

96
K250.6-
2
2·129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九輯

(總第129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
中國文史出版社



C

509904

BAC42/20

(京)新登字第10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 第129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
社, 1995. 6

ISBN 7-5034-0753-0

I. 文… II. 全 III. 中国-文史资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6369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081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印 刷: 通县燕山印刷厂
装 订: 通县燕山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数: 1—7000册
版 次: 1995年7月北京第一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 6.60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护送十世班禅大师返藏纪实 范 明(1)

历史背景——受命保护尊重班禅 为解放西藏作准备——中央决定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向班禅行辕派驻代表——陪同班禅晋京向毛主席致敬——达成和平解放西藏协议 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及职权——达赖和西藏人民欢迎班禅返藏——积极做好护送班禅返藏筹备工作——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随军返藏筹备迎接班禅返藏事宜——护送班禅大师荣返西藏——习仲勋对做好班禅工作和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指示——达赖班禅亲密会晤——胜利地完成了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的历史使命

人 物 述 林 ·

缅怀父亲杨虎城将军 杨振民(45)

杨东莼生平评述 杨慎之(52)

长期的翻译和著述生涯——为人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既是老革命，又是新党员

我所了解的赵戴文 杜彦兴(81)

五台秀才 留学日本——中山信徒 推崇革命——三民主义 始终贯彻——治学一生 自有主张——服从中央 统一行动——爱护人才

不分党派——保持气节 不当汉奸——尽心尽
职 廉洁奉公

·抗战纪实·

抗战期间赴美接舰归国亲历记……阳克铭 胡征庆等(107)

投笔从戎——飞越驼峰——在印度旅途中——
横渡太平洋——海滨旅游胜地迈阿密——在海
军训练中心的学习生活——友谊与偏见——欢
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反贪污的罢课绝食
风潮——接收美国赠送的八艘军舰——在古巴
关塔那摩军港进行作战训练——跨越两洋 万
里返航——八艘官兵回国后的去向——后记

记抗战时期的记者学会战地服务队…………任是军(166)

- 甲、建队前后：总会的决定，建队前的准备，
 青记一支队的成立，雷鸣远和督导团。
- 乙、艰苦创业：青记一支队的初期活动，七人
 被捕，创立队部，筹组青记中条山区分
 会。
- 丙、滞留中原：风雪王屋，掩护牺盟人员，撰
 写战地通讯，总会被迫停止工作。
- 丁、青记北方办事处：参加太行分会工作，太
 岳新闻训练班，青记学会的北方办事处，
 调动到华北《新华日报》社。

·专题资料·

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新县制”…………胡次成(194)

中国所得税创办初期税制内容简述…………张 疏(226)

· 订正 质疑 补充 ·

对《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的

一点订正.....李钦哲(253)

对《游台日记》中一些字句的订正.....张素我(254)

关于《冯玉祥将军谈韩复榘》的一点质疑.....余湛邦(255)

护送十世班禅大师返藏纪实

范 明

已故十世班禅大师的一生，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身体力行，艰苦奋斗的一生。他的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评价，正如万里委员长在悼词中所说的：“班禅副委员长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当年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和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军区负责人之一，我有责任将我40年来与班禅大师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伟大事业中，合作共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身经历史实，翔实地写出来。本文系笔者先期所写有关班禅大师文稿中的第一部分。

历史背景

相传达赖与班禅是中国藏传佛教的格鲁（黄教）派鼻祖宗喀巴的两个弟子根敦珠巴和克珠·格里白柔的转世化身，是西藏两位宗教领袖，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信仰，把他们当成“活佛”来供奉，藏族群众中广泛流传着“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地上的达赖和班禅”。达赖居前藏布达拉宫，班禅居后藏扎什伦布寺，由清朝政府分别赐封直接管辖。

1911年，我国爆发了辛亥革命。1912年推翻帝制，建立共

和。英帝国主义者乘民国中央政府初告成立，中国政局尚在动荡之际，竭力挑拨西藏地方当局同当时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唆使西藏统治集团驱逐清朝驻藏大臣，妄图搞“西藏独立”，脱离祖国。此时，值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在位。史载：“自川军退出藏境，达赖即派兵驻扎后藏，凡生产丰富地方，均被占领。军纪不佳，又复按户征兵，一切军装饷项，均被征者负担。民怨沸腾，公议请班禅到内地向中央求援，班禅从之。达赖闻此讯，约班禅到前藏会商抵御中国，如不同意，即以武力解决。幸有与议之信仰班禅者一人密为报告，班禅乃于民国12年11月轻骑简从，冒险出藏。达赖派兵追还，而藏兵有心缓进，故得脱险。”^①班禅走后，十三世达赖强行接管了班禅辖区的管辖权，委派扎萨喇嘛掌管扎什伦布寺政教事务，并派官兵接管了班禅的所属所有宗（县）和谿卡（区、乡）。

当时的西藏形势，正如九世班禅呈国民党政府文中所说：“边疆多事，国防领土，在在堪虞，西藏民众，痛苦尤亟”，而班禅本人还由于在“民元汉藏交哄之役”，“不避嫌怨，救济旅藏遇难之汉人，冀报祖国于万一”，因而“异己交政，艰难内涉”。史实和有关历史文献表明，九世班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祖国的立场是坚定的，旗帜是鲜明的。九世班禅于1924年抵达北京，晋谒大总统曹锟，“报告西藏政局，要求收回西藏版图”，并要求护送他返藏。1924年，北洋政府册封九世班禅“宣诚济世大师”名号，并准备护送班禅返藏，但因军阀连年混战，北洋政府无力顾及，护送返藏未果。班禅在此待命期间，遍游各省，“宣扬佛教，促进团结，翊赞中枢”。

1927年，国民党当政后，对护送班禅返藏事宜，也进行了多次筹备，但未能有所进展。直到1931年5月16日，九世班禅向国民党政府呈文，表明“班禅忝司黄教，备位西陲，万里来归，倾诚

^① 九世班禅：《近30年之西藏》，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336页。

内向”。请求国民政府“垂念藏民，于最短期间，通盘筹划，解决藏事。俾班禅得以早日归藏，宣示威德，则不惟西藏僧民之幸，抑亦国家无疆之休也”。1933年十三世达赖逝世，国民党政府任命热振呼图克图为摄政，1934年，西藏地方僧俗人事也向国民党政府呈文：“我民众素所希冀者，厥惟佛爷（班禅）在最短期间解决藏事返藏，不幸时至今日未见佛面，心中不胜惦念，惟有朝夕渴望早日返藏，以慰藏民之心。”国民党政府为了表彰班禅“翊赞统一，效忠民国，阐教西陲，抚辑藏服”，遂册封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任命为“西陲宣化使”和“国民政府委员”。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命令，决定护送班禅返回西藏，成立班禅行辕，先后委派诚允、赵守钰为护送专使，并派了护送仪仗队。西藏地方政府亦派出多仁台吉、堪穷向巴却旺等为迎接班禅代表。1935年，班禅奉命行抵青海，积极筹备回藏。但英帝国主义者直接出面干涉，唆使西藏亲帝分子以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派专使和仪仗队入藏为借口，阻止和延宕班禅返回西藏。班禅行辕派大堪布汪堆诺布在西康邓柯与西藏地方政府交涉回藏条件，卒乃枉费唇舌，毫无结果。班禅率全部属员及仪仗队行至青海玉树龙休寺。后值抗战之初，噶厦政府提出班禅不得带蒙汉官兵入藏，并提出后藏永久应受前藏节制等苛刻条件。班禅坚决反对，再次请示国民党中央政府应按原定方案护送返藏。但因抗战紧急，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8月下令：“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入藏”。九世班禅为顾全抗日大局，服从了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于1937年10月致函护送专使赵守钰指出：三大寺和藏政府“毫无欢迎诚意，反欲使班禅与中央断绝关系，听彼指挥。……（班禅）宁愿牺牲个人，力全大局……暂缓西行，以待将来”。并积极投身抗日斗争。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不幸因病在青海玉树圆寂。圆寂时，尚遗嘱班禅行辕官员“要始终拥护祖国”。国民党政府为褒扬九世班禅反对分裂西藏，维护国家统一，阐教西陲的功勋，追封为“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并命令移灵西康甘孜寺，特派考试院长戴传贤致祭和

慰问班禅行辕。1940年11月，西藏派代表王乐阶、卓尼绛巴等迎班禅大师灵榇回藏。1941年抵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建塔供奉。

九世班禅逝世后，并下令撤销护送专使行署，将班禅行辕归青康藏边区专署专员金在治管理。班禅行辕仍按照宗教程序派员寻访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于1941年在青海省循化县温都乡，寻得1938年2月3日（藏历土虎年正月初三）出生的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官保慈丹，并接到青海塔尔寺供养。班禅驻京办事处在寻到班禅转世灵童后，呈请国民党政府批准为十世班禅。此时，西藏地方当局中亲帝势力气焰嚣张，他们逼迫热振活佛于1940年辞去摄政职务，由亲帝分子大扎继任。跟着，1943年夏，他们突宣布成立“外交局”，企图表明“西藏独立”。在帝国主义唆使下，西藏地方当局中的亲帝分子设计陷害热振活佛，1947年5月7日，热振活佛被迫害致死。与热振关系密切的十四世达赖的父亲祁却才仁也受到株连惨遭毒害。正当这个时候，西藏地方当局也自称寻得两个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并派王乐阶再来青海，迎接塔尔寺的这位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到拉萨举行掣签，企图选出一个亲帝国主义的十世班禅，以期达到搞“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阴谋。以扎萨罗桑坚赞为首的班禅行辕官员，提出在西藏问题未解决之前，班禅坚决不返藏，并提请国民党政府明确宣布：(1) 塔尔寺已履行宗教手续的班禅灵童确定为第十世班禅正身；(2) 由国民党政府明令护送十世班禅返藏。1947年8月，国民党政府批准成立西藏班禅堪布会议厅，发给汉藏合璧印鉴一颗，并任命罗桑坚赞为班禅堪布会议厅扎萨堪布，王乐阶为教务处长，计宇结为政务处长，刘家驹为汉文秘书长，拉敏·益喜楚臣为藏文秘书长，罗桑坚赞为总务处长，翁江金巴为典礼处长等，从而粉碎了亲帝国主义分子利用这一事件搞“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阴谋。

1949年6月3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命令：“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予掣签，特准案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8月10日，以国民党政府蒙藏委

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寺使，赴青海塔尔寺主持了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至此，十世班禅在法律上完成了认定手续，官保慈丹成为合法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法名洛桑赤列伦珠确吉坚赞。

从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至十世班禅坐床，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班禅行辕人员在内地停留达26年，正如计晋美1949年12月21日《我们的希望》一文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人民为中国的同胞，我班禅大师为了西藏领土主权的完整和解除人民的痛苦，奋斗努力垂20余年。”但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和北洋、国民党政府腐败，致使西藏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班禅返回西藏宿愿一直未实现。

受命保护尊重班禅 为解放西藏作准备

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班禅行辕的概况是：约有400多人，主要人物有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扎萨喇嘛罗桑坚赞（1950年逝世），秘书长拉敏·益喜楚臣，典礼处长纳旺金巴，政务处长计宇阶，教务处长洛桑坚赞，总务处长图丹尼玛，班禅驻南京办事处长计晋美，以及住在班禅行辕的国民党政府青康藏边区专员金在治等。他们曾以“避免战乱和自身安全”为理由，离开塔尔寺避居青海省都兰县的香日德。

兰州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总部驻甘肃省榆中县城近郊的一村庄里。1949年8月上旬，彭德怀司令员叫我（当时任一野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到司令部，让我看毛泽东主席给他的《关于解放西北方针的指示》电报，其中第四项中特别指出：

“此外，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彭总说：“这是毛主席关于准备解决西藏问题的第一个指示。看来保护班禅，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不仅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决策，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我们必须认真执行、作

好调查研究。”并决定将这项任务交给我具体执行。当时在座的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张德生，还有兰州地下党工委书记杨实同志。

兰州解放后，彭总对我严肃地说，现在联络部在民族工作方面的紧急任务是：第一，要把争取和团结班禅的工作做好；第二，要把甘南藏军保安司令黄正清的工作做好；第三，要把安多地区藏族的工作做好；第四，采取团结教育藏族知识分子，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创办藏族训练班。我们联络部当即本着此精神进行了部署和工作。我接触藏族工作从此开始。于是派员到青海，配合青海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前往塔尔寺，做班禅堪布会议厅留守人员的工作，并通过他们做班禅的工作。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班禅欣慰地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际，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钩鉴：钩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20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钩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边民同声欢忭，今后人民之康乐有期，国家之复兴可待。即久被忽视之西藏人民，亦莫不引颈而望，卜庆来苏。仍恳领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班禅谨代表全藏同胞，向钩座致崇高之敬意，并矢诚拥护爱戴之忱。班禅额尔德尼10月1日叩。”

1949年10月，中共中央情报部派了袁心潮、余恺（秦慎之）等在西宁设立青海联络站（青海省民族研究委员会），负责做争取班禅和达赖的工作，他们在青海省委的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后，将班禅及其集团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1949年11月23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电复班禅：“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

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同一天，彭总也电复班禅：“来电敬悉。查西藏乃中国之领土，在国民党卖国政策下，遭受帝国主义之蹂躏，致全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今我人民解放军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领导下，即将解放全国，摧毁国民党残余，驱逐英美帝国主义者一切侵略势力，求中国领土之全部独立与解放，登全民于衽席，西藏解放，已可预期。尚望先生号召藏族人民，加紧准备，为解放自己而奋斗。”

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帝国主义者通过美国合众社发布了一则西藏当局将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度、尼泊尔，并派代表到北京，以表示“独立”的消息。为此，毛主席在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的同时，授权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于1950年1月20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庄严宣布“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是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也从没有人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拉萨当然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班禅堪布会议厅积极响应这一立场，于1月31日，为反对西藏拉萨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赴英、美等国表示“独立”的举动，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表示愿率全藏爱国人民，支援解放军解放西藏，并发表声明：“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组成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任何帝国主义不能侵略和吞并。我第九世班禅大师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阴谋掠夺，不满意前藏当局与帝国主义的勾结行为，早于1923年离开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里，呼吁请命，国人皆知。去年拉萨当局曾经以‘商务代表团’名义，到英、美从事独立活动。最近又将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和北京要求西藏独立，此等一连串荒谬举动是违反全藏人民的公意，显然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对于这种背叛祖国，接受帝国主义的挑拨分裂的恶劣行为，要誓

死反对到底……”

1950年4月26日，青海省委统战部和青海联络站，为了进一步加强班禅方面的工作和满足班禅的请求，专函介绍班禅行辕原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等，到兰州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一野改称西北军区）见我，申述他们要到西安向西北军政委员会致敬的意见和要求。经请示西北局复电同意后，于6月中旬联络部派人送计晋美等到达西安拜见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首长，“递交班禅大师致彭德怀主席的函件后，并于7月21日列席了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彭德怀主席于7月29日复函班禅大师：“班禅额尔德尼先生：计晋美诸位来西安，收到像片两张，并接6月12日惠书，藉悉先生爱护祖国，关怀解放西藏之至意，曷胜欣慰。关于解放西藏人民和领土问题，我中央人民政府，正在尽速做好准备工作，即行进军，誓将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彻底肃清西藏内部的人民公敌，解放藏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区域自治，从事恢复与发展经济事业。尚希先生依据中国政协共同纲领，广泛宣传民族政策，号召藏族人民，协助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西藏，迅速达成任务，使西藏人民早日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享受平等、安乐、幸福的新生活。兹送上袈裟衣料一件，绸子一匹，茶叶十块及本人像片一张，希即哂收。俾此奉复，顺致敬礼！彭德怀7月29日。”彭总还电呈毛主席，请示班禅大师致敬团晋京事宜。8月3日，毛主席电复彭总，同意计晋美可以赴京面谈他们的要求和解放西藏的意见。

班禅致敬代表携有班禅大师《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函》和《上周总理函》。在《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函》中写道：“……兹特派属员计晋美、王团柱、罗桑、昂嘉格勒等赴京晋谒崇阶专诚致敬，报告西藏情况及前藏反动当局之阴谋诡计，压迫西藏人民，联络帝国主义之事实。伏乞俯赐召见，垂询一切。并恳早日进军西藏，肃清西藏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拯救西藏人民，巩固西南国防，以达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班禅誓率西藏爱国

人士效忠祖国，配合解放军迅速解放西藏，使倒悬已久之边民，得在我英明领袖之领导下，与内地同胞共被露德，享受自由平等之幸福。”计晋美等致敬代表于8月1日还经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主席向毛主席呈递了《解放西藏办法及政教组织方案》，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滇、康、青、新四省同时进军西藏，统一作战，以收迅速解放之效”。《解放西藏办法及政教组织方案》还提出：“西藏有整块的土地，同一的民族，适合区域自治的条件，组织一行政区而将前后藏分别自治。”此外，他们还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和要求。

1950年8月25日，班禅大师及其行辕人员，在人民解放军的护送下，返回塔尔寺等候返藏。9月2日，班禅大师亲率其行辕主要官员前来西宁市，向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致敬，感谢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他们在讲话中表示：

(一)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二)遵守《共同纲领》；(三)加强各民族团结。并在讲话中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基本已被消灭，我们全国人民，已走上光明的道路，开始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团结在毛主席旗帜之下，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所规定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尊重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文，是照顾到我们少数民族的实际需要”；历史上民族间的隔阂和分裂，是已往的统治阶级造成的，“现在人民政府成立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希望各民族本着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亲密团结，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1950年9月11日，班禅堪布会议厅向彭总又呈送了一份《解放西藏的意见》。呈文说：“查现值我中央人民政府积极准备解放西藏之际，本厅为了贡献政府明了西藏情况，并请迅速解放起见，拟具解放西藏管见一份。是否有当恭请采择施行。”《解放西藏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

“(一)现在的西藏……除极少数的帝国主义走狗反动统治官

僚者外，上自政教领袖达赖班禅起，以至全西藏人民都在等待着伟大而亲爱的解放军到达西藏，脱离统治者的桎梏，享受全中国大陆上各民族所享受的自由与安乐，那么解放西藏，根据上面的事实，上面的理由，是顺从民意，合乎西藏大多数人民迫切要求的……

（二）解放西藏越快越好……因为他们反动派有帝国主义者的后盾和援助。倘若时间越长，他们的援助和准备越充分，越周到，反动宣传越深入，抵抗力量越强大……如果旷日持久，则反动派利用充分时间，可能强迫全藏人民，充当兵役，搜刮民财，充实反抗经费……并且还用外交阴谋手段，来联络其他国家，所谓非法‘亲善使团’等，企图让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基于上述情况，所以解放西藏越快越好……

“（三）解放昌都等14县，请政府派遣解放军由玉树向西南的康北群布等三十九族进军，则因地势平坦，行军便利，三十九族的解放，易如反掌。再由三十九族直取昌都等14县，有高屋建瓴之势，利于进攻。一方面由西康大军渡过金沙江，则两面配合夹攻，昌都等14县的胜利解放，可操左券。

“（四）训练藏族人民担任翻译工作……拟请政府在甘肃境内，吸收懂得汉语的藏族人民1000人至2000人，加以短期的训练学习，然后拨派各部队内，随军西进，充任翻译……

“（五）西藏解放后，反动派已经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已被驱逐出境。我达赖班禅两领袖间的隔阂，完全消释，再没有挑拨和离间的存在，那么两领袖自然恢复过去历史性的互相尊重和亲睦。遵守宗喀巴大师遗教，发扬佛教宗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政令，使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全藏人民得享受兄弟民族同样的自由平等，互相团结，更进一步的拥护人民祖国，巩固西南国防，为建设新西藏而努力。”

9月上旬，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计晋美，作了亲切的谈话，答应了班禅致敬团所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并于9月23日，向西北局、

西南局以及青海省委发出了《关于班禅致敬团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的指示》，除了肯定班禅代表“所提西藏政教组织方案的意见很好，是合乎爱国与团结的精神……”外，并作出了我党争取团结班禅集团的英明决策和方针：“班禅集团愿意同我们合作，是一件很好的和很重要的事情。不管西藏解放形式如何及达赖集团的变化如何，我们必须积极争取班禅集团和他们所能影响的人民和我们合作”。同时对他们所提问题和要求，一一作了明确的答复：

- (一) 确定增加班禅封号的时机，俟西藏代表团来谈判后再定；
- (二) 班禅回西藏是确定了的，回藏时机亦待以后情况决定；
- (三) 同意他们组织民族部队3000至5000名，其中包括班禅卫队500名。由人民解放军派出得力与又能搞好民族关系的人员，帮助他们组织和训练；(四) 同意在塔尔寺附近设立民族学院分院或单独的训练班，帮助他们训练行辕人员和一般干部；(五) 同意成立宣传队；(六) 同意拨一个医务所；(七) 帮助他们成立机关消费合作社；(八) 同意拨给一部电台，并配给报务和译电人员；(九) 同意拨给汽车；(十) 同意建立北京、重庆、西安、西宁四个办事处；
(十一) 经费，班禅本人每月用费银洋1500元，班禅行辕人员包括眷属412名，总计每月发面粉2468袋（44斤为一袋）；
(十二) 发还香日德垦牧地，将来如实行土地改革，依政府法令处理；(十三) 同意由政府派联络员参加行辕。中央电报中还要求“转告有关的党政军干部，对他们采取积极和热忱帮助的态度，所有派去他们那里工作的人员，必须加以选择和加以必要的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党的民族政策，具有热忱帮助西藏人民的决心和良好的工作态度”。这个文件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争取和团结班禅集团纲领性的文件。中央又于1950年10月13日，再次致电西北局和青海省委，对处理班禅所提要求作了明确指示，其中关于国民党政府青康藏边区专员金在治的处理问题指示：“金在治问题已与汪锋谈好，仍回西北工作，工作由西北局决定。”

西北局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于1950年11月8日，11月13日

两次作了具体指示，并任命我为西藏工委（后改为西北西藏工委）书记，筹备进军西藏事宜。

在此期间，党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也积极地开展了争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工作。当时，尽管西藏地方当局在大扎摄政为首亲帝分子把持下，对解放西藏设置了重重障碍，中央人民政府仍然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遣代表前来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并逐步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一整套方针、政策。

就西北来说，青海省委和青海省军区，根据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的指示，于1950年5月在西宁组成由当才活佛为首席代表，夏日仓活佛和显灵呼图克图为代表，格勒嘉措任秘书长，并有青海联络站迟玉锐等同志参加的“青海省各寺院劝告和平解放西藏代表团”（简称青海劝和团）。青海劝和团组成后，彭总亲到西宁，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传达中央对和平解放西藏的有关政策精神，勉励他们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7月，青海劝和团从西宁出发，前往拉萨，对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宣传说服工作，使能派出代表赴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与此同时，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于7月10日也从甘孜出发，另路前往西藏，进行劝和工作。

西藏地方当局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对抗中央人民政府，他们不但千方百计地阻挠青海劝和团前往拉萨和扣押了工作人员迟玉锐等；在昌都还毒害了要求前往拉萨面见达赖劝和的格达活佛；而且积极地进行扩军备战，除将一部分藏军分布阿里、黑河地区外，把主要兵力放在昌都一带，企图依据金沙江天险同解放军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我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以军事促和谈，以和谈达到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以及“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决策指导下，不得不于1950年10月7日，发动了解放昌都战役。10月19日，昌都获得解放，藏军除九代本（团长）格桑旺堆率部起义外，大部被歼，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

在党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感召下，在昌都战役取得胜利的促进下，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张和谈的势力和亲帝分裂主义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斗争的结果，亲帝分裂势力头子大扎摄政下台，十四世达赖亲政，释放了被扣押的青海劝和团工作人员迟玉锐等，归还了电台，这是中央与西藏地方联系的第一部电台。并于1951年2月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五人代表团，前来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中央决定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向班禅行辕派驻代表

1950年12月，党中央来电询问西北进藏筹备工作的落实情况，西北局通知我到西安汇报有关入藏筹备工作事宜。我于12月中旬到西安，在西北局会议上，汇报了西北军区关于进藏的设想和方案，以及我个人的意见后，习仲勋等同志也谈了西北局关于进藏筹备工作的一些意见，决定让我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和请示。我们于1950年12月31日抵达北京，住在北京饭店。1951年元月3日，李维汉部长叮咛我准备一个有关进军西藏的汇报提纲向中央汇报。我在汇报提纲中就护送班禅返藏问题提到：“班禅行辕代表由何处任命（中央或西北），以便正式通知班禅堪布会议厅；班禅之民族军3000—5000人有困难，现在只能搞300—500人；民族学院分院可否设在兰州（因塔尔寺无地方），等等。”

汇报提纲送上后，元月30日，李维汉部长接见了我们。首先由我根据提纲汇报了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关于组成西藏工委、骑兵师、班禅民族军和进藏筹备等事宜的设想和方案，以及我个人的补充意见。李部长说，西北的方案和筹备工作设想都不错，并谈了具体意见。

“西北的任务在军事上是配合（以西南为主），准备去接收后藏，进藏以后如达赖在，总的搞一军政委员会，作为成立自治区

的过渡，主席由大头子兼，达赖、班禅与我方副之。现在班禅集团只想管后藏地区，也主张在亚东的达赖最好不走。……西北在策略上应注意争取达赖问题。因此，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派代表驻班禅行辕比较适当，如果由中央派代表，会刺激达赖。

“入藏时如何走，前或后，班禅是否和军队一道，看以后情况……武装可以用班禅卫队名义，搞三五百人……民族学院分院可不搞，在班禅行辕搞一个训练班（和班禅商量），其余的搞在兰州……”

元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作了重要指示：“……中央给班禅已经答应的，如派干部和卫生队等，在3月以前一律搞完毕……”

2月13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关于解放西藏准备工作的通知》：“……（三）所有中央允许班禅集团的条件，必须迅速完满地予以实现，给班禅卫队配备干部及配备一个医务所和电台等，责成西北军区迅速解决”。并将总理、李部长的指示，由我们当面向西北军政委员会传达。

2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经“第38次行政会议通过任命范明为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并由彭德怀主席签署了通知书，正式任命我为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秘书长牙含章为助理代表。指示我和牙含章持介绍信赴班禅行辕到职视事，介绍信说：“额尔德尼先生：兹介绍本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助理代表牙含章前来，至时请予以接洽，并希协力合作推进工作为荷。此致敬礼！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2月27日。”

3月19日，由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扎喜旺徐和中央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主任余恺陪同，我赴塔尔寺举行就职仪式。由于班禅行辕派出中央政权代表这一事实，在历史上从来是表明祖国与西藏地方不可分割，表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之间具有隶属关系，是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一种体现。因此，班禅及其行

辕对举行这种仪式十分重视，按照历来欢迎驻藏大臣的惯例举行了欢迎仪式，隆重异常。班禅和行辕全体僧俗官员，一再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表达了感谢的热忱。典礼完毕后，我当即返回兰州，大力开展了护送班禅和班禅行辕的工作。选派了一批干部组成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办公室，任命李仲西为代表办公室主任，并接收整顿了原国民党政府驻班禅行辕专署的档案和组织机构。

陪同班禅晋京向毛主席致敬

我兼任驻班禅行辕代表的任务除了部署班禅返藏的筹备工作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安排和组织班禅晋京亲自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致敬。堪厅官员对班禅晋京向毛主席致敬很高兴，于3月27日，以班禅名义致电毛主席，请示晋京事宜。4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复电称：同意班禅来京。我于4月9日又专程到塔尔寺通知班禅，并研究了晋京各项准备工作。他们提出对班禅晋京的接待规格，不能低于过去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接待九世班禅的规格。如果低于国民党政府的接待规格，不仅对班禅入藏不利，对争取达赖也不利。我于4月12日就如何接待班禅的礼节等问题，专门发报请示西北局和中央。中央复电命我陪同班禅晋京，并要求当班禅途经青、甘、陕时，各省须按照过去迎送九世班禅晋京时的规格迎送。当时甘肃省委接到中央这一指示后，立即行动，组织专门机关负责筹备迎送班禅。他们派人到塔尔寺，请喇嘛和知名人士，并请我参加，专门研究历代班禅晋京所经之地的迎送仪式，包括搭什么帐篷，街道彩牌要搭多高，用黄色缎子裹起来，有多少僧众和居士持香迎候等等。

1951年4月19日下午7时许，由我陪同班禅离开青海省塔尔寺到达兰州时，受到党政军首长张宗逊、张德生、邓宝珊等和兰州各

机关干部，群众团体代表，民族学院学员，各族各界群众3000余人，以及穿着袈裟手持香柱的佛教徒和喇嘛1000余人，按传统礼节的热烈欢迎。这时，我又以西北西藏工委书记的身份欢迎班禅。班禅破格下车还礼，和欢迎者一一亲切握手，并和张宗逊副司令员、张德生书记、邓宝珊主席、吴作宾市长和我互赠哈达。班禅下榻在新盖的西北大厦，由西北西藏工委负责接待。为了欢迎班禅，西北大厦完全按照宗教仪式进行布置，墙壁和设备都用黄色缎子装饰，走道铺着红毛毯。他们一再表示满意和感谢。

班禅在兰州住三天后，由我陪同乘飞机到西安。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陕西省政府主席马明方，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汪锋和中央民委特派欢迎代表杨静仁等负责人和群众、学生到机场欢迎，少年儿童向班禅献了花。

4月27日，我陪同班禅大师一行乘火车抵京。到车站欢迎班禅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李六如、蓝公武，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务院秘书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人民监察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会、院、署、行首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全体在京委员，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等共90余人。此外，尚有民族事务委员会机关干部，民族学院、蒙藏学院、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北京市寺院僧众、喇嘛及在京藏族人士代表500余人。欢迎队伍高举着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巨幅标语：“欢迎班禅额尔德尼！”“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

车站举行了庄严隆重的欢迎仪式。班禅等所乘的专车由用红黄两色彩绸装饰的机车牵引，在军乐声中徐徐开进北京车站，班禅下车后，先向朱副主席、李副主席，周总理、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副总理，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李维汉主任委员等献哈达，

并接受少年儿童献花和北京市寺庙代表以及在京藏族人士献哈达以后，与朱副主席、李副主席、周总理并肩走出车站，由特备的黄色汽车送往驻锡地畅观楼。新华社对班禅抵京受到热烈欢迎一事作了详细报道。

“五一”国际劳动节，李维汉部长和我陪同班禅登上天安门城楼，班禅向毛主席献了哈达。然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厅里同班禅作了重要谈话。毛主席说：很久以来的中国历史，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压迫的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毛主席勉励班禅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贡献。毛主席说，要团结，与达赖搞好团结，可以给达赖发电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主张和平解放西藏，保护寺庙，宗教信仰自由。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对祖国与西藏的关系，清朝、国民党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作了阐述，并肯定了清朝和国民党政府作为当时的中央政权，为维护祖国统一方面应有的立场。

达成和平解放西藏协议 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及职权

1951年5月2日开始^①，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正式举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中央谈判小组，除了李维汉等四同志为全权代表外，并指派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常黎夫和我，也参加谈判小组的内部工作。班禅副委员长1981年在《西藏民族发展繁荣的伟大转折》一文回忆说：“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为了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解放西藏广大人民，从西藏的历史、民族、宗教等各方面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

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5—26页）为什么是“艰苦的努力”呢？这是包含了许多丰富的内容的。谈判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恢复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问题，但西藏地方代表团说，他们西藏已经有了十世班禅，不承认现在内地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是九世班禅的正身。既然连十世班禅的合法性都不想承认，那么恢复固有地位和职权的问题就无从谈起。这是当时那个西藏地方代表团给我们出的第一个难题，是想将我们的军。由于当时我们还不掌握这方面的具体材料，一时无法进行有力的驳斥。李维汉部长要我很快把决定班禅正身的依据查出来。于是我就找计晋美和班禅的经师嘉雅活佛，询问决定班禅正身的依据。其实，班禅方面他们早有准备，他们拿出了有关历史文献，说按照历史上惯例，达赖、班禅坐床都需经过中国的中央政府批准才算合法。例如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就是由国民党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去拉萨主持的。他到拉萨，手里拿着国民党政府盖印的批文，一切都得按照清朝的旧例办。否则，他就说，那么好，这个批文我带回去，不参加坐床仪式。噶厦就只得答应他提的要求。如果按西藏地方代表团所说他们已经有了正式坐床的班禅，那么就是没有经过国民党政府批准和中央政府主持坐床典礼的不合法的班禅。我将这个历史文献交给了李维汉。他说，这就好了。到了第三天，恢复了谈判会议，李部长手里拿着历史文献，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西藏搞的那个班禅没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批准，是不合法的。西藏代表说，西藏没有独立时，达赖、班禅坐床需要中央政府批准。我们已经独立，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了，这次来谈判，就是以西藏独立国代表的身份来谈判的。我们

① 据《当代中国》民族卷第61页载：“4月29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北京正式开始。”

西藏那个班禅，就是西藏独立国批准的，所以是合法的。很明显，承认不承认班禅，已成为西藏是不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重大政治问题了。这次西藏地方代表团是作为西藏独立国的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两个国家谈判呢，还是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与中央政府的代表谈判呢？这是谈判一个根本性的前提。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从否定班禅入手，原来他们更深的本意就是要想搞“西藏独立”。对这个问题，当然不能有丝毫含糊。李维汉部长当即严厉地驳斥他们的谰言，说你们这个代表团所说的“西藏国”是非法的，你们这个非法的政府批准的那个班禅正身，当然也是非法的。你们这个代表团只能是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与中央代表团就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如果你们不首先纠正代表团的性质，就不能再谈了。这一下他们理屈词穷，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托词说是藏文与汉文上翻译上的差错，并声明说，是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谈判，不是两个国家的谈判。这样就把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说，拉萨的班禅不合法，没有中央政府的批准，我们承认。青海的班禅也不合法，因为也没有见到中央政府批准班禅的公文。因此他们提出：现在不要谈班禅问题，等谈判成功后，把几个班禅请到一起举行抽签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再定。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提出这个问题后，李维汉部长很为难，他深夜两点多钟把我叫起来，又限我在第二天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于是，我马上去找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官员们询问这件事。他们很坦然地说，这个不成问题。他们早在1949年当李宗仁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时，由计晋美（他当时是班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向国民党政府办理了有关手续，取得了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十世班禅的全部公文。这次班禅晋京，计晋美就把这些文件全带着。计晋美立刻拿出来国民党政府的文件，还拿出了十世班禅在塔尔寺坐床时的照片，我当即将全部文献连夜送给李部长。

第二天，谈判继续进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当看到国民党

政府任命十世班禅的公文，没有话讲了。但他们还想找岔子，又说达赖和班禅的坐床应有双方代表参加才算合法，达赖坐床时，有班禅派人参加，但班禅坐床时却没有达赖方面的人参加。他们的话音刚一落，李维汉回答说，有！这里就有十世班禅坐床时，达赖驻南京办事处代表参加的照片。把相片向桌子上一摆，向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们一看，都低下头，不断齐声地说“拉索”（是）！“拉索”（是）！这时，李维汉又说，你们既然承认了班禅大师，班禅是西藏的领袖，明天休会，你们去朝拜班禅。第二天，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按照传统的宗教仪式，在畅观楼参拜了班禅大师献了满扎，班禅也以传统宗教仪式为他们摸了顶。这样不但解决了班禅的地位问题，也就把他们所谓“西藏独立国”代表团否定了。以后，李维汉部长提起这件事时，一再说计晋美立了大功。

既然承认班禅，就得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就必须把这条写进“协议”里法定化，这是谈判又一个实质问题。当把这个问题提到谈判会上讨论时，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不承认班禅的固有地位，说那是清朝政府压达赖强加给他们的，以后九世班禅“叛乱”，逃亡到内地，十三世达赖就把班禅的政治权力和固有地位取消了。这样说就使谈判又发生争论。于是就组织人员查阅清朝政府时的档案，把清朝对西藏的册封和公文都全部找出来，查出有一份在宣统二年（1910年）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时，清朝政府下令革去达赖喇嘛名号的文件。李维汉说，过去的中央政府，已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你们保留达赖喇嘛，是违抗中央，不执行中央命令；你们擅自将中央政府册封和直接管理的班禅予以废除，给班禅加上“叛乱”的罪名，这是非法的。事实上九世班禅是维护祖国统一的。那么到底是谁在搞分裂，谁在搞叛乱，不是一目了然吗？在这有理有力的论证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才同意将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问题，作为条文写进《协议》。1951年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终于签订了，共17条，这

就是后来人们简称为“十七条协议”。从此，西藏回到了祖国的大家庭，西藏民族开始了新的历史篇章。协议条文已经公布，这里就不赘述了。

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达成协议后，5月24日下午，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主要官员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敬，敬献了哈达和礼品，其中红缎锦旗一面，上边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字样；还有镶嵌“毛主席万岁”文字的金盾一座，藏制长寿铜佛一尊，藏制银满扎（为西藏人民敬献领袖的最尊敬礼品，状似银塔）一套。此外，尚有西藏珍贵名产金丝缎、鹿茸、藏香、藏红花、各种兽皮、各种氆氇、各种衣饰以及西藏1904年抵抗英国侵略者时战士所用之武器、弹药等90余件。与此同时，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代表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也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敬，敬献了哈达和礼品。

5月28日，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发表声明，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声明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已经取得了圆满的协议，西藏民族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伟大的祖国大家庭。中国各族人民都为这一重大的事件而欢欣鼓舞。我们是西藏民族，因而有着更加难以言喻的兴奋。”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这一协议的成立，我们首先深深地感谢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感谢毛主席对我们西藏民族父母般的关怀，我们也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各族人民，由于他们的奋斗努力，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才使西藏和平解放成为可能。同时，十四世达赖喇嘛于其亲政之日，即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代表来京谈判，并签订了协议，这也是我们深为

敬重的。

“为了西藏民族的彻底解放和发展，为了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今后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领导，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正确执行全部协议，为西藏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而奋斗！”

6月1日，班禅大师为和平解放西藏取得协议，怀着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的深厚感情，特电毛主席致敬：“……敬爱的毛主席，您确是我们各族人民伟大的领袖，您的事业像须弥山一样的巍峨，您所给予各族人民特别是我们西藏人民的恩惠像海一样深邃。我这次来到北京，得瞻仰您慈祥的丰采，看到在您的领导下人民首都的一切建设，看到由于您伟大的民族政策的感召，我们西藏民族和中国各兄弟民族团结起来，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就要回到祖国大家庭来，我感到无限的荣幸和愉快。今后，我们一定要为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为我西藏民族永远地脱离帝国主义羁绊，获得解放和发展而努力，首先是加强民族团结，包括西藏民族内部和西藏民族与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在您的领导下，西藏将来必然成为幸福与繁荣的西藏。西藏民族必然成为发展与进步的民族，我们各民族的祖国，在其已经奠定的强大而牢固的基础上，必然成为更加尊荣和繁昌的祖国。”

接着，班禅大师一行去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参观后，于6月20日返回到兰州。中共西北西藏工委遵照中央指示向班禅大师赠送纪念品。在举行隆重赠送纪念品大会上，我代表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将一座金盾赠送给班禅大师。金盾图象是伟大可爱的祖国西藏高原的喜马拉雅山，山上插着鲜红的五星国旗，红旗上镶着金色的毛主席像，象征着西藏人民在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下，自由幸福生活的远景。金盾上镌刻的铭文是：“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为解放西藏，建设新的西藏而努力！”这行铭文，表达了党和这位宗教领袖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同时，实际上也成为我这个派往与之共事的共产党人和他共同的

誓言。

6月23日，班禅大师一行返回青海塔尔寺暂住，并于24日致电毛主席致谢。电文说：“辞别后历游天津、上海、杭州、西安等地，……我目睹了人民祖国的伟大建设和各兄弟民族的幸福生活，使我深深地感觉到由于您的英明领导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措施，才能有今日新中国的成长和发展。我相信不久以后，西藏的建设也会和各地一样得到繁荣和发展。”

对这次班禅晋京和到各地参观，我于7月2日向中央、西北局、西南局上报了《关于班禅晋京及到各地参观的收获的报告》：“班禅及其集团此次返回收获很大，不但在生活形式上起了很大变化，并且在政治上、思想上起了重大变化。根据我们从各方面了解调查，除对中央及各地热烈招待，特别是毛主席的伟大，祖国的可爱等反映很好，影响极大外，并因此而从内心解决了以下各项疑虑问题：

“（一）班禅及其集团在未赴京向毛主席致敬前，对我党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政策虽屡有所闻，但疑虑戒备很深，连计晋美在内也都怀疑这些政策是否能够真实兑现。因而在初到兰州时，看到有佛教徒和喇嘛以宗教仪式列队欢迎时，班禅等受宠若惊，破格下车答礼，经久不停。兰州佛教徒和喇嘛要求参拜，他们起初不敢答应，经解释说明后，举行了两次参拜礼，同时到西安、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各地，亦均能自由举行宗教仪式，接受信教群众的参拜，从此才真正的打消了他们的疑虑，相信我党的民族政策是真实的，并进而相信了我党所有政策都是真实的。他们暗中向黄正清表示：‘共产党根本不迷信，但又能让宗教信仰自由，这点都是真的，那么还有什么虚假的呢？’”

“（二）在未去京前，由于过去特务造谣的结果，怕我是先甜后苦的政策，将来总会有一天突然强迫喇嘛还俗，改寺庙为学校等疑虑。但由于看了电影，得知苏联现在还有教徒，又由于看到

我们现在对天主教的三自政策等，他们现在很肯定地认为：在交通、科学发达后，宗教将来便会逐渐的自然的没前途。但共产党决不会强迫取消宗教，只要不勾结帝国主义，爱护祖国，不作特务反对人民，不专制压迫，反对内部改革，他们的宗教生活将会很好地过下去。”

达赖和西藏人民欢迎班禅返藏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后，为了贯彻执行《协议》，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实现班禅返回西藏，中央指示，俟达赖和西藏人民表示欢迎班禅后，班禅再入藏为宜。为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班禅大师曾于1951年5月30日致电达赖喇嘛：“达赖佛：在您亲政之日，即响应了我们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自己的全权代表来中央谈判，并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我们西藏民族和中国各兄弟民族空前的团结起来，使我们西藏永远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西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事业得到合理的尊重与保护；我们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生活得到逐步提高和发展，从而达到繁荣和幸福的可能。这是我们西藏民族僧俗人民的伟大胜利。班禅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特电致贺，并衷心地表示我们向您的敬意。”

接着，班禅还致电西藏扎什伦布寺政教官员和僧俗民众，希望他们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一致，电文说：“不但达赖佛和我团结，西藏的一切地区、部落和教派的人民都要团结起来”，“为彻底实现这个协议，积极地援助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

通过班禅堪厅以及西北西藏工委联络处派到西藏的迟玉锐等分头进行工作，1951年7月，经由迟玉锐携带的电台，发来《西藏

《班禅系统政教官员和全体僧俗民众致班禅电》，我们立即于7月29日，将电文经甘肃省委转给中央和西北局。原电为藏文，译成汉文后连同藏文原电一并送中央。这是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传到西藏后，班禅系统的政教官员和全体僧俗民众给班禅发的欢迎电，是一份有关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及职权很重要的电报。这份历史文献，也是堪厅与噶厦关于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及职权谈判成果的重要证据之一。电文如下：

“救世救人领袖班禅大师座下，我们最崇拜的领袖班禅正身，很盼望着早日回到西藏，在好几年中诵经求神，前藏当局也很关心在藏的和在外的班禅佛领导下的同仁，不变的亲密团结共同奋斗而努力，以及最近达赖喇嘛执政以后，要恢复班、达二佛不能分离的关系。也是达赖先后诵经祷神的结果。达赖告诉我们，佛座确是班禅转世正身，并命从速欢迎我佛返藏。我们极度欢腾，将这最吉祥的消息，照例通知全藏人民热烈庆祝，现已完竣。我们也派代表前去亚东向达赖佛致敬。同时发电向佛请示一切。现在我们朝不待夕地要叩见金面，恳求我佛在很短的时间回到西藏和达赖会见，使全西藏人民得到安居乐业和幸福，务请我佛不要忽略我们的请求。至于返藏南、北路线和迎佛代表路程长短，叩堪厅请我佛明确指示。我们每天三次叩求和献哈达满扎叩头。亥卯年藏历5月10日。”

接着，扎什伦布寺驻拉萨办事处给班禅堪布会议厅发来电报说：“班禅活佛于藏历6月27日发给我们的电报及堪布会议厅的电报，统于藏历7月3日由张经武代表转给我们，读悉后欣慰万分，敬致崇高敬礼。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领导下，西藏和平解放，人民得到安乐，班禅活佛和达赖喇嘛从此亲密团结，这一切人民都表示欢欣和拥护。关于班禅活佛及官员人等入藏路线拟定于北路，请张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以及扎什伦布官员斟酌一节，已将原电转给扎什伦布，此间除向张代表及西藏地方政府接洽商谈外，最近扎什伦布扎萨喇嘛和僧俗官员及僧俗人民等之来信，探

问班禅活佛及官员等从青海出发日期及路线。准备派色杰活佛见扎海当格冬为僧人代表，孜恰丹隆田品官业且多丹巴、拉敏列参巴仲哲加帕杰仲为官员代表，措布多仁尼玛彭措为俗人代表，前来迎接。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亦准备派人迎接，让我们拍电通知。为使以上人等很快前来迎接，并按需要另派迎接人员及准备途中用物什，现在入藏路线虽已拟定，尚希决定出发日期，倘有其教育并希及早见示。”

9月中旬，经中央人民政府赴西藏代表张经武同志等进行一系列的工作，达赖喇嘛于9月19日（藏历铁兔年7月19日）致电班禅，全文如下：“班禅额尔德尼：5月30来电，此间于藏历六月四日接悉，甚慰。您对宗教政治及人民等均走上和平的大道，首先使中藏和平解决，并将西藏所有的教政照旧尊重保护，你的好意谢谢。至于此间我卜卦所得到良好征兆，您确前辈班禅化身，决定后已经公布扎什伦布讫，并届时已由卓木（亚东）去电知照北京西藏代表阿配（沛）噶伦矣。现在希望您即速启程回寺，所经道路决定后希先来电为荷。达赖佛于罗布林卡藏历七月十九日。”

积极做好护送班禅返藏筹备工作

护送班禅返藏的物资筹备工作，在中央、西北局的关怀下，由西北西藏工委统一筹办。1951年3月5日，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向我递交了《班禅佛返藏所造具预算的报告》，《报告》说：“查历代班禅由内地入藏，为历代政府所隆重举行，载入史册有例可稽。其意义所在为班禅系佛教领袖，所有蒙^③藏同胞均皆信佛教，极端崇拜。政府之礼貌班禅，无异间接优待蒙藏兄弟民族之表现。我班禅大师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之侵略，远来内地奋斗呼吁近30年。兹欣在我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领导下，西藏行将解放，我佛此次之返藏实为光荣无上。且目的在领导西藏人民，拥护人

民政府，巩固西南国防，其意义之重大与历代班禅之入藏不可同日而语……”经请示中央和西北局，对护送班禅返藏的筹备工作，基本按此精神办理。筹备工作主要在兰州、北京进行。在北京，由中央民委办公厅主任杨静仁和西北西藏工委的牙含章、萧生负责。班禅驻北京办事处也做了大量工作。在北京主要是接收和安排从中央选调的护送班禅干部，领取经费，采购所需装备，根据班禅堪布会议厅的要求，为班禅特制了活动房子；派干部去天津、上海等地订制采购各类需要物资。在兰州、西宁等地的物资筹备工作由王直、余恺、黎之淦、刘肇功等负责，班禅行辕也相应成立了入藏筹备处，由计宇阶任处长。先后从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等省采购马、骡和驮牛，购置帐篷，炊具，粮秣和各种装备。共计为班禅行辕购买马骡1700匹，驮牛3817头；从甘肃省民勤县雇骆驼3000余峰，从青海雇了驮牛。

建立民族武装。1950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班禅致敬团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的指示》，曾指示“同意他们（指班禅）组织民族部队3000至5000名，其中包括班禅卫队500名，均采取逐步建立、扩大的办法，由人民解放军派出得力与又能搞好民族关系的人员，帮助他们组织和训练。”为了贯彻中央这一指示，1951年2月和3月，青海省委和青海省府、青海省军区先后发出指示，决定成立解放西藏民族军招募委员会，由扎喜旺徐为主任，杨文安、拉敏·益喜楚臣为副主任，余恺负责领导办理这项工作。提出以“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巩固国防！”“护送班禅入藏！”为口号，在青海省的化隆、贵德、循化、共和、同仁、海晏等藏族聚居的县，以能懂得汉语的藏族青年为主，招募解放西藏民族军。从青海省一军派出军事、政治骨干，对招募的民族军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后，与班禅原来的卫士队合并，组建了班禅警卫营。当时与拉敏·益喜楚臣商定，警卫营的营长、副营长由班禅堪布会议厅选派，教导员、参谋长由派去的解放军担任。警卫营共有398人，营长丹巴，教导员赵凯。

在西北西藏工委向西藏进军途中，9月29日，牙含章、梁选贤向工委报告了对班禅行辕工作整顿办法的意见，经工委研究，于10月2日从通天河复电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对班辕藏籍特务处理应特别慎重，切不可操之过急，因小失大，但亦不可讳莫如深，放任不管。根据以往经验，似应说服拉敏·益喜楚臣，由他主持召开行辕全体人员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大会，鼓励参加过特务的分子在会上坦白、控诉。这样不仅在群众中揭露了他们的面目，并且可以增加群众对国民党特务的仇恨，提高其政治认识，同时这种方式他们也容易接受。（二）对国特楼柳堂的处理，似应采取大张旗鼓公开逮捕法办较妥，可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正式命令行之。因采取调训，调职然后逮捕的方法，不仅容易引起班辕疑窦和误会，并将严重影响尔后真正调职、调训人员。（三）班辕今冬入藏装备应尽量尊重他们的意见，采用藏族喜用和习惯的装备，尽量少用现代化装备。我们此次实际经验证明，所有我们主观上以为先进的科学装备（如夹胶帐篷、雨衣等），到了草地高原后又反成落后的东西”。10月23日，牙含章、梁选贤又向西北西藏工委报来了《关于班辕藏籍特务的处理意见》，工委于11月11日从黑河复电，提出的意见是：“采取订立戴罪立功计划，并由堪厅作出书面保证的方法似有考虑必要。因为这样做在表面上固然可以取得一定的保证作用。但根据以往无数次的经验证明，不仅实际作用不大，而且往往因为立功计划和保证过高不能实现，从而引起戒惧、隐瞒、欺骗，加深了隔阂，反陷我于不利。因此我意对这些藏籍特务处理，只要能做到坦白登记，割断特务关系，不再继续进行特务活动即可，不必再有过高要求和附加条件，然后再循循善诱，推诚相见，争取其逐渐进步似较妥当。”

应如何对待国民党政府派到班禅堪布会议厅的人员问题呢？那里有一批精通西藏问题的汉人，如刘家驹、金在治等，他们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也是精通藏族问题的专家。对他们要进行清理。清理，不是肃清。例如中央于1950年10月13日关于处理国民

党政府边区专员金在治的电报中就曾指出：“金在治问题已与汪锋谈好，仍回西北工作，工作由西北局决定。他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因有叛变嫌疑，须有证明才能决定。对此人仍应鼓励争取，同时加以警惕。”这就是用他熟悉藏情方面的长处，分配一定的工作。对其他人员，我认为应该按照解放初期我们党对待国民党政府机关的旧人员一样对待。

国民党派到班禅堪厅那里的人，不一定都是特务，不能一刀切，有些是职员，也有特务。对这些特务，不能和国民党打入到共产党里的CC、复兴社、军统特务等同对待。就以国民党的特务来说吧，国民党向共产党那里派特务，是为了破坏共产党，破坏革命，进行反革命活动。那么，国民党派到班禅堪厅那里的特务是什么呢？是要消灭班禅集团吗？他们的特务任务是什么？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从历史事实来看，国民党派赵守钰、金在治、刘家驹等人到班禅行辕，是要控制班禅集团，防止班禅集团与前藏的达赖集团勾结起来，投靠帝国主义，分裂祖国。这就是他们的特务任务。这个任务的名称可以叫“特务”，但不是为了消灭、打倒、破坏班禅集团的特务，而是控制班禅集团不要投靠帝国主义，分裂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特务。这是其一；其次，退一步说即令是特务，它与国民党要消灭共产党的特务有区别，不能等同。

当时堪厅有一大批汉族旧职员。难道都是特务，都要肃清？对这种做法我当时虽然有疑虑，但思想认识上还没有像上面谈的这么明确。

关于对班禅集团的看法问题。我们对班禅集团包括班禅本人，以及计晋美、拉敏等上层人士在内，是把他们当成民族、宗教上层及宗教领袖对待加以团结。从阶级上讲，他们属于农奴主阶级，但按照当时西藏的历史条件和他们的政治倾向，从政策上我们只能把他们作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成员来看待。

8月1日，西北西藏工委离开兰州向西藏进军，这天我们到达

西宁。我专门去检查西宁供应处为班禅返藏的筹备工作情况，并到塔尔寺向班禅等辞行。向班禅传达了中央关于我率部先行进军西藏后，留牙含章继续在班辕处工作，班禅行辕可派少数人随我先行入藏的电报指示。班禅及堪厅官员除表示完全遵照中央指示外，并对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以及班禅返藏的准备工作等问题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协商。班禅等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西藏的情况，提醒我们到西藏后，要注意防毒等。8月18日，我将上述同班禅辞行的情况，向习仲勋书记和中央作了报告：“我们此次路经西宁，特去塔尔寺向班禅辞行，并介绍牙含章同志到职，班禅及其行辕全体人员举行盛大欢送会，并赠送马鞍、藏服等礼物，对中央和西北局留牙含章同志负责行辕工作，颇表感激之意。惟对其早日入藏要求亦颇迫切。”

1951年9月，我率西北入藏部队到达黄河源时，收到牙含章发来的电报，说中央派给西藏的干部梁选贤已报到，尚未任职。因班禅提议要给他派一个“仲泽钦保勋巴”（即副秘书长），我即向中央发报提请任命梁选贤为班禅堪布会议厅副秘书长。中央电复同意。

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随军 返藏筹备迎接班禅返藏事宜

根据中央对班禅入藏，工作人员先进去，班禅后去的指示，1951年7月组织了班禅行辕的200余人，随我所率领的人民解放军西北入藏部队返藏，经请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命名为“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由计晋美任主任委员，纳旺金巴任副主任委员，并将他们一行编入十八军独立支队（西北西藏工委对外名义）的行军序列，计晋美被任命为副指挥员，我是指挥员兼政治委员。8月28日，我们离开青海省都兰县的香日德。经过长途跋涉，于12月1日返抵拉萨。12月4日，计晋美代表班禅率领班禅行辕入

藏工作委员会全体人员，前往罗布林卡拜谒达赖喇嘛，向达赖递交了班禅额尔德尼馈赠的礼品和班禅大师照片及亲笔函件。12月18日，班禅行辕扎萨计晋美、大喇嘛纳旺金巴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电称：“由于毛主席的伟大感召，使和平解放西藏得到迅速实现，流落内地多年的我们，才能很快地回到西藏，见到了达赖喇嘛和久别的故乡人民，我们感到万分兴奋和愉快，并使我们永远难忘。……”班禅行辕的官员回到西藏后，西藏工委根据十七条《协商》精神，说服噶厦与班禅双方在团结的基础上进行协商，首先议定将扎什伦布寺归还班禅。1952年2月，计晋美率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回到久别的日喀则，接收了扎什伦布寺。

班禅响应祖国的号召，积极参加抗美援朝的斗争，将他在新疆伊犁的牛羊等财产的1/3作为对抗美援朝的捐献。并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致电志愿军总部，对志愿军致以崇高的敬意。

1951年11月6日，班禅大师致电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和西北进藏部队司令员范明，对进藏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慰问并赠黄金150两。于11月28日在重庆西南军区大礼堂举行献礼仪式，班禅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孙克巴顿代表班禅大师将150两黄金，献给了西南军区李达副司令转交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

护送班禅大师荣返西藏

1951年11月3日（藏历铁兔年9月5日）达赖又致电班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已派代表迎接班禅返藏，电文说：“西藏地方政府已派定堪穷、代本各一人及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堪布总代表即日出发，前趋迎接。并指令西藏地方武装驻黑河之贾当（第五代本）之烟日营士兵100人，当您行入藏境后，负责担任警卫，请您准时迅速起程，实为盼。”接着，班禅致电达赖，通知了返藏日

期。电文说：“为了建设新西藏，您促我早日返藏，为我筹备一切，并令第五代本候命保护。这些盛情厚意使我万分感谢。现我已决定于今年12月15日（藏历铁兔年10月17日）返藏，谨电奉闻，并以至诚向您保证：这次返藏后，在毛主席、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进一步加强我藏族内部的团结，并与国内各兄弟民族人民亲密合作，为迅速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建设一个繁荣幸福的新西藏而共同奋斗。”班禅大师还致电西藏扎什伦布政教僧俗官员并日喀则全体僧俗民众，通知了由青海启程返藏的日期。

班禅大师返藏之前，曾分别致电毛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张经武、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和青海省人民政府表示感谢。班禅致毛主席的电文说：“在您的英明正确领导下，使好多年来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的西藏问题获得了解决。这不仅使全国大陆胜利统一，而且拯救了西藏民族与西藏人民于苦海，走向光明幸福的大道。现值班禅返藏之际，谨以至诚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并以至诚坚决表示：这次返藏以后，一定要在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与达赖佛紧密团结，共商一切，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12月13日毛主席电复班禅予以勉励，电文说：“感谢你的来电。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1951年12月15日，班禅离开塔尔寺来到西宁向青海省党政军领导和青海省人民辞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来西宁市欢送班禅大师光荣返回西藏，并看望了班禅，馈赠银洋3万元，检查了班禅返藏的筹备工作，还向班禅行辕的官员作

报告，勉励他们要爱祖国，拥护共产党，认真实行《协议》，与噶厦官员互相谅解，搞好团结，为建设繁荣昌盛的新西藏而努力。12月16日，青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1000多人，在西宁举行欢送大会。习仲勋代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致欢送词，他说：“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同达赖喇嘛一样，在西藏人民中的信仰是很高的，班禅先生离藏28年间，西藏人民时刻在怀念着。班禅先生此次返回西藏一定会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对和平解放西藏取得了协议的必然结果。是接着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的又一件大喜事。这说明，西藏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位先生已经团结起来了，全西藏的人民团结起来了。从此，我们祖国的各民族都亲密地团结起来了。”班禅大师致答谢词，对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和青海省党政军在解放以来的关怀和这次热情欢送，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返藏后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这隆重的欢送会上，班禅大师谈了自己发自肺腑的感想，他说：“我们流离内地快近30年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中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重返西藏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青海省党政军的负责人张仲良、赵寿山、廖汉生、喜饶嘉措以及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黄正清出席了大会，都讲了话。会上，西宁各族各界代表和儿童向班禅献花、献旗，并通过了给达赖喇嘛的贺电。

12月19日，班禅及其堪布人员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牙含章和我们派往班禅堪布会议厅任副秘书长的梁选贤等陪同护送下，离开西宁启程返回西藏。习仲勋书记亲往送行，

西宁市各界人民亦列队前往欢送。新华社对班禅大师离开西宁返藏作了报道。

习仲勋对做好班禅工作和 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指示

在班禅离开西宁返藏的先一日（12月18日），习仲勋书记向牙含章、梁选贤等作了《关于做好班禅工作和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让他们带交西藏工委贯彻执行，其要点如下：

“（一）西藏目前主要搞好统一战线，藏族内部的，藏族与国内各民族的统一战线工作。

“（二）不敢犯急性病，采取稳进谨慎的方针，所谓稳进，不是不进，而是多用思想，多考虑应办不应办，办了以后如何？这样做去，办一步就有一步成绩，并且可以巩固起来。这是搞好西藏工作的方针。在西藏，有些事情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好，否则反而要走弯路。

.....

“（四）统一战线，以我们为主体，首先搞好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团结，然后搞民族、宗教、上层、下层、僧俗、农牧民，组成一个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爱祖国，反帝国主义，这是西藏搞统一战线的基础。搞这个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开展反帝斗争，在斗争中巩固扩大统一战线。西藏，反封建一下还谈不到。……要把他们争取、组织到反帝统一战线中来。因为今天他们还愿意爱国、反帝……

.....

“（六）对班禅集团，要多帮助，要教育他们，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班禅集团在西藏，就像新疆的伊宁三区一样，是一个进步力量，他们在西藏是被压迫的，他们不靠我们是不可能的，会和我们合作到底的。我们只应在合作当中帮助他们进步。

今天他们在大的方面和我们能站在一起，这就对。对他们的落后不要要求过高。只要‘大同’就可以，‘小异’是要有的。有‘小异’就是统一战线。这一点你们要特别注意，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气魄。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要争，要马虎。

.....

“（九）对入藏的汉族干部，多做政治教育，要求他们在藏族人民中作出模范行动（各方面的模范）以影响他们。

“（十）要注意西北去的干部，要和西南去的干部团结一致。”

牙含章于1952年5月护送班禅抵达拉萨后，当即将习书记的上述十条指示，向工委作了汇报传达。工委认为习书记关于西藏统一战线工作的十条指示，是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方针政策上以及领导方法上作了辩证法的阐述，对西藏搞好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搞好藏汉团结，藏族内部团结和干部内部的团结等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当即将习书记的指示转发各分工委，要求结合当地实际，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

达赖班禅亲密会晤

班禅及班禅行辕包括班禅警卫营、班禅医疗队、班禅文工队等共计809人，护送人员及民工1071人，总计班禅行辕人员、护送人员及民工为1880人。班禅及其行辕分三批返藏：第一批是计晋美、纳旺金巴率领的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200余人；第二批是班禅及堪布主要官员及行辕人员342人；第三批班禅行辕留守人员包括眷属200余人，由图丹尼玛率领于1952年6月离青返藏。

从西宁出发前往香日德978华里是乘汽车前往，这段路程是便道行车，道路高低不平，橡皮路、翻浆路，泥泞塞途，汽车行驶缓慢，整整六天方才抵达。行经青海湖和驻锡香日德，班禅大师按教规进行宗教活动，向青海湖投掷了食品和金银财物。佛教信

徒赶着牛羊，驮着财物，长途跋涉供奉班禅，班禅向信徒摸顶祝福。

1952年1月，香日德地区连降大雪，传说唐古拉山雪封山。牙含章向中央和西藏工委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李维汉部长电询雪情，并指示如唐古拉山被雪所封就待来年再启程。如此众多的人、畜集中区区一地，停留日久，人粮马料难以接济，后果不堪设想。西藏工委于1月9日电复：“根据调查了解，唐古拉雪封山的季节，多在阴历八九月间。即或万一出乎意外，亦可向南绕道走唐古拉山之尾朝拉山口，不但道路平坦，且从不积雪，西藏方面保证作好：（一）派骑兵一个排，带电台一部，协同计晋美工作队人员若干前来迎接，并侦察道路情况；（二）运粮2万斤到唐古拉山以东地区接济；（三）在三十九族地区准备牦牛3000头以备应用；（四）在黑河准备粮料5万斤。”并将这一电报上报中央，中央批准启程。1952年1月12日，班禅大师离开香日德，踏上了青藏高原的征途。1月13日，我又给牙含章发报：“迎接班禅问题，工委昨天会议决定派警卫营庞月星政委带一个排，并由聂荣宗雇牲口3000，赶2月4日前送料1万斤至塞维堆。”

2月3日，护送班禅大师行至曲麻莱。曲麻莱县长米福堂是班禅的官员，曲麻莱的牧民是班禅的属民，在这偏僻的巴颜喀拉山南麓辽阔的草地上，牧民们不顾严寒，长途跋涉，早已集结，帐篷成片，一下子变成了帐篷集镇。于是在此休整四天，班禅进行宗教活动，向前来朝拜的牧民祝福。护送人员则利用这一机会，宣传群众，访问群众，散发国旗和毛主席像章，散发领袖像和宣传品；医疗队免费治病，文工队进行演出和放映电影，并在这里开展了统战工作。护送班禅的工作人员开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坚定信心，继续前进。为了预防高山病，我于2月8日致电牙含章：“入藏途中有一种病，肚胀、气喘、咳嗽、呼吸困难，严重者呕吐、晕迷、浮肿。其治疗方法是通便洗肠，重者注射盘尼西林（青霉素）。对脸青肿、心跳、呼吸困难、发晕、重者不省人事，

应注射樟脑、安诺加、阿米诺非林。”

时逢严冬，江河冰封，天堑通天河已结厚冰，人马踏冰径直而过。再向前就是高耸入云的唐古拉大雪山。山顶海拔5800公尺，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30多度，气压为385毫米水银柱，空气稀薄，酷寒逼人，呼吸紧促，四肢无力，牧畜也大口喘气，行走困难，骆驼走着走着，跌倒不起，甚至毙命。在此极端恶劣环境，护送人员时刻关心着班禅大师的安危，班禅大师也以坚定的信念，和大家一起与大自然进行艰辛的斗争。经过六天苦战，翻越唐古拉山。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所派的欢迎代表及扎什伦布寺的代表，于2月26日在唐古拉山北坡扎念扎地区迎接了班禅，他们带有达赖给班禅的信札。对此，班禅致电达赖表示感谢。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派的欢迎代表，于3月9日在唐古拉山雪山顶迎接了班禅大师，并送来了驮牛、马匹和补给。对此，班禅致电张经武、张国华和我说：“班禅及行辕全体人员甚为感激”。翻越唐古拉大雪山，班禅大师终于胜利地踏上了西藏故土。这时，中央、西北局和西藏工委都向班禅发来贺电，热烈祝贺和慰问。

1952年，拉萨发生了伪“人民会议”的暴乱事件时，正是班禅由牙含章、梁选贤等陪同护送，由青海返藏抵达黑河之际，西藏工委给班禅发电，通告了拉萨发生事件的情况，希望班禅能给达赖发电报，一方面表示拥护达赖，并严厉谴责鲁康娃等人破坏《协议》和背叛祖国的罪行。班禅立即向达赖发报指出，这一事件“不仅破坏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破坏汉藏团结，破坏祖国统一，而且破坏了你我之间的亲密团结，尤其是破坏了您的政教威信”。他要求达赖“以大智大勇之精神，大慈大悲之佛光”，将这种活动“迅速予以弭平，妥善处理，而安民心”，并且再一次“誓以至诚”表示“为全部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奋斗到底”。班禅这封电报，是很策略的，既稳住达赖，又对以鲁康娃为代表的分裂主义分子表达了严正的立场。这对于在中央指示下推动达赖集团不得不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人的代理司伦

职务，对他们作出公开处理，是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的。

为了隆重欢迎班禅荣归，1952年3月24日，西藏工委开会讨论欢迎班禅的筹备工作，会议决定由工委和噶厦联合组成欢迎班禅筹备委员会，由擦绒·达桑占东为主任，工委宣传部长乐于泓为副主任，具体领导欢迎班禅返藏的各种筹备工作。

班禅一行抵达拉萨东郊胜利塘（接日）时，4月24日，西藏工委派我和李觉同志到驻地看望，祝贺班禅光荣地返回西藏。我向班禅介绍了拉萨的情况，当谈到伪“人民会议”和拉萨发生的暴乱时，班禅以蔑视的口吻对我们说，鲁康娃这伙人，好像小孩一样的无知，不值一驳。他谈话时以手作势，引得哄堂大笑。在这里，我还同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官员商谈了达赖、班禅两佛会见的仪式问题。

1952年4月28日，班禅进入拉萨市区，在工委搭的帐篷里，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领导为班禅举行欢迎仪式，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致欢迎词，对班禅及其行辕全体人员为了执行《协议》，为了西藏民族的解放，翻越雪山草地，光荣回到拉萨表示慰问和祝贺。班禅大师致答谢词，衷心感谢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工委和西藏军区对他们的关怀，并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在他回藏途中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班禅返回西藏，在拉萨与达赖会见的仪式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具体有个磕头的问题，座位高低问题，班禅与达赖献礼品问题，实质上是按《协议》恢复和维护班禅的固有地位呢，还是损害和压低他的固有地位的问题。达赖方面竭力找借口企图把班禅的地位和影响压低，提出在达、班会见时，要班禅向达赖磕头，班禅的座位比达赖低两格，班禅给达赖朝贡，不让班禅驻锡大昭寺等。这些意见转达给班禅后，堪厅官员很生气。他们提出要是这样，干脆不进拉萨径回日喀则，双方坚持不下。对此问题工委开会进行了讨论，也发生了不同

意见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班禅在历史上是受噶厦领导的，为了争取达赖，班禅可以向达赖磕头。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达赖和班禅都是受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并列关系，而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宗教上则是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两个互为师兄弟。他们之间，只有在达赖为班禅的师父，或者班禅为达赖的师父而成为师徒关系时，才行磕头的礼节。在互相没有师徒关系时，见面时互相碰头，而不行磕头礼。因此，达、班此次会见仍应按历史上的惯例办理，而不能偏废。最后工委认为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不宜插手过问，可建议达、班双方派代表谈判。同时将工委对此问题的两种不同意见一并上报中央请示。中央复电指示，同意噶厦与堪厅举行直接谈判，但工委必须注意掌握，一方面要说服班禅作些让步，另一方面维护班禅的固有地位，不能把班禅统到达赖方面去。工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说服了双方同意直接谈判。于是噶厦派出阿沛、柳震为代表，堪厅派计晋美为代表，双方经过多次谈判还是争执不下，谈判没有结果。工委又开会讨论，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论年龄，班禅比达赖小几岁，虽然不是师徒关系，但是达赖年龄大，从这一点出发，达赖与班禅初次见面时，班禅可以给达赖行磕头礼，然后两人再行碰头的平等礼；座位问题，历史上达赖是班禅的师父时，座位可以高一个垫子，这次达赖与班禅见面应以两人平座为好；将朝贡改为达赖、班禅互赠礼物。经过反复研究，初步作出了四条决定：班禅给达赖磕头，达赖站在宝座前，班禅与达赖互换哈达，班禅与达赖互相碰头；班禅与达赖的宝座一般高。工委决定根据这四条原则，派国华同志做阿沛的工作，派我去做班禅及堪厅官员的工作。经过一整夜的工夫，班禅方面才勉强同意了。但提出要我们保证，不再变更。我向他们拍了胸膛，说了硬话，作了保证。反过来，我又找国华同志谈堪厅的意见，国华说阿沛表示同意作出保证。

4月28日下午，达赖与班禅在布达拉宫会晤。但当班禅给达赖磕头时，达赖不站起来，而且把达赖、班禅互换哈达，变成班禅

献达赖接，把班禅的座位不仅压得很低很小，而且摆在旁边。对此，班禅方面的人很气愤，纳旺金巴把他的捧都要举起来，班禅警卫营去的卫士，气得几乎要开枪。幸有刘旭初作了制止，才未酿成大祸。事后，班禅方面的人痛哭流涕，说是我们欺骗了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国华同志向达赖方面询问，为何改变决定？他们说不知道，可能是译仓（秘书处）改变的。达赖方面的解释虽然是牵强的，但这种解释同时也等于承认了他们那种作法是错误的。因此，我根据中央关于“要达到西藏内部的真正团结，必须以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精神，来彻底处理未解决的问题”的指示，向班禅方面进行了说服工作。班禅接受了意见，从大局出发，未予计较。在这场争执中，班禅大师再次表现了他相忍为国的宽阔胸襟，为促西藏内部的团结，作出了贡献。

班禅与达赖第二次会见时互换哈达，互相碰头，两人举行了愉快的交谈。达赖询问班禅内地改革政策和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情况，班禅现身说法，谈了解放后青海家乡的变化，祖国建设成就，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实施情况，使达赖消除了许多疑虑，增强了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信任。还对相互之间的团结，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等工作问题，作了友好的交谈。

班禅进入拉萨，驻锡大昭寺。入城时，反动分子暗中扔石头。他们散布谣言，说班禅是“毛主席的三儿子”，是假班禅。驻锡大昭寺的第二天，“人民会议”分子暗中与藏军勾结，企图袭击大昭寺。这时，我们在大昭寺对面的楼上，组织力量保卫班禅。其实反对班禅的只是一小撮坏人，广大藏族群众是虔诚地崇拜班禅的。虽然达赖方面下令禁止群众朝拜班禅，但是广大藏族群众连噶厦的官员在内，到了晚上还是偷着去大昭寺朝拜班禅，向班禅磕头，而某些人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是徒劳的。

班禅大师胜利回到西藏拉萨后，于4月30日致电毛主席，电称：“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及

西北军区大力协助下，并在中央人民政府张经武代表、达赖喇嘛与西藏地方各级政府积极帮助下，我们已于4月28日顺利地到了拉萨，并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张经武代表、西藏军区、西藏地方政府及广大僧俗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当天下午和达赖喇嘛会晤于布达拉宫，对祖国的伟大成就及我们今后的团结，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等工作问题，彼此作了友好的交谈。从而使我相信今后将在您的正确领导下与中央人民政府张经武代表、西藏军区的积极帮助下，与达赖喇嘛亲密团结，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把西藏建设成为自由幸福的新西藏。”

班禅在拉萨共停留了43天。经过堪厅官员进行的说理斗争和我们进行的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承认班禅为我们宗教领袖。6月9日，西藏地方政府推选首席噶伦然巴·图丹滚清前往大昭寺，向班禅大师献满扎，并举行了隆重的献满扎仪式。新华社对此作了报道。

6月9日，由仪仗队打着鲜艳的五星国旗、红旗及宗教旗子为前导，在当地驻军、噶厦僧俗官和拉萨市民倾城出动的欢送下离开了拉萨，于6月23日浩浩荡荡地回到了日喀则，受到僧俗官员和数万群众的盛大欢迎。当日，班禅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历代班禅举行坐床典礼的大殿内，隆重举行升座参禅。升座前，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派牙含章向班禅赠送沙金、玉碗和各种象牙雕刻等珍贵礼品表示祝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然巴·图丹滚清、班禅经师嘉雅活佛、扎萨拉敏·益喜楚臣、大喇嘛纳旺金巴以及各寺活佛、堪厅官员等参加了升座参禅典礼。日喀则临时分工委和驻日喀则部队的负责干部也前往祝贺。

班禅光荣返回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后，班禅所属群众爱国情绪高涨，对护送班禅返藏的汉族工作人员，一律呼之曰“阿乡拉”（舅舅），以表示对毛主席的敬仰，对共产党的热爱。“舅舅”这一称谓，是从文成公主时代传下来的，多年来表达着汉、藏民族间的甥舅之情。他们沿用这个亲切的传统称谓来表达发自内心的感情。

激，是很真挚的。他们感谢毛主席、共产党把他们的佛爷送回来。他们深信，他们的来世会有好的希望和幸福。

胜利地完成了恢复班禅的 固有地位和职权的历史使命

在中共西藏工委的领导下，西藏地方政府派以阿沛·阿旺晋美等三人为代表，班禅堪布会议厅派以计晋美等四人为代表，就恢复班禅固有地位及职权问题进行谈判。谈判时双方争论是激烈的。争论的焦点仍是班禅应属于达赖统治之下，还是达赖与班禅应是平等地位。西藏地方政府主张班禅不应与达赖平等，班禅应置于达赖之下；班禅堪布会议厅坚持达赖、班禅是平等的。工委说服了双方代表应贯彻执行《协议》，要求双方应以互相尊重，互相让步为基础，查档案，找根据，确定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和好的年限。经过双方调查研究，决定以藏历第十五绕回之火鸡年（公元1897年，清光绪23年）正月为和好的年限。年限确定后，双方就根据档案，找出那个时候班禅的地位及职权是什么，按当时的地位及职权予以恢复。经过谈判，双方于1952年6月16日（藏历水龙年4月23日）签订了《西藏地方政府与扎什伦布寺喇嘛谈判备忘录》，合理解决了班禅方面有关乌拉差役、军用粮饷负担、诉讼罚金、金税和归还属于班禅的宗谿等问题。

关于九世班禅离开西藏后被侵占的宗谿，《备忘录》规定全部归还班禅，指令有关人员办理移交；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谿卡，由双方共同调查，依照历史文件来确定归属。

关于班禅堪布会议厅负担军用粮饷问题，西藏地方政府主张军费是为了抵御外侮费用，是国防费用，为了保卫西藏的安全，班禅管辖地区包括在内，也应该负担军用粮饷；班禅堪布会议厅认为负担太重，不表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张经武代表出面解围，说国防费可由中央人民政府拨给，使军用粮饷的问题得到解

决。所以《备忘录》写到：“关于军用粮饷之负担问题，有关巩固国防的事宜，现由中央负责，故常年缴纳之军用粮食及款项，从今年起悉数予以蠲免。”

关于站与站之间换马和乌拉差役问题，《备忘录》规定，双方商定将藏历大蛇年（公元1917年，民国6年）噶厦的布告及水猪年（公元1923年，民国12年）达赖的布告，予以废除，班禅属民不予遵行。按照藏历水牛年（公元1913年，民国2年）达赖的布告执行，不得异议。

关于金税问题，《备忘录》规定，将哲蚌寺在属于班禅的拉孜、昂仁、彭措林三地区所收的黄金税，从今年起由扎什伦布寺喇嘛征收。

关于诉讼罚款问题，《备忘录》规定，班禅属民及其他方面的人民因诉讼而纳之罚款，其应归扎什伦布寺喇嘛方面者，可依旧例仍归扎什伦布寺喇嘛。

班禅荣归日喀则后，党为了贯彻《协议》，在日喀则地区开展工作，搞好各个集团之间的团结，加强汉藏民族的团结，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西藏工委日喀则分工委，任命梁选贤为日喀则分工委书记。1952年5月8日，中央来电指示：“牙含章同志可去后藏工作一个时期，至少要去几个月，待一切安定下来了，再回到工委”。牙含章奉命留在日喀则，在工委领导下，帮助组建日喀则分工委。

1952年8月25日，班禅大师经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转呈毛主席《返藏工作报告》，《报告》说：“谨将我们返回后藏以来，两个月的情况摘要报告如下：

“（一）我们于藏历水龙年五月初一（1952年6月23日）胜利返回扎什伦布以来，五月中差不多的时间都用在按照旧例旧规必须举行的宗教仪式上面。如拉让的噶卓（庆祝会），各扎仓的噶卓，农牧区民众的噶卓，然巴噶伦代表藏政府举行的噶卓等等，占去了好多日子。以后又在扎寺前面广场上举行了2万人的僧俗庆祝大会，跳

吉祥舞，藏历六月初七至十二日又演出了六天藏戏，日喀则市民与扎寺喇嘛每日自由去看，欢声雷动，为后藏30年来第一次。

(二) 我们离开扎什伦布寺已30年，返回以后很多问题急待处理，因此我们新成立了三个机关。(略)(三) 由于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我和行辕全体人员得以光荣返藏，并根据和平协议的规定，后藏所属百姓的差役已恢复到清乾隆癸丑年(公元1793年)的原来规定，负担大大减轻，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后藏僧俗官员、民众莫不感激万分。公推大堪布饶娃丹巴饶杰等10人，组成后藏代表团前往北京致谢。……”

至此，西北西藏工委圆满地完成了护送班禅返藏的光荣任务。从九世班禅被迫离藏避居内地到十世班禅坐床，20多年来，班禅集团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由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西藏问题悬而未决，班禅返藏宿愿多年未能实现。只有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国大陆之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使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国内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西藏内部团结起来的时候，班禅返藏才成为现实。一句话，班禅大师荣返西藏，是西藏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解决民族问题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民族政策所结的丰硕成果。

1987年6月9日脱稿，1989年3月10日修订
(转自《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

缅怀父亲杨虎城将军

杨拯民

今年11月26日，是我父亲杨虎城诞辰100周年。

父亲生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清政府丧权辱国，人民苦难深重的十九世纪末叶。他由于家庭贫寒，又心怀杀父之仇，从幼小时期就滋生了劫富济贫、抑强扶弱、发奋图强、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他从刀枪血火的经历中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坚持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国革命才有出路。他为这一理想奋斗一生直至血溅巴山。他的牺牲被毛泽东主席评为“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千古功臣”。

他从17岁参加革命活动到57岁牺牲，这40年政治生涯中，有以下几点值得追思：

首先，在政治思想上。他自始至终追随进步，与时俱进，并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从辛亥革命起，即坚持反帝反封建。他就是在反对军阀，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在靖国军时期，表现尤为突出。当时在靖国军的将领中，名出其右者颇不乏人，但在强敌压境，在敌人打击与招抚并用的两手政策下，竟纷纷放弃靖国军旗帜，接受了北洋军阀的收编。只有他独扛靖国军大旗，在武功（后迁凤翔）重建靖国军司令部。后终因敌我力量过分悬殊而失败，但他仍扛着靖国军旗帜，率部千里进军陕北三边，暂依地方势力井岳秀庇护，保存了西北一点革命种子。在陕北时，他派人密赴上海、广州与孙中山取得联系，接受了孙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并笃信不移。

中原大战后，他到西北搞“大西北主义”，主张陕甘一体、回汉一家、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其实质就是贯彻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建立革命的西北基地。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并几次要求亲赴前线抗日，均遭蒋介石拒绝。直到1936年12月12日与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得以逼蒋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使中国的前途命运才有了一个转机。

正如叶剑英诗中所写的“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在他的政治思想上还应该提到的是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既是他政治生涯中可贵的一面，也是他能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陕北时，他就与中共早期党员、陕西党组织的创立者魏野畴结为密友。从那以后，陆续有许多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中工作，他都委以重任，引为股肱。从与魏野畴结识就开始了他与中共长期合作的历史。例如，他先后任命魏野畴为军的政治处长、曹力如为师的政治处长，南汉宸为省府秘书长，武勉之、张汉民为旅长，王泰吉、阎揆要为团长等等。其他像习仲勋、潘自力、刘贯一、王炳南、汪锋、孙作宾、吕剑人、常黎夫、贾拓夫、吴岱峰、方仲如、童陆生、蔡子伟、武志平等，也都或先或后，或长或短地在他的部队中工作过。这种传统在他被囚禁以后，仍在原部队三十八军中保持着，直到该部起义。

在错综复杂的中国现代史上，某个地方实力集团出于当时的利害关系，与共产党保持某种谅解和合作关系的，并不乏人。但合作时间之久，关系之密切，他却是独特的，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在政治主张上的一致或相近所致。

其次，在军事思想上。他是个军人，军事活动是他一生中的主要活动。在军事思想上，他有他的一套东西。他在战斗中常常能以少胜多，转败为胜，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在讨袁护国时期，他的队伍只不过是一支人数很少的民团，讨袁胜利后才编成一个营；参加靖国军后，发展到一个支队（比团略大）；再往后参加国

民军，发展为一个师；率部参加北伐，发展到一个军，以后又参加中原大战，打回陕西，发展为十七路军。

大约20年间，他的部队打过一些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很有名的胜仗。例如1926年，北洋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10万之众（实有七八万）围攻西安，而西安城内只有一万多人，但他能坚守8个月，最后取胜；出关策应北伐时，在河南商丘以东马牧集一带，以一个军的兵力抗击张宗昌直鲁联军六个军的进攻；在山东打惯匪顾震、刘桂堂，在河南打唐生智，中原大战攻占洛阳，都打得很快。他在用兵上有其一套作法：譬如军事行动与政治措施的配合、军队与民众的关系、军队本身的训练与建设，作战时机的选择、方式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他没有留下什么军事著作，但他的军事实践，足以表明他是一位善于审时度势、智勇兼备的将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他当时在国外，对抗日的前途就有个分析、判断。他认为中国抗战是正义的、人民的、持久战，“非民主不能持久，要使抗战能坚持到底，非巩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

三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他幼年时因家境贫苦，只读过两年私塾，识字不多，成人后深感缺少文化的困难和痛苦。回陕主政后，为了振兴地方教育，他不仅把教育经费独立、专款专用，还把棉花捐、卷烟特费全数用于教育事业，压缩军费开支供教育使用，并为学校配备了一些有进步思想的知识青年任教师。此外，他还鼓励私人办学。蒲城县翼和亭先生在家乡兴办小学，因资金不够，于1931年春节到西安找我父亲。我父亲高兴地说：“我上任三个月，咱县上来找我的人不少，但都是想当官发财的，唯你找我办学，我很欢迎。”批给翼一笔钱，翼回去后办起了孙镇小学。在他卸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后还自己出资兴办了蒲城尧山中学。当时他让我去这个学校读书，我说这学校刚办起来，教学情况可能不会理想，我现在西安二中

挺好的。他说，我办的学校，我的儿子都不去还能让别人去上吗？所以我就在1936年夏季转学到了尧山中学。

在尧山中学，马克思主义可以公开讲，《资本论》可以自由阅读，与国民党推行的奴化教育大不相同。学校的教职员中除进步人士外，还有共产党员方仲如、何寓础、朱茂青、冯一航、袁若愚、赵曼青、袁鹤生等。并设有军事课。建国后曾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张希钦就是当时的军事教官。在这个学校里先后培养出许多优秀分子和共产党员，校内始终存在着共产党组织。

在兴办教育的同时，他还资助优秀知识分子出国留学深造。派往英、德、法、日等国的前后有数十人，较知名的有亢心裁、江隆基、王炳南、蒲子政、袁若愚、潘自力、周梵伯、郭则沉、原政庭、李子健等。早在靖国军时期，1921年他还曾资助过屈武、连瑞琦去德国留学。他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他曾说过，当国民党的官，难免要刮地皮，我把刮地皮的钱用于供给穷学生上学，绝不会错。

父亲在一生中交结了很多知识分子朋友。早期的有蒙浚生、惠又光，稍后的有魏野畴、杜斌丞、杨明轩、崔孟博、李百龄，再后有南汉宸、韩兆鹗、李仪祉、王菊人、申伯纯、宋绮云、米暂沉等。他对知识分子态度真诚，或尊为师，或引为友，有的为忘年交，有事与他们商量，能博采众议，择善而行。

以上这些说明，他虽是一介武人，但却如此尊重知识、重视知识分子，这也是他能够不断接受新思想、随着时代步伐前进的因素之一。

四是重视建设乡里。在他回陕主政前，陕西是兵连祸接，连年干旱，灾情十分严重。1930年11月，何应钦在南京说到视察陕西灾情时，认为“陕西人民之苦甲于全国”。武功县原有15万人，一年之中饿死8万。1931年1月，于右任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报告视察陕西灾情时说：“数年间，陕西全省饿死人口已达300余万，灾情相当严重。”昔日素称富饶繁荣的八百里秦川，凋破如

此，作为新上任的主席怎能不忧心如焚。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农民常遭旱灾之苦。他遂决定大规模兴修水利，以工代赈，既可救灾荒，又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农耕条件。从南京请来了全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主办其事。先后修成了泾惠渠、洛惠渠，可灌溉农田 100 多万亩。原本再继续修几条灌溉渠道，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为此他常引以为憾。他为兴修水利花了相当精力，多方筹集资金，经常深入工地，还带我去过两次，看洛惠渠五号洞经过大荔与蒲城之间流沙层处理情况。

在交通建设方面，也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陕西关中，古称“四塞之国”，意为四面都有高山与外界隔绝。从西安南去汉中、西往兰州当时都不通汽车。他主陕期间，一方面积极支持陇海铁路向西延伸，一方面紧抓公路建设，修筑了西安至兰州、宝鸡至汉中的公路。修筑西兰公路时，调动部队参加义务施工，加快了工程进度减少了费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修筑咸同铁路（从咸阳到铜川——当时叫同官）。同官出煤，运不出来，要修铁路，可省里财力有限，他找宋子文要钱。宋派来个叫刘麻子的经济特派员，此人不实事求是，被“送”走了。改由当时杨部参议郭增恺担任。当时为筹措资金，把上海所谓的“南四行”即金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盐业银行、四明银行都动员来投资。咸同铁路修成后，与陇海铁路接轨，解决了煤炭外运问题，同官亦随之日趨繁荣。

再就是他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方法，总是那么豁达、辩证。1929年他在山东进剿土匪顾震，当时顾震占据莒县。当我父亲的部队逼进莒县时，顾匪慑于他部队的声威，弃城而逃。他带领部下上莒县城察看，有的军官看到莒县“城坚壕深”就说：顾震如果坚守，我们进攻就要费时费劲了。可他却说：这是你的想法，顾震不会这么想，他是草寇，要考虑如死守在这里，倘被我们包围，跑不了怎么办？这么一说，大家深受启迪。

我的祖母，信奉佛教，天天烧香磕头，我认为她在搞迷信。

要父亲劝阻。父亲反说我是小孩子不懂事。说迷信固然不对，可对她说也是一种运动，每天早、午、晚三跪九叩首，跪下起来，再跪下再起来，对她身体有好处。

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亲送蒋介石去南京。被扣后，西安形势非常复杂、严峻，外有中央大军压境，内有主和、主战两派意见分歧，东北军内部群龙无首，在救张问题上矛盾激化。风云变幻，人心惶惶。在那个形势下，我父亲给县长们写一封信，说明蒋答应了六条，内战得以停止，这是形势的主导方面。这既可以给人们增添信心，也正是他在极端混乱危难中所看到的成绩与光明的一面。

1937年我父亲被迫出国，我从北平到上海送行。6月28日晚，即出国前夕（他白天忙于应酬，无暇相谈）要我和他同宿一个房间。

他告诉我这次出国是被迫的，不是自愿，实在也无法子，虽然蒋介石表面上很客气，给了面子，给安了个军事考察员的头衔，路费给了不少，但这是调虎离山计，而他由于团体内部的原因，也不能不暂时离开。加上4月份我的小弟弟拯仁夭亡（养母张蕙兰因此神经有些失常），所以他心情很不好。他说：本可带你出去上学，可你养母因拯仁夭亡受刺激太大，你走了她会更寂寞的，以后有机会再去吧。他问了我在北平上学交友情况，还谈了他对共产主义，对我党政策的看法。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个好的理想，不但中国要走这条路，世界各国也要走。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出路。他说：我们是穷苦人出身，身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我是一生闹革命闹出来的。你有革命的志向，但要好好学习，有了知识才能干好革命。世界上的人才有两种，一种是从实际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当然走这条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我的军事学就是打出来的。我身上的枪伤就是这种知识的文凭。另一种是靠读书，学习科学知识。不论干什么没有科学知识不行。打仗练兵没有计算也不

行。你将来参加什么组织我不干涉，但一定要有科学的基础知识。我一生就吃了没有科学基础知识的亏，你还年轻，一定要把基础打好，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我原本想遵照父亲的临别嘱咐，继续在北平读书，可卢沟桥的枪声，使 I 不能安坐课堂，却把自己的航程，驶向延安。

父亲当晚和我谈了许多，几乎一宿未眠。第二天，即 6 月 29 日，把他送上了胡佛号客轮。孰料就此一别竟成永诀！再见到的却是被敌人杀戮后，令人惨不忍睹的遗体。

血溅巴山神驰五岳功在国家垂青史；

毕生忠烈情系三秦子孙图强慰先灵。

（转自《人民政协报》1993年11月25日第二版）

杨东莼生平评述

杨慎之

本文作者系杨东莼先生之子（已故），生前任湖南社会科学院院长。文中对其父当年东渡日本，长期从事著述、翻译、编辑工作情况；解放前后从事了25年艰辛的教育工作以及和党同心同德，终生为党辛勤工作，在统战工作方面作出的努力和贡献等事迹作出扼要介绍和简短评述。

杨东莼（1900.3.8—1979.9.25），名岂匏，又号人杞，在白区地下工作时曾用罗东莼等化名。父母早丧，幼时与胞弟杨人楩（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依干妈童氏生活。1914年毕业于醴陵朱子祠小学，1918年在长沙长郡中学毕业。1919年入北京大学文预科一年级读书，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开始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追求革命真理。1920年，与邓中夏、罗章龙等人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其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具体领导下，随邓中夏、罗章龙、吴汝明等深入长辛店铁路工人群众，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广交工人朋友，宣传革命道理。1920年3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参加了由李大钊直接领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该会19个发起人之一。1922年南归故里结婚，任醴陵西山县立渌江中学校长。李大钊曾经写信给他，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促其继续参加革命。1923年

7月在长沙参加中国共产党，与何叔衡等经常联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社会活动家之一。在长沙期间，他先后执教于长郡中学和协均中学，并领导协均中学文史科的全面教务。1925年春，湖南省总工会成立，应郭亮之邀，他担任湖南省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并兼《长沙工人日报》社长。通过郭亮的介绍，他被恢复了一度脱离了的党的组织关系。1927年夏初，许克祥反革命屠杀的端倪已见，杨东莼也大体获得了险恶的讯息，但他仍然镇定地编发最后一期报纸，随后乘间潜赴汉口，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任宣传处主任后被派往十五军任政治部秘书，因被告密，离开部队，又一次失掉组织关系。1927年12月，他东渡日本，开始了长期的著述、翻译、编辑生涯。

长期的翻译和著述生涯

抵日后，杨东莼即潜心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并从事翻译工作。他的外语基础并不很好：在长郡中学（旧制长郡中学四年毕业，一个年级分三班，两班习英语，一班习德语）四年和北京大学两年，学的都是德文，至于英文，只在小学读了三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编给印度人学的《正则英文》，而在中学和大学则是把它当做第二外语来学的。他凭借着这样积累起来的、根底并不深厚的德语、英语和在日本刚刚学到的日语知识，就大胆尝试着翻译工作。首先翻译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 1804—1872）论》。这部著作明确宣布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两大基本派别。此书译本一出，立刻在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界获得广泛好评。

（德）约·狄慈根（Joseph Dietzgen 1828—1888）是一个制革工人，是一位自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从1867年就开始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通过自学和研究，独立地得出了同马克思、恩

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极其相似的结论，马克思称他为“我们的哲学家”。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曾再三引证过约·狄慈根的话来痛斥经验批判主义，列宁既对他有高度的评价，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说“他九成是唯物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妄自标新立异，企图建立不同于唯物主义的特殊哲学”，他的主要缺点是“表述的不正确”。早在1908年成书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就指出：“约·狄慈根尽管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曾犯过一些局部性的错误，但他充分重视并接受了他的导师们的这个最伟大和最宝贵的传统。狄慈根由于发表一些欠妥的违背唯物主义的言论而犯了错误，可是他从来没有企图在原则上脱离唯物主义而独树‘新’的旗帜，在紧要关头他总是毅然决然地声明：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①过了五年，列宁又在《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25周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狄慈根的作用在于：他表明了工人可以独立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即掌握马克思的哲学，狄慈根并不认为自己是某一学派的创始人，这一点对于评价工人出身的狄慈根是非常重要的……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人，应该读一读狄慈根的著作，但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阐释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能学到哲学。”上述引文表明：列宁正确地评价了作为工人出身的哲学家狄慈根，同时也郑重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党派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1927年冬，杨东莼在京买到了一部欧根·狄慈根（Eugen Ditzgen 1862—1930）^②

①《列宁全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33—234页。

②欧根·狄慈根在他的父亲死了之后，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他利用其父哲学著作中的弱点和某些表述上的混乱之处，歪曲并违背其父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自然一元论”、“狄慈根主义”等学说，企图“补充”马克思主义，使之同修正主义相调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指出，欧根·狄慈根杜撰出种种谬论，给他伟大的父亲“帮了倒忙”，因而滚入反动哲学的泥坑。

1911年出版他父亲的《狄慈根全集》，他以三个月的时间通读了一遍。他想，国内白色恐怖严重，马、恩、列的译著不可能出版，就翻译了狄慈根的四篇重要哲学著作，即：《人脑活动的本质》（又名《辩证法的唯物观》）、《论逻辑书简》、《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和《哲学的成果》。这些译文的半数，解放前都曾公开出版。解放以后，杨东莼深深感到，为了战斗，工人阶级正在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已经形成了一支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而约·狄慈根正是一位值得学习的榜样。但是他感到，原来的译文过于粗糙，于是根据1961年由柏林出版的约·狄慈根三本著作的新版本全面重译，定名为《狄慈根哲学选集》，共20余万字，交由三联书店出版。他十分尊重狄慈根，对其著作深感兴趣，晚年还在孜孜不倦地翻译狄慈根的《对话录》，可惜疾病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这个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19世纪美国民族学、考古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是一部影响极大的巨著，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和高度评价这部杰出的著作。马克思“很喜欢这本书”，读了之后，作了“十分详细的摘录”，^①并加了许多重要的批语，准备联系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②这个愿望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实现，而是由恩格斯“执行遗言”，^③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光辉著作。在《起源》中，恩格斯对于摩尔根确定人类社会最初的氏族都是母权制这一点，给了高度评价。恩格斯说，摩尔根“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这样就在

^①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08页。

^{②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卷第1页。

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1927年冬，杨东莼到东京以后，找到了美国芝加哥柯尔公司出版的通行本，首先通读一遍，就被这部著作深深吸引住了。他认为，《古代社会》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书，对于原始社会的研究，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在当时出版界面临着严密文网的情况下，以世界名著的面貌把这部书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既是一条较易通过的“捷径”，又是一项最为扎实的理论奠基工程。但是，他发现，《古代社会》包括的内容很丰富，涉及面很广，摩尔根的文笔十分艰涩，许多句子的确切含义不易掌握，而且也很冗长。因此，要仔细地读懂这部书，并将它译成流畅易懂的中文，实在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以杨东莼当时所具备的外语水平和业务知识水平来衡量，要独立把这部书全译出来是相当困难的。他依靠字典一段一段地直译，译完一章，对照原文仔细阅读两遍，咀嚼每章、每段和每句话的内容，将译文反复进行修改和润色，使其易于为读者理解和接受。^①这部书在30年代初由李达任总编辑的昆仑书店出过初版，经过半年多修改之后，在1935年12月，经周予同推荐，由何炳松负责，纳入商务印书馆的《两有文库》出版，1950年4月，又原封未动地由商务印书馆再版。1957年9月，经过民族学家冯汉骥教授修改校订，并写出长篇《校后记》，由三联书店第四次出版。1972年，商务印书馆将上述版本重印发行。1971年，杨东莼读到美国哈佛大学出版部于1964年出版的、由摩尔根著作研究专家怀特(Le Leslie A. White)编校的《古代社会》。这个版本有下面几个优点：第一，怀特对全书文字作了详细的校订，在校订过程中，他还参考了罗彻斯特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摩氏原著手稿，手稿上有摩氏最后的修改；第二，怀特对注释中所引

^① 在杨东莼按照这种办法将《古代社会》翻译了一半的时候，一位因大革命失败而来东京避难的研究生物学的朋友张栗原（又名张光耀）教授主动参加了这项翻译工程，但他只翻译两章，就因肺结核病所缠而中断了，其余部分，均系杨东莼一人译完的。

用的各种著作进行了核对，其中有许多章节页次号码错误之外（或由于摩氏笔误，或由于排印误植），都尽可能予以更正；第三，注释中有一些引印书目是简称，往往过于简略，以致一般读者不知原来的书名，无从查阅，怀特补出了大多数原书名，便利读者；第四，注释引用古典著作中的希腊、拉丁原文，怀特都改用了最新的英译本；第五，怀特在摩氏原著之外，增添了一些注释，有助于了解摩尔根的研究活动、材料来源以及他所引用的作者。^①于是，杨东莼采取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办法，与马雍、马巨兄弟合作，^②穷数年之功，终于在1976年初将《古代社会》全部重译，完成了近50万字的译文任务。后来，杨东莼谈起这次合作时说：“从我个人而言，感受实深，因为我对此书反反复复、前一起搞过四次，都是关着门干的，其结果，很不容易发现自己的错误。而用‘三结合’的方法来做，其结果就两样了，不仅易于发现错误，而且能及时改正错误。班班辈出，后来居上，这正表现祖国一番新气象，可喜之至。”^③很可惜，杨东莼不及见到新译本面世（新译本是1987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就溘然长逝了。

从1923年翻译（德）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的诗歌开始。^④到1979年临终前仍在伏案试译《对话录》为止，

① 《古代社会》新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版，译者前言。

② 马雍、马巨是马宗霍（章太炎先生高足之一）教授哲嗣。他们和杨东莼合作重译《古代社会》的时候，杨东莼72岁，马雍40多岁，马巨才28岁。马雍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期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中英文均擅长，历史知识面很广，专心民族学，不幸早故。马巨高中毕业，完全依靠自学而掌握了英、德、意、俄、日文，能中英互译，并译有《意大利文语法》。

③ 见中国新闻社北京1976年3月2日电，中国新闻记者，《杨东莼谈重译〈古代社会〉及其他》，载香港《大公报》1976年3月3、4日。

④ 见1923年夏季出刊的《协均周刊》，我很感激已故复旦大学哲学系严北溟教授，是他把珍藏了将近60年的《协均周刊》提供给我的。

前后凡56年，杨东莼都在断断续续地从事翻译工作。他译的书不多，但影响很大。^①他是以一种“盗火者”的献身精神来进行翻译的，他是在克服许多困难（包括自身的弱点）的情况下进行翻译的，他是抱着对原著者和读者极端负责、对译文翻研不辍、刻意求工的严肃态度来进行翻译的。

杨东莼的著述主要是三本书：《本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讲话》和《高中本国史》。

《本国文化史大纲》成书于日本，1931年8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作者谦称为“编”，实际上是一部独立经营的专史著作。这部文化专史肯定一个前提：“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史乃是叙述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纪录。”从这个前提出发，作者比较早地体现了“古为今用”的治史原则，指出编写本国文化史首先应该注意之点（或称“取材标准”）是，集中力量记述与我们有关的、影响及于现代生活的“我们祖先的那些活动”，“不拘是那一章，不拘是那一节，我们都要追究到这两个问题上去”。在编著方法上，作者摆脱了前人已经道破的弊病（郑樵就讲过：“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抛弃了“朝代观念”，不采“流水帐簿”和“总簿”的形式。正如作者所说：“我们（以）一个一个的事实做单元去写本书的时候，我就只将各时代之和我们有关而又影响于现代生活的重要事实加以叙述，并且，力求阐明这些事实前后相因的关键。”在叙述方法上，作者既反对那种“史料之来源不真确”的“秉笔直书”，又反对“出自主观的立场和先入为主的见解”的“夹叙夹议”，而是“尽力地固守着客观的立场，用经济的解释，以阐明一事实之前因后果和利弊得失，以及诸事实间之前后相因的关键。按照

① 据陈铭枢：《“神州国光社”后半部史略》（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云，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关共产主义经典著作者有……（苏）德波林（Абрам Монсеев ВИНЧ Певорин 1861—1963）的《斯宾诺莎与辩证唯物主义》（杨东莼译）……。（第174—175页）

上述取材标准、编著方法和叙述方法，作者将全书内容分成三大部分：一、经济生活之部；二、社会、政治生活之部；三、智慧生活之部。这种划分，大体上已经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不同范畴的活动区别清楚了。但是，作者意识到，这种划分方法并不见得尽善尽美，因为人们的某一项历史活动，“其间自无明确而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教育，把它“归之于智慧生活之部，亦无不可”，但它“带着很浓厚的社会生活的性质，因此，就把它归到社会、‘政治生活之部去了’。^① 这里透露了一个消息：作者是把教育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来进行思考的，这和后来他成为一个忠诚的教育工作者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在的思想联系。

《中国学术史讲话》几乎和《本国文化史大纲》同时成书，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发行标明的时间为1932年11月。1986年7月，湖南岳麓书社作为《凤凰丛书》之一重印发行。这本书只有22万字，以“讲话”的体裁分为：学术思想的萌芽，学术思想的解放与分野，学术思想的混合与儒家的独尊、道教的兴起及其变革、自然主义的特盛、佛教的输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与影响、理学未兴前学术思想的倾向、儒学的大转变——理学、西学东渐、朴学、今文学与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等共计12讲，下置94个小题，分别对中国学术史上的每一重大时期、重要思潮、重要学派、重要人物、重要著作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简洁晓畅的叙述和深中肯綮的论衡。这本书有两个显著特色：一是作者对头绪纷繁、浩瀚若海的中国学术史料，进行了爬梳整理，做到了详略恰当，巨细不捐。这种博以返约、厚积薄发的严谨学风，反映了作者学养的深湛和驾驭史料的功力；二是作者在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后，对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思想资料进行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原

① 见杨东莼1936年6月11日于东京为《本国文化史大纲》所写的序言。

《大公报》名记者徐盈说：“杨东老的传记，可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来写，也可以作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家来写，还可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来写，就看你取的是什么角度，强调的是哪个侧面。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在各类活动中，特别是在学术活动中，都能大胆地（即使不够成熟）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①这个评价是公允至当的，确非溢美之辞。

《高中本国史》是杨东莼在30年代中期编著的一部篇幅很大、内容比较系统翔实的教科书，这部书曾经几次修改，由北新书局多次印刷发行。30至40年代的许多高中历史教员，多采此书作为基本教材，赢得了广大师生的赞誉和欢迎。但是，这部三厚册的书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和错误，例如，它讲到现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时，只简述和肯定了严复、梁启超和胡适三个人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劳绩，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最为博大精深”，“国人至是在思想上才获得正确的指导”，对其他在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学、历史学等方面卓有建树并有系统主张者，从无一言及之。此外，对于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也作了不恰当的肯定性的评价。所有这些，全国解放前夕就有学者著文提出批评。^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杨东莼以大部分精力献身人民教育事业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除前述修订旧译外，实际上并没有专事著译。在此值得提到的是：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负责主编的6集共200余万字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亲历、亲见、亲闻的宝贵史料；他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并亲自制定了庞大的调查规划草案；他对通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

^① 1983年春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办公室徐盈和笔者的谈话，据1983年4月15日笔者日记。

^② 见蔡尚恩：《十年来的教育文化统制》，载《时与文》第2卷第17期第14—15页。

作译本，提出了大量改讹匡误的意见；在主持广西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校务期间，他作了大量的论述人民教育工作的报告。此外，这一时期他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固不乏令人心折的佳制，但绝大多数都留下了“左”的印记。其中最突出的是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物自由主义》一书，收集了《知识分子在斗争风暴中何去何从》、《何物自由主义》、《坐什么渡船》、《人民的新闻事业不容许右派分子插手》、《关于“叛逆性格”》共五篇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反右派斗争扩大的纪录。作者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以内，信任和使用了一批在1957年横遭贬谪而又确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并且推诚相见和平等待人温暖了这些同志的心”。^①在十年动乱期间，他进一步认识到了“左”的危害，经常和亲密友朋表示自己的歉疚之情。

为人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

杨东莼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工作者，他一生中，大约有25年的时间从事教育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他巧妙地利用地方势力和中央集权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努力发展进步教育事业。全国解放以后，他为人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是一位从来不知疲倦为何物的辛勤园丁。他晚年所从事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工作，就是以团结广大教育战线的同志（特别是中学教员），提高他们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的积极性，作为主要任务的。

1930年12月，杨东莼由日本归国。此时，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蒋桂战争失败后退守广西，与蒋介石中央政权继续对立

^① 章开沅：《建设社会主义要靠真才实学——怀念老院长杨东莼同志》，载《华中师范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5期第38—39页。本文尚有引用章文之处，不另注。

抗衡。他们装模作样，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为号召，提出“三自三寓”政策，训练人材，推行所谓“新政”。广西师范专科学校的创办，正是桂系培养新政人材的一项重要措施。1932年夏天，广西教育厅厅长、白崇禧的老师李任仁，推荐在广州中山大学才执教半年的杨东莼担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杨东莼接任以后，表面上适应桂系提出的口号，实际上则把师专办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培养广西革命青年的摇篮。在办学思想方面，他明确地提出了两条方针，就是学习上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生活上主张养成集体主义的作风。也聘请了许多思想进步、学有专长的学者到校任教，如经济学家薛暮桥、语文学家陈望道、历史学家邓初民、哲学家马哲民，以及左翼作家夏征农、沈起予、杨潮等，都在广西师专教过书。广西师专的第一、二届办得虎虎有生气，培养了广西革命运动一批忠勇战士和广西中等教育的一批骨干力量，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员，有几个优秀的学生如麦世德、刘敬安等在抗日战争中为党担负重要工作，在桂系军阀的屠刀下英勇牺牲了。1934年5月，由于杨东莼的办学思想和桂系的意图相左，加之他聘请了大革命时期第三军的党代表、著名共产党员朱克靖（化名朱笃一）为师专教务长，被白崇禧发现，终于为桂系所不容，被迫辞去广西师专校长职务。^①

杨东莼离桂至上海，一二·九运动后，参加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南京当局先用分化手段解决了广东的问题，把广西孤立起来。但李宗仁、白崇禧顽抗固拒，以联合各党派团结抗日为号召。为了增加政治资本，李宗仁一面争取李济

^① 本节材料主要取自崔远培，《我校第一任校长杨东莼》，原载《广西师大》1990年10月30日第154期第1、3页，薛暮桥，《回忆杨东莼同志》，原载《光明日报》1981年9月27日第3版，本文尚有引用崔、薛文章之处，不另注。

深、蔡廷锴合作，一面电邀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入桂共商国是。沈老派杨东莼到广西走一趟。杨在南宁向李宗仁等介绍了全国抗日救亡的形势，传达了救国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反对在“南宁开府”的过激作法，要桂系促蒋共同抗日。这对以后桂系调遣军队去前线作战，无疑起了一定作用。1937年抗战全面展开，国共两党在抗日旗帜下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杨东莼过去和张治中相识，他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充任了以张治中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的高级参议。他在长沙主持当地救国会的工作，经常和犁头街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徐特立联系，推进湖南抗敌后援会的抗日宣传活动，对《观察日报》的编辑出版进行帮助。1938年11月12日，^①蒋介石以“焦土抗战”为由，悍然于仓卒间火烧长沙，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文夕大火”。这年冬天，杨东莼由长沙转桂林，经当时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推荐，广西当局邀请他在桂林筹建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这是杨东莼第三次入桂，和第一次入桂担任师专校长、第二次入桂调停“六一运动”一样，都受到了李任仁的有力推荐，而和桂系关系特深的高级幕宾、杨东莼儿时的同学和朋友刘斐，则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关于杨东莼和刘斐的关系，程思远有一段精彩的话：“东莼先生与为章（刘斐字）先生幼同里，长同校。东莼在30年代先后入桂，任广西师专校长和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校长，皆为章先生一手推荐之功，而在1946年国共战争爆发后，为章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报’（不是汇报），他在‘对日作战是内行，对内作战是外行’的遁辞下，存心作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所以有此，也都是东莼先生穿针引线所起的作用。在事业中这样紧密配合，相需相成，历史上实不多

① 《中国现代史大事记》第185页载，“长沙大火”发生在1938年11月13日。

见。”^① 刘斐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思维敏捷，雄辩滔滔，自恃极高，临事一经决断，就很少或很难采纳别人的意见。但他对杨东莼则虚心求教，即使是与己见相违的主张也能虚衷接纳。杨东莼通过自己的挚友，把党的统一战线的无远弗届的威力，施展到国民党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的心脏部位去了。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校长由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杨东莼任教育长，实际校务是由教育长全权负责的。杨当时是共产党员，他的工作直接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领导（有时通过周钢鸣联系）。所以，干校的教育训练工作，实际上是由党在领导的。干校筹备工作开始时，恰好徐特立老人因公路经桂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生活教育社召集留桂会员，假杨东莼寓处请徐老作了报告。徐老谈了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的情况，也谈了解放区的各种教育活动。杨东莼向徐老请教了有关举办短期干部训练班的种种问题，这对干校的筹备工作是一次切实的指导。杨东莼参照解放区干部教育的经验，从办校方针、教学内容、实习活动、读书方法、生活管理、军事训练等方面进行全面革新，把干校办成了一个广西抗日民主运动的阵地，等于是国统区办了一个延安式的“抗大”。当时，全国各地流亡到桂林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有不少人在干校担任教务领导、辅导员或指导员，如秦柳方、张海鳌、潘逸耕、姜君辰、周钢鸣、司马文森、汤有雁、宋之光、张健甫、潘超、路伟良、欧希哲、屠天侠、萧敏颂等。另外，胡愈之、夏衍、张志让、张铁生、千家驹、万仲文等，都先后被邀请到干校做专题报告。1939年5月，叶剑英在湖南衡山南岳游击训练班讲课完毕后路过桂林，也应杨东莼的邀请，到干校作了题为《积小胜为大

^① 见程思远为王序平、刘沉刚著《刘斐将军传略》所写的“代序”，原载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斐将军传略》第10—15页，按，刘斐（1898—1983），号为章，湖南醴陵人，少时和杨东莼在醴陵朱子祠高等小学同班同学，以后数十年过从密切，在政治上互相配合支持，论交终生不渝。

胜》的重要报告。他深刻分析了抗战形势，介绍了各解放区军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绩，并针对当时的“速胜论”和“悲观论”，生动地讲述了解放区抗日斗争的实际事例，雄辩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持久战的方针、政策。干校自1939年2月开办，到1940年年底结束，为期两年，总共举办训练班4期，结业学生1402人，还开办了特别训练班4班。从干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后来有大批人成为共产党员，有的人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献出了青春和生命，有的人在各条革命战线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全国解放后担任领导工作，有的人成了国内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①

1940年6月间，国内政治形势开始逆转，已处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夕。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因为政治倾向太明显，受到各方注意，杨东莼被迫向广西当局辞职。广西当局改任他为省政府参议，他花了几个月时间，视察了几个县的县政，回桂林处理好了干校结束和《救亡日报》终刊事宜，^②于1941年年

① 本节材料主要取自秦柳方，《杨东莼在广西地方建设干校》，原载《学术论坛》1983年第1期第87—90页；杨东莼，《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自我介绍》，原载《广西建设》1939年第1卷第1期第14—20页，杨东莼，《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自我批判》，原载《广西建设》1940年（或1941年初）第4卷第4期第21—34页。

② 《救亡日报》是党的外围的文化性的报纸，在上海创刊，后移广州，广州沦陷，内迁桂林，宣传团结抗日。社长郭沫若，主编夏衍、林林。《〈救亡日报〉临终的时候——怀念杨东莼同志》（载1980年9月20日《人民日报》第5版）中说：“（1941年年初，李）克农同志交代我，《救亡日报》何时停刊，可问东莼同志，他能掌握政治气候。听了这话，我得到一个靠山，心里也就踏实了，后来恶化的情况连续出现了，军警在天刚黑时气势汹汹地搜查了生活书店，并限三天内停止营业。过些日子，东莼同志通过别人约我到他家去。他对我说：‘看来，《救亡日报》到了停刊的时候了，否则情况会更不妙。’我按克农同志临别时的嘱咐，只好听东莼同志的决定。我向终刊号骂不骂人，他答不骂也罢，留点余地。我也听他的话，只在1941年2月1日副刊《文化岗位》，写了约2000字的‘岗语’，题为《鹿眼看醉人》，隐约回敬了反共暴徒。《救亡日报》就此被迫关门。报社印刷厂的机器及其他物质，全部交给他管辖下的干校的印刷厂。干校印刷厂屠天侠同志随即支付了一笔酬金，做为我们报社同人的疏散费。”按，另有一说法，《救亡日报》于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复刊，1941年2月28日停刊，一共出版了两年一个月15天。

初“皖南事变”之后离开了广西，转赴香港。在香港，他与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等组织了全国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并与邹韬奋全力承担会务。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杨东莼和许多著名文化人士一道，在党的保护下，于1942年辗转入川，先后在内迁乐山和成都的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鸣圣学院担任教授。1948年8月又转任厦门大学教授。

杨东莼在四川各大学执教7年，正是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艰苦时期，又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国民党加紧镇压民主运动的时期。他利用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的机会，鼓舞学生坚持抗战，迎接胜利的热情，支持进步师生追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系统地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他自始至终全力支持学生的革命活动，在武汉大学时，他为学生的正义斗争提出了许多充满辩证法精神的意见：第一，进步同学生活在学生之中，要广交朋友，不要局限在进步社团的小圈子里面。这样既可以避免过多的突出，受到敌人的注意，也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还可以了解各种人物对待各种事件的反响，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在认识形势、分析问题的时候，不致于狭隘和片面；第二，进步社团不一定要清一色，可以由左、中和落后的学生组成，但要防止特务分子打进来。这样做，既可争取中间分子，也可以影响落后分子，既避免进步社团过于红，又便于接近群众；第三，进步学生开展革命工作，要尽量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利用同乡、同学，甚至过去的中学同学关系，广泛了解敌情；第四，要注意调查研究；第五，要用学术研究的方式来掩护政治活动；第六，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适可而止，不要走得太前，只能走到大多数群众能接受的地步，不能脱离群众。总之，“主张不怕硬，方法不怕软，心脏不怕热，头脑不怕冷”。柳东莼的这些意见，对武汉大学学生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等革命活动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在武汉大学师生五四运动座谈会上，杨

东莼在发言中，公开主张要继续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发扬她的光荣传统。杨东莼授课时寓庄于谐，旁征博引，援古例今，议论精当，鞭辟入里，有强烈的煽动性和极大的说服力，因而室为之塞。他的家里几乎每夜坐满了武大师生，或请益学术，或纵论形势，或商量工作，或研讨斗争。这些活动终于不免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国民党政府重庆行辕派了两个联络参谋，“会同乐山的军统特务雷大钧，居然打算搜查杨东莼的住宅。1944年12月22日，蒋介石给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的电令中声称：“据（报）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思想史教授杨东莼，平日言论反动，诋毁本党及政府，并对学生时加煽动……希注意整顿为要。”此后，杨东莼的教学和社会活动都受到特务们的严密监视。^①

1948年冬，杨东莼离开厦门大学秘密出走香港。其时，在党领导下的达德学院院长陈其瑗北上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全国政协，香港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协商，一致认为，由达德学院校董会聘请杨东莼代理院长最为适宜。他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革命精神，积极负责地办好这所新型的革命大学。香港弹丸之地，政治形势十分险恶复杂，他镇定自若，排除干扰，坚持正常教学秩序，亲自讲授历史课，并作政治形势报告，号召师生做好精神准备，为迎接全国解放，建设新中国而努力。1949年2月23日，港英政府无理下令撤销达德学院注册，强迫停办。在党的领导下，他审慎周详，安置了全院师生，处理了一切善后事宜，旋转入香港《大公报》任顾问。^②

1949年10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杨东莼

^① 本节材料主要取自《武汉大学校史简编 1913—1949 年》（内部发行）第114—116页，原杨东莼秘书廖有为所撰《在和杨东莼的日子里》（未刊稿）。

^② 本节材料主要取自李志仁：《缅怀敬爱的杨院长——忆杨东莼在达德学院》，原载1986年《达德学院建校四十周年纪念专刊》第15—17页。

被任命为广西大学校长。从1950年初到1953年底，他在广西大学先后进行了解放接管、恢复教学、调整院系、纳入正轨等十分繁重的工作。1954年春，又奉调任华中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他到任后第一次讲话的题旨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要靠真才实学。这个原则鞭策着华中师范学院师生，孜孜不倦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掌握真正的知识和本领。在华中师范学院，根据分工，杨东莼负责指导历史系的工作。在很短时间内，他就和系内的教师进行了个别谈话，而且谈话前都作过认真准备，对教师的家庭、学历、经历、专长、特点、身体健康状况和眼下遇到的困难，都做到了心中有数。这样的谈话使人感到亲切，没有拘束，而他也就通过这个途径掌握了大量系内的情况。他亲自为学生作治学方法和政治形势报告，使学生们举一反三，大开眼界。校内教授作科学研究报告时，只要得到讯息，他一定赶来参加，认真倾听。难怪以后这所学校的的老教师们都有着美好的回忆：杨东莼任职三年多，即1954—1957年，特别是1956年，无论从全国或从华中师院来看，都是建国以来形势最好的年代。

杨东莼当过中学教员，也当过大学教授；他办过正规中学、大学、师范专科学校，也主持过短期干部训练学校。他的教育工作经验是很丰富的，大体说来有三：第一，既然说科学和技术是（或者“可以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科学技术本身之所以能够发展和突破，从根本上说来，除了政治条件和体制规格之外，还必须通过教育这个必由的手段，因此，把眼光放得远大一些，把教育工作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优先考虑，在全民族中造成一种浓厚的热爱和重视教育的气氛，应是当务之急，不得须臾延缓；第二，不管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育都必须为革命斗争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其最终目的则是造就一批又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第三，育人必先人育，“国以人兴，功无幸成”，要把教育搞上去，关键在于爱护、培养和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支过得硬的师资队伍。

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杨东莼是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杨东莼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由于特殊国情的决定，在旧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除极少数人依附于反动派以外，绝大多数都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所以他们是爱国的，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前途并为之献智出力的；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更应该是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社会主义的。至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则是一件艰巨的、和风细雨的工作，需要一个长期的锻炼过程。在这里，一切对知识分子的无端贬抑、侮辱甚至摧残，都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莫大损害。虽然他在《何物自由主义》这本小书和《打渔杀家新解》、《从剪辫子想到的——看老舍〈茶馆〉有感》（载1957年秋《人民日报》第6版）这些杂文中，流露出了一些“左”的情绪，但是，从总体来看，他在行动中确实认真贯彻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他拥护毛泽东同志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所规定的方针，认为这是一个必须长期执行的方针。他赞成周总理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赞成陈毅同志1963年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却不愿苟同那种轻视和伤害知识分子的“左腔左调”和粗暴做法。

对于学有专精、业有专长、但又存在某些缺点的知识分子，杨东莼总是尽力之所能，去做一些据他说是近于“保护”的工作。在政治运动波涛汹涌接踵而至的那段历史时期，他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运动之前以老朋友的身份去和知识分子谈心吹风，让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不至于在急风暴雨的批判前惶惑不知所措。对于个别体弱多病的知识分子，杨东莼还用尽心思让他们取得适当机会回避一下。石声汉教授是庚款留英的第一届高材生，专攻生物，为人诚实不欺，敏悟非凡，有学贯中西之誉。可是他

不修边幅，懒于世故应酬，耿介直爽几乎到了落落寡合的地步。为了使他在运动中不受伤害，杨东莼千方百计地下功夫“保护”他，使他后来在整理我国农学古籍，包括《齐民要术》等名著，做出了特别可贵的贡献^①。1963年以后开展的某些所谓“学术讨论”，实际上是不讲道理的围攻批判。对此，杨东莼十分反感。报刊上点名批判周谷城、夏衍、孙冶方，他偏偏要在各种场合大谈自己和这些同志过去的共事、交往和评价，隐约地流露出由衷的惋惜与同情，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巧妙的抗议形式。20年代长沙中学著名英语教员杨笔钧，桃李满天下，政治清白，为人正直，有口皆碑，“马日事变”后曾帮助杨东莼脱险离湘，并曾掩护柳直荀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杨笔钧81岁时孤身一人在长沙生活，十分困难。杨东莼多方写信陈情，将杨笔钧在湘潭工作的女儿调来长沙伴养老人。程潜的二公子程元曾为此事出了大力，杨在感谢信中提到顾念旧情问题时说：“足下言念旧为不可思议。不思不议，当然不可思议；多思多议，便可思议矣。《老子》想已读过，重读更有好处。”^②他还经常说：“不念旧恶，在必要的条件下应该如此做；不念旧情，那就会变成独夫和天下绝物。”向达教授是国内有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受到了严重冲击，为了“保护”向达，他向有关方面反复介绍向达的专业成就和他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鲜明的政治倾向。原《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是杨东莼受命与其联系的对象，他对王芸生关怀备至，也做了许多“保护”工作。经学家马宗霍，从湖南带着可以理解的十分不满的情绪，调至北京中央文史馆当馆员，月支100元，待遇骤降，生活困难，杨东莼设法调他到中华书局做编辑工作，使他生活安定，发挥了晚年的光和热。语言文字学家

① 见戴锦龄：《杨东莼二三事》，原载《随笔》1984年第4期第66—68页。

② 见杨东莼1974年3月30日致程元信，原信存笔者处。按，程元所说“不可思议”，是赞扬杨东莼不念旧恶，顾念旧情的品德的。

黎锦熙居室逼狭，藏书乱积，无法开展研究，杨东莼四出奔走，替他解决了住房问题。逻辑学家金岳霖重病时得不到应有的照顾，雇板车送医院求治，杨东莼为此大声疾呼。知名爱国人士章士钊，90高龄仍在为《柳文旨要》朝乾夕惕，艰难笔耕，杨东莼尽管不同意《柳文旨要》的基本观点和一些牵强附会的古今类比，但是他认为，这么大年纪了，仍在孜孜矻矻为学术事业献身，难能可贵，因此，他为此书的付梓四出联系，使作者在辞别这个世界之前，终于见到了《柳文旨要》的精致的大字体印刷版本，宽慰了老人一颗赤子之心！杨东莼担任中央文史馆秘书长的时候，曾专程从北京到广州看望商衍鎏和陈寅恪两位副馆长，不管是对商老还是对陈老，他都缓慢有力地说：“您老人家好！我是代表章士钊馆长来看望您的。”他和商老谈词林掌故，和陈老谈隋唐历史，滔滔不绝，应付自如，气氛极为融洽。陈寅恪教授抗战中在成都执教时就目疾严重，终至失明，建国后某年在浴室不慎，又跌断髌骨，他在杨东莼坐定后就发牢骚：“我过去左丘失明，现在孙子膑足。”杨东莼立刻飞驰他的词锋作了答复：“膑足是‘莫须有’吧。谁敢对您加以膑足之刑？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他就太胆大妄为了，中央一定会追究的。我觉得您著述中有的考证确是明察秋毫，并且，您足不出户，知道许多中外大事，您比不少健康的人更健康，这太值得恭喜，值得学习啦！”躺在床上的陈老听后，不禁笑出声来，回敬了一句：“杨先生，我早就耳闻你的辩才，真是名不虚传。”事后，杨东莼语人：“拜访成功，两位老人都很高兴，高兴可以长寿，这样的老人，爱国、正派、有学问，是人瑞兼是国宝，全国已经为数不多啦！”

杨东莼反对欺老凌幼，力主扶老携幼。他对青年知识分子更是热情奖掖扶持，言传身教，从各方面关心他们的成熟和成长。张劲夫在《怀念孙冶方同志》一文中说：“记得在有一次的约会上（这里指的是抗战前夕），某一刊物主编人提到要请冶方就某一专题撰稿，杨东莼当即对冶方发表了评价，说冶方治学严谨，不轻

易为文，他答应要写的文章，必定认真负责写好，只是时间不能急，因为治方不仅在构思上要费脑筋，而且在行文上对每一字句都要推敲的，写文章虽慢，但写出的东西，很有份量。我当时年轻学浅，听了这样的评价，留给我的印象和受到的教育都很深……对当时像我这样的青年来说，帮助是很大的，（杨东莼）帮我们做了许多当时难以做到的事。”^① 1940年6月底，内迁桂林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强迫近10名进步学生转学，杨东莼设法给这批青年以帮助，亲自写信给当时在粤北的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林砺儒，林将这批学生全部接收了。对于年轻学者来信请益的书稿，他总是认真阅读，密点细圈，丹黄殆遍，以商量的态度，提出中肯的意见。对于年轻人提出来的困难，只要他能办得到的，他都尽力帮助解决。他个人生活清苦，但慷慨解囊，资助进步青年。所以有许多人说：“杨东老真是慈航普渡的活菩萨，有求必应。”对于他认为禀赋独厚、勤奋可嘉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总是倾注更多的心血浇灌，使之茁壮成长。胡仲达、李侃、章开沅、陈庆华、张高峰、曾敏之、马雍这些同志后来的成就，都有着一份杨东莼的劳绩。在使天地为之倾斜的特级风暴中，杨东莼自己遭受着严重的迫害，与此同时，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遭受摧残，青年知识分子彷徨失措，教育战线呈现一片荒凉破败景象。他忧心忡忡，约同胡愈之和周世钊“上书毛主席要求见面，毛主席派人接见了三位同志（作者按，据杨东莼、周世钊告我，接见人为华国锋和吴德）。整整两个半天，他们都很诚挚地、也是很沉痛地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晋言。愈之同志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杨东莼同志说的是青年问题。周世钊同志说的是教育问题。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

① 见张劲夫：《怀念孙冶方同志》，原载《人民日报》1984年2月24日第5版。

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① 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召开纪念座谈会，此时，这位60年前五四时代的老战士病得很重，距离生命之旅的终点只有几个月时间了，但他仍然扶病与会，赋诗明志，对青年一代殷殷寄予厚望。由此可见，杨东莼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关心是一贯的，即使身处逆境，也要挺身而出，冒险犯难，为青年一代仗义执言。

杨东莼是一位模范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活动家。他经常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彻底解放自己。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是在这个理论基石上产生出来的，其目的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最顽固、最反动的一小撮敌人驱赶到最狭窄的地带里去，充分孤立他们，以取得和扩大斗争的胜利。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劳绩并不是在理论上有什么独创，而是在实践中颇具特色。约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下述四条。

第一条，他提倡广交朋友。这本来是做统一战线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他能凭借历史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结纳友朋，并且把这个朋友圈子不断扩大。这样，他在各条战线上（包括学术文化界、政界、军界），在各个不同时期中，利用这些老朋友关系，顺利地进行工作，做了很多一般人难于做到的事。

第二条，他总是谦谦蔼蔼，有仁者风，以平等待人的原则对待统战对象。他最反对某些人那种居高临下，以改造者、教育者自居的奇怪现象。在和党外朋友谈话的时候，总是聚精会神，回答问题也经过缜密思考。他经常教育做统战工作的年轻干部：“和年纪大的党外朋友谈话，要认真听，不要走神，不要打断人家的思路，随便插话，^② 不要未经同意就掏出笔记本做记录，不是确实憋不住时不要离座解手。这是必要的礼貌，你要人家尊重你，首

^① 见楚图南：《与人照肝胆 见义轻风浪——沉痛悼念胡愈之同志》，原载《人民日报》1986年1月24日第4版。

先你就得尊重人家。”章士钊的骨灰盒从香港运回北京，在机场迎接时，有一位并不很年轻、地位也不算低的干部面露极不严肃之情，杨东莼后来批评这位干部说：“并不要求你啼啼哭哭，但也不能嘻嘻哈哈，这叫做失态，党外朋友看了会产生反感和恶感，甚至会感到寒心的。”

第三条，待人以诚。他总是说，人之相知，贵相交心。你要人家掏出心窝里的话来，你就得讲心里话，不然感情就不可能交流。党外朋友有所请求，有把握的事他就慨然应承，无把握或不应办的事就委婉说明原因，从不轻诺寡信。1947年蒋军攻下延安时，杨东莼向蒋氏阵营中某些人物策反，得到的反应比较冷淡，但他不把门关死，以克制和等待来显示诚意。他对几十个对象发出了空白信，信封上写明自己的通讯处，信封内不着一字，意思是想过来了，以后仍可保持联系。到淮海大战结束，不到10天，他就收到了许多封态度截然转变的回信。针对某些朋友还心存幻想，他就用毛笔写上一句话：“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他用这样的诚恳态度敦促这些朋友弃暗投明，脱离反动阵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①

第四条，十分强调统战工作人员的学养和素质。他主张：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干部，不仅要懂得业务、政策，而且要争取多懂得一些各类专门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知识。在这一方面，他本人确实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既是老革命，又是新党员

由于客观原因和个人性格，在56年的漫长时期中，他同党的关系时断时续，但即使在脱离党组织的时候，他的心总是向着党的，而且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① 见彭易庐：《杨东莼先生二三事》，1983年10月6日所撰回忆文章，未刊，原稿存笔者处。

1949年10月，周恩来同志在北京单独接见了杨东莼，周总理对他作了八个字的评价：见多识广，胆小如鼠，并且说：“现在你应该把红旗子插起来啦！从来只有个人找党，没有组织来找个人。”杨东莼受了十分深刻的教育，不无内疚地归告亲友：“周总理说的‘见多识广’对我是一种鞭策，‘胆小如鼠’则是痛下针砭，是忠言良药。我是一个孤儿出身，我再不能失去政治上的母亲，一定要认真总结教训，积极争取插上红旗。”后来的历史表明：在共和国建立之后的30年中，无论在广西大学、中南师范学院、在国务院副秘书长任内、在中央文史馆、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和全国政协分管的工作中，他都高举红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他自己也终于在1961年9月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焦琦、萧贤法同志介绍，重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四人帮”施展淫威的那些邪恶的日子里，杨东莼受到了无情迫害，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对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全国串连妨碍生产”的正确说法。在这前后，中央文革小组批判了“以生产压革命”。随后，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了“生产力论”，全国则刮起了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龙卷风。杨东莼对此极为反感，他说：“有些人自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左’派，但他们忘记了人要吃饭、生产要发展的起码常识。有人自封为‘金棒子’，我看是一根搅屎棍。”他日以继夜，重新温读了马、恩、列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以气贯长虹的理论魄力，冒着巨大风险，在全国政协的联组学习会上作了一次专题发言。他指出：所谓“唯生产力论”，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所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任何依据。经典著作中只是肯定，革命可以在资本——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爆发，从来没有批判什么“唯生产力论”。列宁只讲，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泽东同志说得更明确：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

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无端批判一个捏造的“唯生产力论”，可能在一时打倒“政治上的敌人”，但永远不能打倒“敌人的政治”。这些话说得多么深刻，多么策略！在70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正义、邪恶两派力量尖锐交锋之际，发出这种破石惊天之论，又需要多么大的革命勇气，多么大的逻辑力量！^①

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在选举的头一天晚上，主席团成员得到了候选人名单，王芸生发现周恩来依然继任总理，激动得无法入睡。深夜，他跑到杨东莼屋里，两人抱头痛哭。以后他们二人的心相通了，经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后来得知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江青，他们知道国家得救了，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②

1975年暮冬至1976年岁首，在“四人帮”行将覆灭前夕，这伙政治野心家假借和歪曲毛泽东的意向，掀起了一股拔地而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的领导交代，要身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的杨东莼在民主党派的会议上发言。杨写了发言稿去找薛暮桥商量，薛说：“你最好不发言，要发言就应付几句算了，何必写这样长的稿子？”杨说：“不行，领导上一定要我表态，不得不说几句违心之言。”薛看到杨东莼的发言稿字斟句酌，也就表示同意。不料因此引起一场风波，在他发言后受到一批“风派”人物的围攻，说他“假批判，真包庇”，杨东莼被攻击得精神有些失常了。大约就在这个期间，他写了许多诗，在那些诗中，有一首引《贤文》“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为序，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① 见徐伯昕：《当移风易俗促进派——怀念杨东莼同志》。

② 王芝美：《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1985年1月第1版第51—90页。

早知不合人间味，
多买胭脂画牡丹。

他把诗寄给张毕来先生，张先生写了两首答诗。这就引起了杨东莼一首很妙的诗：

我本人间一蠢才，
多口多舌为何来？
只因敢说又敢想，
管它祸灾不祸灾。

大约在1975年的国庆前夕，杨东莼给张毕来写了如下一封信：

毕来吾兄左右：
承赠诗鼓励，感激之至，因步原韵和之，见笑大方，请宥为幸。

人之所贵在自知，
奈何出口不入时！
甘作绿叶一小片，
牡丹尽管涂胭脂。
人老难抛赤子心，
要凭辩证理纠纷；
相争每到不下处，
总有贤明解知音。

兴之所至，难以停笔，再口占俚句二首，以抒鄙怀，望有以教之。

自愧平生一无长，
书在手边懒浅尝，
香花毒草各有趣，

悟到真谛喜欲狂。
五十年来走四方，
处处为人打杂忙，
甘草一味价诚贱，
汤头歌诀不能忘。

此复，顺颂
万福。

弟杨东莼手上 国庆前夕

十年动乱期间，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知识分子最感痛苦的是精神折磨，欲不言而又言，欲言而又不言，杨东莼只是千万知识分子中的一个而已！①

1976年，周恩来同志逝世，杨东莼在写给程元的信中说：“周总理逝世，举国悲恸，史无前例。弟等叨在属下，心情实在难安。”这封信表达了他对周恩来同志的深刻沉挚的爱。就在同一年的六七月间，杨东莼和笔者在北京中央文史馆简陋的办公室里进行过三次谈话。这时，他的神智比较清醒，但“四五风暴”刚刚过去，很明显，他的压抑悲愤情绪是很浓烈的。每次长谈，他都长哭，额头、双颊布满了冰刀霜剑的皱纹和岁月年轮的疤痕，略显呆滞的眼角噙着晶晶闪光的泪珠。他说了如下一些论点：

——“形势令人揪心。我追随革命50多年，从来没有看见过现在这样的局面，我无法自处！偌大一个北京，我的朋友成千上万，但真正能够倾吐心曲的，仅得王芸生一人。其余的朋友不是不可信赖，但大家都有点互相戒备。《罗织经》念到这个程度，真是旷古奇闻。”

——“周总理一柱擎天，力撑危局，功在万世。他不是病死

① 见1990年10月25日张毕来所作《静夜思》，原载1991年1月《民主月刊》第38页“缅怀故人”栏。

的，他是累死的，他是气死的，他是受迫害致死的。他的逝世，使我进一步领会了‘虽万人莫赎’这句古语的悲哀的内蕴。”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伙政治骗子窃踞高位，利用歪曲杜撰历史的卑鄙手法，来打击坚持革命原则的同志，这是给我们伟大的民族抹黑。”

——“‘四五风暴’这桩公案要靠党和人民来做结论。”

——“一个比你年轻的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居然成了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群小包围，整个格局都打乱了！前路茫茫，十分凶险。但事物总有一个极限，过了极限，事物就会走向反面，而且时间是会极快的。”

——“批邓反右，我被迫作了一次违心的表态发言，影响极坏。我一辈子在政治上有弱点，在浪尖风口，我胆小畏缩，出现三次脱党现象。30年代‘七君子’被释放后，邹韬奋责备过我，开国后周总理批评过我，我心悦诚服，我力争在实践中克服自己的弱点。但是，在我行将入木之前，居然在政治上如此‘失言’，这是我永远不能宽恕自己的。李维汉同志说我是一个老革命、又是一个新党员，他的话不幸言中了，我怎么向周总理、向老朋友、老同志交代呢？”（他在三次讲话中都复述了这段话的内容，足见他思想斗争激烈的程度，痛苦的深度。）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东莼欢欣鼓舞。他看到了党的希望，人民的希望。很不幸，厌疾（肾脏综合症）苦苦纠缠着他，剧烈的思想斗争折磨着他，使他全身浮肿，易于激动，被迫长期住院。从“四人帮”倒台到杨东莼辞世，整整三年，他一直住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但仍然振作精神，参加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在他预感到即将离开尘世的时刻，他写下了遗嘱：我死之后，一、不要搞遗体告别；二、不要开追悼会；三、不要留骨灰，杨东莼是开国以后提出“三不要”的第一人。这“三不要”的遗嘱，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信仰，反映了一个战士的真知灼见和优美情操。

1979年9月25日，在北京，杨东莼的生命河床干涸，他在生命的终点写上了一个句号。^①

1991年2月28日在湖南医科大学

附二医院十四病室初稿

1991年9月24日在湖南社会科学院改订

① 杨东莼的具体历史，有一部分是作者直接从王效挺、黄文一主编的《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1920年10月——1949年2月北大地下党概况）》一书第120页中引用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该书第三章的标题为：“建党前——抗战前夕北京大学师生离校不久即入党部分老党员”（第114——139页）。该章序言说：“从建党前后到七七事变前，北大师生中还有许多有影响的老党员。他们虽然在校学习和工作期间尚未建党或尚未入党，但在校时都是政治进步，较有影响的活跃人物，积极参加了从五四到一二·九等重大运动和各种政治斗争，不少人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而在离校不久即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有的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有些在工作中或学术上做出过贡献，有些已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抗日战争前北大校友中的部分老党员，做一专题介绍。”这个专题介绍共列举了34个人，毛泽东排第一，陈独秀第二，杨东莼第七。

我所了解的赵戴文

杜彦兴

赵戴文，山西五台县人。民主革命者，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国民党的元老，抗日爱国将领，在民国史上是有影响的人物。

我与赵戴文先生同是五台人，他是东冶镇的，我是北大兴村的。我15岁（1926年）在阎锡山、赵戴文当政后的山西阎锡山私立进山中学念书，由初中到高中共六年。以后到北平上大学四年，1936年夏毕业后回太原，先在山西日报任编辑。后在西安第二战区继续搞新闻通讯工作。我与赵先生的三儿子赵宗复（共产党员）是中学同学，抗战期间，我因工作关系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秋林和克难坡与阎的几位侍从秘书杨怀丰、李夢源、徐崇寿等以及赵的秘书徐培峰都有交往。解放后也未中断来往。这里，将我所了解的赵戴文的情况，回忆整理出来。

五台秀才 留学日本

赵戴文，字次陇，1867年（清同治六年丁卯），农历十一月初三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其先世居马邑（今朔县），明初移五台。清顺治初，各地举旗反清，其十一世赵国昌和堂兄开昌，曾率众阻击清兵，不胜，遂隐于陇亩间。祖父业农。赵父名良槐（字选三）少孤贫，依姑母长大，继商业。曾在本镇西街渠翰林家所开的“醒香园”杂货铺当伙计，后当掌柜。赵戴文一生不置家产，后来虽历任军政要职，却不事积蓄，从来不过寿，不请

客，婚嫁不收幛礼，丧葬不发讣文。

赵戴文的原配刘氏，本镇北街人，生效复、仰复二子。刘氏病故，赵继娶姚松贞（本县樊家疃人），生宗复、景复二子，又生五女。

赵戴文九岁入学念私塾。他的启蒙老师是五台县东冶颇负盛名的教师田乃心老先生。赵小时候受田老先生启迪很多，14岁读“松阳讲义”，知有圣贤之学，19岁入县书院试，考取秀才。24岁入太原晋阳书院肄业，师事李菊园。赵戴文通古籍，受宋代理学程、朱影响极深，尤对清初理学家陆陇其提倡的“居敬穷理”非常钦仰，因而就号次陇，把自己放在仅次于陆陇其的地位。赵对宋元之际理学家赵复也很敬佩，认为是他赵姓先辈之荣耀。因此，他的四个儿子均以“复”字立名。长子叫效复，次子叫仰复，三子叫宗复，四子叫景复。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赵27岁应科试，学使王梅岑，擢赵文为经古第一文，列一等第一，调入会德堂肄业，受五台观上村名孝廉毛泰芝的教诲。毕业后赴祁县就家馆。

1900年，赵戴文先后就聘于山西大学堂及宁武学院山长（宁武中学校长），从事教育。这时期，他目睹清政府腐败，开始倾向革命。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冬，是年39岁的赵戴文被保送日本留学，住东京弘文师范学堂。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开始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

中山信徒 推崇革命

赵戴文在日本留学时认识了阎锡山。他们是五台同乡，但在家乡时并不相识。在日本东京留学时，阎锡山在振武士官学校学习军事，赵戴文在弘文师范班是学文的。两人同时参加山西同乡会的活动，互相了解，结成“亲不亲，同乡人”的五台小老乡。此后，常在一起谈论时事，痛恨清政府之腐败误国，认为非革命

不足以救亡图存。由于志同道合，阎赵交往甚笃。论年龄，阎比赵小17岁。由于孙中山和黄兴国内多次武装起义失败，便开始重视在学军事的留学生中发展革命骨干。因而阎锡山早于赵戴文加入同盟会，并且是铁血丈夫团的骨干。阎锡山介绍赵戴文加入同盟会，引见孙中山先生。赵阎两人成为同一条革命道路上的知己。

赵戴文和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期间，常去孙中山住地，接受了大量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中国革命的主张，并努力完成孙中山交赋的任务。1907年，赵戴文和阎锡山一同回国度假，奉命回国后布置山西革命，并携带两枚炸弹取道上海经海关至山西内地，那是很危险的。开始，赵阎各带一枚，快到上海时，因海关检查甚严，阎提出，将与赵分带之炸弹集于他的身上，对赵说：“如被检查出来，我一人承担，赵君可不承认与我同行之人。”检查时阎站前列，赵站后列，赵对阎说：“我站前列，阎君站后列如何？”阎说：“后列有怕检查之嫌，还是我站前列。”果然，检员是对后列检查得较为细密。二人遂携带炸弹渡此危关。赵戴文返家小住三五日，即与阎同赴五台山周围和雁门关内外“旅行”，察看地势，并在附近各县向亲友、教师、学生、商界、僧侣等宣传、运动革命，历时三月，复赴日本。

赵戴文东京学习完毕，回国后在太原先后任农林学堂国文教员，并晋阳中学堂斋务长，以从事教育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同时负责山西同盟会支部的秘密活动，发展许多革命志士为同盟会会员，为以后太原起义作准备。

赵戴文自参加同盟会后，总是遵循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追随在阎的左右。阎锡山、温寿泉等铁血丈夫团骨干分子和同在士官学校毕业的黄国梁等，都分配在山西的军事领导机关，后又在山西编练新军中任要职（黄和阎分任八十五标和八十六标标统）。此时，赵戴文所掌握的同盟会革命力量，积极配合阎锡山等掌握新军的活动。他们时常秘密集会，商讨推动革命工作。他们是辛

亥太原起义的核心。孙中山先生曾誉赵阎为山西的一文一武。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赵戴文44岁，参与阎锡山等组织指挥和领导的太原起义。关于太原起义，孙中山和阎锡山都说过，原在日本制定“南响北应”战略决策时商定，山西所担负的任务是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援革命军北上。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形势变化疾速，“我没有等到革命军到河南，就紧跟着湖北武昌之后，在太原起义。这并不是既定的计划，而是受了事实的逼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动。”^① 10月29日（农历九月初八日），举行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机构军署，杀死了巡抚陆钟琦。革命成功，光复了山西。时阎锡山为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被推为都督。后来，赵戴文任山西民军东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与东路军总司令姚以价率部镇守娘子关。

辛亥太原起义，直接威胁清政府首都北京，因此，清政府于太原起义后的第二天，即令驻防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进军山西，镇压革命。而清政府所不知，吴禄贞早在日本士官学校第四期生学习军事时，即与孙中山结识并参加中兴会（后转入同盟会）。他率部向山西进军抵石家庄，即致信阎锡山联络组织燕晋联军，杀死袁世凯（此时袁在湖北指挥镇压武昌起义军），然后挥师北上，直捣北京。阎接信后，与副都督温寿泉约定，在娘子关与吴禄贞会面商谈。赵戴文作为阎的谋士（阎称赵为总参谋长）参加会谈。会议决定成立燕晋联军，公推吴禄贞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副都督兼副司令，温寿泉为参谋长，并决定山西民军派两个营开赴石家庄，归吴指挥，执行任务。但是，由于行动计划泄露，吴禄贞被袁世凯重金收买其亲信而遭惨害。燕晋联军行动计划破灭。吴第六镇里的同盟会员何遂、孔庚等转入山西民军进行革命。

^① 《阎锡山早年革命回忆录》，见《近代史资料》总55号。

后来，形势发展急转直下。袁世凯以清政府名义派渠本翘为山西宣慰使，进行诱降活动。当年11月15日，张锡銮率曹锟第三镇开往石家庄，准备进攻娘子关入晋。12月9日，清军开始进攻娘子关，阎锡山偕赵戴文娘子关督战。山西民军娘子关战败，阎锡山、赵戴文等撤返太原。此时太原一片混乱。山西军政府内部产生分歧，遂“兵分南北”分头行动。阎锡山坚持暂弃太原北撤（副都督温寿泉，开始坚持死守太原，后率部撤晋南河东区坚持斗争），赵随同阎率部北上雁门关以北绥远包头坚持斗争，继续反清活动，直到南北议和，袁世凯就任总统后，赵乃随同阎返回。阎赵的随从事后说，当时阎锡山和赵戴文所部，在绥远坚持“游击”斗争，十分艰苦，阎赵各骑一头小毛驴指挥。后来，副都督温寿泉等也由晋南返太原，山西军政府重新组合，赵任都督府秘书厅长，后任阎的参谋长。

孙中山先生对山西辛亥革命十分肯定。袁世凯篡夺临时大总统后，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孙中山为山西起义力争，给袁世凯电报达23次之多，并表示：“如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即使南北和议破裂，在所不惜。”这样，袁世凯才于1912年3月，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同年4月，阎锡山由忻州回太原，赵戴文乃随阎返太原复职，重掌山西军政。孙中山先生对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同盟会成员举行辛亥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且暗示：“山西可以威胁北京，务必保存革命实力”。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被袁世凯篡夺后，大权旁落，孙中山接受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已经掌握山西军政大权的阎锡山，和赵戴文主要负责的山西同盟会，极力邀请孙中山先生由北京来访太原。孙中山接受邀请后，阎锡山特派邢殿元为代表到北京来迎接。接着又派老同盟会员温寿泉（副都督）^①、谷思慎、南桂

^① 《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记载：1912年、1913年温寿泉任山西省军政司长。

馨赴京迎接。身为都督府秘书厅长的赵戴文，参加了迎送孙中山先生工作。并在山西本土与孙先生见面。当孙中山一行拟乘专列经石家庄来太原时，山西同盟会支部又派出景梅九（定成）专程到石家庄迎接。阎锡山、赵戴文同时派出200名卫队抵石家庄护卫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乘坐的专列自石家庄开出，山西都督阎锡山亲自抵山西境内岩会车站迎接，登车陪同孙先生来太原。

9月18日下午5时10分，孙中山莅临太原。阎锡山、赵戴文仍按中华民国创始人、临时大总统规格组织欢迎和接待。19日孙中山先生出席各界代表欢迎会，发表演说，一再表彰阎锡山等在山西的同盟会员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伯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盛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在太原商学界宴会上又说：“前在日本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子于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共和成立，须前推山西都督之力为最。”当然，孙中山先生对阎锡山革命的授功，自然包括赵戴文等老同盟会员在内。阎锡山曾说，太原起义前，“为进一步使两标新军革命化，我与盟友赵戴文、温寿泉、南桂馨、张瑜、乔煦、常樾日夜密谋，决定一面发起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表面研究学术，实际上团结同志，暗中鼓动革命，一面组织模范队，表面上作训练的表率，实际作起义的骨干。”^①举行起义前夕，赵戴文与阎锡山一起估计了一下同盟会在新军中可能使用的力量，并且共同策划。^②尽管赵戴文早在东京时就认定孙中山是最好的先生，对他的革命思想深信不疑，又时常出入寓所，接受孙先生教育和指导，但在这时，身为山西都督府秘书厅长的赵戴文，他非常懂得以怎样的姿态参加迎送孙中山的。孙先生在太原公开露面的场合，他很少出现，只在孙先生单独接见的时候，方将山西革命形势和日后如何贯彻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与孙先生交谈。

^{①②} 均见《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近代史资料》总第55号。

三民主义 始终贯彻

赵戴文和阎锡山是山西旧政坛上齐名人物。但是，每当重要历史关头，赵总是把阎推到前台，他退后合作间的“总参议”。赵尝语人：我与阎，君臣名分定矣？自从1905年前后，他们在日本东京参加同盟会，走上同一条革命道路的时候起，至1943年赵戴文逝世之日止，尤其阎执掌山西军政大权的历史时期，赵总是追随在阎的左右。可以说，赵又是阎的谋士和参谋长。因此，赵戴文在山西推动阎锡山贯彻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和三民主义，或者说，和阎锡山一道推行的。

民国初年，赵戴文和阎锡山的确贯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以后，所颁布的一系列实行民主改革的法令。阎锡山以都督名义发布告示，男人剪辫子，妇女放脚，提倡兴办学校。“听从者奖，违抗者罚”。为了推行“新政”（即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曾下令五台、定襄各村镇，把庙宇改用为办学校，庙里的神像搬掉，改作学校的教室，发展国民教育事业。当地流传着的几句顺口溜：“初三十三二十三，河边出了个阎锡山。阎锡山胡拾翻（胡折腾之意），剃了辫子留了洋，搬了神像立学堂。”阎锡山山西军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和行动，都是赵戴文积极支持和鼓励，促使阎这么干的。并且首先从五台家乡做起，要求同盟会会员带头自我革命。委任五台县五级村的康佩珩（字子韩，日本留学生，同盟会员）负责，联合当地绅士名流林铭山、朱应龙、赵三成（字恭安，日本留学生，同盟会员）等人，在赵戴文故乡东冶镇，搬掉“十虎神庙”里的神像，办起了高等小学校。设立“保安社”，一面维持社会秩序，一面大搞剪辫子、放脚活动。同盟会员康佩珩他是早剪辫子的，被人叫做“康秃子。”他奉命在东冶镇负责“保安社”开展剪辫子、放脚运动，首先从自己家里做起。命令他老婆放脚，他老婆不愿意，吓唬说：

“你不珍（掺当地方言，解开之意）脚板子，我枪毙了你！”他老婆和弟媳们都放了脚。他又动员父亲剪辫子，他父亲指着鼻子骂他：“叫你到东洋学本事，想不到你回来却要我的命。”康佩珩哀求说：“你不剪辫子，我就不好办事！”他的父亲和五个弟弟也都把辫子剪去。东冶镇每逢二、五、八赶集，“保安社”的人，带着剪子在行人要道，设卡子强行剪去男人头上的辫子。

女人放脚，震动更大。当地人说：“东冶的秀才赵戴文，河边的都督阎锡山实在管的宽哩，连女人的脚也要管。”由此可见，赵戴文等老同盟会员，对社会改革，除旧立新，还有点革命精神哩。村干部要带头，学校的师生街头宣传，每人胸前佩戴一个布条，上写：“不要缠脚的女人”。对于放脚和不放脚的女人，有奖有罚。阎锡山说，女人们放了脚，不缠裹脚布，也得穿双袜子吧！有钱人家好说，穷人家的女人也不能叫光着脚板子走路，每人发给两角钱，扯上三尺土布做双袜子穿；要是一个缠脚的妇女，如果不放脚，或者躲到外逃避放脚，就罚一块银元，有钱人家更要多罚。

南北议和，袁世凯篡夺临时大总统，承认阎锡山为都督的山西军政府后，赵先任都督府秘书厅长，后任参谋长。1915年任将校研究所所长。1916年袁（世凯）政府曾授他为勋五位茂威将军^①。1919年赵任第四混成旅旅长。1920年参加阎锡山主持从事学术讨论的“进山会议”。这一时期，他主持过国民师范（任校长）及育才馆的工作。1925年以后，赵又担任督军公署总参议，代理晋北镇守使等职。

民国六年（1917年），赵戴文帮助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用民政治”和“六政三事”。用民政治内容，包括民德、民智、民财三项。所谓“民德”，以“信”、“实”、“进取”、“爱群”为民德四要，

① 《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记载，1923年1月20日，黎元洪任总统时授赵戴文为茂威将军。

为社会道德标准；所谓“民智”，包括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各项；所谓“民财”，即改良农业（包括林业、农田水利），提倡工业（包括军工生产），以利民生。

“六政三事”。六政是：水利（开渠、凿井、修筑蓄水池），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三事是：种棉，造林，牧畜。这“三事”是第二年增加的。而且，办理六政三事，设专门的管理机构。为了防止地官吏谎报，把原来的政治研究所改为政治实察所，委派政治实察员分驻各县调查了解和监督实施。虽然采取了一些行政命令等强制性的措施，男子不再留辫子，女子不再缠足的事，基本根除。提出的发展农林牧“三事”之后，种棉地区扩大，优良品种有所推广，产量亦有提高。植树造林，规定每年清明为植树节（孙中山逝世后改成每年3月12日为植树节）。为了发展林业，设了林业传习所、林业促进会，建立了不少的苗圃，号召利用荒废山野造林。规定种树株数，提倡道路两旁植树成荫。畜牧业，亦有较大发展，对于能改良种类或饲养数目蓄息多的，还有奖励。

孙中山1912年视察太原时，私下里指示阎锡山和赵戴文，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们要想方设法保住山西这块革命基地。又说，山西煤铁资源丰富，可大力发展矿业，建一大炼钢厂。发展军事工业，制造最新武器，供全国扩张武备之用。对修筑山西内地铁路亦应勘察作出计划。一个时期，在山西开发矿产，建设工业，解决民生。用阎锡山的话说，这个建设目标，即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经若干年的努力，建设初具规模。至对日抗战开始时（1937年7月7日），山西的建设，已有机器厂、炼钢厂、化学厂、水泥厂等。民用方面，有纺纱厂、水压机厂、汽车修理厂、农具厂、发电厂、火柴厂，等等。尤其军事工业的军工生产，成绩更为显著。其中步枪厂月出3000支，枪弹厂月出300挺，重机枪厂月出50挺，冲锋枪月300挺，手枪月600支，山炮厂月出七五山炮30门，野重炮12门，火药厂月出120吨。起初，北洋军阀各派

系武装进攻山西，傅作义守涿州三个月，使用的是山西造的武器和弹药，尤其手掷弹、手雷威力很大。后来，抗战初期，阎锡山前线指挥晋北战场抵抗日军入侵进攻，第二战区中国军队所使用的武器弹药，大都是“山西造”的。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赵戴文悲痛万分，决心继承孙先生意志，遵照孙中山遗嘱，为民族民主革命奋斗不息！1926年10月，蒋介石统率国民革命军实施北伐进占武汉。11月，蒋介石以广东国民政府名义派胡汉民为代表到太原与阎锡山联系，希望派人去武汉研究商讨参加北伐事宜。阎与赵（戴文）商量后，决定派老同盟会员赵丕廉与胡汉民同行前往。赵丕廉到武汉，首先与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会晤，又见了陈公博，陈引起赵（丕廉）赴南昌与蒋介石见面，蒋说：“阎是老前辈，又是丈夫团的人，盼阎能早举事。”赵折回武汉，又与蒋会晤，转达阎锡山愿于5月5日可以举事电意。之后，国民政府授阎以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这样，阎锡山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提议下，于1927年6月6日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晋绥军列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开始悬挂青天白日旗，通电服从三民主义。此时，赵戴文、阎锡山、温寿泉等同盟会员均转为国民党党员。赵戴文代表阎锡山一股地方势力派成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后来又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成员。1928年3月，阎率第三集团军参加蒋介石统一指挥的二次北伐直取北京时，赵戴文时任察哈尔都统。不久，赵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蒙旗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副长官。1929年任国民政府委员，8月29日被选任监察院院长。赵戴文参加南京国民政府活动，他联络各方人士，起着阎锡山地方势力派与蒋政府间的桥梁作用，时人称“阎赵”。由于中原大战时，赵戴文随阎锡山参加了反蒋的北平国民党扩大会议，其监察院院长由于右任接替。中原大战后，阎锡山下野，赵随阎赴大连避难。1932年阎锡山复职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赵任太原绥署总参议。1935年以后，赵又任阎锡山为会长的“自强救国同志会”副会长“主张公

道团”副团长、“民族革命同志会”副会长，山西省政府主席。他始终作为阎的副手，支撑着山西的军政府。

治学一生 自有主张

赵戴文幼读儒书，专心学业，曾考取秀才。他一生治学严谨，以后从事社会活动，在不少的政治场合，发表自己的主张时，多引用孔孟的教语，以作解释。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时，经常发表讲话，他根据中国的经书立论，申述自己的见解。对此他自己说过：“我从前信的是儒家之学，自30岁即学佛学。”^①他是学宗阳明，上溯孟子，又取法程朱，言精理奥。著作有《周易翼邵补正》、《孟子学说》、《答问录存》等。赵曾说过：“人乘根据儒家求学，天乘要根据中国老庄列诸子。”又说：“宇宙，人生观，要根据佛家禅、净、相、教四宗。”他历任军政要职而性行高尚，淡于利禄。晚年还受五戒，皈依三宝，“常欲去根本上的无明种子。”^②

赵戴文是佛教徒。民国初年间，赵先生在山西提倡读经祀孔活动，并出刊《来复》周刊。成立佛学会组织，举行佛学讲学，由赵作主讲，吸收信仰佛学的耆老和旧军政人员。赵对佛学坚持不辍。他曾兼任山西佛教协会会长。抗战前，他还在文瀛湖畔自设禅堂，以居士身份吃斋念佛，同时，他在山西报刊上，经常引用佛经上的语言，如倡导各级公务人员，要发挥各自内心里的“活东西”，克服眼前的一切困难，鼓励人们在政治上遵行“守土抗战”。1939年住三原东里堡时，曾和西安兴教寺的主持妙阔法师，进行过佛教交流活动。

1924年赵先生在学术讨论会上讲公平制度时说：“现在社会上有最重要问题曰无恒产。吾辈欲解决此问题，莫善于使人人俱有

① 见赵戴文1934年讲“佛学百法明门”。

② 见1934年《山西教育学院寒假讲学录》。

恒产。欲使人人俱有恒产，其法莫善于田由公授、资由公给二大端。”赵在自省堂讲：“孟子学说足以救世界。”他将孟子学说概括为四句话：“大家有饭吃，大家有衣穿，大家有房住，大家有学校求学。”他认为此四点“施行之大障碍，即旧日无限制之私有制度。此制度不铲除，则万万办不到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学校求学”。赵先生又讲：“军阀、政客、官僚、资本家须幡然变计，勿培养此种继续人才。从学校课程之改革，从学生方面的变化，变成真人才，则军阀、政客、官僚、资本家之恶德——侵略、垄断、掠夺之推倒，一反手间耳。”

赵戴文任第四混成旅旅长时对军官讲话说：“要认真教学增高军人知识，补助国民教育。”任育才馆馆长时对学生讲：“吾以为现治中国，以孟子学说为适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1941年和1942年赵在克难坡为首脑干部讲学。主题是讲“明明德”。“明明德”出自《大学》第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读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儒家学说内在的“根本”宗旨。明德（明对黑而言）指心，明明德指发挥心的作用。孔子称为“仁”，孟子称之为“浩然之气”，文天祥称之为“正气”，王阳明称之为“良知良能”。赵戴文怕人不懂，又称之为“活东西”。他的学问以儒家的“明德”为内在的根本，是人之所得于天者，是人身上同有的，而外在的适应全凭“明明德”，即发挥“明德”，或叫发挥“活东西”。智、仁、勇都是以“明德”为出发点，从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战区克难坡当时衣食住行都十分困难。作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民族革命同志会副会长（阎任会长）的赵戴文，他每次讲话，必讲“明明德”，例证必引孟子。一次讲话，首先要求听者做到以下四点：（一）端正，（二）下气，（三）怡声，（四）柔色。他说，今天我们讲经书，就是要学大禹“卑宫室，恶衣服”，“胼手胝足为大众服务。”他让大家朗读“明明德”三遍之后，大声说：“大家听我们的声音，真是上达天，下达地。我们的气色，

真是至，大至刚，真是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啊呀！我们今天真要登君子之堂哩！”

赵戴文讲文天祥的《正气歌》，引证止于至善。他说，比如日军俘虏了我们，我们不怕死，不作俘虏，不怕脑袋掉了，这就是我们止于至善之地。克难坡原来只几户人家，连阎锡山、赵戴文住的屋子，都是军队自己挖的窑洞。人们暗中流传着顺口溜：“阎锡山真混帐，不打仗，净打洞。”赵在讲话时说：“要安心抗战，就得有住处，不打洞，哪有住？打洞就是为了抗战！”他对坏人坏事，贪污腐化，非常痛恨，授课中间，有时举起手杖痛斥。赵戴文在晋绥军将士当中，在山西省政府人员和山西老百姓当中，他都是很有声望的。抗战时期，他在安定人心鼓舞抗战精神上，起了重要作用。

服从中央 统一行动

赵戴文有正统观念。在党派问题上，他只承认孙中山由中国同盟会改组改名的国民党。他逝世前有书面遗嘱，其中主要的一条是在他的墓上立碑只书：“中国国民党党员赵戴文之墓”。他一生非常珍重孙中山所创立的革命党，死后也要刻在墓碑上。因此，当第一次国共合作，蒋介石被推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北伐军总司令出师北伐占领武汉，派出胡汉民为代表联络阎锡山出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继续实施北伐革命的时候，赵戴文积极支持阎锡山，并为阎和由他指挥的晋绥军参加到国民革命军的行列表示庆贺。后来，1928年阎锡山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由蒋介石统一指挥出师二次北伐直取北京，解决了北洋军阀控制的政权，组成实施南北统一的、以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长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蒋拉山西派势力，一度委以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赵戴文被委任行政院下的内政部长。从此以后，赵参与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事，在他思想上形成了南京政

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此，他不赞成阎的反蒋（介石）行为。由于阎锡山不仅有了蒋介石先打桂系李宗仁，接着又利用收买冯（玉祥）的亲信韩复榘和石友三诸将等卑劣的手段，从而打垮冯玉祥的前车之鉴，又有郑州亲受蒋暗算的教训，赵曾多次劝阎勿反蒋，阎不听从，为此事阎赵闹翻了，阎责赵说他被蒋收买了。这话大伤赵戴文感情，赵潸然下泪。

赵戴文的实际行动感动了阎锡山。他通电下野受到蒋介石的通缉“格杀勿论”的时候，赵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而是为阎出谋划策，并委托亲信护送逃出山西，又与阎同赴大连，共度患难，帮助他东山再起，重新执政山西。阎锡山由大连回来山西，复职太原绥靖主任之时，写下的几段日记，道出了肺腑之言。1931年10月25日的日记写道：“次陇（赵戴文）由连（大连）归，深感外患而内部不能团结之危险。”1932年3月7日的日记写：“动念不对，次陇负进言之责。”1935年7月13日的日记写：“次陇与吾相交30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及身家之患者，亦未形忧色，昨言及人心瓦解，国将于应付中亡之，痛哭失声，非有所惧，乃有所伤也。”12月5日又记：“华北何计良，国是究主谁，二次（次陇、次宸——徐永昌）伤国泪，疚心亦断肠。”此后，赵亦不再南京政府任职。

阎赵先后由大连回晋，1932年春，阎出任太原绥靖主任，赵任总参议。1935年70岁任山西省政府主席^①，继续协助阎锡山山西执政。阎对赵的进言，一般都能遵从。这时，德高望重，年已“古来稀”的赵戴文，作为阎锡山集团中的唯一的“忠臣”和“功臣”，仍然追随在阎的左右，忠心耿耿地卖力气。九·一八事变后，直至抗战前的六年间，赵戴文作“媒介”，与蒋介石沟通关系，稳定住山西局势，支持阎在“自强救国”口号下，大搞建

^① 《中华民国时期军政官志》、《民国人物大辞典》记载：赵戴文1936年5月任山西省主席。

设。创办西北实业公司，经营管理工矿企业。

一个时期，赵戴文帮助阎锡山确实干了些实事。阎锡山编订了个《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同时加紧修筑同蒲铁路。同蒲铁路自1933年5月1日动工，限期三年完成。对修筑同蒲铁路阎锡山、赵戴文决心很大。有人提出修筑同蒲纳入国家计划，等待政府拨款。阎锡山说，等待中央政府拨款再修，不知到何年何月？资金比较困难，第一，我们可以军工为主修路。招募来的兵都是壮丁，吃的又是军粮，又没工资开支，每月只不过两块钱津贴零用钱；第二，可以修成一段就营业卖票、运输，再将运营赚来的钱用修路。这么个简单的账还不会算？同蒲路南段地势平坦，工程较易，进展较快，太原至介休段于1934年6月筑成，7月1日通车运营。介休至霍县段亦于同年12月30日通车营业。两段共长214公里，营业进款每日平均3000元。至1936年元旦，南段全部通车营业。北段由于崇山峻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大，进展稍迟缓，只太原至原平段通。此外，日本侵略军进占山西之前，还修筑铁路太原至长治，太原至大同，忻县至五台，平遥至碛口，太原至西山等几条支线，共计完成1100余公里。

爱护人才 不分党派

赵戴文先生，一生刚正不阿，淡于名利，乐于提携后辈、奖掖人才。赵不愧为阎锡山的智囊，他陪同阎穷居大连期间，借用历代帝王稳定“江山”例子，曾对阎说，必须善纳贤才。于是，阎任太原绥靖主任后，他的主任办公室和绥署参事室，由赵戴文选贤才聘请了一批有学问的“才子”，充当秘书和参事。不管他哪个党派，但必须外国留过学，有真实才者。李冠洋、方闻、朱点（徐向前元配夫人的侄子，徐的同学）、裴琛都是阎的学术秘书。此外，还有张隽轩（地下共产党员）。后来，又陆续聘请了曾赴法留学的历史学家侯外庐、法学家张友渔，还有韩幽桐、邢西

萍（徐冰）、张晓梅、杨绍萱、温健公、黄松龄等一批共产党员。邓初民、许德珩、张申府、王思华等一批进步学者，也受聘来晋讲学。

赵戴文重视人才，从杜任之（共产党员）受聘入主任（阎锡山）办公室任秘书事，可以看出赵的用人和为人。杜任之德国留学回晋，曾去河边见过阎锡山，表示愿意在绥署参事室当个参议。但迟迟未得到回答。据传闻，绥署总参议赵戴文说话比较有份量，又比较通情达理，杜便前往新民街赵公馆“毛遂自荐”。赵戴文热情地接待了他。杜任之向赵先生讲了到河边去见阎的情况之后，赵却说：“哎，你不知道，参议一职多是退役军人，或是外省客卿。你年纪轻轻，为甚要做这（参议）？还是到主任办公室，跟随总司令去吧，那里有前途。”

杜任之来赵先生住室时，老头儿正手捻佛珠，嘴里喃喃地念着佛经。赵与杜谈话，只见他桌上摆着佛经《唯识论》，杜灵机一动，找到了话题。便说：“赵先生还研究佛学哩？”

“怎么，你也有兴趣？”赵主动谈起来。

“我在德国学的就是哲学。”杜答道。

“那好！”赵戴文情绪来了：“依我看，德国哲学数康德最高。”他跷起拇指。又问：“你学的是什么哲学？”

“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我都学过。依我看，这三人中黑格尔的哲学最高。”

这时，赵的眼里闪着好奇的亮光，说道：“那你先把黑格尔的哲学对我讲讲。”

杜任之粗略地讲了一下黑格尔以及他的辩证法。赵戴文越听越有兴趣，连声说道：“好，好！闻所未闻。以后你上了班，常找我来谈。我愿领教。”

不几天，杜任之收到了太原绥靖主任阎办公室任秘书的委任状。

赵戴文很爱人才，也有正义感。抗战中后期，杜任之在孝义

曾因“通共”被阎押回克难坡，并拟绳之以高干纪律（当时杜为民族革命同志会高干）。赵知后，数次向阎进谏，杜卒得脱险。

阎锡山对赵戴文为他聘请或选任在身边的人员的政治情况，也是知道的。但在关键时候，也竭力保护。阎锡山接任太原绥署主任的一段时间，山西省政府主席是徐永昌。一天，徐永昌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逮捕共产党员张友渔。徐永昌问阎怎么办？阎锡山说，你给蒋介石发个电报，就说张友渔不在太原。回过头来，阎派人通知张友渔，蒋介石要抓你哩！给了点盘缠（钱），要他马上离开山西。

在赵戴文倡议和促使下，抗战时期，阎锡山的用入选才也很放得开。1936年10月，阎锡山自任会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成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他接受郭挺一（巨才）的推荐，并派郭到北平邀请山西定襄的薄一波回山西领导救亡运动。阎非常器重薄，让其担任牺盟会常务秘书。后来，阎采纳了薄一波的建议，又有杨献珍、韩钩、董天知、周仲英等来山西。由薄主持改组后牺盟总会的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占居绝大多数。

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编后的第八路军决定开赴华北前线。周恩来偕山西五台籍将军徐向前前来山西与阎锡山、赵戴文等谈判。阎锡山发现共产党的军事家、政治家人才辈出。过后，有一天，阎锡山约赵戴文和薄一波，还有梁化之（薄、梁都是阎的秘书主持牺盟会的工作）谈话，忽然讲到，徐向前这样的人才，怎么走到共产党一边了，不是“楚才晋用”，而是倒过来了，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不胜感慨之至！赵戴文马上接过话来打圆场说，这是喜事，不是丧事，而今我们五台又出了个“大将军”，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保持气节 不当汉奸

赵戴文在阎锡山集团当政的历史时期，始终不渝地 教育部

属，中华民族有气节，绝不当汉奸做亡国奴。他与阎锡山的关系，虽然对人常说：“我与阎，君臣名分定矣！”但是，他在教训阎树节操，不当汉奸卖国贼，始终以长者、先生启发和提醒他，甚至对阎说：“在我们共事的历史长河里，甚事我都佩服你，但绝对不能干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昧良心的事，这样我们将成为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

1931年，中原大战之后，阎锡山通电下野，但蒋介石仍逼使他出洋离开山西。当阎决定离开山西赴天津时，蒋令张学良沿途盘查缉拿，又密令华北五省军政要人：“缉获阎逆，就地正法。”这时，赵戴文来河边村策划，并派可靠亲信护送先行。然后，随阎一同逃避大连，陪住九个月。可称得“同生死，共患难”之友情矣！阎赵穷居大连期间，找了几个人为学术秘书，以“物产证卷与按劳分配”为题，研讨“物劳学说”和“中的哲学”等。阎拜赵为师，给他讲授《论语》、《孟子》等课。

阎居大连，是受日本人保护的。所以蒋介石也未能将阎逮捕归案。但日本人又何不想利用阎继续反蒋，又为他随之而来侵略中国，先占东北三省，紧接着入侵华北，利用阎锡山做大汉奸充当伪政府“华北王”？对此，赵戴文非常耽心阎被日本人拉了过去。于是，他给阎讲授古文课的同时，每天为阎讲《易经》，并讲岳飞、文天祥、太平天国、义和团诸事。更能导出赵戴文对阎认识的真实思想的是，当阎锡山乘坐雇用的日本飞机偷偷飞回山西老家河边村，摆脱了日本人的纠缠。赵戴文说，这一下我就放心了，甩掉了邪魔歪道（指受日本人利用）。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救亡运动高涨，全国人民都要求组织起来，团结御侮。1932年起，在太原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群众革命团体。这些团体，都直接或间接地受阎锡山支配，阎供给其活动经费。赵戴文非常支持“救国”、“救亡”运动。他建议并积极支持于1935年成立了由阎锡山任会长，赵自任副会长

长的“自强救国同志会”。上述团体，一律取消，停止活动。

赵戴文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极大地增强了阎锡山的抗日精神。继北平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山西又经历了红军东征抗日，给阎锡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琢磨红军英勇善战，是什么精神力量在支持呢？阎问赵戴文说：“次陇，红军中的小娃娃，打着红旗占山头，前仆后继，不怕死，红旗插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这是咋回事？”

赵戴文说：“说起来也怪。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出答案。我去问问杜任之他们。”

赵戴文果然来问杜任之。杜回答说：“红军东渡，主要的口号是抗日救国。日本人已经侵占华北；今天，中国不愿当亡国奴的都要求抗日救国。谁能抗日，人民就拥护谁。共产党一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深得人心的。山西广大青年也不例外。只要阎会长高举抗日旗帜，大家都愿做抗日的先锋，万死不辞。……得人心者得天下矣！”

“这个道理，是得给总司令讲讲。”赵戴文说：“看来，抗日是非提不可了。”

赵戴文又说：“今年2月末，红军东渡，到达汾阳县，总司令和我（赵戴文）叫王怀明去看望在狱中的共产党员黄敬斋（王若飞）。问他，共产党来山西究竟要干什么？黄敬斋说，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我们共产党人就主张全国一致抗日，现在红军来到山西和绥远，也当然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如果抗日，就是杀了我，我也甘心。你们如果仍然防共反共不抗日，是会当亡国奴的。我就活着也没有意思。”

赵戴文又说：王怀明曾对我说，“这个人（王若飞）精神很伟大，很感劲人。”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阎锡山、赵戴文等准备抵抗日军的思想大大增强，随之改“防共”为“联共抗日”的方针。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局势

急剧恶化，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阎锡山进一步施加压力，扬言要沿平绥线进占山西，同时用威胁利诱等手段，怂恿阎锡山另搞一套，意在分化瓦解抗战力量以售其奸。由于赵戴文等人鼓励阎锡山“联共抗日”，阎锡山没有顺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指使，也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吓倒，毅然扛起抗日救国大旗，先于蒋介石提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并且于1936年9月，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展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应召于8月参加了蒋介石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阎锡山回寓所，进屋后不紧不慢、表情镇静地对他驻南京的军事代表台寿民、党政代表赵丕廉、财政代表李鸿文以及其他随员说：“非打不行了！（按：指抵抗日军入侵山西。）不打，共产党不答应！”阎锡山所表示的抵抗日本侵略中国的决心，是与赵戴文苦口婆心地教训分不开的。阎在这次国防会议上，愉快地接受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委任。

赵戴文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坚决抵御日本侵略军的进攻，誓死不做亡国奴。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地处华北前哨的山西抗日军民和一切爱国人士要求抗战的呼声极高。此时，赵戴文促使阎锡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革命的主张，联共抗日，守土抗战。1937年8月初，阎锡山接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任命^①，统一指挥包括八路军在内的二战区中国军队，准备迎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中国战争的进一步升级。顿时，山西形势紧张，本省东北部边境暴露于敌，太原受敌机轰炸。此时，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坐镇太原，阎锡山在晋北抗战前线部署雁门关、大同会战。阎在前线接待了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徐向前曾是赵戴文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校长时的学生。师生太原相会

^① 《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记载：1937年8月20日任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格外亲切，赵戴文专门邀见徐向前，听他有出息的学生——军事家，谈谈如何对付日本军的进攻。

赵问徐向前：“万一太原失守怎么办？”

徐向前回答说：“万一守不住，就要事先炸掉小钢厂、军工厂之类的工业设施，不能留给日本人。要组织民众，坚壁清野，把日寇困守在太原城内，逐步消耗和消灭他们。”

赵戴文听罢，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当日本侵略军进攻山西，阎锡山在晋北组织指挥大同、忻口诸战役的时候，赵戴文多次公开表示，要与太原城共存亡，并勉励山西军政人员，同仇敌忾，共同抗日。但当日军突破娘子关、忻口防线时，阎最后决定放弃太原，逃往晋西山西，准备打游击，以观察局势变化。遂邀赵同行，但此时赵怕自食其言，失信于人民，对自己的声誉有失，因而踌躇未定，阎最后以“不同生，要同死”的说法劝赵，还派梁化之对赵说：“老先生如果在太原殉职，而长官出走，你两人在国人面前，不就有了不同的评价吗？”赵沉思再三，最后终于表示：“与长官共同行动。”遂决定跟阎逃离太原。以后，在抗战期间，赵一度驻在陕西宜川和三原等县，当流亡省政府主席。

抗战时期，阎锡山孤守山西吉县克难坡，跨黄河两岸，以联日、依蒋的两面派姿态保存自己的力量。这时，阎锡山抬出赵戴文，又利用在蒋营垒中的徐永昌（军令部长）、贾景德（曾任阎的秘书长，时在重庆政府任铨叙部长）等，依靠蒋介石供应他粮饷和军政人员补给。阎除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头衔外，其余山西的军政头衔，都由赵戴文兼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是赵戴文，又兼任国民党山西党部的主任委员，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1943年赵还代表二战区出席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的华北、西北各战区的党政高级会议。总之，凡是能取得重庆蒋政府信任的，都由赵出头露面。1942年至1943年间，抗日战争走向最艰难的阶段，蒋介石与日军走向蒋日伪合流，阎锡山也取得蒋的同意，在晋西背着赵

戴文与太原的日伪军勾结。抗日形势陷入沉闷停滞的低潮。赵戴文这时的心情，亦走向极端矛盾之中。他十分耽心阎不听劝告而滑坡。为此，和阎锡山大吵大闹一场，抵制他走向妥协投降的道路。

由于阎锡山与太原日军勾勾搭搭，妥协投降的风声传出来了。这时，具有民族意识的干部，都感到失望与愤慨。大家分头去找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不赞成的意见，请他不客气地向阎表示坚决反对。赵是个国学有根基，并且具有民族气节的老先生，当时也很气愤地说：“我向来是服从他（阎锡山）的，这件事绝不能再和他含糊了！”

于是，赵气愤地去见阎说：“他们大家扳我来问你一件事，外边传得很厉害，都说司令长官已经和日本订立密约，不再抗战，准备回太原，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如果有，我们大家是反对的。你回太原去，大家都不跟你回去。”

阎问赵说：“你的意见如何？”

赵回答说：“我也极端反对妥协投降。”

阎动了气，说：“我如果妥协投降，你将怎样？”

赵戴文说：“我一定跳黄河而死，绝不跟你回太原。”

后来，阎锡山对人说：放心吧，我不当汉奸，也不当汪精卫。

尽心尽职 廉洁奉公

赵戴文先生的为人是很厚道的。在山西统治集团里阎锡山和赵戴文的关系，赵始终认定是“君臣”。自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推举阎当山西都督以后的每个历史关头，赵都把阎推为“上”，从不与阎争权。忻口战役后，太原弃守，阎赵同行转移临汾、秋林、克难坡。阎锡山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并任会长，赵戴文为副会长，为阎参赞军政大事，他是名副其实的“总参议”。平日，阎赵互相

推崇。公开场合，简称赵是“赵主席”、“副会长”。私人场合呼赵“次陇”（赵戴文字）。在家人面前称赵为“老先生”。赵对阎极尊重，公开场合、私人相会，都称阎“总司令”、“司令长官”、“会长”，等等。

赵先生一生清廉。据跟随赵30多年的王绍俊（秘书）说，赵政治廉洁，生活朴素，深受人赞扬与尊重。他任军政要职几十年，除了应得薪金外，其余未曾苟取分文。办公费（也称公杂费）剩余部分，本列为主官所有，既不违法，又不是贪污，但赵一向指示王绍俊将剩余费积累起来，用于解决下级官员和随从士兵的困难；赵除太原市新民街有私人住宅外，其他城市均无他自家的房产。赵的家庭人口多，住宿较为紧张，刻苦度日。抗战时期，他的三儿子赵宗复任进山中学校长，因法币贬低薪金不够正常支配，无法之下求父要点钱。赵戴文回答：“你校长的薪金不够花，我省主席的薪金也不富裕，你母亲在三原也得花钱，哪有钱给你。”又说：“我还有些人参，是养老营养药品，你拿去卖了，节省点花。我是没有钱的，以后再不要向我要钱了。”这话不假，阎锡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赵戴文山西省政府人员，被日本人赶至秋林，赵曾把家眷安排三原县居住，迁移回克难坡，赵仍孤老头一人生活。赵妻姚松贞带儿孙居住三原，因家中儿孙聚居人口多，生活接济有限，经济窘迫，难以过活，她不愿对丈夫（赵戴文）说明，姚遂萌短见，自缢身死。

赵在克难坡，他住的窑洞在阎公馆院外，周围无围墙，住室东侧有平房七间，除赵的寝室、会议室外，其他房为参事、秘书、副官居住。赵无卫队，由阎的卫队兼为警卫。他个人无膳房，而是在阎公馆搭伙，按时由副官取饭。吃普通饭菜。他穿衣也不讲究，病故前，经常就穿的那套肥大褪色的粗灰土布士兵军衣。

而且，这期间，赵的家中不断出现亲属暴死夭亡噩耗，先是他的次子养复在留美期间，因失明痛跳海自杀；长子效复原任山西省教育厅科长，后代理厅长，抗战初的1938年6—7月逃难期

间，在山西桔山太郝附近某山村，被强盗杀害。长孙培根，亦于1939年4月，在陕西澄城县公路上被汽车撞死。其妻，年仅54岁短见自缢……可是，在此国难家愁集于一身的悲惨心境，又能向谁诉说？只在赵先生精神极度痛苦之时，曾说：“这是上天在考验我赵某。”

赵戴文先生，在克难坡，年高七十又七，并且生活艰难，身体虚弱。先生重病时，儿女多不在身边，他留有五言绝句诗一首，以表达他一生的遗志。只记得两句：“乾惕七七年，时恐不尽已。”意思是，他一生对事警惕，唯恐尽不到自己的职责。

赵先生病危时，阎曾前往探视，在病榻前问赵有何嘱咐。当时吴绍之（太原绥署秘书长）侍奉在侧，赵口托阎三事：

（一）宗复（赵的三儿子，中共地下党员）年轻，做事不稳当，希望好好教育他。阎回答说：“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一样，我一定要教育他，你可放心。”

（二）抗战胜利后回太原时，将我的家属照顾回去，勿使流落外地。阎答：“一定办到。”

（三）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答：“我有我的主张，我是为了存在利用他们，绝不会走他们的道路。”赵说：“那我就放心了。”

赵重病期间还对阎说过：“我死后，不要写我任过的职务，在我的棺材上只写个国民党党员赵戴文之灵柩就行了。丧事更要从简。”

1943年12月27日（农历腊月初一日）赵患肝癌，医治无效故去，时年77岁。他去世时，阎锡山正在吉县建军，匆匆赶回克难坡，并亲写祭文悼奠。语极悲恸。祭文末尾曾有：“愿你成其学，化育赞天地”词句。

赵戴文逝世一周年，阎锡山在纪念会上讲话，推崇先生的八个“没有”：

（一）没有瞒过一文钱，清清白白廉政自持。

- (二) 没有瞒过一个人才，有一点长处的人，总想请出来。
- (三) 没有偷过一次懒。
- (四) 没有畏过一次难，无论多难的事，认为该办就办，不管得罪人。
- (五) 没有显示自己才能的意思。
- (六) 没有轻视过人，即对差役也如此。
- (七) 没有厌过学，虽在病中亦不肯间断用功。
- (八) 没有倦过教诲人。对任何人不惜三番五次教诲，本人虽谦诚和蔼，对不好的人毫不留情的予以教训和指责。

这八个“没有”，道出了先生的生平。赵戴文先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清风亮节，即至今尤为后人钦慕。

赵戴文先生灵柩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始由晋西运回太原。迁葬前，在克难坡洪炉台前举行了公祭仪式。灵堂东侧悬挂着秘书送的一副挽联：

家中无长物已由夫人证实
门下多节士尽出先生熏陶

赵先生灵柩运回太原后，先停灵崇善寺，后在兰村窦大夫祠旁择地埋葬。“文革”开始，他的墓为“红卫兵”平毁。

这里，附带讲点赵的三儿子宗复的情况。

赵宗复，字近之。1915年出生。少年先就读于山西省立国民师范附属小学，后考入进山中学。1932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后转入历史系。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交通局局长，进山中学校务主任、校长，山西省政府新闻处处长，教育厅厅长。赵戴文临终曾遗嘱阎锡山“好好教育他”。这里有个插曲：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1949年2月29日飞逃南京前，共产党员赵宗复第二次被扣，阎曾召开高干会讨论。当赵宗复案提出后，会上无人发言，只有警宪

指挥处代处长徐端主张将赵处决。阎默然不语。吴绍之说：“请会长回忆副会长临终托言。”阎锡山才说：“将宗复交我处理吧。”阎未下令处决赵宗复，人们议论，主要是因为阎不忘赵戴文对他的嘱托。阎最后将宗复放了。

新中国成立后，赵宗复先后任山西省教育厅长，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等职。赵宗复和父亲赵戴文一样，刚正不阿，重用贤才，为此被视为思想“右倾”而遭非议。他生活十分简朴，把祖居大部分房产献给人民政府，只留几间旧平房全家老少十几口人居住。“文革”期间，他的家庭出身，甚至他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历史，都成了问题。接着遭受到一连串的围攻、侮辱和诬陷，赵宗复不堪一系列残酷的迫害，含恨跳楼而亡。

1992年1月30日完稿

8月22日修改毕

(此文经乔希章整理)

(作者现为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抗战期间赴美接舰归国亲历记

阳克铭 胡征庆等

本文作者阳克铭、胡征庆、陈显扬、熊焯、刘福祥五同志，均系当年投笔从戎，考取赴美受培接舰归国参战的海军士兵。文中真实生动地忆述了他们参加这一艰险曲折经历和激烈复杂斗争的全过程以及所见所闻的事事物物，表现出他们刻苦培训、积极参战、竭力护舰归国、保持民族自尊等爱国主义精神。

投笔从戎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同盟国在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区的战局，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可是在中国战区的形势却越来越严峻。这年春夏，日军向我中原地区发动了猛烈进攻，打通了大陆平汉、粤汉交通线，又先后占领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等城市；特别令人震惊的是：1944年12月5日，贵州独山失守，日军向贵阳进逼，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也受到威胁。

重庆人心浮动，流言四起，国民政府正准备迁往甘肃省兰州或西康省西昌，有的人说，国民政府的各种文件档案已整装待发……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作出“抗战到底”的姿态，提出“抗战救国”，“一寸山河一寸金，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青年

学生从军抗日。当时，我们是在重庆就读的大、中学生，在外敌压境，国家危亡之际，都想振奋起杀敌，报效祖国。青年学生热血沸腾，情绪激动，无法安心上学，各学校基本处于半停课状态，校园内学生们三五成群，议论着战局，讨论着今后的出路。街上墙壁上到处可见醒目的大字标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军去，到前线杀敌去！”各报连续发表号召学生从军的言论。在此形势下，重庆各大中学校掀起了一股抗日从军热潮。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在公开招考赴美接舰参战的海军士兵，我们毅然投笔从戎，报名报考海军。

经过海军选派委员会的文化考核和陆军医院的体检，我们分别被录取。12月中旬左右，新考取的学生兵陆续到重庆市郊靠近长江边唐家沱停泊的招商局客轮“江顺”和“江新”轮上报到集中编队。这些新从军的学生，上面统称学兵，但学兵之间仍互称同学。到唐家沱后，我们对这支海军成立的背景和人员组成有了更多了解。

抗战爆发后，日寇侵占我国沿海各省，美国支援我国的军用物资只能通过海运至印度或缅甸，再经滇缅公路转运入我国。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人员短缺，很难派出军舰为美中军运船队护航。经过中美两国协议，援引美国国会通过的罗斯福“租借法案”(Lend Lease Act)，美国向同法西斯国家作战的同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战略物资，决定向中国赠送八艘军舰，由中国派遣海军官兵，赴美受训，接舰后，即在太平洋担任护航，协助同盟军对日作战。军事委员会奉命主持派员接收工作，于1944年9月和12月公开招考海军军官60名，士兵1000名，组成军队和士兵队赴美接舰参战。军队成员需海军学校毕业，有舰上工作经验两年以上，并经单位或社会知名人士推荐，方能报考。录取的60名军官，已于11月上旬出发去美。由于要求士兵有英文基础，而海军原有士兵不懂外语，文化程度也低，所以就在重庆招考高中以上的青年学生来补充。

这次招考录取的1000名海军学兵，绝大多数来自重庆的各大、中学校。大学有交通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等；中学有南开中学、立人中学、中正中学、求精中学、志诚中学等；还有少数来自成都的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三台的东北大学；还有来自东南亚、香港的华侨归国学生。学兵中大学文化程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单是交通大学参加海军的就有130多人，包括当时在校的航海系、轮机系、造船系各年级的大部分学生。交大校当局动员同学从军时说：“参加海军专业对口，你们上军舰操作，等于上实习课，这次出国学习也是海上实习的好机会。”这批交大的学生，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后来，他们在各舰中都成了技术骨干。其他大学来的有学工的、学经济的、学医的、学外语的、学文学的，还有学音乐的，真是各行各业，人才济济。除了直接来自学校的以外，还有部分社会职业青年，有银行职员、教师、演员、政府公务员等。在江防大队海军中，也选拔了部分士兵，大多为福建人。这些老海军文化程度不高，但具有水兵的实际经验。学兵团中还有少数陆军军官和江防大队舰艇的尉级军官，他们自愿降格为士兵。

12月下旬，招考的学兵到齐后，即宣布正式组成“赴美接舰参战学兵总队”，总队长是潘佑强，陆军中将衔，黄埔一期毕业；副总队长二人，一是侍从室参谋海军中校魏济民，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一是海军少校许世钧。总队下设九个中队，中队长由军官队中抽派张仁耀、林巽道、何绍志、陈以谋、孙甦、邓先涤、马须俊、刘宜敏、刘征九名军官担任。中队下设三个分队，分队下设三个班，各分队长、班长从学兵中选拔英语较好的大学生担任。任分队长的有马灼其、余奕顺、顾铎、周克宽、黄宗江、陈显扬、唐敦联、吕锦钟、毕道仁、贾健、王伟民等人。

在唐家沱集中编队期间，每天上午到沙滩上进行陆操训练外，并学习一些海军术语和基本知识以及国外礼仪等。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还派一名海军上士担任联络工作，他还教大家唱美国海

年“起锚歌”(Anchor's Aweigh)。

在此期间，一些军政要员陆续到唐家沱视察，副参谋总长程潜代表陪都各界前来慰问，并向每个学兵发了慰问品；军政部长陈诚上船视察，向全体学兵讲了话。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海军武官也亲临唐家沱查看，在沙滩上检阅全体学兵。1945年1月下旬，学兵总队离开重庆前两天，由潘佑强率领总队官兵到浮图关（后改名复兴关）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听蒋介石训话。

从这些军政要员到唐家沱视察和蒋介石接见训话，表明政府高层十分重视这批出国学习的海军。抗战前夕，南京海军部直辖的军舰有50多艘，总排水量仅4万多吨，而且装备落后，不堪一战。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沿海全部被日军占领，海军舰艇大部被击沉；在长江下游又自沉了一部分军舰堵塞航道，企图以此阻止日本军舰沿江而上，余下10多艘破旧的炮艇，撤退到川江。至此，国民政府的海军只留下个空架子。此次，政府派遣这么多青年学兵去美国学习海军（与此同时，还派出一批人去英国学习海军），不仅是去太平洋护航参战，而且期望这批人学成归国，作为战后重建中国海军的骨干力量。

蒋介石接见后两天，海军学兵总队就出发去成都新津机场，候机出国。

飞 越 骆 峰

1945年1月24日清晨，学兵总队乘轮开向重庆朝天门码头，在那里许多亲朋好友前来话别送行，并举行了简短的欢送仪式，即分乘卡车去成都新津机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从泰国侵入英属缅甸，切断了滇缅公路。中国的海上、陆上国际通道完全被日军封锁。为了打开通道，中美两国协议，共同在喜马拉雅山脉和印缅丛林上空开辟了一条空中运输线，因其所经山脉蜿蜒起伏如骆峰，而被称为

“驼峰”航线。数以千计的在中国战区作战的美国飞机在这条航线上频繁飞行，从印度运送军事战略物资到中国，支援中国对日作战。当时，中国的出国人员，也只有从这条唯一的空中航线飞出。

学兵总队到达新津后，住在靠近机场一个祠堂大院内，等候飞机。新津机场很大，一条主要宽大的跑道约有十华里长，周围还有许多跑道，长的短的，宽的窄的，日夜可以听到飞机起降的轰鸣声。

据一个参加修建机场的工程师向我们介绍机场修建的经过：

“驼峰”航线决定开辟后，首先要解决的是空运线上两端机场问题。飞行于这条航线的有各种型号的运输飞机、战斗机，还有被称为空中堡垒的远程大型轰炸机B—29。为了尽快通航，必须短期内在成都地区建成大型机场，任务艰巨，时间紧迫。1942年，国民政府从川西各县紧急征调了几十万民工，日夜赶修新津机场。从各县农村调来的男女老少民工，推着鸡公车（手推独轮车），自带粮食、锄头、扁担、竹编撮箕等劳动工具，从四面八方步行到工地，日夜奋战。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施工设备的条件下，我国劳动人民，以最原始的工具，流淌着汗水，以惊人的速度修成了坚固的跑道。60天后，第一批飞机在新津机场着陆，90天以后，机场全部完工。负责机场设计、施工管理的工程人员，除了少数几个美国工程师外，其余全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美国人不能不佩服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惊呼新津机场工程为“奇迹”。

在“驼峰”航线上飞行，有极大危险。喜马拉雅山脉高达8000多米，为通常飞行高度的两倍。高空气候变化无常，随时可能遇到暴风雪，而且还可能碰到能够折断飞机的气流，途中还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截击，因而飞机失事，中美航空人员遇难的事故时有发生。我们到新津后几天，就听到机场人员讲，一架从印度飞成都的运输机中途失事，机上全部人员罹难。

1945年2月初的一天上午，我们接到去机场出发的命令。领队

宣布：为了减轻飞机载重量，每人除随身穿的衣服、手表、钢笔和亲友们送的纪念品外，其余的衣物都要留下，不准带上飞机。大家纷纷将多余的衣物、书籍取出，堆在院落的空地上。

接着，全大队陆续分批去机场登机，乘坐美国C—47型运输机（每机可容纳三四十人左右，有的乘C—46型）航行。一上飞机，发给每人一个用来装呕吐症物的纸袋，机舱内还放着备用的氧气瓶。运输机是用来装货的，没有设座位，大家就背靠着机舱壁挨次坐在铁板上。飞机在飞越喜马拉雅上空飞行高度在一万米以上，气压低，氧气稀薄，大家都感到呼吸困难，有些人呕吐。有时飞机遇到空中旋风式气流，机身急剧下降二三千米，又再急向上爬升。从弦窗下看，下面全是皑皑白雪，还隐约可见飞机残骸。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刚收复不久的缅甸密芝那机场（有的在昆明机场）作短暂停留，补充燃料后，再飞越印度那加山脉，降落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汀江机场。全队人员在两天内先后平安飞抵汀江。

在印度旅途中

从汀江机场一下飞机，就感到热浪扑面，周身发热，原来印度是热带气候，我们离开成都时正是严冬季节，还穿着厚厚的棉衣，大家赶快脱下棉衣棉裤，只留下衬衫、单裤，才觉凉爽些。

我们登上早已等候在机场的大卡车，由美军驾驶，开往10多公里外的盟军兵站。

兵站工作人员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他们负责接待来往的盟军。从中国来印度训练的远征军，第一站也是到这里。进站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全部衣服脱光，扔进一个正在燃烧的火坑，然后领取香皂、浴巾，进入淋浴室。淋浴后，再按身材领取内衣裤、黄军服、胶鞋、毛毯以及军用餐具、水壶、装衣物的长圆形帆布袋等物品，接着安排进入营房内住下。营房里排列着几十

个军用帐篷，里面用木料搭成对列连铺，每个帐篷可住10多人，每个铺位挂有蚊帐。

从新津机场出发，我们连续在高空中飞行了七八小时，来到兵站又花去一个多小时；办完这些繁琐手续，已是深夜，大家早就饥肠辘辘，十分困乏。此时，炊事员送来了面包、罐头，还特地烧了一盆白菜汤，大家狼吞虎咽吃得很香。临睡前，工作人员关照说，印度的长脚蚊凶狠异常，叮在皮肤上，立刻红肿，睡觉时一定要把蚊帐掖严实。他又说，这里山区丛林，猴子很多，见了猴子千万打不得，最好把未吃完的罐头留下，让猴子取食。当晚，我们都睡得很熟，第二天早上醒来，果然发现摆在过道上的罐头不翼而飞，有的军帽也被猴子取走了。有个同学说，晚上猴子爬到他床边，拍他的脑壳，拍醒了，吓了一大跳，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第二天上午，美国军医来为大家注射预防热带传染病的针药。大家抽空到营房附近公路蹓跶。这里是高原山区的一块平地，公路一边是茂密的树林，一边是铁路。这儿阳光灿烂，气候炎热，公路两旁排列着热带的椰子树，公路上走着一群印度男女，看样子像是去干活的农民。男子头上缠着白色头巾，赤裸着上身，肩上扛着锄头；几个印度女人，身着白色纱笼，提着篮子跟在后面，他们皮肤呈棕黑色。印度人友好地向我们挥手，嘴里不断说着“哈卡，哈卡”。我们不懂印度语，但从他们的表情和手势上，猜想大概是问候语，也微笑着向他们挥手致意。

在公路旁丛林里，我们看见一群戴着船形帽、身穿草绿色短袖军服的中国军人在丛林中砍伐树木。我们上前招呼，才知他们是中国驻印远征军。大家在异国相逢，非常亲热，互相问长问短。

两天以后，全队学兵陆续飞抵汀江汇齐，即乘火车到加尔各答郊外一个美军军营住了几天，然后乘火车驶向印度第一大港孟买。

火车站特为中国士兵加挂了十几节车厢。这是专为印度平民设计制造的三等车厢，设备简陋，除了木靠椅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列车服务员，没有餐车，没有吃水供应，盥洗间的用水也时有时无。上火车时，每人领到了一个像国内美孚公司煤油桶那样大小的长方形铁桶，内装有配给士兵的三天口粮（ration）。上车后打开一看，内有各种食品，按早、中、晚餐分成许多包，大包里又有小包，有饼干、牛肉和沙丁鱼罐头、奶酪、巧克力糖、供冲饮的桔子汁和香烟、火柴等，甚至还有一小卷薄薄的皱纹手纸，真可谓考虑得十分周到。在火车上，我们就是靠吃这些干粮度过的。领队还宣布，每人发给100个印度卢比（约合美金30元），作为在印度旅途期间的生活零用津贴。

我们是午夜上火车的，印度气候炎热，车厢里连一台风扇也没安装，闷热得叫人难受。大家很疲倦，只能靠在硬座木椅上打盹。

早晨天色明亮后，因为车厢里供水不足，大家只能浸湿毛巾，随便擦擦脸。吃了早餐后，我们就靠在车窗旁，观赏印度景色。

车窗外面烈日炎炎，热浪滚滚，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广袤的、干旱的平原。铁路两旁的田土干裂成硬块，形成道道裂缝，禾苗枯萎，许多饥饿的印度农民，在路边徘徊。他们赤裸着上身，瘦骨嶙峋，根根肋骨清晰可见。在一条干涸的河边，一群干瘦的男男女女，跪在地上，双手合掌，对天不住叩头，像是在祈祷求雨。最可怜的是那一群群的孩子，有的半裸，有的丝不挂，全身皮包骨，而肚子却异样鼓胀呈现严重缺乏营养。孩子们光着脚在那被烈日晒得发烫的地面上直跳，伸出双手，对着列车叫喊：“巴克西，巴克西”，听得出那是乞讨东西的意思。

火车在一个车站停下，前面旅客车厢门一打开，印度人都争先恐后像一阵风似地奔向车站抽水机前，用龙头水冲洗头部和上身，并用双手捧水喝。我们在闷热的火车坐了一天，周身都是

汗，也下车到抽水机前洗脸。我们发现一些印度人用食指蘸着水在口中来回推动，似乎是在刷牙。我们不明白这是他们的习惯或是为了节约，后来才知道，印度教徒认为牙刷是用动物的鬃毛制成的，不清洁，所以，他们不用牙刷，而用手指来代替。

站台周围挤满了乞丐，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蜷缩一堆躺在地上的，乞丐中还有缺腿、缺胳膊的残疾人和带着狗的盲人，白发苍苍的老人枯瘦如柴；一个妇女手里抱着呱呱待哺的婴儿，露出干瘪的乳房；有的手里拿着瓦钵，嘴里喃喃说个不停；人们来去匆匆，也未见有人发善心施舍。在站台上进出的还有穿着白色长袍的印度男人，有的额上脸上涂着五颜六色的横纹条（这是表示等级身份的记号）和穿着华丽纱笼民族服的贵妇款步而过。有些妇女装饰奇特，鼻孔的外面凹处嵌上金制的装饰品，镯子不仅戴在手腕上，足踝上也带着脚镯。偶尔有几个英军士官神气活现地走过，发出橐橐的皮鞋响声。人群中夹杂着提着篮子高声叫卖香蕉的小贩。

铃声响了，快开车了。许多光着上身的瘦小孩子，挤在我们车窗前，伸出手，不停地叫着：“巴克西、巴克西”，许多同学把口粮、罐头、糖果送给孩子们，他们拿着兴高采烈，欢叫“浅那、浅那”（中国）。可是，这却惹来了麻烦，一大群人都涌上来要食物。

在火车上，学兵们谈论着对印度的印象和观感，大家对印度人民的贫穷和苦难寄予深深的同情。

车行第二天晚上，火车在一大站停下，领队通知，要在这里换车住一夜，大家扛着军用行李袋下车，到候车室听候安排。

带领学兵总队出国的总队长潘佑强和副总队长许世钧带着翻译黄学光（黄也是入伍学兵，曾在香港大学就读，英文说得很流利，被抽调去当潘的翻译）先乘飞机去孟买了。实际带领我们的是副总队长魏济民海军中校，战前，他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能说流利的英语，在印度都是由他负责向英、美军方联络交

涉，安排全队的交通、食宿。

从加尔各答上火车以来，我们已有20多个小时没能好好合眼，十分困乏。魏济民打听到靠近车站有一个英军军营，空着许多床位，他带着两个分队长前去交涉，一个英国陆军军官出面接待。魏济民向他说明，我们是路过此地换车的中国海军，请他协助，在英军军营借住一夜。

这位英国军官迟疑了一下，勉强地指着营房旁一间空房说：“你们士兵可以在这间空房过夜。”

魏济民进去观察，发现这间房地面潮湿，又没有床，当即恳请说：“这间房地面潮湿，你们军营空着许多床位，请你安排我们士兵住一夜。”

这位英国军官竟十分傲慢无礼，用轻蔑的口吻说：“战前，我在上海看见中国士兵都是睡在地上，现在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睡在地上。我们军营的床铺是留给英国士兵住的，对不起，我不能安排你们士兵住进去。”

魏济民一听这话，非常气愤，当即向英国军官提出抗议说：“现在是1945年，中国已不再是受列强欺侮的弱小国家，中国是同盟国四强之一，中国是贵国的盟友，你不能这样无理！”

魏济民义正词严，使这位英国军官感到尴尬，无言以对。但他却蛮横无理，仍拒不同意中国士兵住进英国军营。

分队长回来向学兵们传达了同英国人交涉的经过。大家都异常气愤，有的当场大骂：“英国老牌帝国主义，本性不改，太欺侮人，太可恶了！”

为了不耽误旅途行程，大家压住怒火，就在候车室静坐一夜。次日一早，我们换了车，向孟买开去。

经过三天三夜火车奔驰，到达印度第一大港孟买。我们被安排离孟买不远的小镇，一座名叫克里扬的英军军营住下。这座军营很大，有一排排平房，军营内有食堂、洗澡间、医院、电影院、小卖部等生活设施。营房大半空着，只有少数后勤人员，冷冷清

清，我们住进以后，军营顿时显得热闹起来。

我们被告知：大队将从孟买港乘船去美国，开航日期未定，大队在此休整，听候命令。

在印度10多天以来，队伍一直是在流动的旅途中，生活艰苦，到了这军营，睡上了带有蚊帐的单人木床，按时三餐，每天都可以冲淋浴，每星期可看上两次电影，大家也就安心住下候船。

在克里扬军营候船期中，各分队分批放假去孟买城游览了一天。

孟买原意为“巨大的海湾”，300多年前，这里不过是几个小岛组成的渔村，经英国人不断疏浚和填充成为半岛。随着越来越多的浅滩被填平为建筑用地，岛屿逐渐连成了一大片。

孟买背靠青山，面临阿拉伯海，海湾景色秀丽，在环山半腰中，有幢幢风格各异的别墅，在繁华的市中心区，高楼大厦林立。孟买没有遭到直接的战祸，也没有受到轰炸，呈现出一片和平繁荣景象。

印度的异国风俗，使我们感到新奇。大街上行驶着各种车辆，小汽车、公共汽车、电车、人力车，夹杂在车辆中有缓缓而行的大象，孩子们骑在象背上怡然自得，好似中国农村牧童骑在水牛上的神情，街中还有牛在悠然散步。令人不解的是，有的牛躺卧在马路中间，车辆和行人都绕道而过，警察也视而不加干涉。一个印度出租司机向我们解释：印度人认为牛是代表繁殖的象征，又是人们维持生存的基本来源，因此对牛十分尊敬，特别是母牛，视同母亲，称为“圣牛”。母牛老死也不能宰杀，还要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在印度，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牛躺卧在马路上，就是英国总督也不敢碰，只能绕道。

在一条小街上，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耍蛇人。一个印度男人盘腿坐在地上，面前躺着一条眼镜蛇，他拿出一只笛子吹奏，随着笛声眼镜蛇昂首左右摆动，似乎在翩翩起舞。一条小碗粗的大

蟒，紧紧缠绕在一个男人身上，他却毫不在意。

我们也看到在那些豪华大楼前和人行道上，却蜷缩着一堆堆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穷苦印度人。在离大街不远的小街上尽是低矮的棚户，挤满了贫民，街旁摆满各种小食摊，一些印度人盘腿坐在地上，用手抓吃食物，小食摊前散发出一股股刺鼻的类似大蒜的气味。

横渡太平洋

学兵总队住在克里扬军营候船约20多天，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们才得到通知，登上停泊在孟买港的美国运输舰“曼恩将军”号（General Mann），该舰是一艘两万多吨级远洋轮。与我们同时搭乘这艘船的还有许多回美国轮休的美国士兵。

“曼恩将军”号船舱有好几层，中国海军士兵1000人被分配住前舱最底层。住舱约两米高，排列着三层帆布叠床，要侧着身子才能睡进去，对列叠床之间，有狭窄通道，顶架上搁放着橡皮救生带。住舱密闭不通风，全靠电灯照明和风机制送空气进来，舱内闷热犹如蒸笼。美国士兵也住同样条件的舱位。美国军舰中有严格的等级制，军官和士兵吃、住、娱乐都是分开的，各有标准。军官住在舱面上房间里，条件要好得多。总队长潘佑强率领总队部的军官也登上这艘运输舰。“曼恩将军”号的美军舰长是海军上校衔，是全舰最高军阶军官。潘佑强是中将军衔，按照军队的等级，舰长把他安排住进上等舱，享受着贵宾待遇。军舰上有专供军官们休息的大厅，士兵们无处可去，住舱里太闷，只能上甲板透气玩耍。

当天下午，我们在舰上用餐，每人领到一张用餐卡，一日两餐，每次用餐出示卡片，按日期打上一个洞。士兵餐厅设在船舱中间层，饭厅入口处放有洗净的餐具，进餐时自取。菜肴分装在大盆内，由炊事兵掌勺，士兵排队依次取菜后入座就餐。饭厅里安放着

一排排长桌和长凳，桌上放着面包、果酱、黄油、盐、胡椒粉等，任随自取。早餐供应牛奶、鸡蛋，饭后每人发一个苹果或桔子；中餐轮流供应猪排、牛排、煎鱼、另有沙拉、白菜、大葱等。据舰上水兵说，像这样的餐厅，舰上有四个，担任舰上炊事工作和厨房杂务的就有二三百人，工作异常繁重辛苦。在战时的军舰上，要供应几千士兵，每天能吃上营养丰富的饭菜，需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我们也不能不佩服美军后勤工作的高效率。

饭后，新上船的中国士兵在前甲板集合，由舰上水手长向大家讲解如何使用救生艇、救生衣以及遇到海难时的必要应急措施。

水手长对我们说，军舰将开往美国。由于日军占领了马来西亚、爪哇、菲律宾东南亚沿海地区，军舰将从印度洋绕过澳大利亚南端，横穿过太平洋。在安达曼群岛，驻有日本海军舰队，日本潜艇在这一带海域活动猖獗，还随时可能遭到日本飞机的袭击，因此要做好战斗准备，也要学会跳海逃生的技能。

接着水手长像宽慰大家似地说，航行中有护航军舰随行护航，本舰也有强大火力装备。军舰来往于印度和美国之间已航行过多次，都安全渡过。由于绕道，航行的里程和时间将比正常航行多一倍。

最后，水手长严肃宣布：航行期间，军舰实行严格灯火管制。晚上严禁在甲板上打火吸烟，禁止将瓜果皮及杂物丢入海中。

次日清晨，军舰起锚离开孟买港，驶入阿拉伯海。

一连几天都是风平浪静，阳光和煦，中国的、美国的士兵都到舱面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倚靠船舷，欣赏海景。海上生活的单调寂寞和异国人互相好奇的心理，都渴望了解对方，两国士兵自然地交谈起来。美国兵一般都很热情、坦率，乐意交谈，我们也愿意多了解美国人，同时认为这是练习听说英语的好机会，也主动和他们交谈。在甲板上，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的在玩扑克牌，有的在互相交换着看家人的照片，连说带比，气氛融洽。

这些美国兵来自盟军各个战场，有的来自欧洲，有的来自北非，有的来自印缅战区，也有从中国战区来的，其中有些是黑人。他们是回美国休假或轮换调动，也有因伤病而获准退伍的。大多数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应征入伍的青年。尽管他们的出身、经历、文化各有不同，但几年在国外残酷的战争生活，使他们变得成熟，都憎恨法西斯主义。当然也良莠不齐，有些美国兵骄横，带着种族偏见，看不起其他民族，有的则十分粗俗，喜欢谈女人。

当军舰航行一周后，气候开始变化，天空灰暗，刮起大风，海浪逐渐高起来，浪花打上甲板，人们已不能呆在舱面上，都回到住舱。晚上，雷鸣电闪，风雨大作，船身被海浪高高抛起，又骤然落下，船身还左右摆动倾斜。我们许多人是第一次乘海船，晕船呕吐，食物吐完后，就吐黄水，好像胃都要被吐出来似的。有的躺在铺位上面色苍白，犹如半死之人。我们真羡慕福建老海军，他们不晕船，照样吃东西，他们说，晕船呕吐后要吃点东西才好，不要怕吐不吃，应当吐了又吃。我们依照他们的话，勉强吃了几片苹果，果然灵验。

几天以后，风浪渐渐平息，船也不再猛烈颠簸，大家也从晕船中恢复过来，又上甲板说说笑笑。

最使人感到有趣而难忘的是过赤道线了。进入印度洋后几天，就开始过赤道。赤道把地球分成南北两半，赤道地区被认为是地球最热的地方。赤道附近洋面没有一丝风，海面平静得没有一丝波纹，像一面大镜子。中午时分，太阳升到赤道当空，像一个红色火球悬在空中，灼热的阳光烤在身上火辣辣的痛。我们穿的胶鞋底被晒得滚烫的甲板烫得变形，向上翘起或卷缩。一个美国兵用温度计放在甲板上测量，竟高达摄氏60度。赤道地区不仅很热，而且十分潮湿，伸出手去，也感到空气湿热。这里的空气也要稀薄些，有如在高山上缺氧的反应，感到气短、气急。好在军舰很快驶过了赤道线，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在舰上的美国士兵中有一部分是黑人。中国士兵无种族偏见，待人平等、谦和，黑人士兵很喜欢和我们交往。开初，我们并不了解在美国军队中存在着种族歧视，后来发现美国白人士兵和黑人士兵间时常发生冲突。有一次在洗澡间，一个白人士兵不准黑人士兵同浴，并出言不逊，殴打黑人，激起了我们的义愤，与白人士兵也发生斗殴。黑人士兵向我们揭露了美国军队内，黑人遭受歧视的事实。在美国军队里，战斗部队不要黑人，他们认为黑人智力低下，是劣等民族，不能开飞机坦克，大多数黑人只能从事劳役杂务。黑人士兵还时时遭到白人军官和士兵侮辱和殴打。这引起了我们的忧心，到美国后，会不会受到种族歧视呢？

在船上还发生一件丢中国军人脸的丑事。有个学兵（名字记不清了，是从香港回内地的）他向一个美国兵大诉其在中国内地生活太穷、太苦，他十分羡慕崇拜美国的生活，他不愿意当中国人，认为只有当美国人才最幸福，他乞求美国兵设法帮他加入美国籍。他的谈话被另一个同学听到，传出后，引起了大家气愤，认为他有辱国格，有失中国军人的身份，把他狠狠揍了一顿。

军舰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港停泊一夜，补足油料给养后进入塔斯曼海，继续航行。有一天晚上，当经过新西兰附近海面时，舰方宣布发现有敌人潜艇出现，要求全体人员做好战斗准备。该舰立即采取“之”字航行，不断改变航向，同时减低主机转速，减轻螺旋桨的声响，使潜艇难以发现，终于闯过险关，安全脱险。接着军舰穿过分布在大洋洲的许多岛屿，向美国西海岸方向航行。这一带海域已为盟军所控制，不必担心日本潜艇的威胁了。越往前走，越靠近美国海岸，也就越安全，原来那种戒备的紧张气氛也随之缓和。

为了利用航行中这段单调、漫长的空隙时间，总队部和美舰洽商，临时布置了海上实弹打靶的训练科目，使中国水兵尽快地适应和熟悉海军的战斗生活。

各分队分别在舰上各炮塔前学习使用各型火炮，在舰首、舰尾

和左右船舷都设有炮座，从轻型的双管炮到各种口径的大炮，所有炮塔都是电动控制，自由旋转，可仰射，也可平射。先由舰上枪炮军士向我们讲解大炮的性能、各项操作要领，并示范做动作，然后让大家试操作，熟练后，即在军士的指导下进行实弹打靶练习。从舰上放出一个红色大气球，飘向空中，各炮对准红气球开炮，一时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有如真的海战。有的气球被射中，在空中爆裂，大家欢呼跳跃。美军舰长对中国水兵打靶成绩十分满意，随即奖励每个分队一包精美的糖果。

这次，我们在海上连续航行30多天，航程一万多公里。从阿拉伯海，进入印度洋，再横渡太平洋，经历了几次风浪，进行了实弹打靶训练，实际上这是一次海上练兵。

海滨旅游胜地迈阿密

“曼恩将军”号运输舰于4月中旬到达美国西海岸圣迭戈海港。中国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处已为我们安排好专列火车，当即登车驶往南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城。

火车车厢，舒适整洁、陈设讲究。车厢座位是一色绿绒面沙发靠背座，拉开靠背就变成双层床铺，身着铁路制服的黑人列车员彬彬有礼。车厢挂有餐车，届时到餐车就餐，由黑人侍者服务到桌。晚上睡在松软而有弹性的沙发床上，感到十分舒适。

火车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出发，经过美国大陆许多州，穿过了广阔的乡村田野和许多城镇，也在大大小小的车站停留过，行程数千里，虽是浮光掠影，但美国给我们的最初印象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

当时正是4月初春季节，阳光明媚，生机盎然，山岗一片翠绿，田野上麦浪滚滚，幢幢色彩艳丽的房舍掩映在绿树丛中，平滑宽阔的柏油公路纵横交错，无数的汽车穿梭奔驰。驾驶汽车的许多是妇女，其中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火车经过的大小小车

站，都是整洁而有秩序。战争时期，青壮年男子被应召入伍，上前线去了，许多工作由妇女顶替。沿铁路线上，许多工作人员都是妇女，她们身材高大丰满，动作敏捷，有的像男人一样穿着工作装，满手油污，钻在火车厢底下检修车辆。

经过几天奔驰，火车抵达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的美国海军军官和早几个月到达受训的中国海军军官到车站迎接。车站里有几个美国记者和海军摄影人员拿着照相机，频频拍照。

随即，我们被带领到军营住地阿尔克札旅馆（Alcazar Hotel）。这是一座12层楼高的漂亮大楼，耸立在海滨大道旁。它原是一座旅游旅馆，战时，被海军征用作为海军士兵营房。我们全体学兵被安排住在旅馆10至12楼三个楼层。底楼是休息大厅，并附有娱乐室、小卖部等设施，二楼至九楼属美国海军士兵营房，大楼有两部电梯。我们进入事前已分配好的楼层套房。每套房有一间卧室、一间盥洗室。套间大小不一，有的住六人，有的住四人，置有单人双层钢丝床，床上铺弹簧床垫，并备有卧具。盥洗间有抽水马桶、白瓷洗脸池和浴盆，并备有冷热水管。对于我们这些过惯了国内战时大后方艰苦生活的中国士兵，能有这样的军营住宿条件，已感到十分满意。旅馆楼东侧面临海湾，不远处即是湾前公园。沿海湾筑有长堤，堤上排列着棕榈树，堤外是湛蓝的海水，港湾里停着一排排白色游艇。

接着三天休整。在此之前，我们的服装是在印度汀江兵站临时换发的黄色陆军服，到迈阿密后，全换发为美国水兵装。我们领到了夏季白色水兵服、灰蓝色工作装、内衣、皮鞋等全套服装。当我们换上白色水兵服，戴上白色圆帽，系上黑领带，我们才成了真正的水兵。

根据介绍，我们对迈阿密市有了概括的了解。迈阿密位于佛罗里达州东南端，是美国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它东临大西洋、西濒墨西哥湾。这里最早的主人是印第安人，“迈阿密”是印第安语，意为“大水”。由于墨西哥湾和东南风的影响，这里四季如

春，平均温度为摄氏24度，特别是冬天，美国北部积雪盈尺，而这里却是阳光和煦，温暖如春，繁花似锦，因而迈阿密有“阳光城”之称。迈阿密市区不大，它的精华在于东面躺着一个狭长的小岛，那就是有名的迈阿密海滩，海滩曲折连绵长达10多公里，水暖、沙细，是理想的天然海水浴场。每年冬天，北方有钱人常举家来此避寒，享受阳光温暖。

为了表示欢迎中国海军学员的到来，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组织了一次集体游览迈阿密海滩活动。从市内到海滩浴场，有长堤公路通往，也可乘汽艇前往。长堤公路是由人工填海而成。我们分乘卡车，驶过跨海长堤，直奔迈阿密海滩。岛上风格迥异的豪华旅馆大楼星罗棋布，餐厅、酒吧间、电影院、夜总会间杂其中，热闹繁华。在较僻静的小路上则是幢幢精致漂亮的花园别墅，掩映在热带花树丛中，整洁，幽静。到处可见妇女们穿着鲜艳的泳装在街上悠闲漫步。到了海滨浴场，那更是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一张张彩色的遮阳大伞，各式各样的沙滩躺椅遍布海滩，成千上万的男女躺在沙滩上，尽情享受着日光浴。许多弄潮儿到海中戏水，有些游客则宁愿在海边上拾贝，或在凉亭小憩，啜饮着可口可乐。年轻的对对情侣毫无顾忌地在沙滩上拥抱接吻。我们这群来自古老东方的水兵初看到这些情景，还感到不习惯、不自在。我们还分乘快艇沿着海滩周游了一圈，快艇在海面上飞驰，激起朵朵浪花，我们挥动着白色水兵帽向海滩游客致意。

在海军训练中心的学习生活

休整几天后，我们全体学兵进入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Miami Naval training Center)学习。该中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才建立的，训练中心司令是豪海军上校(Captain Howe)。训练中心的任务是根据战争发展的需要，速成培训海军军官和士

兵。学员大部分是新入伍的美国大学生和青年。经过一年左右单项专业训练后，即派上军舰充任该专业的军官或士兵，这种短期专业训练，比海军学校培养全面的学员快得多，这样可以配合大量新舰投入服役的需要，迅速扩大官兵队伍。中心下设10多个专业学校(或称班)如航海学校、轮机学校、枪炮学校等。教师队伍庞大，上至校尉，下至军士。教学设备齐全。该中心除培训本国海军官兵外，还代外国培训海军官兵，当时除我们中国海军官兵外，还有苏联海军官兵，同时可训练学员三四千人。

中国当局在迈阿密设立了“中国海军接舰官兵办事处”，由中国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处直接领导，主任是宋锷海军上校。不久，宋锷调到海军武官处任职，由学兵总队副总队长许世钧接任。总队长潘佑强和副总队长魏济民完成了护送学兵总队到美国的任务后，即回国去了。

从此，我们受到美国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和中国海军办事处的双重领导。美方负责中国学员的教学训练和后勤供应(包括食、宿、服装等)；中国学员的人事、纪律和日常行政则由海军办事处直接管理。双方也互相协调、配合。

中国海军在美国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均在美国战时租借法案下规定的项目内由美方提供。我们与美国水兵基本享受同等生活待遇，同住一个军营、同在一个食堂进餐，穿同样水兵制服。培训期间，由海军办事处发给每个学兵每月生活津贴30美元，作为零用开支。

海军训练中心设在濒临海湾的码头内，临街一面围有铁丝网，大门设岗，出入验卡，平民百姓禁止入内。主要教学活动都是在训练中心内进行，内有各专业教室和供教学用的仪器和各种设备。学员驻地和各种生活设施分散设在训练中心外面的大街上。我们住在阿尔克札旅馆内，往南行约200米是海军医院，往北行200多米是训练中心，中心入口处斜对面不远，就是海军食堂。日常活动日程是：早晨6时起床，盥洗完毕后，即分批列队步行去

食堂就餐，然后进入训练中心上课；中午到食堂就餐后，又回到训练中心继续学习，直到晚餐后才回到旅馆休息。晚上一般不作安排，自由活动。大多数人在寝室复习白天所学功课，也有的到楼下大厅文娱室打乒乓或台球。开初，除了礼拜六晚上和星期日放假外，平时不能外出，后来逐步放宽，晚上也轮流放假，规定晚上11时以前必须回营。

战争时期，美国政府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所有的物资供应，首先保证军队的需要。在副食品供应上，美国没有像英国那样实行配给制，但一些紧俏的副食品在老百姓中还是受到限制，而军队则是尽量满足，美国军队的膳食一直保持高标准。

海军士兵食堂是由原来一个室内大停车场改建，饭厅内摆着一排排长条餐桌，一次可容纳四五百人进餐。训练中心所有海军士兵都在此进餐（军官另设有食堂），一日三餐，开的是流水席。早餐供应有：牛奶（或加奶咖啡）、煎蛋、咸肉、煎饼、麦片粥等，饭后有水果；中、晚餐轮流供应主菜有：猪排、牛排、炸鱼、烧肉等，另配搭有沙拉、烧白菜、蕃茄汤、大葱等蔬菜，饭后有冰淇淋一块，面包、黄油、果酱和各种调料摆在桌上自取。当时，市面上很难买到黄油，但在海军食堂却是敞开供应。节日，可吃到火鸡。

码头内设有专供官兵的免税商店，价格大大低于市面，比如骆驼牌香烟，市上又贵又缺，可是海军商店却平价敞开供应。我们都在海军商店购买所需日常生活用品。

鉴于当时太平洋战区的严峻形势，日军的顽抗，美军伤亡累累，美国急于把我们这批中国海军投入太平洋战场，以补充人员不足。训练中心作了精心的组织安排，调集了各方面的人力和物力，以保证对中国海军的培训能按期按质完成。

学习的第一关就是语言关。学习期间没有配备翻译，我们学兵大部分是大、中学生，有一定英语基础，但程度参差不齐，还有一部分老海军士兵完全不懂。怎样使中国学员以最快的速度掌握

基本的英语词汇，使其能够听懂教员的讲课，这是教学中遇到的第一难关。为此，以美国语言学专家理查德博士为首，带领了一批人员来到训练中心对中国学员进行英语教学试验。战前，理查德博士曾在北平燕京大学教授语言学。他创立了一种“基础英语”(Basic English)速成教学法，即：一个母语非英语国家的外国人，通过短期突击学习，掌握850个英语基础单词后，可以简单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日常生活内容。据说，以前经过小规模的试验教学，效果良好。但在这样多人，这样大范围的试验教学活动还是第一次。

理查德博士已年过花甲，满头白发，带一副金丝眼镜，但他精力旺盛，对自己创造的“基础英语”速成教学法充满了信心。在他的主持下，我们1000名中国学兵经过统一测试，按英文程度的高低，分成20个英文班。开始时，各班都用“基础英语”教材，进度快慢，随各班英语程度而不同。高班的学员多是大学程度，已有相当英文程度，学习时就不限于“基础英语”的词汇，而是尽量扩大词汇，进一步提高听说能力。与此同时，理查德博士组织教学人员将海军各专业科目的教学内容，以“基础英语”的词汇为主，全部改写成通俗的教材。教员讲专业课时，尽量使用“基础英语”的词汇，让学员听懂。开初几个月，我们每天上两个小时的英文课，经过短期的突击，加之生活在英语语言环境中，边学边用，效果很好。一些原来不会英语的，学到了基础词汇，有了初步听说能力；有英语基础，就进一步得到提高；有的人本来英语就不错，就更加说得流利了。在学专业技术课时，英语程度高的同学，也协助做些翻译工作，帮助大家都能听懂教员的讲课。结果证明：“基础英语”的教学试验是有成效的，它为中国士兵学习专业技术课，扫除了语言障碍，使得学习能顺利展开。

海军是综合性技术兵种，现代军舰是现代工业的缩影，军舰如一个工厂，每个水兵各有专职，但所有船员都必须掌握舰艇的基本知识和处理各种海难事故的技能。学习的第一阶段是共

同科目训练，有舱面帆缆、消防救火、损害管制（抢险堵漏）、枪炮知识、识别各种型号的舰艇、飞机以及海上救生等；第二阶段分班学习专业科目，分：航海、帆缆、轮机、电机、无线电收发、无线电修理、雷达、声纳、旗语信号、枪炮以及医药、文书、军需等。

进行专业课学习前，训练中心根据舰艇需要和个人能力、意愿进行分配，尽可能照顾到学员原学专业和特长。如原在交通大学学航海、轮机专业的，尽量分配相应的专业，从医学院来的几个同学就分配到医药班，直接派到海军医院去实习，以后分别担任各舰的医药军士。

担任各专业科的教官都是对口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美国海军军官和资深的军士，培训教材均为训练中心所编，内容深入浅出，由基础原理至实际操作，以使用为主。每科均有专用课堂，分三间：第一间为讲解室，第二间为电影室，第三间为实物操纵室。舰上的火炮、高射机枪、深水炸弹、雷达、声纳、轮机等均可在室内操作，甚至装拆。学习中一切从实战出发，以培养学员实际应用能力为主，特别强调操作使用和维修保养，讲理论少。学各专业操作时，由教官边操作示范、边讲解，然后让学员自己动手，不懂就问，教官在旁指正，学员经过反复实践，熟悉机器的性能和操作。如学枪炮专业科目的，就让学员反复拆卸安装各种型号的枪炮。

训练中心广泛采用电化教学、直观形象教学。学习各科目时，配合放幻灯、电影和利用各种图表、符号、实物，尽量给学员以形象的直觉。比如上救火消防课，先讲解消防和灭火器的知识，接着到电影室，银幕上映出：一艘军舰被炸起火，然后展现水兵们如何使用各种消防器械，扑灭大火的情景，在关键操作部分，放慢镜头，分解动作，如看一遍不够，再重放。这样，学员对救火的全过程得到了了解，然后再到消防器械室，实际操作使用各种类型的灭火器。特别有趣的是操纵炮火的模拟实验课，学

员走进宽大的实验室（暗室），一按电钮，四周顿时呈现一派海洋景色，在大型屏幕上，投射出一群飞机，在空中飞行。学员所处的中心位置，正好是一座模拟的炮位，而且左右摇晃，上下颠簸，宛如置身在舰艇炮位上，学员可以操纵炮火任意旋转俯仰，追踪固定或活动的目标，并瞄准射击，其命中情况，可以从屏幕上显示出来。有的科目的教学实验室，配置有先进的科学仪器，如雷达、声纳，当时是列入保密技术范围。由于设备齐全，方法先进，学员很快就能学深学透，并掌握其操作技术。学员所学课程需经考试合格，才准予结业。

训练中心还专门为学员放映了许多战争纪录片，以增强学员的战争实感。我们看过一段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大屠杀的新闻纪录片。银幕上出现了这样的特写镜头：一个日本兵站在南京城墙上，右手举着大刀，左手提着一个被砍下的血淋淋的中国老百姓的人头，狰狞地狂笑。这当场激起了我们对日本法西斯强盗暴行的仇恨，莫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有一次放映了美军在太平洋进攻日本冲绳岛的实战纪录片。美海军陆战队乘坐登陆艇，在飞机和军舰掩护下，强行登陆后，遭到日军顽强抵抗。日本士兵躲藏在掩蔽体或洞穴中负隅顽抗，美军用火焰喷射器向洞中扫荡，浓烟滚滚，日军被烟火呛得难以忍受，有的在地上打滚，有的被烧得蜷缩，但仍拒不放下武器。有的日军用军刀剖腹自杀也不投降，美军也伤亡累累。我们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具体形象的认识，联想到以后到太平洋参战，将会遇到多么残酷的战斗。但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我们决不能退缩，要有不怕牺牲，血战到底的精神。

我们在海军训练中心勤奋学习，生活紧张而有秩序。经过八个多月的速成培训，我们掌握了海军专业技术，学会独立驾驶军舰的本领。美国教育很称赞中国学员的聪明、才干和勤奋精神。

友谊与偏见

迈阿密市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新兴旅游城市，它不像纽约、旧金山等大城市那样有许多华侨，市民对中国十分陌生。我们这批中国年轻水兵到达这个城市后，引起了市民们的浓厚兴趣，大多数美国老百姓对我们热情友好，主动交往。刚到迈阿密初期，我们每天上午要到湾前公园操场操练，总有好多美国人在旁边饶有兴趣地观看，休息时间，就找我们攀谈，询问有关中国的情况。每逢周末下午，我们在公园举行例行检阅，这活动也成了当地盛事，男女老少都来观看。

我们到达迈阿密不久，曾出现了一起中国水兵（名字记不清楚了）抢救一落水美国儿童的事，在当地传为佳话。一个星期天，一个美国年轻的妈妈带着五岁多的小女儿在海湾长堤边上玩耍，小女孩不慎掉入海中，妈妈惊呼求救。此时，一个中国水兵正路过，他听到呼救后，连衣服、鞋子都来不及脱，就跳入海中将小女孩抢救上岸，小女孩得救了。女孩父母对中国水兵十分感激。事后，当地报纸以《中国水兵英勇抢救美国落水儿童》为题作了报道，并刊出中国水兵与小女孩合影照片。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特为这个水兵颁发了奖章。这件事传开后，市民们纷纷赞扬中国水兵的高尚行为，促进了相互的友谊。

每逢星期假日，许多市民一大早就驾着小汽车到阿尔克札旅馆大门前等候，热情邀请中国水兵到教堂去做礼拜或到家中去做客，或一同去海滨浴场去玩耍。一些美国老太太，特别喜欢中国青年，她们称赞中国孩子尊敬老人，有礼貌。迈阿密大学的男女青年学生也时来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在市体育馆，我们同当地球队经常举行篮球、排球比赛。教我们英语和专业课的老师和我们相处融洽，上课时是老师，下课后就是朋友，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都各自交上了美国朋友。

在迈阿密期间，我们最不满的是种族歧视。迈阿密地处美国最南端，过去，南方是农奴制最盛行地区，种族歧视根深蒂固。40年代，迈阿密仍实行公开的种族隔离制度，白人与黑人是严格分开的，黑人居住在划定的黑人区，白人的住宅区，黑人是不能进入的。公共汽车的最后一排是专供黑人坐的，黑人只准坐在最后一排，若后排坐满了，只能站着，而不能坐在其他座位上。若是黑人不遵守规定，坐到其他座位上，轻则遭到申斥，重则拳脚交加，甚至警察也可以以违犯隔离法罪将黑人拘捕。迈阿密市的公共场所到处可见“禁止黑人入内”的标记牌，电影院、旅馆、餐馆、厕所都禁止黑人入内，就连神圣的教堂也是黑白分开的。

美国对黑人公开歧视隔离，对待美洲土著印第安族采取屠杀、流徙、赶入保留地等手段，致使印第安族人口大大下降。在迈阿密市，偶尔也看到几个从山区保留地下来的印第安人，他们棕色的皮肤，穿着花布衣裙，头上戴着有羽翎的帽子，蹲在街头角落，成了外国旅游者参观的特殊对象。

黄种的华人在美国历来受到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多数美国人对我们热情友好，但有些怀有种族偏见的人，仍然处处流露出轻视、傲慢的态度，损伤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引起强烈的不满。

我们到达迈阿密的第二天，当地报纸刊载了一则中国海军抵达的消息（大意）：昨天下午，一批中国海军到达本市。他们是黄色皮肤，个子矮小，身着宽大的美式黄军服，扛着军用帆布袋，走出火车站，他们东张西望，好奇地望着周围一切。据悉，这批中国海军将在本市海军训练中心接受训练云云。

我们看到这篇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议论纷纷，显然，这位记者是带着轻视、嘲讽中国人的笔调写的。实际上，反映出一些美国人的心态，看不起黄皮肤的中国人。这篇新闻报道，虽令人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接着不久，又发生一起公开歧视中国水兵的事件。

有一个来自交通大学、名叫瞿伟民的同学，他的皮肤较黑，嘴唇较厚，平时大家开玩笑叫他“黑人”。一个星期天，他到市内电影院去看电影，女售票员拒不卖票给他。瞿伟民当即申辩说：“我是中国海军！”女售票员轻蔑地说：“中国黑人也不卖。”

瞿伟民没有看成电影，很生气地回到旅馆。当同学们知道此事后，都愤愤不平，议论纷纷。

一个同学说：“可能是售票员把他误认为是黑人了。”

一个同学接着说：“不管是不是误会，事实上，有些美国人怀有很深的种族偏见，就是把中国人当成黑人看待。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打破这种歧视中国人的行为，我们以后怎么过下去，我们决不能受这个气。”

一个同学说：“我有个同学是留美空军，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空军基地受驾驶训练。他曾对我说过，他们初到美国时，也发生过电影院不卖票给中国军人的事，他们就大打出手，打得全城的人都知道中国军人是不能侮辱的，历来洋人就是欺软怕硬，只要大家齐心，采取强硬态度，洋人就会退缩。”

大家觉得这话说得对，就商定在下星期例假，邀约一批人，专到那个电影院，看他们卖不卖票，如果拒不卖票，就强行冲进去，谁要阻拦，就不客气用拳头对付。

到星期例假日，有10多位同学邀约在一起，专到那个电影院门前买票。卖票窗的女售票员看见这么多气势汹汹的中国海军站在那里，迟疑了一下，可能是害怕了，乖乖地把票售出。

以后，还发生过因美国水兵无理轻视中国水兵，而引起冲突打架的事。很快，中国水兵骨头硬的名声传遍这个城市，我们大摇大摆出入各个公共场所，也没有再发生过公开无理拒绝的事了。

欢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迈阿密全城沸腾，人们热烈庆祝欧洲战场的胜利。

欧战胜利后不久，5月中旬，有300多名苏联海军，也根据美国战时租借法案，来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学习，并接收美国军舰。苏联海军就住在我们紧邻楼下。旅馆门前，原由中、美两国各派一名水兵日夜值勤，自苏联海军住进后，也派水兵参加值勤，这样，阿尔克札旅馆成了中、美、苏同盟国合作与友谊的象征，吸引了人们的注意，经常有本地市民和外地旅游者来旅馆门前参观，对着三国值勤水兵摄影或要求合影，留作纪念。

我们和苏联海军还同在一个饭厅用餐，同在训练中心学习（学习时间错开安排），也同在一起娱乐、玩耍。苏联海军于9月接舰返国去了。在四个月的共同生活中，给我们留下了友谊的记忆。

自从德意投降后，我们在迈阿密的海军训练并未因欧战结束而稍有松懈，而是按计划照常紧张进行，积极准备投入太平洋战场。

我们都十分关心着太平洋战区的战局发展，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今后的命运和前途。同盟国已将欧洲部队陆续转入太平洋战区，集中打击日军。日本虽然大势已去，但困兽犹斗，仍在作垂死挣扎。

从7月底到8月上旬，战局急转直下，一个个震动人心的消息不断传来。

8月6日，美国派出B-29轰炸机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其威力为一吨烈性炸药（TNT）的两万倍，倾刻之间，广岛化为灰烬。

8月9日零时一过，苏联百万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

势，几面突入中国东北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击。

8月9日上午，美国飞机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8月14日晚上11时左右，我们刚刚入睡，突然，楼下大街上的汽车喇叭齐鸣，把我们从梦中惊醒，紧接着，楼层走廊上的扩音机响了，反复播放：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日夜盼望的胜利喜讯终于到来，日本法西斯垮台了！同盟国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们都激动得流出泪水。

我们迅速穿上白色海军服，奔向楼下大厅。美国、苏联水兵已聚在那里，大家互相握手、拥抱，互祝胜利。每个人都用中指与食指叉开比成“V”字形（“V”为英文Victory胜利的缩写，已成为国际通用“胜利”手势语言）。苏联水兵纵情高呼“乌拉！乌拉！”美国水兵更是手舞足蹈，把水兵帽抛向空中。

这时，摄影记者已迅速赶到旅馆，大厅里闪光灯频频闪烁，他们抢拍下中、美、苏三国水兵共庆胜利的历史镜头。

接着，水兵们走出旅馆，拥向大街。此时，海军码头上庆祝胜利的礼炮响了，军舰上探照灯强烈的白光在夜空中交叉晃动，轰隆的礼炮声、汽车的喇叭声、人们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人们沉浸在胜利的欢乐气氛里。全城的人都走出来了，人们拥向中心大街，拥向海滨公园，街上华灯齐放，平时显得那么宽阔的大街，现在竟挤得水泄不通。此时，不管男女老少，不论认识或不认识都互相握手拥抱，互祝胜利。军人成了最受宠爱的人。美国水兵更是放纵任性，看见妇女就上前拥抱接吻，妇女们也热情地回吻。有些热情的姑娘也主动与军人拥抱接吻，我们中国水兵也同样受到美国少女们的热吻。

在海滨湾前公园，简直成了欢乐的海洋，一支临时凑起的乐队，用劲吹奏着欢乐的舞曲，人们在草坪上纵情地跳舞。在迈阿密海滩上，人们燃起一堆堆篝火，火光照亮了海滩，映红了人们的脸，大家围住篝火，不停地唱歌，不停地跳舞。这是胜利之

夜！狂欢之夜！

为了庆祝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决定在8月下旬，举办中美苏三国海军共庆胜利联欢晚会，要求三国官兵分头准备晚会节目。

我们经过筹备与突击排练，准备了合唱、京剧和戏剧小品等节目。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中、美、苏三国海军庆祝胜利联欢晚会在迈阿密市演出厅举行，大厅呈半圆形，设有梯形座位，可容纳数千人。中、美、苏三国海军官兵穿着整洁的海军服进入大厅，出席联欢会的有海军训练中心司令豪海军上校、中国、苏联海军领队，以及迈阿密市政官员、社会名流等，整个大厅座无虚席。

报幕员由中、美、苏三国水兵共同担任，分别用中、英、俄文解说报幕，表现了同盟国军队的团结与友谊。

大幕拉开，首先出场的是中国海军合唱队，我们演唱的是抗日歌曲《黄河大合唱》，由来自国立音乐学院的杨健同学指挥，这首歌曲气势磅礴，表现了中华民族奋起抗日的决心和英勇气概，具有强烈的反法西斯的时代感。人们凝神谛听，台下鸦雀无声。当我们唱完最后一个音符时，台下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连续谢幕两次。我们原来担心外国人听不懂中文歌的顾虑消失了。他们理解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我们感到民族的自豪与骄傲。

紧接着上台的苏联海军小合唱队，他们演唱了《神圣的战争》、《喀秋莎》等苏联歌曲。接着美国海军合唱队演唱了《自由战歌》、《起锚歌》等。合唱完后，由三国水兵轮流表演其他节目。毕道仁同学表演了一段用京胡伴奏的京剧清唱，外国人对这只用两根弦的中国式提琴能奏出美妙的音乐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原是演员的黄宗江同学，用“基础英语”通俗词汇，自编、自导、自演一出小品，他一人饰两角，夸张的语言和动作，引得满场哈哈大笑。

苏联水兵表演了俄罗斯、乌克兰民间舞，美国水兵表演了踢踏舞，都具有民族风格，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最后由美国海军铜管乐队登上舞台，分别演奏了中国、苏联、美国的歌曲，这时全场沸腾，情绪达到了高潮。

庆祝胜利联欢晚会，开得热烈、紧凑，充分表现了中、美、苏三国海军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的团结与友谊，与获得的成功。

反贪污的罢课绝食风潮

1945年10月下旬，即日本投降胜利喜讯传来以后两个月，在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学习的中国学兵，爆发了一场反贪污的罢课绝食风潮。

矛盾的由来

这批青年学生怀着满腔抗日爱国热情，投笔从戎，参加海军。起初，大家抱着天真的幻想，认为这支出国学习的海军，有别于国内军队，应是一支廉洁的、官兵平等的、有民主精神的新军，但事实证明，国内国民政府军队的重官轻兵，官兵间的经济待遇悬殊以及上层军官的贪污腐败，对士兵采取惩办的种种恶习和弊端，同样存在于海军学兵团中，引起了学兵们的不满。

当时在迈阿密接受训练的有60名中国海军军官，他们将担任接舰后的军官职务。这批军官是从国内海军军官中选拔出来的，他们都受过海军学校正规教育，分别毕业于马尾海校、青岛海校、烟台海校、黄埔海校、电雷学校；有的还曾去英国、德国学习过，有的资历较深，担任过舰长，他们的军衔从少尉到少校。受训的军官和学兵是分开居住、分开学习的，军官学习的内容是按照对军官的要求安排的。学兵团到达迈阿密后，又调来九名中国海军军官，他们曾在安纳波利斯（Anapolis）海军学院学习过两年。直接管理学兵的是海军办事处。

主持海军办事处工作的是许世钧海军少校。他在战前当过舰

长，约40多岁，此人久混官场，世故圆滑。平时一副笑脸，表示很看重学兵，可是，当学兵稍不顺从时，他即进行惩办。有的学兵违犯纪律，如放假外出未按时回营，或者顶撞上级，许世钧就下令关禁闭，关押在美国海军监狱里。学兵们对此种做法极其不满，抗议说，中国士兵违反了纪律，可以受中国军纪处分，为什么要关在美军监狱里，由美国军人来执法，难道中国是美国的附庸国！关禁闭只能临时关几天，还得放出来，关得次数多了，也就见惯不惊了。许世钧见关禁闭不能压服，又变换手段，采取对违纪者扣罚津贴，按情节轻重每次扣罚5美元或10美元。学兵每月只有30美元的生活津贴，在美国理发、购买肥皂、香烟等日用品以及假日费用，处处离不了钱，扣罚津贴直接影响到学兵生活，这一招果然厉害，使大家又怕又气，心中积压着怒火。

学兵们普遍不满的是：军官与士兵的经济待遇悬殊。当时受训的中国军官，除国内按原工资照发给家属外，在国外期间，另发给美金津贴，少尉230美元，少校300美元。而学兵每月只有30美元生活津贴，相差太大。大家也知道，在美国受训期间的一切费用，按租借法案规定，均是由美国政府提供，只是记在中国帐上而已。当局压低士兵待遇，自然引起学兵的不满。

导火线

引起学兵们罢课绝食的风潮的导火线是印度差旅费问题。

到迈阿密后，就有传闻，学兵们在印度的旅途津贴和制装费都被克扣减发了，但具体情况不清楚。当时，正处于战争紧张时期，大家的心思都集中于学习，准备参战，因此未予深究。

后来了解到，按上级规定，出国海军学兵在印度旅途津贴为每人每天2美元。临出国时，有几个英语好的学兵被临时抽调去当翻译和先去印度协助后勤采购。据他们揭露：军事委员会派到印度为海军大队采购的林科长，买的都是质量低劣的廉价货，而且没有买足上面规定的数量。总领队潘佑强还伙同林科长用克扣学兵差旅费的美金，在印度购买了大批高级洋货，用卡车从中印公

路运回昆明倒卖。

学兵们算了一笔帐，学兵大队在印度旅途约40天，每人实发旅途津贴为100印度卢比，折合美金约为30美元，每人每天实发不足一美元。按规定，每人每天的旅途津贴为两美元，那就是说，每人每天被克扣一美元，按40天计算，就是40美元。全大队1000人就被克扣四万美元，这是一笔巨款。钱到哪里去了？关于制装费更是漏洞百出，在印度汀江兵站换装时，军服的里里外外和毛毯均为美军所发，由国家发的只有两套质量低劣的黄棉布短袖军服。大家不清楚上面规定的制装费是多少？但肯定制装费也被贪污了。

大家一算帐，越算越气愤：我们青年学生，为了抗日救国，不惜放弃学业，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从军参战，而这些贪官污吏在国内贪污腐败，一再贻误军机，致使国土沦丧，到国外来，仍恶习不改，抓住各种机会贪污，中饱私囊。这些贪官哪有什么抗日心思？哪里还有半点廉耻之心，不铲除这些贪官污吏，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学兵们义愤填膺，要求许世钧对印度差旅费作公开答复，并强烈要求补发被克扣的差旅费。许世钧也不能不承认，确实扣发了差旅费，但又不敢当面向学兵作答复，由军官传话搪塞说，扣发学兵在印度差旅费的事，是总队长潘佑强决定的，因为体谅国家经济困难，已上交国库，支援抗战，就不再补发了。

大家一听此话，更加气愤，好像他们扣发士兵的差旅费，不是贪污，而是体谅国家经济困难，支援抗战了，非但无过，而且有功，真是鬼话连篇，连三岁的小孩也不会相信。同时，大家还了解到：军官们在印度的差旅费是全部发给的，而且金额比士兵多，为什么只要士兵支援抗战，军官就不支援抗战？潘佑强、许世钧就不支援抗战？学兵们再三要求许世钧公开回答，许世钧总是避而不见，也不作答。

拒绝佩戴辱华臂章

正当学兵们要求补发在印度差旅费同时，海军办事处正忙于筹备美国赠送中国八艘军舰的移交签字仪式，拟安排全体官兵参加，隆重举行。事前，在阿尔克札旅馆的值班军官徐中尉，从办事处拿来一大捆新制的臂章，交给正在值勤的学兵分队长黄宗江，吩咐他发下去，要求学兵缝在白色水兵服的左袖上，佩戴在左臂上，准备参加移交军舰签字仪式。黄宗江解开一看，发现臂章上印有黑色英文“China”字样，当时叫了起来：“这是什么样臂章，简直是辱华，不能发，不能发。”学兵们闻声也凑过来看臂章样式，都十分气愤，议论开了。到迈阿密后，学兵们换发穿的是美式水兵服，但没有任何符号标志。在美国海军训练中心学习期间，穿美国海军服，可以说得过去。军舰移交中国后，就要挂上中国国旗，作为中国水兵，就应该穿上中国式的水兵制服。像这样穿上美式水兵服，而且佩戴上英文“China”的臂章，不伦不类，我们不是成了十足的美国附庸国了！大家表示坚决拒戴这种辱华的臂章。黄宗江将大捆臂章，原封不动地退还给徐中尉。徐中尉也认为学兵们有理，当即表示：暂停发臂章，向海军办事处反映大家意见，重新慎重考虑。自此以后，再也没有提臂章之事了。

围攻扣押领队

学兵们要求补发在印度期间的差旅费和拒绝佩戴辱华臂章之事，传到海军办事处后，许世钧感到学兵的思想不稳，移交军舰在即，万一学兵们做出越轨行动，岂不是当面丢丑。他只有硬着头皮，亲自出马到阿尔克札旅馆去做学兵工作。

10月下旬的一天，许世钧来到阿尔克札旅馆学兵驻地，他一走出电梯，就被学兵团团围住，要他对印度差旅费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许世钧没有想到学兵们的情绪如此激昂，感到势头不对，想转身溜走，但已经迟了。学兵们将他挟持到旅馆12楼上一间空客房内。其他楼层的人听说许世钧来了，都拥到12楼，走廊上挤满了人，纷纷向他质问。

一个学兵指着许世钧的鼻子说：“你把你们怎样贪污印度差旅费的事，向大家说清楚，不说清楚，休想走出旅馆大门。”

围在室外一大群学兵高呼：“说清楚，说清楚！”

许世钧态度傲慢，昂头叉腰，威胁说：“你们这样围攻领队军官，是犯法行为。”

学兵们群情激昂，质问他：“什么犯法不犯法，你们克扣贪污差旅费才是犯法，我们要求补足在印度的差旅费是完全正当的。”

许世钧有些害怕了，做出十分委屈的样子说：“在印度的一切事情，都是总队长潘佑强决定的，与我无关。扣发你们的差旅费，因国家经济困难，都上缴支援抗战了。”

许世钧的推托狡辩，更加激怒了学兵们。

一个过去曾在许世钧手下当过水兵的福建老海军站出来：“你不要装好人，你当舰长时，就克扣士兵粮饷，吃空额，你拿着贪污的大把票子，到岸上花天酒地。”

人群中有个操着四川口音的学兵骂道：“你是个老贪污，揍这个龟儿子！”于是，有几个人冲上前抓住许世钧，欲施拳脚。此时，陈显扬、黄宗江等分队长上前拦阻，把人分开，一边劝说：“同学们，冷静点，不要打。”一边将房门拉上，并对大家说：“同学们要冷静，我们要求补发差旅费是正当的，我们要坚持说理，不能打，如果动手打伤了许世钧，我们就处于被动，也无助于差旅费的解决。”

大家觉得分队长们的话有理有节，于是退下来，要求许世钧写出书面交待，签字画押。

美军的武装干涉

当海军办事处得知许世钧被围困在阿尔克札旅馆后，即向美国海军当局发出紧急求援电话。迈阿密海军当局接到电话后，立即派出武装宪兵乘吉普车赶到阿尔克札旅馆。

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带领五六个全副武装的美国宪兵赶到阿尔克札旅馆12楼，带队美国军官命令中国士兵立刻释放许世钧少

校，美国宪兵用枪托打圈住他们的中国士兵。学兵们手无寸铁，担心发生流血事件，只得退开。美国宪兵打开房门，武装护卫着许世钧冲出学兵的包围圈，乘电梯下楼，坐上吉普车走了。

美国武装宪兵强行带走许世钧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各楼层宿舍，当天晚上，学兵们聚集在各楼层走廊上，议论纷纷。同时，怒气也转向美国海军当局。

“我们追查军官的贪污问题，要求补发差旅费，这是中国军队内部的事，美国人凭什么要来干涉，凭什么派武装宪兵把许世钧强行带走？”

“海军办事处勾结美国人来欺压我们，我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气！”

一个同学激动地说：“同学们，我们是为了抗日而来从军，现在日本已经投降了，抗战已胜利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留在美国受洋气，还要受贪官的欺压？我们不学了，回国去！”

接着响起一片“罢课！罢课！”的呼声。

差旅费涉及到每个学兵的切身经济利益，不管是学生兵或是老海军士兵，不管对政府的看法有何不同，但反对贪污克扣，要求补发在印度的差旅费，是大家的共同要求，行动是团结一致的。可是，当涉及到是否采取罢课行动时，则出现了分歧：来自学校的大多数青年学生情绪激昂，无所顾忌，积极主张罢课；有些经历较多的人则顾虑重重，怕事情闹大了，以后遭报复，弄不好要坐牢，杀头的；原来的老海军士兵感到出国后的待遇比在国内当兵时好多了，他们也习惯服从军官，不敢违抗当局，但也不敢得罪学生兵，勉强跟着走；有少数人则持公开反对态度。一个原江防大队的中尉军官说：“政府花了这么多的心血与金钱，送我们出国受培，我们不能干这种反对政府的事。”

赞成罢课的青年学生占了多数，少数人观望或反对，但阻止不了大流。积极主张罢课的同学，迅速组成了临时纠察队，到旅馆大门把守，阻止任何人走出旅馆，就是反对罢课的人，也无法

走出大门。

最初，只是提出罢课，并未提出绝食。但海军食堂离旅馆有两条街，如果让人走出旅馆到海军食堂就餐，那就根本无法控制众多分散的人员，罢课就是一句空话。要罢课，就不能让人走出旅馆，就不能到海军食堂去吃饭。大家提出行动口号：“不出旅馆，不去海军食堂吃饭，不去训练中心上课，要求补发差旅费！”有人提出，绝食不是好办法，但事已至此，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有采取绝食罢课的行动了。

罢课绝食行动震惊中美军方

第二天早晨，平时旅馆里热气腾腾、闹哄哄的场面，突然变得冷冷清清，中国学兵躺在床上睡大觉，没有人走出旅馆大门，没有人去海军食堂，更没有人去训练中心，一场中国学兵的绝食罢课行动开始了。

当中国海军士兵绝食罢课的消息传出后，中国海军办事处和海军训练中心的官员们都惊慌失措，一时不知该怎样对付才好。他们一面分别紧急向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和美国海军部报告请示，一面设法缓和中国士兵的情绪，不让事态继续扩大。

中国军官和美国军官都出动了，他们来到阿尔克札旅馆，用广播反复劝告中国士兵停止绝食罢课，并由海军食堂专送来面包，还用电梯送到各楼层，但没有人理会。

第一天绝食罢课成功了。

绝食罢课的第二天，迈阿密市的报纸以“Chinese Navy Strike”（中国海军罢课）的标题，报道的新闻消息中还透露出罢课的原因是：中国海军士兵反对贪污腐败，争取改善待遇云云。消息很快传遍全市，也传到美国其他城市。这更引起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惊慌，遂迅速派出官员飞到迈阿密调查处理。他们会同海军办事处对学兵软硬兼施。一方面表示，差旅费问题，已向国内请示，要合理解决，要大家立刻停止绝食罢课；另一方面发出严厉告诫，如果继续闹下去，要按照军法严惩不贷。

在当局的劝诱和威胁下，一部分人顶不住了，有的人耐不住饥饿，下楼拥到小卖部抢购饼干、饮料，有的人去拿海军食堂送来的面包，一部分本来就不赞成罢课的人，不顾纠察队的劝阻，带头走出旅馆到海军食堂去用餐，绝食罢课已无法再坚持下去了。

大逮捕

中国海军学兵在迈阿密绝食罢课风潮也迅速传到了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闻讯极为震怒。这次绝食罢课事件竟发生在美国，暴露了中国军队内的贪污腐败丑行，在国外产生很大影响，当局自然不肯轻易罢休，一场镇压学兵的行动正在幕后紧张策划。

罢课风潮发生后，海军办事处放出空气说，在学兵中，混入了共产党分子，这次绝食罢课不是一个单纯差旅费问题，而是被“坏人”利用，煽动组织起来的叛乱，一定要彻底查办。

接着，他们在学兵中进行了清查。白天，学兵们照常在训练中心上课，到了晚上，办事处的军官们即来到旅馆学兵驻地，分头逐一对每个学兵进行“个别谈话”，实际上就是进行侦讯。谈话的中心内容和意图是，追查谁是这次绝食罢课风潮的煽动、策划首要分子。

经过几天的紧张侦讯，海军办事处开始动手抓人，陆续逮捕了所谓带头闹事的约50名学兵，关入美国海军监狱。在这些被捕学兵中，大都是出头露面围攻许世钧和参加纠察队的，有些还是十八九岁最不怕事的中学生，也包括一些平时言词激烈，顶撞军官的。在美国海军监狱里，经过审讯，陆陆续续释放了大部分人，最后确定陶寿喜、任治祐、张明煌、阮怀德等八人为这次罢课闹事的首要分子。审讯是在监狱里分开秘密进行的，当局也没有公开具体的罪状和罪证，只笼统地扣上“煽动罢课首要分子”的帽子，就匆忙把八名学兵押解回国。同学们闻讯后，愤愤不平，认为这八名同学是代大家受过，纯属一场冤案，但也无法救援他

们。

据事后了解，要求补发差旅费最先是由黄宗江、陈显扬、毕道仁等分队长带头提出，他们曾起草报告质问：“钱到哪里去了？”但事情发展到罢课绝食并非事前有预谋，更没有组织领导，而是学兵们痛恨贪污，并在目睹许世钧狡赖和美军的蛮横武装干涉时，当场激起了大家的愤怒，在情绪激动中产生的自发斗争行动。

接收美国赠送的八艘军舰

学乐队在训练中心的学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每个舰员都必须掌握的共同科目；第二阶段，分科学习专业技术，如航海、轮机、雷达、枪炮等；第三阶段，接舰上岗，进行海上实习和战术训练。1945年11月，军官队和学乐队同时分别登上准备接收的八艘军舰出海实习，按计划担任的职务，由美海军人员以“一对一”方式辅导实习。八舰每天早晨起锚出港，在迈阿密港外墨西哥湾海面操演，日落前返港。12月下旬各专业班举行结业考试，发给迈阿密海军学校蒙上校签字的毕业证书，同时发给“同舟”纪念册一本。并按照学习成绩分别授予军衔，士兵最高为军士长，依次为上士、中士、下士和列兵。

1945年12月初，举行八舰正式移交仪式，由美国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司令蒙上校移交给中国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刘田甫海军少将。随着宣布派上各舰的官兵名单，暂用美海军编制。

这八艘军舰是美国40年代初建造的，都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在美国海军中属轻型军舰，装备是相当先进的，特别是对战后只有几艘破旧落后的炮艇的中国海军来说，则是设备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军舰了。“太康”、“太平”为同型的护航驱逐舰，航速为21.5节，火力装备有76毫米炮三门，双联装40毫米炮两门，20毫米机关炮六门；舰尾设有攻击潜水艇用的滚放式深水

中国接收的八艘军舰为：

原美舰名	改中国舰名	类型	排水吨位	主 机	舰长姓名
DE-6	太康	护航驱逐舰	1450	6000千瓦	梁序昭
DE-47	太平	护航驱逐舰	1450	6000千瓦	曹仲周
AM-257	永胜	扫雷舰	1000	1800马力	蒋 谦
AM-258	永顺	扫雷舰	1000	1800马力	高 举
AM-259	永定	扫雷舰	1000	1800马力	麦士尧
AM-260	永宁	扫雷舰	1000	1800马力	徐 亨
PCE-867	永泰	海岸巡防舰	850	1800马力	王恩华
PCE-869	永兴	海岸巡防舰	850	1800马力	齐鸿章

炸弹架和抛射式深水炸弹发射器；配有跟踪、测定飞机、舰船的对空雷达和对海雷达各一台，探测水下潜艇和暗礁的声纳一部；还有无线电通讯电台、航迹自动记录标绘仪、定向仪、电罗经等。四艘扫雷舰和两艘海岸巡防舰均配有雷达、声纳等先进仪器，扫雷舰可以扫除触发水雷、磁性水雷和音响水雷。这八艘军舰合计排水量为8000多吨。

正式接收八舰后，当局宣布将许世钧调离回国，改派中国驻美大使馆海军副武官林遵中校担任八舰指挥官。与此同时，对士兵的津贴待遇按军衔职务作了相应调整，比原来津贴有较大的提高。由于许世钧的调离和提高士兵待遇，士兵的要求得到了部分满足，矛盾有所缓和，官兵们积极进行训练，准备启程回国。

在古巴关塔那摩军港进行作战训练

1946年1月初，由八舰组成中国舰队，以“太康”号为旗舰，在新上任的舰队指挥官林遵海军中校率领下，离开迈阿密，驶往古巴关塔那摩（Guantanamo）美国海军基地继续进行海上实习和战术训练。林遵是福建人，40来岁，中等个子，早年就读于烟台

海军学校。1928年到英国留学，毕业于英国海军学院^①，以后到德国接收舰艇，不久回国参加抗日，曾担任长江布雷队大队长。1945年，林遵被派到中国驻美大使馆任海军副武官。此次，他来担任舰队指挥官，颇想有一番作为，学兵们对他也寄有希望。

中国舰队离开迈阿密以后，进入佛罗里达海峡，向古巴关塔那摩军港驶去。关塔那摩海港是古巴东南沿海的一个天然良港，它控制着大西洋入加勒比海的航道，位置重要。从1903年起，美国即强行租借关塔那摩港作为海军基地。

经过一昼夜航行，中国舰队抵达关塔那摩军港。该港果然是



1946年3月，中国军舰“永宁”号（美国编号为260）在古巴关塔那摩军港的留影。

① 《民国人物大辞典》记载：林遵1929年考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

个良好港口，它的入口处狭窄，仅三公里，进入港湾后，水面宽阔，有70平方公里，停泊着美国大大小小的军舰。美国在关塔那摩港经营多年，已具有相当规模，设施完善。它有良好的码头、仓库、船坞和修理厂，储备有充足的各型军舰的机器部件、油料和生活物资。它可以检修各类军舰并提供后勤供应，同时它也是一个海军训练基地。基地内除少数美军临时雇用的古巴人员外，大都是美国海军人员，其中很多是来往流动的舰艇人员，基地司令是一位美国海军上校。

严格的技术科目训练

八舰到达关塔那摩军港后，即投入了紧张的训练。各舰都留有少数原舰美国军官和军士作技术指导。先是在港口附近海面上作三五天的短期航行，使各部门的水兵熟练掌握机器和适应海上生活。加勒比海地区属热带气候，火辣辣的太阳把甲板晒得发烫，在机舱下工作，更是闷热不堪。海上气候变化无常，霎时间阴云密布，风浪大作，暴雨倾盆，军舰在大浪中猛烈颠簸摇晃，虽然我们不再呕吐，但仍感到眩晕，不管是烈日、暴雨，每个人都得坚守岗位，一丝不苟地操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海上训练，大家已能独立熟练操作，在各种自然条件下航行了。

紧接着进行战术科目训练和海战实弹演习。在海上不仅要熟练各种部署，而且要用不同的航速编队演习，不时变换各种队形。各舰还需根据指挥部的命令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的方位，与友舰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发挥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演习时，基地派出一批军舰、飞机、潜艇作为“敌方”，紧随中国舰队进入海域。我们舰上的雷达和声纳严密监视着海空敌情。当雷达兵在荧光屏上发现“敌机”或“敌舰”，或者声纳兵从声纳仪器的电波曲线和声波回声发现有“敌潜艇”时，立即发出警报，全舰人员在一两分钟之内，必须进入各自的战斗岗位，做好战斗准备。各个炮位上下左右转动，追踪搜索着“敌人”，当“敌舰”、“敌机”出现在海上和空中，它们的后面都拖带着靶船或靶机。开火命令一

发出，各舰的火炮，向靶船和靶机进行猛烈射击，炮声隆隆，浓烟滚滚，大家看见靶子被击中起火，都高兴得大叫“打得好”。当声纳兵报告发现敌潜艇的方位后，枪炮兵从后甲板上将深水炸弹（用一种信号弹代替）投射入海，立刻轰然巨响，掀起巨大的水柱。在作战演习中，还同时进行消防、堵漏等各种训练。扫雷舰还着重进行扫雷训练。作战演习时，林遵指挥官和官兵一起出海、检查各舰的战备情况。基地司令美军上校也登上军舰观察，了解训练情况，帮助总结经验。经过四个月的严格作战训练，官兵们熟练掌握了军舰各项操作和作战的本领，美军基地司令称赞中国官兵能干，并认定已达到美国海军训练的各项标准。

作战训练告一段落后，八舰进行全面检修机器设备。基地派技工到舰修理，官兵们参加拆装、清洗、调试，进一步深入掌握各种设备、仪器，并补充了许多易损的备件。各舰检修完毕，重新油漆，准备远航驾舰回国。

一到关塔那摩军港，我们即投入紧张的作战训练，日夜出海。在检修舰船停航期间，才得以了解军港全貌。关塔那摩港常年干旱，雨水稀少，到处都是被强烈阳光晒成的棕褐色，在起伏的丘陵上贯穿着宽阔的泥土公路，山岗四周布满着炮台和瞭望台。这里看不到青翠碧绿的树丛，田野上却可见仙人掌、风滚草、毒蜘蛛和毒蟹。基地海军码头属军事区，四周围有铁丝网，平民百姓不得入内，在岛的另一端是生活区，区内设有商店、俱乐部、电影院、游泳池、露天球场等，还有古巴华侨在此开设的中餐馆。这些都是为基地海军人员休息服务的。

参观“密苏里”号战列舰

1946年3月，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和举世闻名的美国大型战列舰“密苏里”号，同时到达关塔那摩港。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就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中国海军官兵分批去参观这艘具有历史意义的军舰，（一部分还参观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该舰一少尉军官带领我们参观并作解说。

“密苏里”号战列舰标准排水量为4.5万吨，满载为5.8万吨，舰长270多米，宽33米，相当于三个足球场，航速35节，主机功率26万匹马力，舰上配备有406毫米的主炮九门，另有大小不等口径的火炮，具有强大的远程和近距的攻击力，所有炮塔都是由雷达指挥的控制系统。我们参观了驾驶舱、指挥舱、主炮塔、雷达室、机舱、士兵餐厅等。电机舱里洁白明亮，一尘不染，值班水兵在控制台前操作。从军舰的装甲、火力装备和各种先进机器设备，显示了美国的工业水平和军事力量。少尉军官特别领我们到战舰右侧指挥室外的上层甲板上，在甲板旁镶嵌了一块紫铜牌，上面刻有“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此签字”的英文字样。少尉军官还向我们叙述了当时签字的情景：

签字用的桌子，原来准备向英国“乔治五世”号借一张古色



1946年3月，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到达古巴关塔那摩军港。（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就在该舰举行）。正在该港实习的中国舰队官兵登舰参观。甲板旁的铜牌刻有“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此签字”的英文说明。铜牌旁站立的三名中国水兵，中立者为本文作者之一刘福祥。

古香的木案，因为太小，临时换用“密苏里”舰士官室一张长方餐桌，上面铺上绿色台布。这张桌子已成了舰上珍贵的历史纪念品。那天，主甲板和指挥室及各个炮座上，挤满了来参加签字典礼的同盟国官兵，各国记者就有200多名。在主甲板紧靠舷梯处，排列着海军军乐队。当同盟国签字代表到达时，乐声大起。投降签字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主持。首先，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重光葵一条真腿、一条假腿，走起路来，一跷一拐，样子狼狈可笑极了。然后是同盟国代表麦克阿瑟将军签字，接着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加、荷、新西兰等国代表依次签了字。

我们久久凝视甲板上日本投降签字的地方，心潮起伏。从甲午海战惨败以来，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侮，我们早就盼望着报仇雪耻的一天。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和同盟国共同战斗，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牺牲了多少人，才换来了这个伟大的胜利时刻，但愿法西斯主义永远被埋葬，世世代代永远和平。

我们拿出相机，站在日本投降签字的甲板上互相摄影留念。临别时，少尉军官向每人赠送了“密苏里”号军舰的纪念小册子，里面有军舰的照片和介绍，还附有日本投降签字的历史照片，我们请少尉军官在纪念册签名留念，才握手告别。

跨越两洋 万里返航

1945年4月上旬，八舰在关塔那摩军港检修完毕，各舰的里里外外都重新油漆，帮助训练的最后一批美国海军官兵，完成任务后全部离舰，各部门均由中国官兵独立上岗，各舰升起了中国国旗，水兵们换戴上有中文标志水兵无檐帽和蓝色披肩。此时，美

国又赠送一艘1.5万吨级补给舰“玛米”(MAMI)号，暂由美国海军人员驾驶，护送八舰回国后再正式移交。(移交中国后，命名为“峨眉”号)

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准备远航启程回国，尤其令人兴奋的是：中国舰队在返航回国途中，将对古巴、巴拿马、墨西哥、日本等国和美国西海岸、夏威夷地区进行访问并慰问当地海外侨胞。像这样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访问海外是近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特别此时的中国舰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胜利大国的姿态出现，真是一洗百年耻辱，重振国威。明代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船队到了亚非南洋一带，最远的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中国舰队远航到大西洋加勒比海、太平洋东海岸访问，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哈瓦那侨胞情意深

1946年4月中旬，中国舰队在林遵指挥官的率领下，从关塔那摩军港启航，在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作短暂停留后，即驶古巴首都哈瓦那访问。据说，哈瓦那原为一个美丽印第安姑娘的名字，人们怀念她，以她的名字命名赞美这个城市。当中国舰队驶抵哈瓦那港时，码头上已聚满了欢迎的人群，除了古巴的军政官员外，大多数是当地华侨。我们列队站在甲板上，远远地就看见侨胞们举着的“热烈欢迎祖国的海军舰队”中文横幅。当军舰抛锚停泊后，侨胞们纷纷拥上甲板，和官兵们热烈握手、拥抱，有的侨胞双手抚摸船舷，热泪夺眶而出。

古巴的华侨大多是在清朝末年被殖民主义者拐骗，作为猪仔贩卖到美洲做苦工的。他们在海外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还被视作低等民族而受到歧视。他们多数是糖厂和甘蔗园的劳工，或者开餐馆、开洗衣店。中国舰队首次访问哈瓦那，侨胞们感到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当时在哈瓦那的华侨约有两万多人，各华侨社团联合组成了欢迎祖国舰队接待委员会，各华侨团体、商号、个人，踊跃集资，筹集了一大笔招待款

项。

中国舰队首次访问古巴，受到古巴政府的隆重接待。古巴总统在哈瓦那中心广场检阅中国海军。当我们的队伍行进在哈瓦那大街时，人们争睹中国海军的英姿。古巴总统还亲自登舰参观。哈瓦那市报纸连日均在显著地位，刊登中国舰队访问活动的消息和照片，并发表文章，祝贺舰队胜利远航，赞扬中国作为盟国四强之一，坚持八年抗战最后把日敌驱出国土。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总有许多古巴人上前向我们致意，有的用西班牙语热情高呼：“chino，chino”（中国，中国），有的邀请我们合影留念，我们深深感到古巴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意。

舰队在哈瓦那停留期间，各华侨团体连续举行盛大招待会。许多侨胞一家老小三代都到会，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在子孙搀扶下来了。年轻的华侨姑娘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们热情邀请官兵跳舞，一些年长的侨胞拉着我们的手话家常，询问着祖国的情况。侨胞们大多来自广东、福建，也有来自江浙其他省份的。大厅里欢声笑语，广东话、福建话、国语、西班牙语、英语以及连比带划手势交错使用，洋溢着同胞亲情。

在哈瓦那停留期间，侨胞们还纷纷来到军舰停泊码头，热情邀请官兵们去赴宴或游览。在侨胞的引导下，我们参观了哈瓦那的风景名胜，瞻仰了矗立在中央广场的华侨纪念碑。那是一座大约10多米高圆柱形大理石碑。据侨胞介绍：在古巴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中，许多华工和古巴人一道参加了斗争，华工们作战英勇，深受古巴人民尊敬。独立后的古巴政府，为表彰华侨所立下的功勋而修建了纪念碑。在黑色大理石的基座上镶着一块铜牌，上面有古巴冈萨洛将军的题词：“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叛徒。”

离开哈瓦那时，侨胞们都赶来送行，我们再三感谢他们的盛情招待。侨胞们说：“祖国舰队的到来，我们海外华人感到扬眉吐气，祖国强盛，我们的腰杆才硬，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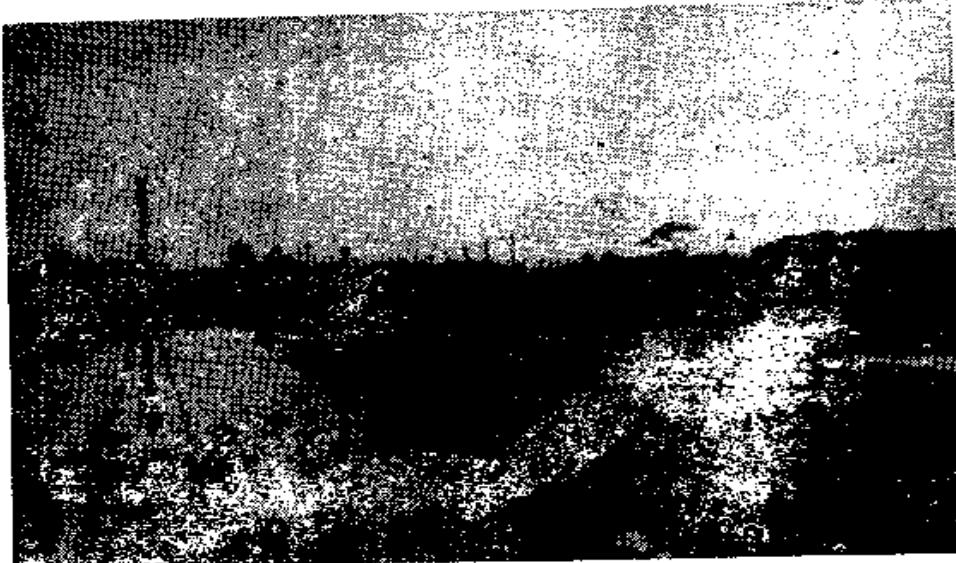
通过巴拿马运河

中国舰队结束了对古巴的访问，于4月18日离开哈瓦那，驶入加勒比海，前往巴拿马共和国进行访问。

舰队于4月21日傍晚到达巴拿马共和国科隆港，科隆位于巴拿马运河北口大西洋（加勒比海）入口处，是巴拿马第二大城。港湾内筑有长长的防波堤，尽管海上波涛汹涌，舰船驶入港内即感到风平浪静，实为优良的避风港。舰队在科隆港停留三天，受到了当地侨胞的热烈欢迎，然后通过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运河是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要国际通道，全长81.2公里。运河于1914年竣工，1920年正式通航。运河未凿通以前，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必须绕道南美大陆南端。运河的开通，可缩短两大洋航程一万多公里。

巴拿马地峡，地势起伏，山峦重叠，运河和两洋之间的水位不是处于同一海平面上，因此它建成水闸式以调整水位差。运河共有六座水闸（两端各有三座水闸）船只通过运河时，先开进河口，即山脚下第一个水闸里，水涨船高，当水位平了第一道水闸



1946年4月下旬，中国舰队返航回国途中，经加勒比海进入巴拿马运河。图为舰队通过巴拿马运河时的留影。

时，闸门开启，在电动机车的曳引下，舰船就进了上一级水闸，过了三道水闸后，驶过天然湖和运河通道，来到另一端船闸，再经过三级水闸逐级下降至太平洋海平面，进入巴拿马海湾的巴尔博亚港。历时约八小时，我们舰队顺利通过了巴拿马运河。

以运河为中心，两岸1400多平方公里的地带被划为运河区、归美国管辖，美国在运河区设有政府、军队，并悬挂美国国旗。

舰队在巴尔博亚海港停留了数天，对巴拿马共和国首都巴拿马城进行了友好访问和慰问华侨活动。部分官兵受到了巴拿马总统的接见。我们在巴拿马城游览时，看见许多不同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各国海员和游客蜂拥而至。在市中心的广场有为纪念修建巴拿马运河工人的方尖碑。运河从城市边缓缓流过。运河区与巴拿马城间划有明确的边界。在运河区一边悬挂着美国国旗，为美国法律管辖，巴拿马人不得随意进入。

访问墨西哥合众国

中国舰队在巴拿马访问结束后，离开巴尔博亚港，进入太平洋，沿着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诸国海岸向北航行数日，于5月初到达墨西哥合众国南部太平洋岸阿卡普尔科海港。海湾呈半圆形，城市沿海湾而筑，依山傍水，景色秀丽。到达阿卡普尔科港的当晚，我们在电影院里观看放映的新闻短片，银幕上出现了中国舰队上午抵达阿港时受群众热烈欢迎的镜头，其工作效率之高，令人惊叹。林遵指挥官率领部分官兵去首都墨西哥城作官方拜访，并慰问华侨，墨西哥总统亲自在总统府接见。

墨西哥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是印第安人古代马雅文化中心之一。十六世纪初，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21年获得独立。墨西哥人大半为印欧混血种，西班牙语为国语。我们见到墨西哥人的典型脸型是扁脸、浓眉、大眼，宽鼻厚唇，皮肤呈淡棕色，表情忠厚。墨西哥人酷爱仙人掌，把仙人掌视为民族的象征，墨西哥的国旗国徽及许多建筑物上，都有一只神鹰，雄踞在一棵仙人

掌上的图案。我们在阿卡普尔科城的公园、山崖以及居民的庭院中，到处看见各种形状的仙人掌。人们把墨西哥称为“仙人掌之国”。

我们在阿卡普尔科港，观看了悬崖跳水表演。跳水者站在高约三四十米的海边陡峭的山崖上，纵身跳入海湾，姿势优美，动作惊险，令人赞叹。

重返美国西海岸

中国舰队在墨西哥停留数天后，继续向北航行，于1946年5月中旬，到达美国西海岸圣迭戈军港。去年4月，我们初到美国，曾在此港登岸换乘火车去迈阿密。舰队在圣迭戈停留约20天，进行检修并补足舰船零部件、油料和生活副食品，做好横渡太平洋的准备工作。

舰队还去洛杉矶作了短暂的停留，我们还有幸参观了影城好莱坞。好莱坞幽静美丽，有名的八大电影公司分散建立在青翠的山谷中。在一家大戏院门前，我们看见保留有大明星的手印、脚印和签名的水泥地。我们特别访问了洛杉矶的唐人街，受到了侨胞们的热烈欢迎。唐人街位于闹市和郊外山区之间，街面大半为西式楼房，也有朱门碧瓦、画栋飞檐的中式房屋，店铺多半是餐馆、杂货店和纪念品商店，街面整洁繁华，已成为市内一旅游区。在一些纪念品商店门前悬挂着彩色的中国宫灯，女店员身穿色彩绚丽的唐代妇女的服饰，足着绣花鞋，笑容可掬地接待顾客。店内中国古玩瓷器琳琅满目，鲜艳的丝绸闪闪发光，在一些餐馆的门前，斜挂着丝制的三角黄色酒旗迎风招展，表现出中国古代酒店的风情。

老华侨还向我们介绍了早年美国华工的苦难辛酸史。19世纪中叶，华人陆续到达美国西海岸，早期华工大都是作为猪仔被卖到美洲的契约华工，当时美国西部还是未开发的不毛之地。最初，华工们从事开采金矿、煤矿、修筑铁路、开垦荒地等工作，这些都是白人们所不愿干的最艰苦、最累、最危险、最脏的工作。单

是参加修筑铁路的华工即有四五万人之多，在筑路中因意外事故和病死的即达一万多人。华工对开发美国西部做出巨大贡献，可是华工们得到的却是饱受压迫与剥削，他们收入微薄、生活艰辛，死亡累累。太平洋铁路和垦荒工程完成后，大批华工失业，生活无着，才大量转向洗衣业。到19世纪末，加利福尼亚州即有七万多名华人从事洗衣业，洗衣成了美国华侨最普遍的职业。早期洗衣店都设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或小木屋里，洗衣华工每天工作10多小时，由于整日泡浸在水中和长久的站立，多数人患有风湿症和静脉曲张症等慢性病。美国华工不但遭受经济上的压迫，而且还受到种族歧视和政治上的迫害，美国多次掀起排华浪潮，制定排华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华侨在美国的处境有所改善，但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仍然很低，多数华人仍只能从事餐馆、洗衣仆佣等服务行业。

檀香山华人赤子心

1946年6月初旬，中国舰队离开美国西海岸，开始横渡太平洋，于中旬到达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第一大城檀香山。

檀香山（Honolulu，音译为火奴鲁鲁，在夏威夷语中是“避风港”之意，檀香山是当地华人沿用的名称）位于夏威夷群岛中的瓦胡岛东南岸，地处太平洋中心，是航海、航空必经之地。这里原是夏威夷王国的首都，1900年成为美国领地。檀香山是多民族杂居地区，除本地土著波利尼西亚人外，华侨和日侨占到半数以上，其余为白人、菲律宾人等。19世纪中叶，大批华工到此地，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华人事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华人在当地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中国舰队到达檀香山，当地政府官员和众多侨胞聚集在码头上欢迎。他们高声呼喊着：“阿洛哈！阿洛哈！”后来，我们才明白“阿洛哈”一语是夏威夷语“你好、欢迎”之意，这已成为一句“世界语”，夏威夷的代称了。一群华侨少女登上军舰，按照夏威夷的习俗，在我们颈上挂上花环。当晚，檀香山华侨团体为祖国

舰队来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招待会。

次日上午，许多侨胞驾驶着自家的小汽车来接官兵们去赴家宴或游览，小汽车在码头上排成了长龙。我们在哈瓦那很少见到华侨有小汽车，从这点可看出檀香山华侨要富裕得多。

檀香山是孙中山先生早年求学和发起兴中会的地方，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华侨们的积极支持。在抗日战争期中，华侨同仇敌忾，踊跃捐款捐物，许多华侨青年还回国参加抗战，有的战死沙场。

在侨胞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著名的伊奥兰尼学校。这是孙中山早年在檀香山求学的母校。学校座落在市中心，四处绿树成荫，环境清静。乳黄色的校墙上漆着白底红圈的校徽，校徽中央是两把交叉着的钥匙，意在勉励学生努力学习，打开知识宝库的大门。孙中山在此校毕业后，还进过当时最高学府奥休学校深造。檀香山是孙中山的第二故乡，他深受华侨的崇敬。

一位姓陈的老侨胞对我们说：“祖国的强弱，与华侨的地位休戚相关。海外华人时时刻刻都关心着祖国的命运，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华侨衷心期望祖国从此走向民主繁荣富强，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海外华人才不会受人歧视。”

我们还游览了有名的韦基基海滩(waikiki Beach)。夏威夷地处热带，因受海风调剂，四季如春。韦基基海滩是游泳与冲浪胜地，这里椰树成林，沙平如镜，人们躺在细沙上享受着阳光和海水沐浴。我们还欣赏了夏威夷草裙土风舞。一群棕色皮肤，黑发披肩的夏威夷少女，穿着彩色泳装，显露出少女的婀娜身材，胸着挂着大串花环，腰间系着草裙，在吉他、小鼓等乐器伴奏下，在沙滩扭动腰肢，轻摇双臂，缓缓移动，舞姿优美动人。一曲终了，游客们纷纷上前与跳舞姑娘们合影留念。

凭吊珍珠港战场

舰队在离开夏威夷前，驶入举世闻名的珍珠港进行技术检查和补充给养油料。

珍珠港是一个天然良港，具有20多平方公里的水域，可以停泊巨轮。因曾在海湾发现过带珍珠的牡蛎而得名。1900年归属美国，以后改建为美国海空军基地，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驻地。1941年12月7日，在日本的精心策划下，日本海空军偷袭了珍珠港，因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这就是震动世界的珍珠港事件。

一个曾经历了珍珠港事件的美国海军军士长向我们讲述了当时战争情况：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亚洲为12月8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共有80多艘军舰停泊在珍珠港，其中有战列舰八艘，巡洋舰七艘、驱逐舰五艘、潜艇五艘。在日海空军的偷袭下，美国损失惨重，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大型战舰被击沉18艘之多，飞机损失数百架，美军伤亡达3000多人。

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被击沉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仍然躺在港内海底，它的一个炮塔还露出水面，已长满了铁锈，这艘战列舰有1177名海军官兵阵亡，大部分尸体仍困在舱内，未能打捞起来。

12月7日，美国把日本偷袭珍珠港这天，称为“耻辱日”（Day of Infamy），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对日作战。美国人痛定思痛，全国人民奋起，同日本苦战，终于和其他盟国一起，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洗雪了耻辱。制定和指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日本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也在太平洋空中被击毙。

战后的东京

舰队离开夏威夷群岛，下一个航行目标是经中途岛到日本东京湾。途中，遇到了太平洋夏季台风的猛烈袭击，各舰官兵群策群力，与台风作了生死搏斗，度过风险。舰队在中途岛停留了短暂停间，即直驶日本东京湾。

由于即将进入日本国土，我们的心情特别复杂。只要一想到抗战八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无不切齿，积恨难消。虽然，日本已投降，我们已不能亲手去杀死日本鬼子兵报仇雪恨，但我们要在日本侵略者的国土上重重踩上几脚，

方解心头之恨。这次，中国舰队是以战胜国的姿态，首次出现在日本东京湾，真是一洗百年国耻，令人扬眉吐气。

1946年7月2日下午，中国舰队驶抵日本横须贺军港。该港扼东京湾口，以前是日本海军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现在港内停泊的全是美国军舰，那些曾称霸一时的日本军舰大部已在太平洋战争中被击沉，幸存的少数军舰，已被盟军收缴封存，不准日本再有武装舰艇。我们站在甲板上眺望着横须贺港码头以及后面的城市，只见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日本本土进行了猛烈轰炸，日本的重要城市和港口，都遭到极大的破坏。

到横须贺港后，指挥部通知，各舰官兵分批去东京参观访问。我们从横须贺港乘直达东京的火车，从车窗望去，沿铁路线到处都是被炸得七歪八倒的建筑物，田野上还遗留下许多深深的弹坑和烧焦了的树木。到了东京，这种被战争破坏的景象更加触目惊心。东京车站的圆形屋顶完全被毁坏而剩下几根骨架，车站周围几乎没有一座完好的建筑物。另一个突出的印象，车站来往人群，大半是老弱妇孺。战争时期，日本青壮年都被强征去充当炮灰，千万青年被战死，造成了战后日本青壮年男子奇缺。日本人衣衫褴褛，生活极端穷困，许多人向我们乞讨。还有一些小贩拿着骆驼牌香烟和美军罐头在作黑市交易。

我们中国海军精神抖擞地走出火车站，走的是盟军专用通道，备受尊敬。在街上日本人站在一侧鞠躬敬礼。华侨们笑逐颜开，手持中国国旗列队欢迎。

在东京，我们看见许多街区都被炸成一片废墟，到处都是一堆堆瓦砾。盟军驻日占领军总部设在一幢劫后幸存的大楼里，楼的对面是天皇皇宫的护城河。在总部周围已新建起酒吧、餐馆、商店，显然这些都是为美军服务而赶修起来的。

在东京旅日华侨总会的欢迎会上，劫后余生的侨胞一看见我们，就像遇见久别的亲人一样，抱住我们痛哭，倾诉他们遭到日

本军国主义迫害的惨痛遭遇。一个姓刘的中年侨胞对我们说，七七事变以后，华侨的商店被勒令停业，财物被没收，华侨男子被强征到矿井或军工厂做苦工。他在矿井里苦熬了八年，受尽折磨，侥幸活下来。

东京的侨胞对中国舰队来日本慰问华侨，感到极大的欢欣，他们说：“中国胜利了，强大了，日本人再也不敢欺侮中国侨民了，只有祖国繁荣富强，侨民们才能挺起胸膛做人。”

八舰官兵回国后的去向

1946年7月中旬，中国舰队离开日本东京湾，直航上海。

官兵们即将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莫不感到欣喜万分。当军舰驶入东海海域，大家聚在甲板上，凭船舷眺望着波浪滔滔的海面，心潮起伏。近百年来，各国列强凭借着军舰和大炮侵入我国，欺凌压迫我们，中国军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次殖民地国家了，决不能再让帝国主义的军舰在中国领海横行霸道了。当我们远远地望见海平线出现了陆地时，大家欢呼跳跃，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7月19日，舰队进入长江口到达吴淞口外，原定在上海作短暂停留，突接南京海军司令部来电命令：“玛米”号驶往青岛，八舰直航南京。7月21日，八舰驶抵南京。照理说，这支从国外学成归国的海军舰队回到首都，是一件喜事，按照习惯和礼仪，军政官员和亲朋好友必到码头迎接。因此，旗舰“太康”舰长梁序昭命令官兵换上洁白的军服，列队站在甲板上，翘首等待。可是，当八舰进入南京长江面时，得到命令在江中抛锚停泊待命，下关码头冷冷清清，不见欢迎的人群，这一反常现象，使官兵困惑恼怒，连舰长也不知究竟。

其实，南京海军司令部对归国八舰之所以采取这种形同隔离的防范措施，是有其原因的。当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

招考选拔留美海军人员时，是费了一番苦心。当局长期望这批出国学习的海军学兵，学成归国以后，能成为其嫡系力量。谁知事与愿违，这批学兵居然在美国集体绝食罢课，反抗政府，蒋介石闻知此事，大为震怒，下令彻查严办。被押解回国的八名士兵至今还关押在南京军事监狱。虽然在当局严厉的镇压下，罢课风潮得到平息，但是，学兵们思想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却难以消除，许多人已公开表示：回国后即退役，脱离海军。当局对学兵这些思想情绪，忧心忡忡，很不放心。这批回国学兵，文化水平高，在国外学习两年，见多识广，是颇难对付的。事前，海军高层人士预先作了策划部署，以预防攻心为主。八舰在长江中抛锚停泊后，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陈诚亲自两次接见八舰士兵代表和全体士兵。士兵代表向陈诚陈述：当初，青年学生是为抗日而从军，现在抗战已胜利，任务已完成，要求政府准许退役复员复学，同时要求释放无辜被押八名学兵。陈诚向大家讲了话，大意是：政府花了许多心血与金钱，送你们出国学习现代化的海军技术，期望你们学成回国建设海军。现在，抗战虽然结束了，但国防力量还要加强，海军要重建，国家正需要你们出力的时候，怎么能一回国就要求退役，这是决不允许的事。你们要打消退役的念头，立志在海军中干一辈子。政府很重视你们，蒋委员长很关心你们，你们好好干，都有发展前途。他还宣布：他已责成海军部人事署，立即从士兵中提升一部分为海军军官，以后还将从八舰士兵中抽调一部分人去青岛中央海军训练团，进行短期培训后，即提升军官。就是暂时未能提升军官的，每人在现有军衔的基础上，普遍提升一至二级。陈诚严厉告诫：如果有人不听话，擅离职守，私自开小差者，政府当以逃兵论罪，通缉归案，给予军法严惩。

陈诚的两次接见与讲话，在八舰士兵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响。有的人认为陈诚用蜜糖和恐吓两手，实际上是拒绝学兵复员复学的要求；有的人也产生幻想，认为在海军干是有前途的；有的人想退役，但又害怕通缉法办；有的人想到退役后也难找到合适工

作，还不如留在海军中混混，看一看再说。

在陈诚对八舰士兵讲话不久，海军又发生了重大人事变化。蒋介石任命桂永清为海军代总司令。此项任命在海军军官中引起了震动。历来海军总司令都是由海军中有资望的人士担任，从萨镇冰到陈绍宽都是海军科班出身的海军宿将，现在却突然任命陆军出身的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是江西人，黄埔一期学生，参加过北伐，后去德国学步兵，回国后担任过教导总队队长，是复兴社骨干。他一直在陆军中任职，根本不懂海军，只因他是蒋介石的亲信嫡系，才被委派来当海军总司令。他一上台就施展政客手腕，排除异己，安插亲信，把原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几十年扶持起来的“马尾系”人员调离重要岗位。八舰指挥官林遵及其下属一部分军官也是马尾系的，他们感到不安。果然，桂永清上台后，就宣布撤销八舰舰队编制，将林遵调离，并对八舰进行大刀阔斧的整编，整编的方式有几种：一部分人上调海军司令部；一部分人在八舰中互相调动；一部分调离八舰，分散调到青岛、上海、宁波、舟山群岛等地；一部分还远调台湾、澎湖列岛。与此同时，补充一些军官和新兵到八舰。经过这样整编，原来八舰从组织编制到人员却被打乱分散，原“八舰”作为一个集体，已不复存在了。

就在对八舰人员调整期间，因罢课事件被关押在南京的八名学兵得到释放。当局的“宽大”处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后来，根据各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分析，八名学兵得到释放是多方面的原困促成的。

八名学兵被押解回国以后，当局几次审讯，找不到他们是共产党或受共产党利用的任何证据，于是案件拖延下来。

据知情军官透露：罢课事件结束后，美国海军部为此事作了调查，写出情况报告，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海军士兵发生罢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行为，引起学员的普遍不满所造成。报告中还表示美国对中国海军的腐败不满。据说，

此报告的副本，也送给了中国政府。当局不能不顾到美国的舆论，而更感到此案棘手。

再有，八舰学兵中有些人的父兄、亲友是政府中的高层人士，学兵们反对贪污举行罢课的事传到国内后，引起了种种议论，有的仗义执言，有的活动关系，呼吁释放被捕学兵，当局也不能不有所顾虑，有所牵制。

八舰学兵一致强烈要求释放无辜被捕八名同学。他们说现在罢课风潮已成过去，学兵已完成学业接舰驾驶回国了，如果此事处理不好，可能再度引起八舰士兵不满情绪，造成更大的损失。

有了这些种种因素，当局只有不了了之，以安定军心。

对于潘佑强等人的克扣贪污士兵差旅费行为，当局既不敢公开，也不敢去追查，噤若寒蝉，这也有其难言之隐。在抗日战争期中，国民党军政官员在印度和国内大肆贪污盗窃同盟国援助中国抗战军用物资的事已成风气，已是众所周知的事。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就公开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不满。潘佑强将克扣的钱买成洋货运回国内，各方的人士都分到了油水，还可能牵涉到更高层人士，如果追查下去，那岂不是自我大暴露，自己拆自己的台，因此当局只有捂住盖子，不敢深究。据后来了解到事实的真相是：潘佑强等人将克扣学兵在印度的差旅费的数万美金，由林科长在印度买成洋货，用卡车运回昆明，转手倒卖，从中赚了一大笔钱，然后又以结余名义，以外汇官价折合成法币，上缴军事委员会，他们自以为手段高明，这样，既肥了私人腰包，又捞取节约上缴的好名声，一箭双雕，名利双收。但想不到走漏了风声，传到了国外学兵耳中，引发了一场反贪污罢课的轩然大波。

尽管海军当局费尽心机，软硬兼施，企图稳住八舰士兵的军心，但收效甚微。学兵们回到南京以后所见所闻，使许多人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专制独裁和媚外误国，国内经济凋蔽、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最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政府不顾广

大人民要求和平，重振家园，建设国家的愿望，迫不及待地全面发动内战，使人民再度陷入战乱之中。大家也得到消息：海军司令部也正在策划部署把八舰推向内战的前沿。当初，青年学兵们抱着抗日杀敌、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参加海军，现在怎能去屠杀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这完全违背了八舰官兵的初衷，简直是一幕历史悲剧！许多人不顾当局通缉的危险，陆陆续续离开了海军，各奔东西。我们几人也在回国不久，即从海军中开了小差，从此脱离了国民党海军。

原八舰指挥官林遵，在中共政策感召下，于1949年4月23日率领第二舰队在长江下游笆斗山附近宣布起义，毛泽东、朱德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此次起义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永定”舰参加了起义，但舰长却率舰逃走。

永兴舰1949年5月在上海起义。在驶往南京的途中发生变化，领导起义的骨干被打死在驾驶室里，军舰被劫持到上海，又逃到台湾。在厮杀中，反对起义的舰长陆维源也被击毙。后来台湾当局乃将“永兴”号易名为“维源”号。

还有些八舰官兵，分别参加了其他舰艇的起义。

八舰官兵中，一部分人去了台湾、香港及海外各地，大部分留在大陆参加了祖国建设。

后记

“八舰”这段历史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当时的年轻水兵，如今都已霜染两鬓，年近古稀，有的已经离世长辞了。回忆过去风风雨华，如烟似梦，不胜沧桑之感。从抗日战争后期，“赴美接舰参战学兵总队”组建，到出国学习，直到抗战胜利后，接收八舰驾乘回国，历时近两年。这在中国海军发展史上是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但长期以来，这段历史却被淹没，其中丰富曲折的经历，鲜为人知。我们都曾是“八舰”学兵，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

的全过程，感到有责任按照当时实际，反映出这段历史的真实过程，为中国海军发展史留下一段史料。

这里所记述都是真人，真事，并尽可能查对了历史资料。但由于我们当时只是年轻的学兵，有一定局限性，而且记述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难免有不准确和错误之处，敬请有关人士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原八舰官兵各自东西，分散在世界各地。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人参加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了作用；也有一部分人去了香港、台湾和海外各地。近年来，许多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原八舰人员纷纷回到祖国探亲、参观、访问，有的还回国投资、定居。大家白发重聚，共忆往事，缅怀当年抗日从军豪情，旧情依依。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热爱祖国，期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期望祖国繁荣昌盛，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93年4月

记抗战时期的记者学会战地服务队

任是军

抗日战争的第二年，有一支记者队伍，活跃在黄河两岸，从山西南部的中条山区转战到太行敌后根据地。这支队伍就是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战地服务队华北一支队（简称青记一支队）。它是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总会）组织的一支新闻服务队伍。

这支队伍的记者和当时许多战地记者的生活是不相同的。到战地采访的记者，都是由所属的报社、通讯社派遣出来，在战地兜一圈，完成采访任务后，就仍然回到所属新闻单位，有固定收入；即使是在战地长期工作的新闻工作人员，他们都在所属的单位享有各种待遇。这支记者队伍的人，既不是大后方某个新闻单位派出来的人员，在到太行以前，也不属于战地的任何组织，领导他们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远在重庆，除了给这支队伍命名，确定几项任务以外，只能在通信中作些指导，寄些总会出版的读物。因为当时总会的经费也很困难，不可能在这方面给予援助，所以他们长期在战地生活，吃饭穿衣等一切费用都要自己解决，一切关系都要由他们自己去建立，工作局面要靠他们自己去打开。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条山战区坚持了两年，完成了总会给他们的发展会务、从事战地新闻服务、采访与写作战地通讯这些任务的。他们不仅在国民党战区的复杂形势下 艰难的环境中锻炼了自己，而且还经历各种险阻，到达了敌后根据地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所以把这支记者队伍说成是游击式的记者队伍也

是合适的。

这支记者队伍前后有14人，除五人因为各种原因中途折回后方外，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与负伤者超过半数，其中在太行1942年5月大扫荡中，在战场上牺牲的就有萧炳昆和陈达。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是1938年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的新中国新闻界抗日救亡团体，也是共产党在新闻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和各个解放区都有它的分会。它在团结争取帮助新闻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方面起过许多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有过自己的贡献，它在中国的新闻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这里记述的青记一支队的简单经历，只是为了反映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整个工作的一个侧面。

甲、建队前后

青记一支队的绝大多数队员是从四川省会成都出发的。其中第一批五人：蒋慕岳、冯诗云、任冰如、黄是云和罗宛萍，原是青记学会成都分会的会员。他们从成都出发，前往华北战地的时间是1938年12月2日。

出发前，任冰如是成都《新民报》的见习记者，中共党员。他急于北上抗日，来不及向党组织请示就出发了；1942年在太行区才重新入党的。黄是云和罗宛萍原在成都《时事新刊》工作。《时事新刊》的前身是《国难三日刊》，这两份报纸是抗战初期成都著名的进步报刊，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黄在该报任记者，罗作发行。蒋慕岳和冯诗云原在成都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星芒报》和《蜀话报》工作。蒋是中共党员、成都著名救亡群众团体“星芒社”社长。《星芒报》由胡绩伟主编，是“星芒社”出版的，在成都和川西一带影响较大，销量超过成都各报。1938年夏天，《星芒报》遭国民党查封，9月又以《蜀话报》名义出版。

他们五人前往华北战地，是由青记学会成都分会组织的，是

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简称督导团）一道出发的。

青记总会由范长江、徐迈进主持会务。武汉撤退后，总会迁到重庆，日常工作初期由冯英子处理，后期是莫艾；总会的党组书记由南方局指定学会常务理事徐迈进担任。

1938年夏初，总会理事傅于琛任成都《建国日报》总编辑，协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筹组青记成都分会。分会成立后，曾约请路过成都的国民参政员王明、林伯渠、吴玉章、钱公来作过报告。11月中旬，又约请路过成都的督导团团长雷鸣远作报告。当时主持成都分会会务的是傅于琛，解放后，他在华东局和上海市任职，1984年病故。分会理事内有中共党员王达非、唐徵久、蒋慕岳等人，出头露面的是分会理事、川康通讯社总编辑刘克俊，川康社是当时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办的。

雷鸣远的随行人员中有个刘益，曾参加青记总会的成立大会，并为总会会员，与范长江、傅于琛都认识。到成都后，刘益去找傅于琛说，是否可以组织一个战地记者采访团，随督导团一道去华北战地活动，如果傅同意，能否动员成都分会的会员参加。在此以前，总会已向各地分会发出过号召，希望组织新闻从业人员到战地去，到敌后去。所以傅与分会的理事商量后，同意了刘益的请求，并在雷鸣远报告后即席发言，希望到会的会员报名参加记者采访团。原来报名的有十多人，由于时间仓促，成行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五个人。

1938年下半年，要从四川到延安，走路已经比较困难，川陕路上不仅有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盘查，还有成群的土匪抢劫来往商旅。从成都到西安的路费，许多青年学生也花不起。督导团在成都公开招考团员，就有不少学生前往报考，有的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去延安，有的是想只要能出川抗战，跟着这个团到了西安再说。这五位记者也多少有这个想法。组织记者采访团的事，出发时并未形成。临行前，青记成都分会开了欢送会。12月3日川康

社还发了一则新闻，报道这五位记者北上去战地采访的消息。

总会的决定

这五位记者随同督导团到了川陕路最后一站宝鸡，蒋慕岳向青记总会写了一封长信，报告这一路对督导团了解的情况。信中提出，不能和督导团一起共同组织采访团，而应由总会直接组织战地新闻服务队伍的建议。这五位记者到西安时，蒋慕岳就从西安分会那里得到总会的复信。复信是由范长江和徐迈进签署的。复信指示蒋慕岳把成都出发的青记会员组成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华北战地服务队，受总会直接领导，由蒋慕岳任队长。他们五个人就在西安用了青记学会华北战地服务队记者的名义印了名片，并用这个名片在西安、洛阳采访。洛阳《行都日报》还登过青记学会华北战地服务队到洛阳活动的消息。

时隔不久，蒋慕岳又收到总会寄来的第二封信，大意是：名称问题，要略作改变。原确定的是：“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华北战地服务队”，现改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战地服务队华北一支队”。它的任务是：一、在华北战地和敌后作新闻服务工作，协助战地和敌后的军民，办抗日救亡的报刊；二、采访华北军民艰苦抗战的事迹，向大后方的报纸和通讯社供稿；三、开展青记学会的会务。服务队所在的地方需要建立青记分会的，可以协助当地的新闻单位进行组织。

建队前的准备

收到第二封信后，蒋慕岳就着手筹建青记一支队：印制了主要证件，包括护照、印章、信封、信纸等。青记一支队的护照，以后不仅能在黄河两岸通行，还能在川陕路和鄂豫等地通行。

1984年5月，任冰如、黄是云曾在北京访问过徐迈进，叙谈往事。徐迈进说：他当时是青记总会的党组书记，建立青记战地服务队这件事是他亲手办的，经过青记总会批准，并由他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汇报过，是向南方局备了案的。他说：当时总会对派遣战地服务队到敌后去是非常重视的，因为总会有这样

一个打算：不仅在华北组织战地服务队，在华东、华南也准备组织这样为战地新闻服务的记者队伍。他最后还说到，青记华北一支部在抗日战争初期所起的作用很有意义，应该把它的经过写出来。

1938年底到1939年初，西安那时的情况还比较好，“生活书店”等还能出售各种进步书籍，如《斯大林选集》、《政治经济学》等。西安街头书摊还能公开出售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

督导团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建立了团部。在到达西安后，它的大队长曾当众宣布：五位新闻记者可以自由行动。这五位记者一方面对西安的进步团体有些接触，一方面与督导团内部的人员也有一些交往，特别是成都招考来的大批学生到来以后。

蒋慕岳在西安这段时间，除和西安青记分会有联系外，还访问过西安《老百姓报》和《西北文化日报》的负责人，了解了西安新闻界的一般情况，并和战地文化服务处建立了工作上的联系。战地文化服务处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的，三厅厅长是郭沫若。西安、渑池、洛阳、郑州等地都设有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分处。蒋慕岳到西安分处去时，不仅认识了西安分处的吴从征、马浩，还见到了渑池分处的黄一修、杨抑，郑州分处的林冰等人。在1939年和1940年，青记一支部和洛阳、郑州分处的人都有一些来往。战地文化服务处渑池分处因为临近中条山，曾经是这些记者们来往于中条山、陇海路的落脚点。

蒋慕岳还向战地文化服务处借来许多敌后出版的报纸，比较多的是新四军各支队办的石印、油印报纸，在督导团驻地举办了一次敌后报纸展览。由于当时的形势还没有完全逆转，这些报纸又是从战地文化服务处借来的，所以能够在督导团内举办这个展览。这次展览既进行了抗日宣传，扩大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也给这些办展览的记者开阔了眼界。当他们看见新四军用油印出版的《拂晓报》比国民党区域的铅印报还好时，受到很大的启发。这对他们后来在战地办石印、油印报纸是有很大帮助的。

督导团在成都招考来的学生中，方德是中共党员，他曾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星芒社”的工作，在成都和蒋慕岳认识。他的同乡、同学陈达、陈泽然、陈曼兮都在成都的师范与高中学校学习，先报考了督导团，后才和他谈这件事，方曾经加以劝阻，这些青年人出川抗战心切，与其他许多学生一样，怕错过这个机会。方德在报上看到五位记者出发的消息，见有蒋慕岳的名字，后来他才同陈泽然等一起报考了督导团。

督导团在成都招考的学生有百人左右，由副团长李仲三率领，称作督导团二团，前一批出发的四五十人称作一团。二团在行军路上，得知李仲三是要带领他们去河北民军张荫梧那里，张荫梧是反共的摩擦专家，臭名远扬，所以二团到了西安，由方德等酝酿的不到河北民军去的主张就公开提了出来，他们与五位记者接触后，又提出要跟着一团去中条山，雷鸣远被迫同意。二团中随李仲三去河北的只有二三十个人。方德、陈达、陈泽然、陈曼兮，还有刘驰兮都留在一团，经过蒋慕岳的同意，吸收他们参加了青记一支队。方德与任冰如是四川省立师范同学，他和任冰如一样，没有带组织关系就出川抗战了，到太行后重新入党。

督导团一团中，有两个贵阳大夏大学学生，萧炳昆和商学礼，他俩是贵州党组织被破坏后第一批参加贵州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1938年夏天，大夏大学的民先队被破坏，他们到了重庆，找到曾在大夏大学任教的孙起孟（孙是《国讯》杂志的主持人），后又认识了“战时教育社”的戴白韬。当时督导团由武汉到重庆，并在重庆招考团员，戴白韬劝他俩参加督导团北上抗战，他俩在川陕路上就和五位记者多次接触，并向蒋慕岳讲了督导团的一些复杂情况，还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说跟着这样一个团体不知会走到什么地方去？到西安后，他俩与蒋慕岳的接触更多，后来知道蒋在筹组青记一支队，提出愿意参加，经蒋介绍成为青记一支队的成员。

这七个人中除刘驰兮外，他们到西安后，都是想到延安去学

习的。曾分别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探询、请求过，办事处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劝他们现在不要去延安，还是到敌后去，他们从五位记者那里了解青记学会的性质与任务后，特别是方德对蒋慕岳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中所进行的工作早有了解，所以他们就汇合到这支记者队伍里来。这样，青记一支队就有了12位成员。

青记一支队的成立

督导团是1939年春节前离开西安的。当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风陵渡，经常隔着黄河炮轰潼关，火车经过潼关时，往往要停下等待夜间通过。督导团乘的那列火车，早晨过了华阴，就在一个小站停留，督导团的人都纷纷下车各寻去处。青记一支队的人，按着蒋慕岳的通知，到附近村子一家老百姓的院子里聚会。由方德、陈泽然、陈达刻蜡板翻印总会章程和会员登记表，因为参加青记一支队的人，都必须是青记学会会员，要填写会员登记表，履行入会手续。

从成都出发的五位记者，已经是会员，虽然当时也是督导团的团员，督导团内从上到下都承认他们是到战地来采访的记者。1939年夏，黄是云在中条山受枪伤后，督导团把他护送回成都，还是去找青记成都分会接受的。后在西安参加的七个人，原来不是青记会员，所以还需补办这个手续。他们七个人在督导团内没自己的公开身份，所以，这次活动是避开督导团的，借白天停车的机会，办理了新会员的登记，宣告了青记一支队的正式成立。

这12个人中，男的10人，女的2人（陈曼兮、刘驰兮），年纪大的24岁，小的16岁。他们当中少数人做过新闻工作，多数人没有做过。他们当时确实是朝气蓬勃的。蒋慕岳任青记华北一支队的队长是总会指定的，参加这个组织的人要经过队长同意，但离开这个组织却没有什么约束。这个队伍以后的进程中免不了出现一些小的分化，但它绝大部分的成员，还是在抗战中坚持到底的。

这次新会员填写的登记表，都报送总会批准。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第一期上，在王文彬所写的《长江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一文中，附有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名单的部分影印件，方德（原名陈仲民）、萧炳昆等人的名字，就列在了这个表上。

雷鸣远和督导团

雷鸣远是比利时人，天主教神父，早年由罗马梵蒂冈教庭派来中国，他在天津与河北等地传教多年，1927年加入中国籍，是天津《益世报》的创始人之一。雷会说一口中国的北方话，以爱国自诩。

七七事变后，他组织天主教徒救护队，帮助国民党第三军救护伤员，抬运担架。雷鸣远有时也亲自参加。当时的报纸对他的这种行动有过报道，使雷成为抗战初期的抗日爱国人士。三军军长曾万钟委任他为该军卫生连长。1938年夏，蒋介石电召雷鸣远去武汉，委任他为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的团长，这个团隶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雷在武汉时，曾在不少场合作过报告，武汉的各报都有报道。雷在成都时所作的报告，基本上是讲前方战士如何英勇抗战，他和一些天主教徒如何救护伤员。一个宗教界的外国老人，讲他亲身救护抗日战士的事迹，在当时是颇能鼓舞人、打动人的。

雷率督导团一团到中条山，就驻在第三军防区里。三军是蔡锷云南起义时留下的底子，他的中下级军官中，还有一些那时的老兵，虽然他们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比其他地方军要靠近一些，但和嫡系部队毕竟有些不同。

1939年夏，蒋介石再次电召雷鸣远到重庆，可能是催促他去河北。青记一支队的人和督导团决裂后，1939年雷鸣远才率督导团去晋城，后来他带了几名修士到九十七军朱怀冰部，朱怀冰是在河北与八路军搞摩擦站不住脚才转到河南武安一带。1940年初，太行我军向进攻根据地的朱部发起反击，歼灭朱军大部，俘虏了

朱的军部人员，包括雷鸣远和他的修士在内。雷受到八路军的优待，不久，他就从一战区转往重庆，1940年末他在重庆病故，开追悼会时周恩来还送了花圈。

雷鸣远率领的督导团是一个复杂的团体。在武汉、重庆招来的40余人中，除萧炳昆、商学礼是进步的大学生，还有一些跟随雷鸣远的修士外，这里面有冒充诗人的骗子，有自吹当过东北义勇军的瘪三，有说自己是上海滩的大力士，后来往返于晋南、西安，做走私买卖的翁康亭，还有曾作过国民党宪兵的唐剑秋等。这几个宪兵后来在中条山还拐走从成都招来的几名女学生，卖到西安的妓院里。

督导团在西安的头面人物中，有原在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呆过的李仲三、郭鸿群，还有从黄埔军校来的所谓军事大队长，还有从三青团来的官员。三青团那个官儿和大队长一起，在西安时与雷鸣远和他的修士们相互摩擦，闹到公开吵架要枪，结果三青团那个官儿和军事大队长两人敲了雷鸣远一笔钱走了。虽然如此，这个团的总体人数，一多半还是成都招来的大、中专学生。

督导团在中条山时，从它的掌权人来看，也可以说它基本上是个宗教性的团体。在督导团的五、六、七个处里，除秘书处处长是郭鸿群外，其他各处的处长都是雷鸣远的亲信修士，医务室的人也是修女，团的警卫排是由天主教徒组成的。雷鸣远和他的修士们，仍然穿着道袍，并在中条山的驻地搭席棚定期做弥撒，做弥撒时没有要求团员去参加。督导团在中条山期间，雷鸣远和那些修士也没有公开讲过反共的话。除了参加办过一期红枪会训练班，到中条山下几个村子发放过救济物品，此外很少有其他抗战的活动。团内上面腐败，下面松散，不少人无事可干，从西安开始就不断有人想走就走了。雷鸣远死后，这个团也就烟消云散了。

沈醉在《戴笠其人》这本书里，曾提到“雷鸣远用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名义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活动，戴笠除派军

统特务李敦宗、李芳、柴达文等参加进去工作外，还派有两个无线电台随同他们一道，主要是利用天主教对八路军进行特务活动”。督导团内确有李芳这个人，刘益离开后，李芳曾继任督导团政训处处长，1955年全国总工会机关党委为了弄清原在青记一支队一位成员历史问题，经过有关单位，到监狱中提审李芳，他供认在中条山时，督导团认为蒋寨岳等人都不是共产党，但没有抓着证据。军统在督导团内发展特务，是到晋城以后的事。十年内乱中，这些记者又被审查，有个单位又在监狱中找到李芳，李芳说的还是跟十多年前一样。

在十年内乱中，不少人说督导团是个特务组织，参加过督导团的人，不是特务也有特务嫌疑，还有人贴大字报说雷鸣远是国际间谍头子，戴笠曾派军统特务去督导团，并带有电台。打倒“四人帮”以后，就是贴过上述大字报的那个单位，为了彻底弄清原在青记一支队这个成员的历史问题，他们在查阅了国家保存的档案，看了有关督导团的卷宗，得出了这个结论：督导团的发展有个过程，督导团自成立到青记一支队脱离，以至到了十二月事变前这段时间，大权主要由雷鸣远的教徒、修士把持，国民党反动分子和军统分子，在当中也互相争权，但不占主要地位，因而没有进行公开的反共活动，1940年雷鸣远死后，督导团的领导权为军统掌握，它的性质就改变了。

乙、艰苦创业

中条山位于山西西南与陇海路隔河相望，东西长南北狭，西临同蒲路，东接王屋山，南沿黄河，包括芮城、平陆、闻喜、夏县、垣曲、翼城等县在内，是属于当时的第一战区。日本军队只占据着同蒲路和沿线的一些县城，1939年的中条山有四方面的力量：一是国民党部队，基本上都是那时所谓的杂牌军。这些军队和蒋介石都有不同矛盾。抗战军兴，蒋介石就把这些地方军调在

第一线，如四川出来的军队，冬天还穿着单衣草鞋，在战争中牺牲很大，也很少给他们补充。他们与蒋介石的嫡系不同，没有积极反共，有的还多方支持进步力量。芮城、平陆一带是原属西北军杨虎城部的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独立旅旅长孔从周等抗日爱国将领，都在这个集团军里。夏县、闻喜一带是曾万钟兼任的第五集团军。在四、五集团军之间驻防的是川军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中条山的东北面垣曲、绛县一带是十四集团军刘茂恩，原是河南的地方部队，还有过去驻在陕北榆林的高桂滋部。二是阎锡山在中条山区设有专员公署，山区各县、区、村都由专员管辖。三是牺盟会（全称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在中条山区设有牺盟夏县中心区委员会。这个中心区活动的范围与专员管辖的地方相同，山区各县都有牺盟特派员的办事机构。牺盟会是七七事变时，阎锡山在薄一波等共产党人协助下建立起来的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和这个组织同时建立的有抗日武装纵队、工人保卫旅等。在中条山活动的是同蒲铁路工人组成的工卫旅。还有一支政工旅，在同蒲路西面的稷王山活动。四是八路军在垣曲设有兵站，柴泽民等领导的游击队，曾在闻喜、夏县等地活动。

在中条山的国民党部队，都是抗战初期从河北、山西等地转战退到这里来的。三十八军扼守过娘子关，李家钰部在长治等地与敌军血战，曾得到当地群众的帮助，这些部队除三十八军主动下山袭击过敌人外，其他基本上只在山上据守。由于这些军队经历不同，历史各异，在中条山区时又各有各的防区，也就各有各的风气；他们对阎锡山的旧政权和牺盟会，好恶也不一样；阎的专员与牺盟会之间，裂痕也已日益显著。中条山的这种形势，青记一支队未过黄河前是不了解的。1939年初，他们以记者的名义，到几个集团军采访后，才有个大致的概念。督导团在白浪渡口和皇落镇设有接待站，它的活动没有出过三军防区，也没有派人去过其他两个集团军和川军的部队。

青记一支队的人到中条山后，对这个战区的形势有了初步的

了解，又与牺盟会、三十八军、川军等建立了一些联系，由于有这些因素，以后青记一支队才能比较顺利地在中条山单独建立部队，开展工作。

青记一支队的初期活动

到中条山后，青记一支队的记者们，冯诗云、任冰如、罗宛萍、蒋慕岳等曾先后访问了各个集团军，他们在川军采访时，还下到了营连。在这些采访活动中，他们和三十八军有了更多的交往，当时在军部编《新军人》杂志的周延，在军队教导队作教官的贺立，任一七七师师部秘书的柳乃夫，赵寿山的秘书姚警尘，孔从周的秘书何寓础等，都和这些记者从认识到比较熟悉。川军中从上到下，不少人都有乡土感情，对这些四川来的记者，格外的热情。

蒋慕岳还以一支队队长名义到牺盟夏县中心区商洽共同召开晋南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的事。牺盟中心区宣传部长孙久青（孙是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中共党员，以后撤退到太行，在华北《新华日报》工作）当即表示赞同，并与蒋一起去专署办的《三角地带》报社商量，约定以三家的名义联合发起，就是青记一支队、牺盟办的油印报纸《中条吼声》和专署的报纸《三角地带》。1939年5月，在牺盟的驻地平陆的下涧召开了这次座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专署、牺盟、三十八军等各系统办的报纸的负责人。在这次会议上散发了青记总会的章程，讨论了筹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中条山分会的议题，与会的人推荐蒋慕岳来筹办这件事，会议还发表了告晋南新闻工作者的一封信。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在总会出版的《新闻记者》月刊上登载过。从这里开始，青记一支队和夏县中心区委员会之间，建立了工作关系，使这支记者服务队在战地有了一些依靠。

督导团的各处中有政训处，处长是刘益，到中条山后，政训处下设了文化科，由刘益兼科长，蒋慕岳作副科长。青记一支队的人，除萧炳昆在秘书处，陈曼兮、刘驰兮在女团员队伍里，其

他的人都先后聚集在文化科。

由于在西安时看到敌后办的许多报纸，冯诗云等提出是否也试办一个油印报纸。经过刘益同意，由文化科正式出版，这份报纸每期就是一张腊纸大小，定名为《大家看》，由方德、陈泽然、黄是云编辑、印刷。他们把国内外政治时事用口语化加以综合编写，使老百姓、士兵都能听得懂，看得懂。这次尝试对他们以后编辑油印、石印报纸，起了实习的作用。

1939年的夏秋之交，三军一二师政治部、闻喜县牺盟和督导团共同举办过一期红枪会会员训练班。这些红枪会员都来自中条山下的敌占区，是由牺盟会掌握的。去办这个训练班的是闻喜县牺盟特派员干玉梅（干是中共党员，她以后调任平陆特派员，解放后，先任川西民政厅长，后任中共物资部办公厅主任）、一二师政治处负责人许寿真（许是沈志远编的《理论与现实》杂志的撰稿人，是有名的世界语学者，后参加民主同盟，四川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他的遗骨埋在成都青羊宫烈士公墓里），督导团派往这个训练班去上课的是商学礼、方德、任冰如，所以这三方面的人合作得不错。据牺盟会反映，这个训练班还是办得好的，使来受训的人懂得了一些抗日的道理。

七人被捕

1939年5、6月间，雷鸣远去了重庆，蒋慕岳和刘益一道去西安购置办石印报的设备，罗宛萍已准备回四川还没有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文化科七人被捕事件。

七人被捕的远因是：五位记者随督导团出发后，时常单独活动，他们公开使用青记一支队的名义，督导团是有看法的，青记一支队对团内招考来的青年学生也有一定影响，有的人还向蒋慕岳表示愿意参加这支记者队伍，青记一支队的人，对督导团某些腐败的情况早就看不惯；督导团那些头头们，包括雷鸣远在内，对文化科这伙人也越来越感觉是异端分子，只因为他们是记者，又无什么把柄，不便发作罢了。

近因是：日军进攻平陆一带，督导团转移驻地，先让各科在村子里自找住处，后来督导团的事业处长义禄修士，又要强占文化科已经找好的地方，这些记者年轻气盛，互不相让，发生争吵，义禄悻悻离去。就在当天夜半，督导团的警卫排破门而入，将文化科的七个人（冯诗云、方德、任冰如、陈泽然、陈达、商学礼、罗宛萍）绳捆索绑，押送三军军部。

押送到军部时，天已大亮，遇到九十五军邮局吕局长（吕是陕西三原人，在邮局工作多年，这些记者到中条山后，因要和总会以及其他新闻单位联系，曾拜访过他，早已熟悉），他见这种情况，大为惊异，向冯诗云询问究竟，并表示他将去找三军周参谋长。冯诗云到中条山第一个访问的就是这个三军的周参谋长，他还为冯写过去其他各集团军采访的介绍信。这位姓周的参谋长，北平解放时，是随傅作义将军一道起义的，他那时已是傅的参谋长。这七个人在三军关押的第二天，就由冯诗云领衔，其他六人署名，向周参谋长写了一封信，请他主持公道处理这件事。隔了一日，周请他们七人前往，说督导团告他们是不服管教，拉帮结派，聚众闹事。冯据理反驳，周说三军将调停这件事。又过两日，时逢端午节，三军副官处通知他们收拾好行李，中午到副官处去过节。他们去时，督导团政训处副处长鲁道修士已经在那，先向他们寒暄，并对这次事件表示了歉意，还说过去有个七君子事件，这也可以说是另一个七君子事件。当天下午便在鲁道修士的陪同下，这七个人返回了督导团的团部。

他们回去后，从萧炳昆那里才了解到这件事的始末。萧说七人被捕前的当天下午，处长们都到郭鸿群那里开会，郭把萧支使出去，第二天他才知道，这七个人已被押往第三军。他找陈曼兮、刘驰兮商量，决定给总会发个电报，由刘驰兮送往军邮局，被吕局长劝阻，说他已经去见过周参谋长说过这事，三军要出面调停，这封电报就不要发了，免得事情扩大。萧炳昆又说吕局长曾来督导团两次，后来一次转达了周参谋长的三点意见：一是

雷鸣远不在，督导团把这七个人绳捆索绑送到三军关押，处理不当；二是要团里出面，说两句抱歉的话，把这七人接回去；三是督导团如不来接人，三军军部就把这七个人放了。萧炳昆还说，七人被捕后，督导团曾搜查文化科和他们的行李，翻出方德等在西安购买的《斯大林选集》、《政治经济学》等书，后悔没有把这七个人说成是共产党分子。

过了几日，蒋慕岳从西安回来，了解情况后，就和青记一支队的人商量，决定离开督导团，随同他一道来的穆家军可以暂时留在团内。穆家军在成都时就和蒋慕岳认识，他从成都出来原是想去延安，后因大病，住在进步木刻家刘铁华主持的西安木刻社里，碰见蒋慕岳，经蒋介绍给刘益，参加了督导团。

蒋慕岳、商学礼等首先离开，在一个村子里找好住处，其他人也陆续离开了。罗宛萍此时回了四川。

冯诗云离开督导团前，在村子里碰见刘益，刘益曾对他说，冯到中条山第一次外出采访去三军的一个兵站，雷鸣远、李仲三也要到那里去，他们阻挡冯去那里采访，冯没有听，后来李仲三曾提出将冯开除出团，是他从中斡旋才平息了这件事。刘益说，他在督导团内也很难处，这次七个人被捕，他也受到雷鸣远和其他修士的申斥，他也要离开督导团，并表示担心这些记者们离开督导团后，生活怎么办，在这个山区里能不能长期呆下去？冯当时对他说的话都不大相信，只是简单的回答，他们这些人和督导团分道扬镳，会干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以后刘益在西南联大学习时，看见香港的报纸上有人写文章，称赞青记一支队的记者，在战地生活如何艰苦，他曾主动给冯诗云写了一封信，表示他过去的担心是多余的，并寄来一些《世界知识》等刊物。

创立队部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战地服务队华北一支队的队部是1939年8月在中条山正式建立的。队部住得最长的地方是夏县马家峪村。他们建立队部时，碰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原先他们的吃

饭、穿衣都是由督导团供给，每人每月还有十元津贴费；发生七人被捕事件后，他们和督导团分手，生活上没有准备，他们大多数又都是刚出校门的学生，生活经验少，开头他们向村子里买了玉米，没有磨成面，又没有碎成渣，就这样白水煮玉米豆吃。第一个吃得病倒的就是商学礼，他到洛阳医院去治疗，因怕拖累队部，要家里寄来路费，返回了贵州。这些记者到了马家峡村，才向工兵营借牲口学会磨面，以后自己上山拣柴，挖掘野菜。“文革”时，有人到马家峡去调查，那里的老乡还记得他们和国民党的军队不同，对老百姓很亲热，自己做饭。

建立队部后碰到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穿衣的问题。他们在中条山创立了自己的队部，大家心情振奋，对生活上的艰难谁也没有放在心上；鞋子跑破了，没有钱买，把别人丢了的鞋套起来穿。赵寿山的秘书姚警尘见了，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还有的用面袋布做成内裤、手巾，勉强使用，但这年的冬天他们不少人还没有棉衣穿。使他们发愁的这件事，赵寿山知道后，送了一百元钱，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青记一支队的队部，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建立的，也是从着手解决这些难题来开展战地的新闻服务事业的。

在他们决定要离开督导团时，牺盟夏县中心区，准备把油印的报纸改为石印的《中条战报》，每期四开四版，派干玉梅来和蒋慕岳商量，请一支队派人去帮助创办。蒋慕岳决定派冯诗云和陈曼兮去。后来蒋去太行时，又改派穆家军去。

为了扩大新闻服务工作，同时也解决这些记者生活上的困难，蒋慕岳与刘驰兮、任冰如去四十七军与军长李家钰达成协议，派方德、任冰如、陈达、陈泽然去那里帮助四十七军出版油印的《时事简报》。这些外出协助办报的人，除伙食由工作单位供给外，还有少数津贴，队里规定，这些人所得的津贴，全部或大部都需交回，因当时队部还留有三人（蒋慕岳、萧炳昆、刘驰兮）。总会又介绍青记一支队的人都任范长江、胡愈之办的国际新

闻社作特约记者，与后方报纸通讯社的联系，日益增加，这方面也需要有些开支。

蒋慕岳在两三个月内，大体上把队部的事情安排就绪以后，又去西安向八路军办事处汇报青记一支队离开督导团在中条山单独活动的情况。办事处同意现在蒋慕岳可以去北方局联系，以便确定这支队伍的去向。当时蒋慕岳和队里的人都不知道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在晋东南什么地方。后来蒋发现交换来的报纸中有壶关出版的《黄河日报》，这张报纸是牺盟长治中心区委会办的，才决定他只身一人以记者身份先去壶关打听。他通过国民党部队的防区到了壶关，见着《黄河日报》和华北《新华日报》的同志，由他们安排，顺利到达了八路军总部。

在总部招待所，蒋住了一些日子。陈克寒去找他。陈当时是华北《新华日报》副社长，在和蒋慕岳的谈话中，他告诉蒋北方局已经同西安办事处、四川省委、南方局都联系过了，蒋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北方局，北方局决定蒋慕岳把青记一支队带到太行。陈达陪蒋慕岳一起去华北《新华日报》，会见了报社社长何云。何云问了蒋慕岳来太行的经过，他建议蒋不要再由来路回去，可以随同华北《新华日报》的交通人员，通过白晋公路，从太岳转回中条山。

筹组青记中条山区分会

成立青记中条山区分会，是晋南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确定的。蒋慕岳去太行后，这个任务就由队里的人承担起来。由冯诗云先后和牺盟中心区孙久青、三十八军的周延交换意见，定在12月中旬在平陆召开分会的成立大会。要在中条山区开这么一个会，并由青记一支队来筹办是有不少困难的，因为一支队拿不出开这个会的经费，也没有组织开会的人手。来开会的人，远的要走百多里的山路，近的也要走几十里，开会就要有住的地方，还要准备一日三餐。这个会又不好在牺盟中心区和三十八军军部的驻地举行，但当时填表参加分会的又多是这两个单位的人，会议的地址

只能选在平陆。

开会的经费从哪里来？周延建议分会成立会的前一天，先开柳乃夫的追悼会，这样两个会的经费都可以找一七七师来出，开会的具体地点和食宿等事都由平陆牺盟特派员干玉梅、蒋经纶来解决。

柳乃夫原是上海的进步作家，抗战前后，在上海和钱俊瑞、章汉夫、李凡夫等编过进步刊物，还出版过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书籍。他曾任生活书店编辑，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员，受赵寿山的邀请到中条山任三十八军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秘书。是年6月日军进攻第四集团军防地，一七七师浴血奋战，柳乃夫英勇牺牲，中条山的文化新闻界还没有为他开过追悼会。这年12月参加分会成立大会的人，都参加柳乃夫的追悼会，向这位战死在民族解放战场上的著名作家肃穆默哀致敬，这次追悼会的情况，当时在重庆出版的《世界知识》杂志上曾有过报道。

青记中条山分会开成立大会时，有总会理事刘尊棋参加。刘尊棋是中央社特派员，赵寿山去重庆时邀请来中条山采访的，他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青记一支队为中条山区分会的成立准备了一份材料，题为《中条山区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会上散发，以后寄给总会，将题目改为《中条山的新闻事业》，由冯诗云、陈曼兮署名，刊登在1940年6月出版的《新闻记者》上。

这次分会的成立，参加的人中，专员公署所属的报纸、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报纸来的人少，成立会又只开了一天，所以没有酝酿选举分会的理事。

这两个会开完以后，蒋慕岳从太行回到了马家峡，青记一支队在外面服务的人也陆续回来。元旦前后，由蒋慕岳主持开会总结工作，同时转达了北方局的意见，决定会后全队都去晋东南。大家听了都很兴奋。后来，又考虑到前一段在中条山做的一些事还没有完，对夏县牺盟中心区也要有个交待，中条山区分会理事会的事情也要与各方商量一下，任冰如病在三十八军野战医院

里，陈曼兮还病在《中条战报》。所有这些事都需要留下人来处理，决定把冯诗云、陈泽然暂时留在中条山。队里的其他成员都由蒋慕岳率领去太行。在去太行人员中，新增加了秦华维。秦在成都参加过“星芒社”宣传队的活动，经蒋慕岳认可，他12月才从督导团出来到马家峡的，还有持青记一支队护照从川东的云阳出发，经河南渑池来到马家峡队部的于成、杜白。他们在成都时，原准备和陈曼兮一起报考督导团去延安的，后经方德安排，让他们先去川东。这次他们绕道来山西，是要到解放区去学习的。青记一支队除在中条山留下四人外，去太行的共九人，是用记者集体采访的名义离开马家峡向阳城进发的。

丙、滞留中原

风雪王屋

1939年12月，国民党蒋介石与山西阎锡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叫做十二月事变。这次事变是从晋西开始，重点地区却是在阳城、晋城一带，因为那里有牺盟会掌握的地方政权和决死一、三纵队，阎锡山派了一个集团军由孙楚率领与一战区的嫡系部队联合围攻。这个事变的重点地区就是蒋慕岳他们到太行解放区必需经过的地带。

阳城、晋城一线是王屋山区，西连中条，东接太行。蒋慕岳这一行人，顶风冒雪，第一站到了刘茂恩的集团军军部，过去青记一支队的人就去采访过，所以刘茂恩对蒋慕岳率领这些记者热情接待，离开集团军时，他还派军马把他们送到阳城。阳城是十五军陈铁部的防区，蒋慕岳他们到了阳城后，对十二月事变才有大体的了解。

蒋慕岳来到阳城以前，这个县里已经大肆屠杀抓捕共产党员和牺盟的干部，县长也换了人，由陈铁的政治部主任兼着。孙楚就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蒋慕岳他们住在陈铁军部。面临这

种情况，蒋向随行人员都打了招呼，采访时多听少问，问也只问抗日的战况，不问地方上发生的事情。陈铁安排他们去阳城参加县政府召开的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十五军把他们自己说成是山西新军（指决死队）和旧军（指阎锡山的部队）的调停人。陈铁又安排他们去访问孙楚、穆家军和陈达去了。这个瘦小的独眼军阀，一口否认在阳城等地屠杀牺盟人员，把十二月事变说成是整顿牺盟会，审查和清洗反叛阎锡山的人。当他把身边的官员介绍给记者时，却又显出委曲和愤慨的神色，说：他们原本是来做事变地区的地方官的，现在这些地方却被一战区强占过去了。真是不打自招。

在阳城逗留了两天，陈铁送这些记者到九十三军刘戡部去采访。蒋慕岳他们原来是想早些摆脱国民党部队，自己走路去晋城，由于十五军已经和九十三军联系好，他们不能不客随主便。刘戡的参谋长魏白天在接谈中向他们表示，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采访意图行动，不一定要在这里多呆。这些记者在九十三军碰见政治三厅的演剧三队，就同他们一起离开。魏白天不久也到了太行，任八路军总部的参谋处长，解放后曾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做负责工作。

这些记者离开九十三军，请老百姓挑上行李，向晋城、陵川方向前进。一天，走到接近壶关地区时，天黑、路断、人稀，朦胧中望见一处村寨，叫开栅门，进去时才知道是一所炼铁厂，工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只有留守的老汉，给他们熬了一锅小米粥。这个夜晚正是大年除夕，他们已经到了解放区边上。秦华维却不愿继续向前走了，提出他要回四川去，虽然蒋慕岳和穆家军苦劝，穆家军说得声泪俱下，秦华维还是一人回头走了。到了壶关，刘驰令不听队里的安排，没有去抗大一分校学习，折回晋城四十七军军部，以后随李家钰的眷属回四川去了。

蒋慕岳等在壶关树掌镇稍事休息，又往北行到了武乡安乐庄华北新华社社，才算到了家。他们这一行人虽然穿过十二月事

变的风雪区，也到过一些部队去采访，但主要是为了顺利到达解放区，无心去搜集材料。在抵达武乡后，他们还是拿出一段时间来，整理沿途所见所闻，穆家军写出的访问战地工合（路易·艾黎主持的工业合作社），国新社曾转发后方的报纸。

掩护牺盟人员

蒋慕岳等人走后两日，陈曼兮便回到马家峡，带来牺盟夏县中心区负责人王竟成和孙久青的信，大意是说中心区已转移到山下，还准备继续出《中条战报》，希望冯诗云也到山下去，去前与驻在闻喜一个小山村的解玉田联系。冯到解玉田处时，解说了十二月事变和中心区应变的情况，并说与山下失掉联系，不知道王竟成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冯建议他与别的牺盟人员都去马家峡，比隐蔽在这个小山村好，解同意这个办法。他与牺盟会宣传部副部长要崇德、在中心区搞行政工作的丁立本、还有两个通讯员小高、小李，先后到马家峡与青记一支队的人住在一起。

十二月事变后，中条山的情况是平陆、芮城等地比较紧张，因为阎锡山的专员公署与牺盟夏县中心区都驻在那里，平陆等县的县长也是专员公署的人，阎锡山通过一战区，命令第四集团军帮助专署逮捕牺盟人员。闻喜、夏县一带比较缓和，因为那里有些原是牺盟的县长，早已离去。第三军只是在山口加强对行人的盘查。青记一支队在马家峡设立队部后，和三军的副官处等来往也比较多，马家峡住的三军工兵营，营长尹可宽是滇军老兵出身，和这些记者们相处得不错，所以青记一支队的人员才能掩护留在山上的牺盟人员。

虽然如此，留在中条山的四位记者也考虑到和牺盟的人都住在一个院子里，既不安全也不方便，便与三军副官处交涉，在三军军部驻地用青记一支队的名义办了一个阅览室，由要崇德与小李在那里照管。一个多月后，因要生病，又将阅览室关闭，由小李将他护送回家。解玉田与丁立本在马家峡开了一个小店。解玉田用青记一支队的护照去洛阳等地，一面采购些香烟、点心之类东

西回来，一面联系散在黄河南岸的牺盟人员，用青记的护照送他们到垣曲八路军兵站。其中有芮城的牺盟特派员丁乃光。解放后，丁乃光曾任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解玉田和丁立本等在马家峡住了两三个月，才随垣曲兵站撤往太行。1941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曾派柴泽民、解玉田再回到中条山。全国解放后，解玉田先在山西运城地区任专员，后任山西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在这段时间内，一支队这些人的生活费用，都是靠解玉田从牺盟中心区带出的一笔钱来开销的。牺盟人员在一支队队部进进出出，三军的人，只把他们当作记者，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只有一次，专员公署《三角地带》报社一个女编辑来到马家峡，恰逢陈曼兮一人在家，寒暄一阵，她一无所获就走了。

蒋慕岳他们去后，青记一支队和总会、国新社等处的联系，仍然由留在中条山的人员继续办理。他们四个人，一方面担负着与重庆等地和去太行的人相互联系，一方面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采访、撰写战地通讯，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撰写战地通讯

牺盟会的人还没有离开马家峡以前，因后方有些报纸已来信请青记一支队的人为他们写稿，如原在总会工作的冯英子去湖南邵阳担任总编辑时，就约请一支队的人都作这个报纸的特约记者，重庆国新社请他们担任特约记者，已将近一年时间还没有人写过一篇通讯。

他们在中条山这段时间里，曾到各处采访多次，也积累了一些素材，曾写过一两篇通讯，因为写作不得法没有被刊载，从失败中也吸取了一些教训。十二月事变后，他们都回到了马家峡，有了切磋的时间，更有了要写战地报道的愿望，从1940年的5月到9月，连续写了十来篇通讯，大部分是由国新社和全民通讯社转发的，也有些是由湖南《力报》和重庆《国民公报》登载的。国际新闻社发稿的范围，除重庆等地的报纸外，还包括南洋各地的报纸。他们写的战地通讯有《晋南盐池敌我争夺战》，有分析中条山

区整个形势的《中条山横断面》，有登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晋南工人支援抗战的事迹》，登在《大公报》上的《战地创办的小学校》，登在《力报》上的《黄泛区敌我斗争的情况》，还有关于孔从周、李家钰的人物专访。当时来中条山的战地记者已经很少，青记一支队写的这些战地通讯，从不同的方面，通过人物报道了那一时期中条山战区的一些面貌，后来他们写的这些通讯，国际新闻社几乎每篇都是转发了的。

中条山的四个人，当时是无法靠稿费来生活的，所以解玉田走后，他们就商量让任冰如、陈泽然先去太行，因为陈曼兮的病时好时坏，留下冯诗云照顾，并继续保持和总会的联系。任冰如、陈泽然等拿着解玉田介绍他们到八路军兵站的信到了垣曲，兵站去太行的人已经出发。他们只好又沿着十四集团军的驻地向阳城方向前进，到了阳城刘茂恩部，他们才了解到秦华维返回时，在那儿散布了青记一支队的一些坏话。他们匆忙离开，到武士敏的部队去采访，又遇见了演剧三队，经过三队的人指点，就没有去晋城，而绕道去了太岳区。

总会被迫停止工作

十二月事变后，中条山的抗战局面就日益恶化，牺盟人员撤走后，各县群众抗日活动，已经基本停息。蒋介石将第四集团军调过黄河整训。这支纪律比较严明、战斗力比较强的部队离开中条山后，晋南三角地带再也没有向日军出击的主力。决死队的政卫旅离开稷王山后，同蒲南段中条山与稷王山的倚靠之势也不存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前，蒋介石又把朱怀冰残部调到中条。留下的两个记者从马家峪搬到麻岔村，为避免朱部的骚扰，又搬到三军补充兵营的驻地西山头村，当时他们已不可能外出采访，冯诗云曾第次想单独离开中条山，一因道路梗阻，一因不能让病号陈曼兮单独留在那里，都没有成行。

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茂林事变发生后，陈曼兮接到一封信，信的大意说：曼兮吾女，母近日病重，汝等不可在战地久留，应迅

速去找你们的蒋大哥为好。信的落款是“母字”，陈曼兮在读信时很疑惑，因为她的家在四川乐至，家里的人并不知道有什么蒋大哥这个人。她和冯诗云一道捉摸，猜出是青记总会莫艾写来的，莫艾那时在负责青记总会的日常工作，经常和青记一支队联系。这两个人从这封信里推测出总会处境已很困难，局势将有大的变化。冯决定送陈曼兮去洛阳治病，还未到渑池，陈曼兮就在途中病故。这时莫艾正式来信，说总会已被迫停止活动，将把资料室余下的刊物全部寄给青记一支队。冯诗云离开中条到渑池时，这批刊物已寄到渑池邮局，他在每卷刊物上贴上转寄辽县邮局青记北方办事处地址后，便去三十八军找周延、贺立，借往太行的路费。事先他已和孙殿英部驻洛阳办事处接洽好，准备和孙的取款部队一道去林县，仍以记者的名义，到那里去采访。贺立也是国际新闻社特约记者、中共党员，因当时三十八军处境恶劣，贺立要求与冯一道去太行。他们两人在路上走了一周左右，到达和太行根据地比邻的孙殿英军部。冯、贺两人在孙的军部遇见重庆国际新闻社来的高泳，才知道茂林事变后，重庆的进步人士包括青记总会和国新社的工作人员都先后疏散，高泳也是被疏散出来的，他想从太行去延安。国新社在桂林成立，他就在那里工作，他还出版过中篇小说《随粮带征》。1942年5月太行反扫荡时，这位年轻的新闻记者牺牲在战地。他们三人分头在孙殿英的防区转了一圈，先后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辽县。

丁、青记北方办事处

参加太行分会工作

1940年初，蒋慕岳等到达华北《新华日报》后，这一年仍然以新闻服务工作为主，大部分人在帮助青记太行分会工作。

青记太行分会是1939年建立的，但没有常设机构，也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青记一支队的人去后，就着手筹备太行分会第三

次代表大会。这个时期，太行的新闻事业相当发达，除了规模较大的单位华北《新华日报》、新革社上党分社、《胜利报》等外，还有军队、地、县等的报纸。在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前，青记一支队的人，分头访问了各新闻单位，征求关于召开这次大会的意见，同时发展一批新会员。

1940年5月，青记学会太行分会的代表大会，在华北《新华日报》驻地附近一个小山村召开了。参加的会员代表共50多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到会祝贺并讲了话。他要求新闻工作者用自己的笔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坚持敌后抗战，直到胜利。大会最后决议出版太行分会会刊，开办新闻训练班，开展群众通讯和群众读报等工作，还改选了理事会。这次会后，青记一支队的人承担了分会的日常会务，也出去采访过。这一年，太行地区有两件大事：一是百团大战，一是物资交流大会。蒋慕岳在采访百团大战中写了《访八路军炮兵团》，陈达在交流大会中，组织了部分反映解放区人民经济生活的稿件，都在华北《新华日报》上发表了。

这段时间，方德、穆家军还为华北《新华日报》作过扩大通讯网的工作，作这件工作，为以后办新闻训练班做了准备。他们在完成分会的几项任务里，比较起来，开办太岳新闻训练班的工作做得更具体一些。

太岳新闻训练班

太岳新闻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叫新闻教育学校，是《太岳日报》根据青记太行分会的决议来办的。主持人就是《太岳日报》的社长史纪言、魏奉璋。经费和校址都是由他们来筹措的。这个训练班的任务，是为太岳各县培训新闻通讯的骨干。来的学员大多做过报社通讯工作的，只不过他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也缺乏新闻工作的基本知识，因此，训练班的基本课程分为政治常识和新闻知识两门。政治课由史纪言、魏奉璋承担，新闻知识由穆家军、方德负责。

训练班是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办学方针的。在训练班里，

办了两张油印报和两处墙报，作为业务实习的园地。开学前，大家动手把一个牲口棚打扫出来，做了全体30个学员的集体宿舍，临时砍伐树枝，在空地上搭起一个大棚做为教室，用卵石和泥土垒成一条条课桌、课凳。物质生活虽然简陋，精神生活却丰富多采。对办学的人来说，能使太岳山区阎寨村山沟飘出读书声、讨论声、歌声、……，得到很大的欣慰。在这训练班的后期，任冰如和陈泽然从中条山到了太岳，他们的到来，给训练班增加了一份力量。在这个仅一个月的短期训练班中，除正常学习外，还组织过两次演讲比赛、两次辩论会、三次时事讨论会和三次写作讨论会。这些活动，使学员们懂得了，没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是做不好新闻工作的。不懂得采访、编辑、出版、发行业务，是办不好一张报纸的。这为许多学员以后继续努力自学，奠定了一个基础。

这次训练班的不足处是：筹备时间比较仓促，事前的动员工作也做得不够深入，故各地选派来的学员，政治、文化程度相差过大，不免影响一些学习效果；另外，也缺乏必要的教材和参考资料。当时的教学资料只有总会出版的《新闻记者》杂志和国际新闻社内部出版的《采访与写作》，教业务课的人，对新闻工作也是初学，自己知道的很少，却要去帮助别人，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青记学会的北方办事处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是1940年8月1日在山西辽县麻田镇正式成立的。成立以前，华北《新华日报》在7月1日报道：“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为了便于领导、联系，将成立北方办事处，任务是领导长江以北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各分会的工作。以陆诒为主任，何云、陈克寒、曹若铭为副主任，陈克寒兼秘书，负责代表总会进行会务工作。陆诒未来华北以前，一切工作由何云代理。”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从武汉迁移到重庆时，在桂林设立了

南方办事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统治区形势日益恶化，才决定在太行设立青记北方办事处。陆诒当时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没有来太行到职，何云、陈克寒委托蒋慕岳和青记一支队的人做青记北方办事处的具体工作。北方局决定办事处建立党组，党组成员三人：何云、陈克寒、蒋慕岳，蒋慕岳为党组书记，归北方局宣传部领导。

青记北方办事处是在总会被迫停止活动前后开始工作的。总会在重庆停止活动后，它还继续工作了将近一年。在这一年中，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除青记一支队的人外，还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出来的章容，他是随李公朴在延安组织的教育考察团，从晋察冀边区来太行的。李公朴离开解放区后，他参加了青记北方办事处的工作。办事处当时人手少，事情多，除了日常会务外，还编辑了油印的会刊《北方记者》，并为华北《新华日报》、《胜利报》等召开通讯员会议，交流采访、写作经验，同时也做了会务工作。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德战场成了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在这个战场上，谁胜谁负关系着人类的命运，也关系着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迟早。当时青记北方办事处有不少由总会寄来的刊物，这些刊物上，有预测苏德两国战略战术和战争实力的文章，虽然时间晚了一些，但在解放区来说，还是许多人没有读过的。北方办事处的人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出版了一种文摘性的油印刊物，这个刊物就是《辑文》。《辑文》出版后，不仅得到各方面的欢迎，还得到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的重视。他看了《辑文》上叙述希特勒在战斗机上装设怪嘴的声响器，搞所谓恐怖战术的报道，还在一二九师政治部通知军队干部看一看，他说：“日本人在我们边沿地区，在扫荡战中也有类似这样的战术，干部要见多识广，才免得上当。”《辑文》上有篇分析苏联的文章说：“拖拉机制造厂在战时可以改为坦克制造厂。”陈克寒看了说：“这还要有一定的时间，苏军可能要和我们一样用持久战来对付闪电战。”《辑

文》这个刊物只出了两册，因为青记北方办事处的人被调往7月召开的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去服务，终止了出版。

调动到华北《新华日报》社

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是太行规模宏大的一次盛会，它开了将近一个月。青记北方办事处的人，大都去参加了这个大会的宣传工作。蒋慕岳负责大会宣传处，其他的人有的编印大会会刊，有的作为记者采访会议消息。

临参会的工作结束后，北方局宣传部为了加强华北《新华日报》的工作，集中力量办好报纸，决定撤销青记北方办事处，办事处工作人员都调动去报社。1941年10月，青记北方办事处的工作结束。冯诗云、陈达分在新华社华北分社；蒋慕岳和方德、陈泽然、章容、穆家军都在报社通联科，蒋慕岳任科长。萧炳昆已在1940年底，调到华北新华书店秘书处。青记一支队这支记者队伍的历史任务也就和青记北方办事处一起结束了。

过去在青记一支队的这些新闻工作者，他们在解放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全国胜利后，继续在党领导下的新闻出版单位辛勤工作，成为这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直到年老离休才离开他们终身服务的新闻岗位。

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新县制”

胡 次 威

作者曾任国民党政府县长、专员、民政厅长及内政部次长等职。本文以作者亲身经历记述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实行“新县制”的前因后果、具体过程以及有关内部派系斗争情况。

抗战期间，蒋介石在后方各省，主要是在四川实施过“新县制”，这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措施。抗战胜利后，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域内普遍推行，使广大人民遭受无穷的损害。我曾参与其事，并且是在四川实施“新县制”的主要负责人。兹就亲身经历略述其梗概如次。

先从蒋介石搞“自治实验县”说起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随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政府，设了一院九部，而以内政部为首席部。内政部是主管地方行政和地方制度的，最早的几个部长是薛笃弼、阎锡山、赵戴文和杨兆泰等。他们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以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自治”遗教为名，把阎锡山在山西所办的“村治”作为蓝本，草拟了“一套‘以县为自治单位’的‘地方自治’法令，在各省一律施行。但是，为时不久，因为蒋介石在江西同红军作战节节失利，他认为不

是国民党军队打不过共产党，而是“地方自治”组织涣散，配合不上“剿匪”军事。于是采纳杨永泰（杨系旧国会议员中“政学系”的首要之一，当时是蒋介石的“南昌行营”秘书长）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建议，由“南昌行营”制定一套“保甲”法令，命令豫、鄂、皖、赣、闽五省“停办自治，改办保甲”。这样一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域内有了两种不同的地方制度。

与此同时，梁漱溟承袭彭禹廷（彭是冯玉祥的旧部）在河南镇平县“建立地方武装”的衣钵，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自兼该院院长，并以邹平为实验县（该县县长先是王一鞠，后来是孙则让），推行其“以自卫为中心”的所谓乡村建设。跟着又有以办“平民教育促进会”起家的晏阳初（晏是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该会的经费来自美国），得到了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支持，以定县为实验县（该县县长先是霍六丁，后来是吕复），推行其“以教育为中心”的所谓地方建设。从此各种各样的实验区（县以下的区）、实验乡、实验镇、实验村，有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其中有以自卫为中心的，有以教育为中心的，有以自治为中心的，有以经济为中心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据当时国民党内政部的调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域内搞实验工作的单位达到1200余处之多，形成了一股“实验潮”。

国民党为了培养政治爪牙，早在南京办了一所“中央政治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央党务学校”，抗战胜利后改为“国立政治大学”），由蒋介石兼任校长。我先在那里兼课，后来做了教授、法律系主任（在当时设有行政、外交、法律、财政、经济、教育等六系）。在193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蒋介石约该校教育长陈果夫、校董陈立夫、教务主任罗家伦、总务主任吴挹峰、财政系主任刘振东、教育系主任汪懋祖和我在他家里晚餐，谈到了设置实验县的事。他说，梁漱溟们搞什么实验县，把地方弄得乱七八糟，与其让他们胡来，还不如由我们自己负起责任，先在江浙两省各办

一个实验县，以中央政治学校学生为班底，请两位先生去做县长，专办地方自治，就叫做自治实验县，再来取缔那些实验县、实验乡……。他还说，江浙两省是国民党的政治根据地，办不好是不行的，等到这两个实验县办有成绩，再扩大为实验区（县以上的区）和实验省。当然大家都表示赞成，蒋介石当即指定陈果夫筹划进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陈果夫向蒋介石上的条陈。1932年夏，由陈果夫取得江苏省政府主席叶楚伧^①的同意，把江宁划为自治实验县，蒋介石要我去做县长，我不愿去，才改派梅思平（梅当时是该校行政系主任，抗战期间在南京做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枪决）。1933年夏，又在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同的意下，把兰溪划为自治实验县，我去了这个实验县的县长。

1933年冬，由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黄在江苏黄浦办有一个实验镇）、高践四（高在江苏无锡办有一个实验区）等人发起，约集一部分搞实验工作的人组成“中国乡村建设学会”，我和梅思平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这就是当时一般人所称的“乡建派”。抗战前，该会开过两次大会，第一次在定县，由晏阳初负责招待；第二次在无锡，由高践四负责招待，出席的人数都不到100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交流工作经验。抗战发生后的第二年，即1938年春，该会又在长沙开过一次会议，其时我在湖南做民政厅长（我是在南京沦陷前夕调到湖南的），并未约我参加。据说，这次会议是想把乡村建设学会改为政党组织，因为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各有怀抱，没有达成协议。这个学会似乎就从此无形的瓦解了。

梅思平因财政问题同江苏财政厅长赵棣华（赵是陈果夫做国

① 《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记载：江苏省政府主席叶楚伧（1930.3.17任），顾作同（1931.12.15任），陈果夫（1933.10.3任）。说明1932年叶楚伧不是江苏省政府主席。

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时的会计科长)发生冲突，为陈果夫所不满(陈当时是江苏省政府主席)。后蒋介石免去了梅思平的本兼各职，调我为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不再兼江宁县长，并将该区改为实验区，在全区实施所谓“地方自治”。江宁和兰溪这两个实验县至此结束。

定县实验县在日军侵入华北前早就解体了。邹平实验县在日军侵入山东的时候宣告解散，孙则让裹胁了1万多壮丁随韩复榘逃走，及韩复榘被蒋介石枪决，还剩下5000多人，由蒋介石改编为一个旅，作了国民党的炮灰。此外，还有稍后于邹平由梁仲华与清华、燕京和南开三大学在山东合组的济宁实验县，也在兵荒马乱中“无疾而终”。

对设置实验县很有胃口的是晏阳初。他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入川以后得到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同意，成立了一个新都实验县(该县县长是陈开泗，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做过兰溪实验县科长，浙江金华和湖北黄冈县县长)。又在抗战发生后的第二年，即1938年，在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衡山实验县(该县县长先是孙伏园，后来是彭一湖^①)。前者以四川实施“新县制”，后者以日军侵入湖南而分别告终。

以上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域内的一段“县政实验”史，也就是用尽一切方法加强反动统治的历史。

“寓保甲于自治之中”的新花招

CC头子之一的陈果夫在江浙两省搞自治实验县的策划，引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95辑，晏升东、孙怒潮《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记载：1935年……湖南省划衡山县为实验县，先派彭一湖为衡山县县长，后由孙伏园继任。《民国人物大辞典》记载：彭一湖，1935年为湖南衡山实验县长。孙伏园，1937年任湖南衡山(山)实验县长。

起了掌握“南昌行营”政治实权的杨永泰的莫大震惊。震惊的原因是，以杨永泰和张群为首的“新政学系”原来打算先从豫、鄂、皖、赣、闽五省入手，再进而由“南昌行营”命令各省一律“停办自治，改为保甲”，借改变地方制度的机会，抓住用人权，使全国地方行政归入该系的掌握。如果真像陈果夫所策划的那样，先在江浙两省各办一个实验县，再扩大为实验区和实验省，那末，积之日久，全国地方行政势必为CC所包办，使该系的打算完全落空。

在江宁和兰溪两个实验县成立之后不久，陈果夫做了江苏省政府主席，对新政学系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大了。当然，新政学系是不会不动脑筋的，曾由杨永泰和张群向蒋介石力保，以辜仁发（辜系新政学系分子，当时是湖北某区的行政督察专员）为江苏民政厅长，用来牵制陈果夫。不到半年，辜仁发即被陈果夫以贿卖无锡县警察局长向蒋介石告密（证据是盖有辜仁发私章的一张4000元的收据），由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永不叙用。事实上并未查办，辜仁发却从此销声匿迹，退出了政治舞台。新政学系与CC的冲突，于此可见一斑。

这时的内政部长黄绍竑对推行“地方自治”甚感兴趣，似乎是有意要同新政学系作对。他认为，根据孙中山先生生前的主张，各县必须办理自治，“南昌行营”在豫、鄂、皖、赣、闽五省“停办自治，改办保甲”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仍然非办理自治不可。他用了一位曾替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办过“训政学院”的“AB团”分子王先强为内政部民政司长，起草了一套“地方自治法规”，一俟国民党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后（立法院也在起草“地方自治法规”，成立了一个“自治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黄右昌），即在全国施行。同时对于实验县、实验区、实验乡、实验镇、实验村，又尽其可能地加以鼓励和支持，这样就使新政学系更伤脑筋。

1934年秋，适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病故^①，杨永泰和张群便先从黄绍竑下手，以浙江系蒋介石的“丰沛之邦”为理由，怂恿蒋介石把黄绍竑调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继任内政部长的是新政学系核心分子蒋作宾^②）。我原在兰溪搞自治实验，黄绍竑到了浙江即约我商谈，他打算把他在内政部起草的一套“地方自治法规”尽先在浙江实施。我是赞成他的主张的，也提了一些意见，认为这套法规不大切合实际。由于谈话投机，他保我做了兰溪区行政督察专员。我请黄绍竑亲临兰溪指导，他召集了20多个县长前来参观，并开会议论，要把兰溪的某些措施如裁局改科、清查地粮、整理田赋，在其他各县次第推行。他还同建设厅长伍廷飏到河北定县和山东邹平考察，带回了邹平的“合作粮仓”办法，要我在兰溪专员区择县试办。“南昌行营”曾不止一次地命令浙江“停办自治，改办保甲”，黄绍竑却置之不理。

“南昌行营”也同样命令其他非“剿匪”省份一律“停办自治，改办保甲”。这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其实并不简单。因为依照“南昌行营”的法令规定，一旦“停办自治，改办保甲”，各省的县长、行政督察专员、省政府委员和各厅处长即应由“南昌行营”直接遴选委派。但是，谁都不愿把用人权交给“南昌行营”，做一个光杆的省政府主席。他们以江浙两省为例，同“南昌行营”虚与委蛇，借词拖延。新政学系明知是江浙两省从中作梗，可是陈果夫是蒋介石的宠儿，黄绍竑是蒋介石的重臣，使权倾一时的杨永泰也无计可施。

及至1935年初，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自兼行政院长^③，为

① 《民国人物大辞典》、台湾《民国人物小传》记载：鲁涤平，1935年1月病逝于南京。

② 《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记载：内政部部长黄绍竑(1932.5.3任)，黄郛(1934.12.7兼—1935.12.12)，甘乃光(1934.12.12暂代)，陶履谦(1935.2.27暂代)，蒋作宾(1935.12.12任)。

③ 台湾《民国大事日志》、《民国人物小传》记载：蒋介石任行政院长的时间，是1935年12月。

了解决各省办自治还是办保甲的问题，也就是要缓和新政学系与CC之间的冲突，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最高行政会议”。出席这个会议的除国民党中央有关各部部长外，有各省省政府主席、民政厅长、教育厅长和行政督察专员代表（每省一人）。此时杨永泰已继张群之后由南昌行营秘书长调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出席了这次会议。我由黄绍竑指派为浙江九个区的行政督察专员代表，也一同到了南京。

在这次会议中，显然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一个是以陈果夫为首的“办自治不办保甲”的阵营，这个阵营的马前先行是黄绍竑；一个是以杨永泰为首的“办保甲不办自治”的阵营，这个阵营的急先锋是熊式辉（熊当时是江西省政府主席）。争吵了一个星期，彼此各走极端，使会议成为僵局。最后由蒋作宾提出一项折衷方案，叫做“寓保甲于自治之中”，也就是在非“剿匪”省份仍然保持原来的“自治”体制，但是必须以乡镇为范围一律编组保甲。既办自治，又办保甲，双方都有了面子，蒋介石也认为满意，这个会议就在这样一个新的花招之下草草收场。

接着是杨永泰在湖北被刺，蒋介石在华清池被捉，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又一天加紧一天，任随各省办自治也好，办保甲也好，也就不再有人过问了。但是，“寓保甲于自治”这一办法却为后来的“新县制”打下了根基。

进一步搞所谓“新县制”

国民党政府在1938年从汉口退到重庆以后，蒋介石把西南一隅作为他的所谓“大后方”，而西南一隅的云南、贵州、西康都比较贫瘠，最好的一块肥肉便是四川。但是，如果要在四川任其所欲地征兵、征粮、征工、征税，来维持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除用高压政策外，还得要假“自治”之名成立一套“民意机构”，然后才有所措手。同时为了调和国民党内部党政之间的矛盾，蒋介石

还要借此机会来一个“调整党政关系”的措施。他把这些企图告诉了张群（张当时是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和熊式辉（熊当时是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由熊式辉约集甘乃光（甘曾任内政部次长，当时是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和雷殷（雷原任广西民政厅长，抗战发生后，蒋介石与桂系合作，调他做了内政部次长^①）。根据第一次全国最高行政会议“寓保甲于自治之中”的决议与蒋介石的指示，草拟了几十条大纲，并附有“党政关系略图”及说明，送给蒋介石核定。

蒋介石认为可行，当即指定张群组织一个“地方自治临时讨论会”，根据“大纲”的内容起草一套有关“地方自治”的法令。张群是这个讨论会的召集人，参加会议的有甘乃光、雷殷、狄膺（狄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李宗黄（李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地方自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内政、财政、经济、教育等部的代表。1938年秋，我由湖南调为四川民政厅长，接事后不久，张群即约我到重庆（四川省政府设在成都）参加会议。

我参加会议时，会议已进行了两个月，曾由甘乃光执笔草成了一种法案，叫做《县各级组织纲要草案》。就《县各级组织纲要草案》的内容看来，其实就是“县组织法”（国民党政府早就颁行了一个“县组织法”），不称为法而称为纲要的原因，是在避免经过立法程序，即直截了当地由行政院通令施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县各级组织纲要草案》始成定稿。与此同时，曾由雷殷起草了一种《各县级组织纲要实施方案》，长达300余条，大家认为过于繁琐，没有采用。于是决定不再制定统一的实施方案，由讨论会建议给行政院，在该院通令颁行《县各级组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时特别提到，准由各省省政府根据“纲要”内容和精神自订《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方案》，呈候行政院核定。

^① 《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记载：雷殷任内政部常务次长时间是1939.8.30—1942.12.8免

“纲要”全文计七章60条，内容颇为复杂，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点：（一）美其名曰实施所谓“地方自治”，首先规定“以县为自治单位”。（二）各县县政府一律裁局改科，县长由省政府直接委派，县政府各科科长由县长遴选合格人员呈请省政府委派。（三）县以下可以分区，区设区署，区署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也就是区为虚级），区长由县长遴选合格人员呈请省政府委派。（四）乡镇是县自治的基层组织，在乡镇内部编组保甲，保甲是乡镇的组织细胞，而不是乡镇以下的两个阶层。（五）划分县与乡镇的财政收入，乡镇预算是县一级预算的单位预算。（六）甲设居民会议，由居民会议选举甲长。（七）保设保民大会，由保民大会选举保长和乡镇民代表。（八）乡镇设乡镇民代表会，由乡镇民代表会选举乡镇长、副乡镇长和县参议员。乡镇设乡镇公所，分设四股或两股，分股办事。（九）县设县参议会，由县参议会选举省参议员，但是暂不选举县长。拿“纲要”同抗战前南昌行营所颁行的有关法令作一比较，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国民党反动派真要实行所谓“地方自治”，其实是披着自治外衣进行欺骗，企图使人不容易觉察。

比“纲要”更为重要的还有一种“调整党政关系”的办法。据蒋介石当时的指示是，在国民党中央为“党高于政”，在各省为“党政平行”，在各县为“融党于政”。以事关机密，系作为内部文件，未对外公布。在国民党中央为“党高于政”，这就是蒋介石为什么要做国民党“总裁”的主要原因。所谓“党政平行”和“融党于政”，经归纳为下面所说的五点，曾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对各省省党部和省政府下了一道联衔密令，同“纲要”一起施行。（一）各省省党部委员和省政府委员（出席人限于国民党党员）应定期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由省党部主任委员召集，并作会议主席，商决该省有关重要党政事宜。（二）各县县党部委员和县长、秘书、各科科长（出席人限于国民党党员）应定期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由县长召集，并作会议主席；如县长非国民党党员，应由

县党部书记长召集，并作会议主席，商决该县有关重要党政事宜。

(三) 各省省党部主任委员得出席省政府委员会，各县县党部书记长得出席县政府行政会议。(四) 各省省参议会秘书长和各县县参议会秘书，应由省县党部提名，交由县政府呈请各该上级机关委派。(五) 各县县政府民政科长、教育科长和兵役科长，必须是国民党党员。

张群把定稿后的“纲要”及有关意见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认为满意，仅在文字上有所添注涂改，讨论会又作了一次修正，然后分送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由行政院通令施行（当时的行政院长是孔祥熙）。

1938年冬，国民党在南温泉设置了一个“中央训练团”（后来迁到浮图关，把浮图关改为复兴关），以陈诚为教育长，团长由蒋介石自兼。蒋介石把《县级组织纲要》定为主要课程之一，叫做“新县制”，并以熊式辉替他写的一本小册子作为教材，由其亲自讲授。该团设有一个“党政人员训练班”，系分期抽调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域内县长以上党政人员前往受训，受训期间两个月。我在四川全省行政督察专员和县、市、局长入班受训时被派为驻队指导员，并随班听讲。蒋介石的所谓讲授，除了按照熊式辉所写的小册子宣读一遍之外，别无新义。他却指着那本小册子煞有介事地说，这本小册子是政治上的基本动作，与军事上的“步兵操典”同样重要，要全国党政人员人手一册，带在身旁随时翻阅，作为“政治典范”。蒋介石只亲自念过几次，后来系由李宗黄、雷殷、王东原（王当时是该团总队长，后来继陈诚之后做了教育长）代念，他坐在讲台上，有时打断别人的“念白”作几句补充。

“新县制”在四川的实施拟定“实施方案”

当我到重庆参加“地方自治临时讨论会”的时候，张群在私下对我说，“新县制”对“抗战建国”的关系非常重大，四川又是

“抗战建国”的主要根据地，“委员长”（指蒋介石）有意尽先在四川实施，要我早作准备。我当然了解蒋介石的企图，可是要把偌大一个四川披上“新县制”的伪装，并不是那么容易。我对他说，在四川尽先实施“新县制”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不能求之过急，因为我从小就离开了四川，连东西南北都还弄不清楚，必须有一个相当的准备时间。他说，这好办，可约集几位相熟的大学教授组成调查团，由民政厅视察员陪同，分往各县作抽样调查，所需川旅费由国防最高委员会负担。我回到成都后，即组成调查团，分组出发工作。

那时的四川省政府主席是王缵绪，只做了一年多的主席，因为种种关系，有在前后方的八位川军师长联名通电，并调兵遣将要用武力驱逐他。于是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撤换了王缵绪（名义上是调王出川抗战），自己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这是1939年冬天的事。蒋介石就职后便同我面谈，要在四川尽先实施“新县制”。随即下了一道手令要我在三年内完成全省“新县制”的实施，并拟具实施方案呈核。这次同蒋介石来到成都的有陈果夫（大陈当时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主任）和陈立夫（小陈当时是教育部部长），蒋介石要我和陈果夫商量。陈果夫的意思是，实施“新县制”的重要关键在训练各级干部，要我先拟训练计划。我在他的意图之下，仿照“中央训练团”的办法，拟了一个计划送给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训练各级干部只能作为实施方案的一部分，必须拟具整个实施方案，再作全盘决定。

蒋介石对我说，四川情形复杂，实施“新县制”是有困难的，他已打电报给甘乃光、雷殷和余井塘（余当时是教育部次长）前来帮助我，可以把责任推给中央。由此可见蒋介石是怎样迫切希望要在四川搞这一套反动措施。甘、雷、余来到成都后，我召开了多次会议，请他们讲演“新县制”，并解答问题，闹了不少的笑话。例如有人问：乡镇经费太少，怎样筹措？雷殷回答说：“这很容易，我们广西的办法是在每年年初发给每家一个鸡蛋，

到了年终要他们交纳一只母鸡，问题就解决了。”引起了哄堂大笑。

我反复思索，拟了一个《四川省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到重庆面交蒋介石，并作了口头说明。“实施方案”的主要之点为：除设置省、县训练所分期抽调现职人员入所受训外，将其他工作分为三个步骤进行：（一）自上而下调整县以下各级机构；（二）成立县临时参议会；（三）自下而上成立各级“民意机构”。每一个步骤的工作又分为三期先后进行，即全省16个行政督察区临时划为三个大区，先从第一个大区起开始进行第一个步骤的工作，俟办理完毕后，再依次推行到第二个大区和第三个大区；又俟三个大区的第一个步骤的工作都办理完毕后，再从第一个大区起开始进行第二个步骤的工作，以此类推，直到全部工作办理完毕之时为止。我当时的想法是，四川区域大，县份多，情形复杂，同时征兵、征粮、征工、征税又急如星火，刻不容缓，如果不采取分步骤的和分期的办法来实施“新县制”，那末，势必引起一场大混乱，使征兵、征粮、征工、征税等等工作陷于停顿，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为了更加“保险”，我还把完成“新县制”的时间，从三年改定为四年。

不到两天，我接到陈布雷（陈当时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的电话说，实施方案批下来了，要我快去。蒋介石只将“完成新县制的时间定为四年”的“四”字改为“三”字，其余未动。我对陈布雷说，一字之差，关系甚大，我要再去见蒋介石。他说：

“三年就三年吧，只要开步走就行了，谁也不会再来问你是三年还是四年。”我不禁失笑，使我失笑的是：应付功令也得要有窍门。

（一）设置省、县训练所

首先在成都设置了“四川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由蒋介石自兼主任，以陈继承（陈当时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为副主任，蒋介石经常住在重庆，实际负责的是陈继承。训练所的组织规

模相当庞大，设有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大队部和主任办公室。陈继承保黄仲翔（黄当时是四川省党部委员兼宣传处长，又是四川省政府社会处长）为该所教育长，黄已到职，蒋介石来电不同意，指定我做教育长。

该所的组织人事早已成为定局，除总务处长梁泽民系邓锡侯（邓当时是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的部属外，其余的处长、大队长、主任秘书、秘书都是清一色的“复兴社”。因为蒋介石要我做教育长，才让出了教务处长，由我推荐彭善承（彭当时是民政厅第一科科长、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充任。陈继承徒拥虚名，掌握该所实权的是训导处长任觉五（任当时是四川省党部委员，又是四川三民主义青年团委员）。“复兴社”与“CC”原处于对立地位，他们把我看作既是“CC”，又是“新政学系”，颇有戒心。我为了避免正面冲突，对“复兴社”在所里搞的一套组织工作也就不便过问。

该所的任务是分期抽调各县的区长、县政府的各科科长，以及相当于区长、科长的现职人员入所受训，也训练过各主管厅处甄审合格的会计、统计和合作人员，还调训过各县县党部书记长和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每期的受训人数约在500名左右，受训期间一律为两个月。课程以“新县制”和“实施方案”为主，由我讲授，其他专业课程由各有关机关负责人讲授。蒋介石如来成都，必到该所“点名训话”。及1940年冬张群继蒋介石之后做了四川省政府主席，由其自兼该所主任。陈继承辞去了副主任兼职，即不再设副主任，并裁去了主任办公室。1942年春，蒋介石和张群要我征调民工建筑“华西空军基地”，我辞去了该所教育长，由孙则让（孙当时是四川大竹区行政督察专员）继任。到了此时，该所的训练工作已接近尾声，从此便无形停顿。我做了两年多的教育长，办过八期训练，训练了4000多名有关民政、财政、建设、教育、会计、统计、合作，以及县级党集负责人。他们的品类原来就很复杂，把入所训练当作“镀金”，一旦做了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和张

群的学生，还有不少的人又在受训的时候加入了“复兴社”，有如为虎添翼，回到各县就更加胆大妄为，无恶不作。

与此同时，在“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的策划和推动下，各县都先后成立了“乡镇人员训练所”。由县长兼任所长，下设教务、训导两科和大队部，由县政府民政科长、教育科长和兵役科长分别兼任教务、训导两科科长和大队长。分期抽调区署的区员、乡镇公所的乡镇长、副乡镇长、各股主任、各保保长，以及中心学校和国民学校的教导主任（当时的办法是中心学校校长由乡镇长兼任，国民学校校长由保长兼任，因此分别设置教导主任）、教员入所受训，以两个月为一期，直到所有人员调训完毕之日为止。主要课程同样是“新县制”和“实施方案”，由县长讲授（县长都在“中央训练团”听过“新县制”的课程），其他专业课程由县政府主管科室负责人讲授。由各县训练所训练出来的反动爪牙要比省训练所多到几十倍，他们遍布于全省各县的区、乡镇、保每一个角落，以同学的名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其流毒之深那就更其不堪设想了。

（二）自上而下调整县以下各级机构

除设置省、县训练所训练各级干部外，按照“实施方案”，实施“新县制”的第一个步骤是自上而下调整县以下各级机构。

要自上而下调整县以下各级机构，首先是调整县政府的组织。县政府的组织，一般是根据“县等”来决定的。在以往，四川一如其他各省一样，系将各县分为“一、二、三”三等。分等的标准是：根据各县的人口多少、土地面积大小和应完赋额分别记分，取其中数，定为二等，高于此者，定为一等，低于此者，定为三等。我觉得四川的县份多，差别大，这样的区分县等不大切合实际，于是除根据原有标准外，并按照各县的经济条件、交通条件、文化条件和有无特殊情况，将全省140多个县（此140多个单位中，包括设治局和管理局，不包括成都和自贡两个省辖市，省辖市另有分等标准）重新区分为一至五等。各县县等决定后，

县政府的组织即以县等为准，定为一至三等县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兵役等五科和会计室，四、五等县设民政、财建、兵役等三科和会计室（各县曾一度设过禁烟科）。至于县政府人员的配备，则以三等县为准，按照县等的高低递增递减。三等县为80余人，一等县为120余人，五等县为50余人。此外，各县县政府（包括省辖市、设治局和管理局）还有三个附属机关，即田赋管理处（必设，由县长兼处长），地籍整理处（只是整理地籍的县份设置，由县长兼处长），警察局或警察所（全县警察在50名以上的设局，不满50名的设所）。实施“新县制”后，四川各县县政府组织的庞大也就可以想见了。

其次是调整区署。在1935年国民党军队入川以后，四川省政府（当时的主席是刘湘，民政厅长是王又庸）曾根据“南昌行营”所定办法，将各县分为三至五区，分别设置区署，全省设置了500多个区署，区署的区长，由行政督察专员遴选合格人员呈请省政府委派，其权力仅次于县长，他们还可以优先升补县长，人们称其为“小县长”或“候补县长”。这是新政学系用来培植该系下级爪牙的办法（与该系在省以下县以上分区设置行政督察专员用来培植中上级爪牙，系同一用意）。刘湘为了掌握区长人选，设了一个“县政人员训练班”进行训练。在训练班结业的1000多名学员中，一般都做了区长，有些人做了县长，也有些人派了工作后来又因故失业，他们自成派系，人们称其为“县训派”。实际掌握这个派系的是当时的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及嵇祖佑继王又庸之后做了民政厅长（我是嵇祖佑的后任），又登记了1000多名行政人员，绝大多数都未派工作。按照“实施方案”，只是人口在1000户以上的乡镇，边远地域，或者是“三不管”的地方设置区署（很像前清时代的巡检司），全省只能保留150多个区署，这样在人事安排上就大成问题。我采取了逐步裁撤区署的办法，将裁撤下来的一部分区长调为县政府的秘书、科长和其他相当职务，同时又要适当安插失业的县训学员和尚未就业的登记人员，位少人多，穷

于应付。他们持有受训和登记证件，所谋不遂即恶言相向，或写匿名信肆词漫骂，对我来说，这样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再其次是将原有联保改为乡镇。按照“纲要”规定，乡镇的内部组织为保甲，四川在1936年编组过保甲，尽可以暂时不编保甲，但是要怎样把原有联保改为乡镇却大费踌躇。因为四川原来是根据“南昌行营”的保甲法令以五保为一联保，如即以联保改称乡镇，那末，乡镇的区域未免过小，单位也未免过多，不但管理不便，经费的开支也大有可观。因此在“实施方案”中规定：原有的保甲编制暂不变动，只是在原则上先将三个联保合并为一个乡镇，也就是以15个保划为一个乡镇，同时仍酌留伸缩余地，又规定为至少不得少于10保（等于过去的两个联保），至多不得多于20保（等于过去的四个联保）。为了避免人事纷更，使征兵、征粮、征工、征税等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因而又在“实施方案”中规定：各乡镇设乡镇长一人、副乡镇长一人或二人，由县政府就原有联保主任中分别遴选派充。其结果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不仅为此，还从而扩大了乡镇公所的组织，在“实施方案”中规定为：乡镇公所得分设民政、财经、文教、保卫等四股，各股设主任干事一人，干事一人或二人；如乡镇区域较小，财政又不甚充裕，可酌减为两股，以民政、保卫合为一股，财经、文教合为一股，各股设主任干事一人，干事一人或二人。其结果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地方基层组织有所谓“两位一体制”，“三位一体制”和“四位一体制”。例如定县实验县所实行的是以教（指教育）为中心的管（指民政）教两位一体制，邹平实验县所实行的是以卫（指保卫）为中心的管教卫三位一体制，江宁、兰溪两个实验县和豫、鄂、皖、赣、闽五省所实行的是以管为中心的管教养（指合作社）卫四位一体制。国民党反动派把“四位一体制”奉为“金科玉律”，还胡诌一套“理论”，说什么“四位一体制”是“以管、以教、以养、以卫”，“自管、自救、

自养、自卫”，“自管管人，自教教人、自养养人、自卫卫人”。

“纲要”所规定的便是“四位一体制”。具体表现为：由乡镇长兼任中心学校校长、自卫大队队长、合作社联合社主任，由保长兼任国民学校校长、自卫队队长、合作社主任。四川全省就是这样办的，不过那时尽管在省政府之下设有“合作事业管理处”专搞合作社，可是在各乡镇设有合作社联合社和各保设有合作社的并不多。乡镇保长身兼教职，大权在握，他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成了大大小小独霸一方的“土皇帝”。这些“土皇帝”也就正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政治基础。凡是稍有正义感的人都反对这个办法，例如有一次蒋介石在成都请客，张澜先生（张当时是国民参政员）系客人之一，他就拿“四位一体制”质问过蒋介石，把蒋介石气得咬牙切齿，大动肝火。我曾在场作陪，亲眼目睹。

（三）成立县临时参议会

按照“实施方案”，实施“新县制”的第二个步骤是在各县成立“临时参议会”，作为将来成立所谓“县参议会”的过渡。

在各县未成立临时参议会以前，四川省政府已根据国民党行政院1939年颁行的《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和《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遴选办法》，在1940年初成立了“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人数，最初为50人，后来增加到100人。省临时参议会是我一手经办的，在该会成立后又同参议员们打过交道，使我感觉到即使是一个咨询性质的临时参议会，如果不在各个方面加以严格的控制，势必对于各县的征兵、征粮、征工、征税等等工作发生阻碍。因此我在起草《四川省各县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四川省各县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遴选办法》时，玩弄了不少花招。

我首先考虑的，是各县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人数问题。人数不宜过多，过多就不容易应付，也不能超过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人数，可是也不宜过少，过少就冷冷清清不成其为会议。因此规定为一等县36人（省辖市与一等县同），二等县为30人，相差六人，以此递减，五等县为12人（设治局和管理局与五等县同）。其

其次是参议员的来源问题。美其名曰各方面都有代表参加，可收“集思广益”之效，将参议员的来源分而为二：一是来自地区的所谓“区域代表”，一是来自农会、工会、商会、教育会、渔会和律师公会等等团体的所谓“团体代表”。前者占参议员总额的三分之二，后者占参议员总额的三分之一。再其次是参议员的产生问题。既名“遴选”，就当然用不着什么选举，在表面上规定为由县政府提出加倍的参议员候选人名单，呈请省政府圈定半数；实际的做法则是由县政府与国民党县党部、省政府与国民党省党部分别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共同提名和圈定。不但如此，省政府还可以指定名单以外的人为参议员。第四是临时参议会的会期和参议员的任期问题。我所考虑的是临时参议会开会的次数不宜过多，参议员的任期不宜过长，而又必须留有回旋余地。因此规定为临时参议会每六个月开会一次，由县长召集，必要时得由县长召开临时会议，开会的时间为三天到五天。参议员的任期为一年，必要时得延长一次任期。最后是临时参议会的权限问题。我所考虑的是尽管临时参议会只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而没有一定的权限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它的权限不能过大，否则便无法控制。因此规定为参议员有提案权、表决权和询问权，县政府的重要施政方针应由县长提交临时参议会审议。更其重要的是把议案的最后决定权操之在自命为监督机关的省政府的手中。即临时参议会与县政府如有争议，不得自行处理，应呈请省政府核定。

根据上述各点写成《四川省各县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四川省各县临时参议员遴选办法》以后，张群（张当时是四川省政府主席）还在私下问我，照这样做有没有把握？我说，据我看大有把握。“组织条例”和“遴选办法”经省政府委员会议通过并呈请国民党行政院核准后，随即付之实施，各县都先后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其结果是，举凡征兵、征粮、征工、征税等等工作，有了临时参议会的“赞助”，就更加得心应手，予取予求。也就是临时参议会成了县政府不折不扣的御用机构。

我就全省各县2000多名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作过统计，其中90%以上是当地的土豪劣绅、袍哥大爷、党棍（指国民党党员）和团棍（指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此外也有为数极少的所谓“公正士绅”，把他们用来点缀门面，可使那些对国民党反动派有幻想的人更容易受骗。

（四）自下而上成立各级“民意机构”

按照“实施方案”，实施“新县制”的第三个步骤是自下而上成立各级“民意机构”。这步工作比较复杂，所费的时间也比较多一些。

要自下而上成立各级“民意机构”，就必须“清查户口，编组保甲”。我为了清查户口，曾同国民党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一起合作。由该局派了一批人员（主持其事的是该局科长李承谟）到成都先作设计，并以距成都不远而又人口不多的新繁县作为试办，然后制定《四川省各县清查户口办法》在全省先后实施。从民国初年以来，四川的人口就号称5000万，这次清查的结果为5200万，只多200万。很显然，这个数字是不确实的，不确实的原因甚多，最主要的是：一般劳动人民害怕国民党政府以清查户口为名大征壮丁（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充当壮丁的除少数地痞流氓散兵游勇外，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更多的是农民），一闻清查户口，即东藏西躲，逃得无影无踪。按照一般通例，平均每家有一名壮丁，翻阅一下当时的“户口统计”，有很多地方要三五家才有一名壮丁。

在清查户口的同时，即进行编组保甲。在过去，四川编组保甲系根据“南昌行营”的保甲法令采取严格的10进制，即以10户为一甲，10甲为一保，只有编余的户不足10户的才能编为一甲，编余的甲不足10甲的才能编为一保。“纲要”则改为以10进制为原则，即10户为一甲，但不得少于5户，多于15户；10甲为一保，但不得少于5甲，多于15甲。这种规定适用于一般乡镇是比较合适的，如适用于人口密集的城市就值得考虑，因此在“实施方案”

中规定了这样一条：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编组保甲采取20进制，即20户为一甲，但不得少于15户，多于30户；20甲为一保，但不得少于15甲，多于30甲。这次编组保甲的结果，使保甲的数字大为减少，以保而论，便由原来的9万多保减为7万多保。

“清查户口、编组保甲”的工作办理完毕后，各甲应即召开“居民会议”，选举甲长。顾名思义，既称为居民会议，应该是全甲的成年居民都可以出席，但是按照“纲要”规定，出席这个会议的只限于各户户长，就其性质来说，也就是一种封建性质的家长会议。居民会议没有一定的会期，并不经常开会，开会时又没有会议记录，究竟开会与否以及开会的情况怎样，谁也无从查考。所谓“选举”，从来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用来制造民意，伪装民主的骗人花招。就选举甲长来说，通常是由当地的少数土豪劣绅和袍哥大爷所包办。“选举”出来的甲长，绝大多数不是土豪劣绅的狗腿子，便是堂口（袍哥组织叫做堂口）上的么满10排。做了甲长也有油可揩，不过油水并不很厚。

各甲召开了居民会议，紧接着就是各保召开“保民大会”，选举保长和乡镇民代表。出席保民大会的同样是各户户长，而不是全保的成年男女都可以出席，就其性质来说，也就是扩大的家长会议。为了凑足所谓“法定人数”，各户户长还可以派人代表出席，以此出席保民大会的有不少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和尚未成年的儿童。保长和乡镇民代表的权力大，油水厚，是仅次于乡镇长、副乡镇长和县参议员的肥缺，在选举保长和乡镇民代表时，操纵把持和竞争选举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勾心斗角，各显神通，甚至聚众械斗，杀伤人命，这种情形以在边区的地方最为常见。按照“纲要”规定，保甲原系乡镇内部的组织细胞，但是保长可以设置保办事处，还可以任用一名保干事。一般保干事略识之无，乡下人多称其为“师爷”。保长可以带同这位师爷升座理事，又有自卫队员为其站岗，于是保办事处成了官衙。做保长和师爷的，一无薪俸，二无津贴，只有一两元灯油茶水和文具费，他们

的主要财源则是卖放壮丁，私收捐税。

在第一个步骤里，将联保加以合并并改称为乡镇，原是暂时的措施。在这次“清查户口、编组保甲”以前，又作一次调整，重新划定乡镇的管辖范围。我曾经作过一项调查，四川全省共有4000多个农村集市，叫做“场”，这4000多个“场”是由于自然需要而形成的，“场”与“场”的间隔，有的相距十几华里，有的相距二三十华里，星罗棋布，分布得相当均匀。又由于“场”系人口集居之处，一般是三天一场（在相近的几个场，场期各不相同，有的是一、四、七，有的是二、五、八，有的是三、六、九，有的是逢十），先由贸易中心，逐渐成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交通也比较方便。因此在这次划分乡镇的管辖范围时，规定为必须以“场”为中心，如地区过于辽阔而没有“场”的，可以重新建“场”。这样便将全省划分为4000多个乡镇^①，比以往的乡镇数字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按照“纲要”规定，乡镇是县自治的基层单位，也就是较小的所谓“自治团体”。以此在各保选出乡镇民代表后，即据以组织乡镇民代表会，作为乡镇的“议事机构”，也就是“民意机构”。乡镇民代表会的首要任务为选举乡镇长和副乡镇长，并据以改组原有的乡镇公所，作为乡镇的“执行机构”，又称为“行政机构”。这套反动理论是我从资本主义国家贩来的，曾大肆吹嘘地说，这就是“新县制”的基本特征。它的特征不是别的，而是使乡镇公所成为县政府的化身，使乡镇民代表会成为更多的县参议会，全省有十几万乡镇长、副乡镇长和乡镇民代表在“自治人员”的外衣掩盖下，名正言顺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我曾亲眼看见有很多乡镇私设公堂审理民刑案件，自造监牢卡房关押“人犯”，有无数的劳动人民憔悴呻吟于刑杖与铁窗之下，敢怒而不敢言，他们经手办理征兵、征粮、征工、征

① 乡与镇的区别，在农村系以各“场”的人口多少而定，聚居人口不满100户的叫乡，100户以上叫做镇，在城市则概称为镇。

税，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有数不清的人做了几年乡镇长、副乡镇长和乡镇民代表，尤其是乡镇长，即田连阡陌，富甲一乡，由穷光蛋一变而为富家翁。

按照“纲要”规定，应由乡镇民代表会选举县参议员，在各乡镇选出县参议员后，即将原有的县临时参议会撤销，成立县参议会。县参议会系根据《四川省各县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四川省各县参议会参议员选举办法》所组成的，在形式上与县临时参议会有所不同。县参议会的内容要点为：（一）县参议会参议员的人数按照各县乡镇数字而定，每乡镇一人，最少的只有十几名参议员，最多的有六七十名参议员。（二）县参议员由乡镇民代表用无记名投票法选举，因为他们不是由享有选举权的公民直接投票选举的，一般称为“间接选举”^①。（三）县参议员的任期定为两年，连选得连任。县参议会每六个月开会一次，由县长召集，必要时得由县长或县参议员 $\frac{1}{3}$ 的请求，召开临时会。开会的时间定为一周，必要时得延长三天到五天。（四）县参议员有提案权、表决权、询问权（与质问权不同）和选举权。选举就是选举县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和省参议员。（五）县政府的年度施政计划和年度预算应由县长提请县参议会审议。审议只是提供意见，对县政府并无绝对的约束力。更其重要的是，县参议会与县政府如有争议，不得自行处理，应呈请省政府核定。这一条与过去对付临时参议会一样，原是用来控制县参议会的，后来事实证明，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各县县长都有一套拉、打、吹、捧的做官本领，有不少县参议员又蝇营狗苟，别有企图，甚至同县长里应外合，狼狈为奸，从来省政府就没有收到过什么“呈请核定”的公文（他们也有在私下向我控告县长的，那是另一回事）。县参议会自称为

^① 依照国民党行政院所颁行的《市参议会参议员选举办法》，市参议员系由全市享有选举权的市民用无记名投票法选举，而不是由镇民代表会选举。一般称其为“直接选举”。

一县的“民意机构”，尽管在形式上与临时参议会有所不同，究其实际仍是县政府不折不扣的御用机构。如果说真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盘踞在县参议会的土豪劣绅、袍哥大爷、党棍和团棍为数更多，从2000多名增加到4000多名。他们打着“民意代表”的招牌，人数多，串连广，神通大，作恶的机会和办法就更加广泛而深入。他们的主要财源是：经征粮食、代购军粮、包征捐税和包揽词讼。也有某些县参议员洁身自好，有所为而不为，可是这样的人毕竟无多，在县参议会中起不了什么作用。

（五）成立省参议会

从地方组织的级别来说，成立省参议会原不属于“新县制”的范围，由于各县既已成立了县参议会，也就不能不撤销原有的省临时参议会，成立省参议会。这件工作，同样是我经手办理的，所根据的法令是国民党行政院颁行的《各省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各省参议会参议员选举办法》。

省与县虽同属地方组织而毕竟有所不同，因而省县参议会有着其不同之点，也有其相同之点，兹就两者作一比较，可以看出省参议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省县参议会主要不同之点为：（一）县参议员系每乡镇一人，省参议员系每县一人。四川省140多个县（包括省辖市，设治局和管理局），就有140多名省参议员。（二）县参议员由乡镇民代表会选举，省参议员由县参议会选举（均用无记名投票法，以票多者当选）。（三）县参议会每六个月开会一次，由县长召集，必要时得由县长和县参议员三分之一的请求召开临时会。开会的时间原则上为一周。省参议会每年开会一次，由省政府召集，必要时得由省政府和省参议员三分之一的请求召开临时会。开会的时间原则上为一个月。（四）县参议会闭会期间，由正副议长驻会处理日常事务，待遇与县长同。省参议会在闭会期间设置驻会委员会，以每10人选举一人组织之，正副议长为当然委员，驻会委员的待遇与省政府委员同。每周开会一次，由省政府各厅处局长出席报告工作，并接受询问。省县参议会主

要相同之点为：（一）省县参议员的任期均为两年，必要时得延长任期一年或二年，连选得连任。（二）省县参议员均有提案权、表决权、询问权和选举权（省参议员系选举正副议长、驻会委员和国民参政员）。（三）省县政府的年度施政计划和年度预算应提交省县参议会审议。（四）省县参议会与省县政府如有争议，应呈请上级行政机关核定（在省系呈请国民党行政院核定）。关键在于省县参议会的职权如何以及省参议会与省政府之间的争议由谁解决，从这两点来衡量省参议会，它同县参议会在性质上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在四川省参议会140多名参议员中，国民党党员占80%，其余是青年党和民社党的党员以及无党无派的所谓“社会贤达”，就整个省参议会来说，仍为国民党一党所包办。有不少的省参议员原是过去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各有一套玩弄政治的经验和手法，尽管他们的职权有限，可是依然可以利用提案权提出这样和那样的议案，使省政府难于处理；利用表决权对省政府所提出的交议案，特别是一年一度关于征收和征借实物的交议案，进行讨价还价；利用询问权对省政府各厅处局长提出口头询问，实行“疲劳轰炸”。其实某也的用意如何，某也的企图何在，大家都心中有数，只须曲予周旋或者多所变通，有时甚至在幕后成交，一切问题不难迎刃而解。所谓“一省民意机构”的省参议会，不过哗众取宠，自便私图，如是而已。

（六）对公职人员和省县参议会进一步的控制

为了进一步控制乡镇长、副乡镇长、乡镇民代表和省县参议员的人选，国民党考试院特意制定了一种《公职人员资格审查登记办法》。这个办法系以省县参议员为甲种公职人员，乡镇长、副乡镇长和乡镇民代表为乙种公职人员。前者应在各该省政府填表申请登记，后者应在各该县县政府填表申请登记，经省县政府审查合格后给以合格证书，始取得公职候选人的资格。如未持有合格证书，不得参加竞选，即使当选为省县参议员、乡镇长、副乡镇长

和乡镇民代表，亦应作为无效。其控制之严，也就是要借此排除一切异己分子，实为古今中外所未有。据戴传贤（戴当时是国民党考试院院长）对我说，这是他的精心得意之作。因此经常发生选举诉讼，我以民政厅长而兼选举监督，处理这类的案件，自己也感觉不胜其烦。有某些头面人物参加省县参议员竞选却没有事先取得甲种公职候选人的资格，而是我私下告诉承办人员代为填表申请登记，并给以合格证书。

进一步控制省县临时参议会和省县参议会的办法是，根据国民党中央党部与行政院的联衔密令，从省县临时参议会到省县参议会，所有的秘书长和秘书（省级设秘书长，县级设秘书）都是由省县党部秘密推荐的国民党党员充任。他们承省县党部之命，在议会内部组织“党团”，操纵一切。例如四川省参议会，从临时参议会起一直就是由省党部向省政府秘密推荐转请行政院任命的复兴社分子罗文谟充任秘书长。以议长和副议长为核心^①，罗文谟为总干事，组成“国民党党团”，在幕后发号指使的则是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他们操纵议案，把持选举，并奔走于省政府与省参议会之间作出卖民众出卖参议员的种种活动。在省参议会召开大会期间，他们的活动就更为紧张，我曾被邀参加过他们的秘密会议。不过“党团”内部分子甚为复杂，有时并不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一切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有一二厅处长明白了这种内情，也拉拢一部分省参议员组成小集团，来直接运用省参议会。

（七）县长的甄审与任用

1938年秋，我从湖南调往四川，路过汉口去见蒋介石，蒋对我说，四川情形复杂，王缵绪又是军人，要我在用人行政方面多

^① 在省临时参议会成立之初，议长是李肇甫，副议长是向传义。1940年冬，张群做四川省政府主席时调李肇甫为省政府秘书长，由向传义任议长，唐德安任副议长。及成立省参议会，仍由向、唐两人分别充任议长和副议长。

加迁就。到了重庆，我把蒋介石的话告诉了张群，张认为我同王缵绪将来最容易发生争执的是任用县长，无妨假传命令，说蒋介石要他办理县长甄审，用人一秉大公。假传命令果然有效，在王缵绪勉强同意之下，由我起草了一个《四川省县长甄审办法》，提交省政府委员会通过后再呈请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准施行（因为蒋介石下过一道密令，该会对四川省政府有督导之权）。这个甄审办法的主要内容是：（一）甄审县长由省政府全体委员组织县长甄审委员会负责办理，以省政府主席为主任委员，民政厅长为副主任委员。（二）甄审县长的第一步为审查资历（须年满30岁，体格强健，曾在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曾任荐任职三年以上或委任职五年以上，始得应审）；第二步为举行口试，如资历审查未能合格即不得参加口试。（三）经县长甄审及格的人员称为“备用县长”，嗣后任用县长须就备用县长中依法遴选委派。

尽管如此，可是王缵绪不愿受此约束，依然要我在备用县长之外任用他的私人，有时还硬性指定必须派为某县县长。我为了避免同他闹翻，有时虽借词延宕和给予顶回，而仍以迁就的次数为最多。兹举一事为例，有一次王缵绪带同一位姓杨的前来见我，并当面交付此人可做简阳县长，要我立即决定。王去后，我留杨某细谈，始悉此人染有鸦片嗜好已到了声音嘶哑的地步。我把实情告诉了王缵绪，王却非常坚持，甚至说一切由其负责，与我无关。我终于派了这位姓杨的为简阳县长。事后有人对我说，杨某曾以5万元贿赂走王的私人保镖唐毅和王的姨太太银蝴蝶的门路，所以指定要简阳县长。我不便对王直说，把此项传闻告诉了王的大女婿熊觉梦，请其转告王缵绪。杨某到简阳后不久，即有人控告他贩卖鸦片和吸食吗啡，经派人查明属实，不到半年，我即将其撤职。不但任用县长如此，对任用直辖市市长、直辖市警察局长和行政督察专员也同样由王指名硬派。这些人一到地方上便胡作非为，那时已成立了“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常有参议员对我提出询问，使我非常难堪。

我在四川做了八年民政厅长，经过三个主席，先后办过三次县长甄审。第一次甄审县长系在王缵绪做主席的时候，录取了备用县长20多人。第二和第三两次甄审县长系在张群做主席的时候，一次录取30多人，一次录取50多人。在这100多名备用县长中，就年龄说，绝大多数在35岁到45岁之间，就籍贯说，本省人约占70%，外省人约占30%。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每次参加甄审的人都并不怎样踊跃。原因是：做县长诚然有地皮可刮，可是更可以大刮其地皮的则有各县的田赋管理处副处长（处长一职系由县长兼任，掌握实权的是副处长）和仓库主任。在当时曾流行着这样两句话：“从政（指做县长）不如从良（指做田赋管理处副处长），从良不如当娼（指做仓库主任）”，于此可见一斑。还有一些人已改营商业，也有一些人做了省县参议员，也就无须经过甄审备用一套麻烦手续去做县长了。即在已取得备用县长资格的，如另有出路，亦不愿“辕门听鼓”，长期候差，而远走高飞。

关于县长的任用，在王缵绪做主席时期非常混乱。蒋介石兼理主席时，系由秘书长贺国光代行主席职权，贺为避免地方军人的请托，不愿轻易更动县长，为时仅只一年，总算平平而过。及张群做了主席，我同他私下约定，仍维持县长甄审办法，其时向张群和我推荐县长的，不外CC、复兴社和地方军人三个方面。即一律以必须经过甄审作为挡箭牌。我们还进一步约定，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必须就现任县长中遴选升充。但是无论任用县长和专员，仍保留一条例外，以免在必要时无法应付。按照国民党政府颁行的《省政府组织条例》，县长的任免应由民政厅长提案交由省政府委员会通过，我的实际作法是，先同张群秘密商定一张任免县长名单，以主席交议方式临时提交省政府委员会，由我略作说明，如无人提出异议，便照原案通过。省政府委员们认为张群过于独断专行，曾不止一次地在私下对我大发牢骚。因此在拟具任免县长名单时不能不照顾到各方面的关系，一句话，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大家心照不宣，实行分赃。

“千里为官只为财”，做县长而能奉公守法，不大刮其地皮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只要刮地皮而无人控告，或者手续做得干净利落，查不出真凭实据，省政府也就官官相卫任之听之。此之所谓刮地皮，并不包括县长的“合法收入”在内。例如吃吃空缺，挪用公款做做生意，以及因征兵、征粮、征工、征税应得的奖金、提成、手续费和其他例规，都是县长的“合法收入”。尽管这种收入已大有可观，可是在140多个县长中，因贪赃枉法而被撤职和撤职查办者所在多有。还有一些县长贪残酷虐，胆大妄为，以致天怒人怨因而陷于刑辟和为民众所制裁的，亦颇不乏人。例如万县县长黄某因贩运鸦片和成都市市长杨某因囤积小麦，均被军法执行总监部处以死刑。又如绵竹县县长某（已忘其姓名）因自己囤积了大批绵州大曲而又厉行禁酒，茂县县长黄某因私收烟税而又厉行禁烟，均为民众激于义愤所枪杀。因为峨眉县县长某（已忘其姓名）和渠县县长李某因见火不救，几乎使整个县城化为灰烬，新都实验县县长陈开泗因不择手段乱拉壮丁，均先后酿成很大的民变。在后者的事例中，峨、渠两县县长曾经省政府撤职查办，永不叙用，陈开泗却“好官自为”，反而升为南充区行政督察专员，后来还继我之后做了四川民政厅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考试院要四川省政府取消“县长甄审办法”，举行县长考试。临时组织了一个县长考试委员会，以主席张群为主任委员，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刘光华和我为副主任委员，其他委员由省政府委员充任。这次考试只采取了“候补县长”（经考试及格的称为候补县长）20人。

（八）加强了对四川人民的奴役压迫摧残剥削

按照“纲要”规定，各县县长应由省政府直接委派，县参议会暂不选举县长。乡镇民代表会可以选举乡镇长、副乡镇长，而县参议会却不能选举县长，这当时是一种欺骗。它的主要用意仍在于由省政府直接掌握着各县县长人选，如认为所派的县长不能奉行一切反动政令，或者破坏它的反动政令，即随时可以下令撤

换，不至于像省县参议员那样必得在任期满了之后才不再令其当选。在任期未满以前还要用尽方法加以控制运用。因此国民党反动政府之期望于各县县长的，只要他们能够奉行一切反动政令，其他在所不计，还经常为他们撑腰。

在四川，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完成了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一套反动政治措施，也就是他所命名的“新县制”。其结果是，扩大了县政府的组织，加强了县长的权力，使百万以上的县参议员、乡镇民代表、乡镇长、副乡镇长以及保长、甲长一齐披上了“自治人员”的外衣，再以县长为领导核心，结成为一个以自治之名而行法西斯专制独裁的反动政治集团。它同时又是一个以食人肉喝人血养肥了自己的贪污集团。操纵控制纵容包庇这些反动政治集团和贪污集团的，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所谓上级行政机关的省政府，为虎作伥、助桀为虐的是自称“一省民意机构”的省参议会（包括省临时参议会），而从上到下贯穿着的一条黑线则是所谓“新县制”。

蒋介石要在四川实施“新县制”的企图，原在于任其所欲地征兵、征粮、征工、征税来维持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也正如他的企图一样，抗战期间在四川征集了200多万壮丁（其实就是拉兵），充当炮灰；征收、征借和征购了两亿担（每担100斤）以上的粮食，供给所谓“军精民食”；又征调了2000万以上的民工（系人数，不是工数），建筑所谓“军事工事”；还在四川办理食盐、食糖、烟类、酒类、火柴等等的专卖，花纱布、桐油、猪鬃等等的管制，并厉行各种各样名目多、税率重而又是重复课征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究竟搜刮了多少现金和实物，连国民党反动政府也无法统计。拿这些东西维持了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同时也喂饱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以及蒋介石集团的每一个成员。最后的结果是，“新县制”加强了对四川人民的奴役压迫摧残剥削，使几千万劳动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

从“新县制”到“省县自治通则”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以在四川搞的一套“新县制”为蓝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域内普遍推行。1946年秋，我被调为内政部次长^①（当时的内政部长是张厉生）^②，这时正是各省成立省县临时参议会的时候，实施“新县制”系由内政部主管，我又参加了这一反动的政治活动。

由于张群的拉拢，青年党和民社党已早同国民党有所勾搭，及蒋介石撕毁了旧政协协定，即脱离民主同盟，公开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他们对蒋介石提出，除参加国民党的中央政权外，还要参加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对参加地方政权所定的分赃办法是，青年党和民社党党员必须占各省县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总名额的三分之一。他们（尤其是民社党）提不出这许多参议员，于是捕旗招兵，到处拉人。有不少国民党党员因为有参议员可做，纷纷加入了青年党和民社党。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异议，又同青年、民社两党来一个秘密协定，指定我和青年、民社两党的负责人成立一个审查小组，负责审查他们所提出的参议员候选人名单。审查的标准非常简单，只要不是国民党党员（已正式申请脱党并经过核准的除外），即不问其籍贯如何，年龄如何，资历如何，给以通过，再由内政部提请国民党行政院会议决议公布。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急于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要召开第一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再进而召开第二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在抗战前，国民党立法院（那时的立法院院长是孙科，“行宪”前也一直是孙科）已经起草了一个叫做“五五宪法”的“宪法草案”，蒋介石和青年、

① 内政部次长正式任命时间是1947年1月29日——编者。

②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第354页载，张厉生抗战后任行政院副院长、政务员委，未担任内政部长事。

民社两党都不同意这个草案，于是由蒋介石指定王宠惠、王世杰和吴铁城另行起草，民社党的头子张君劢在美国主子的策划下，对起草中的“宪法”提了十几条意见，其中有一条是实行“省县自治”。蒋介石接受了这一意见（当然，蒋介石是另有他的政治企图的），可是玩了一个花招，在蒋记宪法草案中规定，各省县可以根据国民党政府制定的“省县自治通则”草拟“省县自治法”，实行“自治”。

蒋记宪法在第一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后，国民党行政院（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是张群）随即命令内政部起草所谓“省县自治通则”。内政部组织了一个“省县自治通则起草委员会”，以我为召集人，参加会议的有各司司长（总务司长除外）、参事和专门委员。经过四个月之久，草成了三种自治通则草案：《省自治通则草案》，《县自治通则草案》和《市自治通则草案》（此项通则草案，因自治尺度的宽严不同，又分为甲乙两案），由内政部一齐呈报了行政院。

经过行政院会议决议，组织了一个“省县自治通则审查委员会”，以甘乃光为召集人（甘当时是行政院秘书长），我被指定为审查人之一，有关各院部会署都有代表参加。审查的结果是，把《省自治通则草案》与《县自治通则草案》删繁就简，合而为一，统名之曰：《省县自治通则草案》，同时以制定市自治通则和蒋记宪法之所无，无须另定《市自治通则草案》，只在《省县自治通则草案》中规定这样一条：“市自治准用省县自治通则之规定。”

在行政院将《省县自治通则草案》送给蒋介石之后，由蒋介石提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由该会决议交由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审查，以王世杰为召集人（王当时是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我代表内政部，甘乃光代表行政院参加了这个审查会。会议一开始，孙科便大骂行政院简直是胡闹，他说，“总理”（指孙中山先生）从来就是反对省自治的（按孙中山先生是主张省自治的，孙科是胡说——笔者），什么人要办省自治？为什么

要制定省自治通则？甘乃光起而解释，孙科就更加光火，几至无法收场。最后由王世杰提议，由陈布雷、甘乃光、林彬、史尚宽（林当时是国民党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史当时是国民党考试院秘书长，均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法制委员会委员）和我组成五人小组，以陈布雷为召集人，先作初步审查。五人小组只就原草案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即提交联席会议照案通过，呈报了蒋介石。这个《省县自治通则》完全是“新县制”的翻版，它的内容如何就用不着多说了。

此时的蒋介石正忙于召开第二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自己做“总统”，对“省县自治通则”没有作任何处理。等到他做了“总统”，而天下大势已去，“新县制”也好，《省县自治通则》也好，也就不再为害于中国，遗毒于中国人民了。

中国所得税创办初期 税制内容简述

张 瑞

本文作者已故 生前系留法经济硕士，解放前曾参与国民党政府直接税法的制定工作，解放后曾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山东省委员会会员。文中主要叙述中国所得税产生的过程，所得税的范围分类、减免、税率、征募和征收办法等。

一、中国创办所得税的经历

中国所得税倡议于清末，当时曾拟定所得税条例，提交资政院，乃院议未决，国体已变。

民国成立以后，财政部又有创办所得税的拟议。1914年1月，颁布所得税条例凡27条，其内容颇有仿照日本所得税制度，以综合课税方法为主，分所得为两类：第一类为法人所得及公债公司债等利息所得，第二类为不属于第一类之各种所得。第一类中之法人所得，由各事业年度总收入内，扣除当年度支出，前年度盈余，各种公课，保险费及准备等，就其余额课以2%的比例税率。第一类中之公债公司债等利息所得，即就其收入金额，课以1.5%的比例税率。第二类所得，由一切收入总额内，减除已课所得税的法人利益的分配额与公债公司债等利息所得，以及经营各种事

业的费用及各种公课等，以其余额为课税标准。

上项条例，当年并未实行。至1915年财政部因感于我国经济组织很不健全，工商业会计帐簿简陋，调查统计又极缺乏，如欲全面课征，难收实效，故决定分期举办。乃于8月间订定《所得税第一期施行细则》16条，拟先就(1)当商、盐商及由官特许或注册之公司行栈及(2)议员岁费，官公吏俸给、年金、给予金及律师之酬金、工程师之薪津、医师药剂师之薪酬，公司大商号经纪人之薪资等先行征课。嗣因袁世凯称帝，云南起义，政局变更，这一拟议又未克施行。

1918年，财政部又拟重申前议，通令推行，无如各省当局，均观望莫前，终成泡影。

1920年，推行所得税之议又起，财政部乃于7月1日成立所得筹备处，将1915年所订《所得税第一期施行细则》呈准废止，另订《先后征收税目》，令各省财政厅议估，然后由财政部将切实推行所得税的议案，提出于国务会议，决议定自1921年1月1日开征，并明定所收税款，决拨作教育及实业经费之用。嗣各省议会及商会，均纷纷通电，请求缓办，财政部不得已乃展期3月，而各省商民仍多反对，致推行以后，税收极微，全年收入仅有10310.67元，且多系由官俸中扣除者，其后所得税即无形中陷于停顿。

1927年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后，为了整理财政，1928年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当时财政上的主要问题是为“关税自主”，而要关税自主，首须裁撤厘金。由于裁厘以后，税收上的损失很大，作为抵补之法，对于各省则举办营业税，至于中央，则议办所得税。为此，财政部于1929年1月重将1914年所订的所得税条例加以修正，同时复将1921年所订所得税第一期施行细则加以改订，以期互相适合，并分别各种所得，分期开征，其所规定于第一期开征者，为营利事业及债券利息之所得，然均未实行。是年9月，财政部凯末尔设计委员会曾提出所谓《所得税说帖》，

建议我国当时尚不宜采行一般所得税，并谓就特殊或部份所得税加以进一步之研究，亦不能证明此种有限制之所得税适于采用。至其原因，一部分在于所得税本身之性质，一部分基于我国工商企业会计之现状，而最主要者，则在乎行政效率之薄弱。至1930年11月该委员会在其《税收政策意见书》中犹坚持其主张。1929年修正的所得税条例之所以欲行未果，及其以后5年很少有人倡议举办所得税，未始不是受了凯氏所提意见的影响。

1934年5月财政部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以后，即成立了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指定专人开始积极筹划所得税创办事宜。1935年7月，财政部重又拟订了《所得税暂行条例草案》，呈经行政院审议，送呈中央政治会议核定。经中央政治会议审议研究后，于1936年6月制定了创办所得税原则八项，财政部按照上项原则，将原条例草案加以修正，送经立法院审议通过，制定了《所得税暂行条例》计22条，于同年7月21日经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同年8月，财政部拟订《所得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计49条，经行政院审议通过，以院令公布，定自1936年10月1日起施行。嗣后又制定《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税征收须知》，《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税征收须知》及《第三类证券存款所得税征收须知》，于1937年5月31日由财政部明令公布施行。先是财政部于1936年7月1日设立直接税筹备处，筹划所得税及遗产税一切开征事宜；至10月1日改称所得税事务处，综理全国所得税稽征事务，并于各省市由部派委员组织所得税办事处，主持各该省市所得税稽征事务。1940年7月，遗产税也继之实施，所得税事务处又改称直接税处，各省市所得税办事处改称为直接税局。

自清末即开始倡议的中国所得税，从倡议到实际开征，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才算真正诞生了，在中国财政史上可以说是件大事。

现将中国所得税创办初期的税制内容，作一简略的阐述如下：

二、中国所得税的课税范围与分类

所得税的课税范围，有国籍主义、住所主义和经济所属主义三种原则。如采国籍主义，则不问其在国内有无住所，也不问其所得之出自本国或外国，凡为国人，均须纳税。如采住所主义，则不问其为本国人或外国人，也不问其所得之来源，凡在国内有住所或居住满若干时期者，即须纳税。又如采经济所属主义，则即不问其国籍，也不问其住所，凡其所得系取自国内者，概须纳税。现代世界各国，大都兼采这两种或三种原则。中国所得税施行细则第五条规定：“凡营利事业本店在中国国外，分支店营业所在国内，或分支店营业所在国外，而本店在国内者，无论其资本是否与本店互为划分，均就其在中国境内营业盈利之部分计算所得额，准用暂行条例第四条税率课税”；又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税征收须知第二项规定：“施行细则第五条所称分支店营业所在国外，而本店在国内者，系指分支店营业所全部在国外者而言，如分支店一部分在国外者，其在国外部分营业上之盈利，应于计算本店纯益时将其剔除”；又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税征收须知第三项规定：“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及其他从事各业者，薪给报酬之所得，无国籍、职务或业务之别，均照施行细则第27条第1项规定，扣缴所得税”，就此可知国人在外国营业，可无须缴纳所得税，若其盈利系来自国内者，仍须计算照缴，则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税系采用住所主义。唯第三类证券存款利息所得税征收须知第一项规定：“公债包含中央及地方政府发行之债券、库券、证券、凭证”，而未提及外国公债，则因事实上征收有困难，又为采用住所主义之一例外。

至中国所得税的分类，按所得的性质，分为营利事业所得税，薪给报酬所得税和证券存款利息所得税三类，现逐类分述于下：

(一) 第一类为营利事业所得，凡以营利为目的而经营之事
业，其所得属之。复依其资本来源及营业的性质，分为下列三
项：

- 甲、公司商号行栈工厂及个人营利之所得；
- 乙、官商合办营利事业之所得；
- 丙、一时营利事业之所得。

上列甲项规定，凡私人举办之事业，不同其为公司商号行栈或工厂，均须一律缴纳所得税。又官商合办之企业，有私人资本在内，如不加以征税，则与一般完全私人资本之企业相较，显有不公平，故于第一类所得中列入乙项。又各种团体，如非以营利为目的，乃属慈善教育宗教或其他非营利性质者，则虽有所得，也不课税。良以此等团体，都以社会利益为目的，不加课税，系含有奖励的意义在内。然营利所得，并不限于继续营业的企业，尚有为一时之目的而经营获利者，自也须同样负担纳税的义务，故于第一类所得中又列入丙项。根据《所得税施行细则》第12条规定，凡企业买卖与本业无关之物品证券或金银货币，而其所得又不在本业务收入项下计算者，以一时营利事业论，在非营业之个人，则买卖物品证券或金银货币而不于约定期日以现货交割者亦同。又航空奖券中奖金作一时营利事业所得论。惟买卖不动产，如非属于以地产买卖为营利之事业者，则不予课税。

(二) 第二类为薪给报酬所得，包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及其他从事各业者的薪给报酬所得。所谓公务人员，根据《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税征收须知》第二项，系指下列各项：

1. 各级党部及其所属机关之人员；
2. 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关之人员；
3. 海陆空军官佐及警务人员；
4. 国立及省市县立学校之职员教员；
5. 官营事业之人员；
6. 地方自治机关之人员；

7. 其他依法令从事公务之人员。

所谓自由职业者，系指独立执行业务的律师、会计师、医师、建筑师、工程师等而言。所谓其他从事各业者，系指服务于一切工商企业之职工而言。

薪给报酬所得的内容，范围甚广，其在公务人员，则一切俸给、薪金、岁费、奖金、退职金、养老金及其他职务上所得的给与金，均包括在内；其在自由职业者及其他从事各业者，则凡一切因职务及工作上所受的薪给、年金、报酬、及其他金钱之给与均属之。

(三) 第三类为证券存款所得，包括证券及存款两项利息所得。所谓证券，系指各级政府所发行的公债、证券、各种公司所发行的公司债券和股票。根据《第三类证券存款所得税征收须知》第二项规定：“股票利息，以股份有限公司及股份两合公司之股息为限。”故股票红利不在第三类所得范围以内。至于存款，则包括下列两项：

1. 银行钱庄所收存款之利息；
2. 银钱业外其他营利事业所收存入款项之利息。

由此可知，凡存于个人之存款，可无须缴纳所得税。此外，人寿保险被保险人满期领受的保险金额超过保险费总额者，其超过部分，也视同储蓄存款利息之所得，予以课税；但劳工保险金额则免予课税。又储蓄会储蓄中奖金，属于存款利息所得。

三、中国所得税的减免

中国三类所得税中，第一及第二两类均设有免税点。属于第一类甲项者有二：其一即公司、商号、行栈、工厂或个人营利事业，其资本不满2000元者免税；其二即营利所得合资本实额不满5%者免税。这种免税规定，无非保护工商企业，使资本薄弱及小有所得者，均有从容发展的机会，而无感受纳税的压力。至第

一类乙项官商合办营利事业之所得，则未设有2000元以下资本的免税点，这是因为官商合办企业，资本额类多甚钜，其在2000元以下者，绝少其例，故仅凡纯利不满资本实额5%者，免予课税。至于第一类丙项一时营利事业之所得，则除按照甲项计算者外，凡所得不满100元者免税。

第二类为薪给报酬所得，其免税的规定尤属重要。凡靠薪金或服务酬劳以资生活者，如其薪金或酬劳所得，仅足以维持最低生活费之用，当不能课之以税。《所得税暂行条例》中对此类所得，定为每月平均不及30元者，为免税点。此处之所以加平均二字，是因薪给报酬往往有非于每月发付者，如商店中之红利，公务员的奖金量，如不就其平均之额计算，显属不公平。况且第二类所得中，尚包括自由职业者及其他从事各业者在内，但他们的收入，每月各有不同，甚或多寡悬殊，自不能不加以平均计算。

此外，第二类所得的免税项目，按照条例规定，尚有下列三项：

1. 军警官佐士兵及公务人员因公伤亡之恤金；
2. 小学职教员之薪给；
3. 残废者劳工及无力生活者之抚恤金、养老金及赡养费。

至第三类所得的免税项目，按照条例规定，也有下列各项：

1. 各级政府机关之存款利息；
2. 公务员及劳工之法定储蓄金利息；
3. 教育慈善机关或团体之基金存款利息；
4. 教育储金之每年所得息金未达100元者。

此外，尚有下列两项，也在免税之列：

1. 驻在中国境内各国外交官之所得；
2. 在中国境内居住未满一年之外国人，其所得之来源不出中国境内者。

唯以上两项免税项目，以各外国对于中国有同一之待遇者为限。

四、中国所得税的税率

中国三类所得税的税率，其方法各不相同。第一类采全额累进制，第二类采超额累进制，第三类采比例制。现分述如下：

(一) 第一类营利事业甲乙两项所得应课的税率，根据条例第三条规定，共分五级如下：

1. 所得合资本实额5%未满10%者，课税30%；
2. 所得合资本实额10%未满15%者，课税40%；
3. 所得合资本实额15%未满20%者，课税60%；
4. 所得合资本实额20%未满25%者，课税80%；
5. 所得合资本实额25%以上者，一律课税100%。

上列各级税率的决定，系以所得与资本实额之比率为准。此项比率，我们可称为所得率。根据所得率以决定税率，则一企业所得虽多，如其资本也多，相比结果，所得未满资本实额5%者，仍可无须纳税。

上述税率，系采全额累进制，每进一级，其全部所得均须按照该级税率计算之。

至第一类丙项所得应课的税率，凡能按资本额计算者，即依上述税率课税；其不能按照资本额计算者，依其所得额课税，其税率如下：

1. 所得在100元以上未满1000元者，课税30%；
2. 所得在1000元以上未满2500元者，课税40%；
3. 所得在2500元以上未满5000元者，课税60%；
4. 所得在5000元以上者，每增1000元之款，递加课税10%，至其税率达200%为最高限度。

(二) 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应课的税率，根据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共分六级如下：

1. 每月平均所得自30元至60元者，每10元课税5分；

2. 每月平均所得超过60元至100元者，其超过额每10元课税1角；
3. 每月平均所得超过100元至200元者，其超过额每10元课税2角；
4. 每月平均所得超过200元至300元者，其超过额每10元课税3角；
5. 每月平均所得超过300元至400元者，其超过额每10元课税4角；
6. 每月平均所得超过400元以上者，每超过100元之额，每10元增课2角，至每10元课税2元为最高限度。

上述税率，系采超额累进制，凡一级中之所得，其相当于以前各级之数，仍按照以前各级的税率分别计算，唯其超过之数始照本级较高的税率计算，计算手续上较为麻烦。为求简便起见，特另行规定每月所得之超过额不满5元者，其超过部分免税，5元以上者，以10元计算，如是则其课税额以所得每增加10元，变动一次。

(三) 第三类证券存款所得应课的税率，最为简单，即不论其所得多寡，一律课以50%的比例税率。

五、中国所得税的计算

计算各类所得税时，首先要确定其合于课税标准，然后减除减免额，应用税率以计算应纳所得税额。

(一) 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税的计算方法

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税的计算方法有二：其一为所得能按资本额计算者，甲、乙两项及丙项的一部分属之；其二为所得不能按资本额计算者，丙项的另一部分属之。前者计算较繁，而后者则较简。兹分述如下：

I、所得能按资本额计算的营利事业

按照条例第七条规定：“第一类之所得税，以纯益额计算课税。”又第三条税率的规定，则以所得合资本实额比率的大小而累进之。由此可知，计算此项所得税时，其先决条件，为确定纯益额和资本实额两项。

甲、纯益额的计算。关于纯益额的计算，施行细则第15条规定：“计算第一类所得时，应就其收入总额内减除营业期间实际开支，呆帐、折旧、盘存消耗、公课及依法令所规定之公积金，以其余额为纯益额，依照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之税率课税。”所谓收入总额，系指营业上实收及可收的总收益而言。包括营业收益、非营业收益及特别收益在内。所谓实际开支，则指营业上已付及应付未付的必要合理费用而言，如薪资、水电、房租、文具用品、舟车旅费、广告费、利息及律师会计师公费等是。呆账、折旧及盘存消耗等，也应由收入总额中减除之。公课则指各种缴纳政府的捐税而言，如营业税、房捐等是，唯所得税不应包括在内。因所得税系属直接税，按照实际纯益而课税，应于上年度纯益项下开支，不得作为本年度支出。而法定公积金，并非开支，也非损失，乃为事业盈利由法律强制各公司提留的部分，为政府所特许减除部分，视为免税项目，也未尝不可。

由上可知，税法中所称的纯益额，与普通会计上所称者微有不同，凡合于公司法组织的公司，必须减除法定公积金。对于此项纯益额，我们可称之为课税所得额。

至纯益额的计算时期，施行细则第八条规定：“第一类甲、乙两项营利事业之所得，得依各业习惯，每年计算一次，其不满一年者，就其营业期间之所得计算课税。”

尚有一点需加注意的，如本店及其分支店营业所同在中国境内，而其资本互为划分者，根据实行细则第六条规定，其所得额应分别计算之。

乙、资本实额的计算，根据施行细则第7条规定：“称资本者谓照公司组织实在缴足之股金，或其他组织实际投入之本金。有

公积金者，得按其总额三分之一并入资本计算。”因此，税法中所称的资本实额，即指实缴资本与公积金三分之一的合计额而言。至于公积金，根据“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税征收须知”第六项规定：“施行细则第七条第二项所称之公积金，凡法定公积、任意公积、盈余滚存等均属之。”可知一切公积、准备、盈余滚存以及资本公积，均包括在内。至历年营业而有亏损者，则于计算资本实额时，不得减除之。

丙、税额的计算。课税所得额（纯益额）和资本实额即已求出，则只须将课税所得额除以资本实额，视课税所得额合资本实额比率的大小，以决定其税率，然后以课税所得额乘此税率，即计算出应纳所得税额。

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一]某商号实际投入资本为4000元，某年度结算结果，获得纯益476.82元，因其资本业已超过2000元，依法应缴纳所得税。其纳税额可照下列方式计算之：

- (1) 课税所得额 ÷ 资本实额 = 所得率
- (2) 由所有率推知应纳税率
- (3) 课税所得额 × 应纳税率 = 应纳所得税额。

将上例中实际数字代入之，则如下：

- (1) $476.82 \text{ 元} \div 4000 \text{ 元} = 11\% \text{ 强}$
- (2) 根据条例第三条规定，推知所得率为11%者，其税率为40%
- (3) $476.82 \text{ 元} \times 40\% = 18.83 \text{ 元}$ 。

该商号应纳所得税为18.83元。

[例二]某有限公司额定股本为20万元，业已全数收足，已提公积金6000元，某年度获得纯益2.2万元，其纳税额可照下列方式计算之：

- (1) 实缴资本 + 公积金 $\frac{1}{3}$ = 资本实额

(2) 纯益 - 应提法定公积金 (即纯益 $\times \frac{1}{10}$) = 考税所得额

(3) 考税所得额 \div 资本实额 = 所得率

(4) 由所得率推知应纳税率

(5) 考税所得额 \times 应纳税率 = 应纳所得税额

以上例中实际数字代入之则如下：

(1) $200,000\text{元} + 6,000\text{元} \times \frac{1}{3} = 202,000\text{元}$

(2) $22,000\text{元} - 22,000\text{元} \times \frac{1}{10} = 19,800\text{元}$

(3) $19,800\text{元} \div 202,000\text{元} = 9.8\%$

(4) 根据条例第三条规定，推知所得税率为9.8%，其税率
为30%。

(5) $19,800\text{元} \times 30\% = 5,940\text{元}$ 。

该有限公司应纳所得税为5940元

I、所得不能按资本额计算的营利事业

第一类丙项一时营利事业所得，有并无确定的资本而不能按资本额计算者，则必另以他法计算之。根据条例第四条规定：“第一类丙项所得……。不能按资本额计算者，依其所得额课税。”所以，此项所得税的计算，较为简单，只须算出其纯益额，乘以应纳税率即可。至其纯益额的计算方法，仍与前述计算第一类甲乙两项所得的原则相同。唯其计算时期，因其为一时营利事业，应于各个交易结束时计算之。现设例子下：

[例三]某纸商从甲地购得大批新闻纸运至乙地应市，委托某纸号代为销售，得收益2330.60元，除去开支230.60元外，净余2100元。此项交易系属一时营利事业性质，因其并无确定的资本，应纳税率的计算，只可依照所得额的多少为准。其方式如下：

(1) 收益总额 - 营业开支 = 考税所得额

(2) 由课税所得额推知应纳税率

(3) 课税所得额×应纳税率=应纳所得税额

以实际数字代入之，则如下：

(1) 2,330.60元-230.60元=2,100元

(2) 根据条例第四条推知所得为2,100元者，其税率为40%

(3) 2,100元×40% = 84元

该纸商对于此项交易，应纳所得税84元。

(二) 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税的计算方法

第二类薪给报酬的内容，包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及其他从事各业者的一切薪给报酬，其计算方法，可分为两类：其一为公务人员及其他不独立从事各业者的薪给报酬所得，均按其原支额依税率计算，不得扣除任何开支，即公务人员膳宿津贴，属于职务上给予金之一种，也应与薪额一并课税；但公务人员因公支领的费用，如特别办公费、旅费等，均不属于薪给报酬的范围，不予课税，又驻外武官的交际费，根据财政部解释，也不课税。其二为自由职业者及其他独立从事各业者的薪给报酬所得，如有下列各项费用时，应先行扣除，以其余额为所得额：

(1) 业务所房租；

(2) 业务使用人薪给报酬；

(3) 业务上必需之舟车旅费；

(4) 公会会费；

(5) 业务使用人之膳宿开支，但以在业务所住宿或供膳者为限；

(6) 公课；

(7) 复委托费；

(8) 业务用具之修理费；

(9) 广告费；

(10) 邮电文具消耗及其他杂费。

以上各项扣除，均须为业务而支出之费用，如非因业务而发

生者，当不能予以扣除。就房租一项而言，如业务人即就其住所为营业所时，则其业务所占房租，不得超过房租总额的60%。又业务上必需之舟车旅费，以受有报酬者为限，且不得超过各个报酬额30%。

计算薪给报酬所得税的时期，以按月计算为原则，其以月计、年计或有定期者，均就全年或该期间之月数平均计算之。自由职业者的所得，每年结算一次，而按月平均之。其所得无定期或一时所得者，以各该月之所得额计算课税。例如各企业于每年年底往往有红利分给职工，则此项红利虽于年终始行获得，且其数额也非事先可以确定，但因其属于定期性质，自应分配于各月份平均计算之。又如一机关临时雇用人员，其时间不定者，则可就该月份的所得额计算之。

现将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税的计算方法，举出数例如下：

[例四]某甲服务于某火柴公司，月薪180元，则其应纳所得税额计算如下：

$$(1) (180 \text{ 元} - 100 \text{ 元}) \times \frac{0.20}{10} = 80 \text{ 元} \times 2\% = 1.60 \text{ 元}$$

$$(2) (100 \text{ 元} - 60 \text{ 元}) \times \frac{0.10}{10} = 40 \text{ 元} \times 1\% = 0.40 \text{ 元}$$

$$(3) (60 \text{ 元} - 30 \text{ 元}) \times \frac{0.05}{10} = 30 \text{ 元} \times 5\% = 0.15 \text{ 元}$$

(4) 满30元者课税0.05元

$$(5) 1.60 \text{ 元} + 0.40 \text{ 元} + 0.15 \text{ 元} + 0.05 \text{ 元} = 2.20 \text{ 元}$$

某甲每月应纳所得税2.20元

[例五]中医某乙于某年度全年诊金收入2500元，业务所房租380元，修理费124元，业务上必需的舟车旅费292元，电费84元，公会会费24元，其他140元，其应纳税额计算如下：

(1) 全年收入2,500元

(2) 全年费用总额为 $380 \text{ 元} + 124 \text{ 元} + 292 \text{ 元} + 84 \text{ 元} + 24 \text{ 元} + 140 \text{ 元} = 1,044 \text{ 元}$

(3) 每月平均所得额为 $(2,500 \text{元} - 1,044 \text{元}) \div 12 = 121.33 \text{元}$

(4) 超过不满5元者免税，故121.33元作120元论

(5) $(120 \text{元} - 100 \text{元}) \times \frac{0.20}{10} = 20 \text{元} \times 2\% = 0.40 \text{元}$

(6) $(100 \text{元} - 60 \text{元}) \times \frac{0.10}{10} = 40 \text{元} \times 1\% = 0.40 \text{元}$

(7) $(60 \text{元} - 30 \text{元}) \times \frac{0.05}{10} = 30 \text{元} \times 5\% = 0.15 \text{元}$

(8) 满30元者课税0.05元

(9) 每月应纳0.40元+0.40元+0.15元+0.05元=1.00元

(10) 全年应纳税额为1元×12=12元

(三) 第三类证券存款所得的计算方法

证券存款所得的纳税额，计算最为简易，就其实际所得的利息总额，乘以规定的税率即得，无须扣除任何开支，而且其税率采用比例制，一律均为50%。此类所得，也未规定最低免税额，即使微数的利息所得也应课税。

证券存款所得税的计算时期，条例中规定以每次支付或结算时付给的利息计算课税，而未明定划一的期限。这是因为各种证券各有不同的付息日期，而银行钱庄存款更有往来、定期、短期、长期之分，所以规定以每次支付或结算付给时计算课税。现列示一例如下：

[例六]某甲有定期存款于某国家银行，到期应得利息795.60元，则其应纳税额计算如下：

(1) $795.60 \text{元} \times 50\% = 39.78 \text{元}$

(2) 扣除10%手续费= $39.78 \text{元} - 7.96 \text{元} = 31.82 \text{元}$

某甲应纳所得税31.82元，由某国家银行付息时扣缴之。

六、中国所得税的征收

关于中国所得税的征收，可分为征收的方法、征收的机构和征收的手续三点予以阐述。

（一）征收所得税的方法

所得税的征收方法，并世各国原有综合征课制和分类征课制两种。自理论上言之，当以综合征课制较为公平完善，但实行上则感计算繁复，调查困难，必须先有普遍完善的会计统计制度，方期收效。分类征课制则计算较为简便，并可尽量采用源泉课税法，使税收达到确实原则。所谓源泉课税法，是指生产所得的来源、场所，也就是所得的支付人，在其支付时，根据税法规定，负有扣缴所得税的义务，也可称之为扣缴法，与由领受或获得所得者自行申报缴纳所得税的所谓申报课税法不同，申报课税法也可称之为自缴法。在综合征课制之下，因亦可采用扣缴法，但手续则较麻烦。财政当局鉴于我国当时社会经济情况，工商企业会计制度，即简陋不全，社会统计资料，又极感缺乏，为求推行便利和税收确实起见，特采用分类征课制，暂分所得为营利事业所得、薪给报酬所得和证券存款所得三类分别征收之，其中凡有确定的所得源泉可稽者，一律采用扣缴法。

根据条例及施行细则规定，下列各种所得，采用扣缴法：

1. 第一类丙项一时营利事业所得，有支付所得之人或单位者，如在交易所中买卖物品证券或金银货币之所得是。
2. 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有支付薪给报酬所得之人或单位者，如公务人员之所得是。
3. 第三类证券存款所得，有支付利息所得之单位，如公债有支付公债利息的银行，股票有支付股息的公司，存款有支付利息的银行或钱庄等是。

下列各种所得，则采用自缴法：

1. 第一类甲乙两项营利事业所得及丙项一时营利事业所得之无支付所得之人或单位者，如公司、商号、工厂等年终结账后的纯益等是。

2. 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之无支付所得之人或单位者，如自由职业者的报酬所得是。

由上可知，扣缴方法和自缴方法的采择，系以有无支付所得之人或单位为准则。事实上无论何种所得，都必有其来源，即都必有其支付的人或单位，例如自由职业者的医师、律师、会计师等，其所收的诊费、公费等，无不有其支付的人或单位。然而税法中所称，有支付所得之人或单位者，其意义实与普通意义不同，因为税法所谓所得，实指每次或每期结算所求出的课税所得而言，而并非泛指一般收入的所得。在第一类甲乙等项营利事业所得和第二类自由职业者薪给报酬所得中，因其来源初无一定且其每月收入之中，含有费用开支在内，当不能分别计算其所得，因之，税法中规定就其每月或每期结算后的纯益为课税所得，因其为各种所得综合的结果，支付所得的人或单位，实难一一查究，故称为无支付所得之人或单位。

（二）征收所得税的机构

中国所得税的征收机构，采取分立负责制度，以收互相监督之效，故经征、审查及收款，均分设机构办理之。具负经征责任的机构，在中央为直接税处，在各省市为直接税局。直接税处直隶属于财政部，统辖一切所得税的经征事务，直接税局则办理各该省市的所得税经征事务，直属于财政部。各省直接税局之下，分区设立分局，就近办理各该区所得税经征事务。经征机构的职务，首在决定各纳税义务人的所得额，并计算其应纳的税额，责令缴纳之。

唯经征机构决定的纳税额，是否恰当，有时或不免发生异议而不服，因之犹需经过一番审查的手续。办理审查手续的机构，称为审查委员会。为达到分立负责的目的起见，特于各县市或其

他经征区域设置之，并不隶属于省直接税局或区分局。审查委员会设委员三人至七人，均为无给职，由财政部于当地公务员，公正人士及职业团体职员中聘任之，任期三年。审查委员会开会时，主管经征机构长官或其代表应列席。

所得稅額决定以后，纳税义务人如无异议，自应于一定期限内缴纳之。收受此项税款之机构，为各地国家银行或三等邮局以上的邮政机构。此收款机构之所以与经征机构划分者，也为分立负责之一端，使税額的决定和税款的收受，得收互相牵制之效。

（三）征收所得税的手续

中国所得税的征收手续，可分为申报、调查、审查、缴纳、退税及奖惩六步。纳税义务人均须向主管经征机构申报所得额，主管经征机构收到此项报告以后，得随时派员调查，决定其所得额及应纳税额后，应通知纳税义务人；纳税义务人接到上项通知后，如有不服，得请求复查再行决定；如复查决定后，纳税义务人仍有不服，得申请审查委员会予以审查；如审查决定后，再有不服者，得提起行政诉愿或诉讼。至税款的缴纳，则当税額决定而无不服后于一定的期限内缴纳。如纳税义务人误纳或溢缴所得税款，经主管经征机构审核发觉或纳税义务人自行声请，审核确实者，应予退税。如纳税义务人不依期限报告或怠于报告者，隐匿不报或为虚伪报告者，以及不依期限缴纳税款或企图逃税者，主管经征机构将予以各种严厉的惩处。扣缴所得税者如能依照法定手续期限完成其扣缴之职责者，主管经征机构则予以相当的奖励。现将逐步手续详述于下：

1. 申报

申请为所得税征收上的第一步手续，而且是必经的手续，不论其属于何类所得，也不论其征收方法采用扣缴法或自缴法，其所得额均须申报，唯其申报的负责人和申报的期限，则各有不同。

负责申报者，在扣缴所得税的各类所得，如支付所得之人或

单位，例如第二类中公务员及各工商企业职工的薪给报酬，由扣缴所得税的各该机关或企业负责申报；第三类证券存款所得由扣缴所得税的各银行、钱庄或商号负责申报；第一类丙项所得之有支付所得的个人或单位者亦然。反之，在自缴所得税的各类所有得，则应由领受或获得所得的人或单位，即纳税义务人负责申报之，例如第一类甲乙两项所得及丙项所得之无支付所得的人或单位者，其所得额均由纳税义务人负责申报，又如第二类中自由职业者的所得亦然。凡无行为能力人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所得额，则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申报之。

各类所得的申报期限，根据税法规定，列示如下：

(1) 第一类甲乙两项营利事业所得，应由纳税义务人于每年结束后三个月内，向主管经征机构申报之。

(2) 营利事业因合并、解散、歇业、清理或受破产之宣告，经结算后仍有所得者，应于结算日起20日内，向当地经征机构申报之。

(3) 第一类丙项一时营利事业所得，应于结算后一个月内申报之。

(4) 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应于各该月支付薪给报酬后一个月内申报之。

(5) 第三类证券存款所得，应于付给或领取利息后一个月内申报之。

上列各类所得的申报期限，除长短各有不同外，即期限的开始日期，也各有异，唯原则上以纳税的时期为准。关于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概于每次或每期结算后纳税，故以结算日为申报期限之起点。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则因其计算，或以月计，或以年计，而纳税则按月平均计算课税，故不以结算日为准，而以次月分第一日为申报期限之起点。至第三类证券存款所得，于每次或每期结算后支付利息时纳税，其有虽经结算而暂未支付者，仍须俟支付时纳税，故也不以结算日为准，而以支付之日为申报期限之起点。

限的起点。

以上已将负责申报者及应行申报的期限，分别阐明，现则可进而阐述申报的方法。凡有申报责任的自缴所得稅者或扣繳所得稅者，均应向当地主管經征机构或其他委托代发的各地行政机关、商会、同业公会、邮政局或经收税款机构，领取各项所得稅报告表，详为填列，尽于税法规定的申报限期内，申报于主管經征机构。

申报人在报告所得額时，除上述各项所得額报告表外，还须提出其他各种文据，用以证明其所得額的正确。此在自缴所得稅者，如第一类甲乙两项营利事业的纳税义务人，如财产目录，损益计算书，资产负债表，及其他足以证明其所得額的帳簿文据；在扣繳所得稅者，如第三类中支付存款利息的银行及支付股息的公司，除支付无记名证券利息和存款利息另以特种表式申报外，则为各个纳税义务人清单等。当地主管經征机构对于所得額的报告，发现有虚伪隱匿或逾期未报者，得迳行决定其所得額。如认为所申报之額有不实之处，得指定期限，要求申报人提出有关纳税額的证明文据。申报人对此项要求怠不履行时，当地主管經征机构得依调查或其他方法，迳行决定其所得額及纳税額，然后通知纳税义务人依期缴纳。

这里应当指明的是：当地主管所得稅經征机构工作人员，对于纳税人的所得額、纳税額及其证明关系文据，应绝对保守秘密，违者经查实后，须受法律上严厉的惩处。

2. 调查

调查为对纳税人所申报的所得額有怀疑时所施行的一种手续。纳税人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往往不惜触犯法纪，想出种种逃税舞弊的方法，或涂改帳簿、隐瞒收益、或捏造文据、凭添开支，或竟将一人或一企业的所得无理分割，以图所得稅的免征或累进率的减低，种种弊端，不一而足，所以调查手续，有时很属必需。按照税法规定，各地主管經征机构，对于自缴或扣繳所得

税者所申报的所得额，根据附呈的各项证明文据予以审阅的结果，认为内容正确，并无不尽不实之处，即可决定其纳税额；但若经审阅后，认为所报告的内容尚有不甚可靠或可滋疑虑之处，则可尽于收到报告后15日内，随时派员调查之，然后再决定其所得额及纳税额。

主管经征机构决定各类所得额及其应纳税额后，应即通知纳税义务人，纳税义务人接到上项通知后，如有不服，得于20日内叙明理由，连同证明文件，请求主管经征机构重行调查，主管经征机构应自接收请求之日起十日内，派员复查决定之。经复查决定后，纳税义务人应即依法定期限缴纳。

调查的方法，无非根据帐册文据，查核证明其所申报的所得额是否正确，与一般会计师的查帐相似。调查时，被查者不论为自缴所得税者或扣缴所得税者，对于调查人员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均应负责解答或陈述，而各项帐册文据，更应尽量提供，不得隐匿或拒绝。调查人员对于自缴所得税者应较对于扣缴所得税者为严格而精密。因扣缴所得税者仅为代理他人纳税，其本身并非即负担所得税者，除有串通舞弊情事外，为卸除责任计，一般不愿有所隐瞒，但自缴所得税者，因其与本身利害攸关，或不免发生逃税之举。至于复查的方法，也无一定，或仅根据申请人所述理由及其证明文件，与调查所得的结果互相复核，或更须将全部帐目单据重行检查一遍，须视事实如何而定。

3. 审查

纳税义务人对于复查决定的所得额及纳税额如仍有不服，则可于接到复查决定的通知书后十日内，申请审查委员会审查决定之，一面将复查决定的应缴税额如数缴纳，俟审查委员会审查决定后，依其决定为退税或补税。

所得额及纳税额经审查委员会审查决定后，纳税义务人如仍有不服，则可提起行政诉愿或诉讼。

1937年抗日战争以后，各地审查委员会以战事关系，尚未组

设，如迳以各主管经征机构的复查决定为最后决定，自非维护纳税义务人的利益。经行政院1938年10月18日议决救济办法两项如下：

(1) 在抗战期间，各地所得税审查委员会因战事关系不能组织成立，或不能召集会议者，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不服经征机构复查决定时，得省略请求审查程序，迳依诉愿法提起诉愿。

(2) 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依前项规定提起诉愿时，仍应照经征机构复查决定额缴纳税款，俟诉愿终了后，再为退税或补税。

4. 缴纳

负责缴纳所得税的人，视各类所得的性质而有不同，根据实行细则第27条规定，可列示如下：

(1) 属于第一类甲乙两项者，其所得税由各该业务负责人自行缴纳之。

(2) 属于第一类丙项者，如有支付所得的人或单位，由支付人或支付单位有关业务负责人代为扣缴；如无支付的人或单位，由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自行缴纳之。

(3) 属于第二类者，由直接支付薪给报酬的单位长官或雇主代为扣缴；无支付单位或雇主者，由纳税义务人自行缴纳之。

(4) 属于第三类者，由付息单位的业务负责人代为扣缴之。

至所得税的纳税期限，分别列示如下：

甲、扣缴的所得税：

(1) 第一类丙项一时营利事业所得之有支付人或单位者，其所得税于申报时扣缴之。

(2) 第二类中公务员薪给报酬所得，以及自由职业者和其他从事各业者之有支付人或单位者，其所得税于按月申报时扣缴之。

(3) 第三类证券存款所得，其所得税于结算支付息金申报时扣缴之。

乙、自缴的所得税：

(1) 第一类甲乙两项营利事业所得，其所得税于应纳税额决

定通知书送达后20日内缴纳之。

(2) 第一类甲乙两项营利事业的营业年度变更时，其新旧年度交替期间的所得税，于结算申报日起20日内缴纳之。

(3) 第一类甲乙两项营利事业因合并、解散、歇业、清理或受破产宣告，经结算后仍有所得者，其所得税于结算申报日起20日内缴纳之。

(4) 第一类丙项一时营利事业所得之无支付人或单位者，其所得税于结算申报日起20日内缴纳之。

(5) 第二类自由职业者及其他从事各业者薪给报酬所得之无支付人或单位者，其所得税，按月从申报日起20日内缴纳之。

经收税款机构，为中央银行或其委托的其他国家银行、邮政局或其他银行商号等，于收到扣缴所得税者或自缴所得税者的税款时，均应掣给主管经征机构规定的正式收据。

5. 退税

纳税义务人如有误纳或溢缴所得税税款者，得于缴纳税款之日起算，于三个月内向当地主管经征机构申请退税。主管经征机构如发觉纳税义务人误纳或溢纳者，也得代为申请退税。现将有关所得税退税办法的要点分述如下：

(1) 因核定税额计算错误，责任不属于纳税义务人或扣缴处所者，不论数额的大小，均予照退。

(2) 误纳或溢纳所得税款，出于纳税义务人或扣缴处所者，以纳税个人为单位，其数额满一元以上者照退。

(3) 纳税人申请退税，应从缴纳税款日期起算，于三个月内填具退税申请书，送由当地所得税主管经征机构审核，逾期无效。

(4) 各省市所得税主管经征机构收到所得额报告表，应尽于收到日起十日内审核，如发觉误纳或溢纳税款合于退税条件者，不待纳税人申请，应予退税。

(5) 各省市主管经征机构核定应退之税，应填发三联退税凭

证，三联退税通知书，送由该省中央银行国库分库拨付退款，同时以退税通知书附同空白退税三联收据送达原纳税人。

(6) 原纳税人收到退税通知书后，应即于空白退税三联收据上签名盖章，持同退税通知书向指定经付机构具领退款；该项通知书自发出日期起算，以一个月为有效期间。

(7) 纳税人逾期未领或无法投递的返还退税款项，仍由国库列入其他收入科目帐内。

至纳税义务人无论自缴或扣缴税款，如经主管经征机构审核发觉少纳税款者，仍得通知补税。

6. 奖惩

所得税的征收，原以税款的缴纳为其最终的手续，但为求其税收的确实起见，尚须对于扣缴及自缴所得稅者分别予以奖励或惩处。

关于奖励方面，根据税法规定，仅有一项，即凡扣缴所得稅者如能依照法定手续期限完成其扣缴职责者，当地主管经征机构得照其扣缴总额，给予 5% 的奖励金。若其扣缴单位系政府机构时，则此项奖励办法不适用之。又存款利息所得稅，已给予扣缴单位 10% 手续费，故不再发给 5% 的奖励金。

关于惩处，则可分为下列两方面阐述：

甲、关于申报方面，主管经征机构对于所得額的报告，发现有隱匿虛偽，或逾期未报，或虽已报告但对于要求提示有关纳税額的证明文据怠不履行时，除依调查或其他方法迳行决定其所得額及应纳税額外，并依下列规定处罚之：

(1) 不依期限报告或怠于报告者，科以 20 元以下的罚锾外，并得移请法院科以漏税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其情节重大者，得并科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若更触犯刑法伪造文书罪情形者，主管经征机构并应报请法院法办。

乙、关于纳税方面，纳税义务人或扣缴所得稅者不依期限缴纳税款，主管经征机构除移请法院追缴外，并依下列规定处罚

之：

- (1) 欠缴税款全部或一部逾三个月者，科以所欠金额30%以下的罚金。
- (2) 欠缴税款全部或一部逾六个月者，科以所欠金额60%以下的罚金。
- (3) 欠缴税款全部或一部逾九个月者，科以所欠金额一倍以下的罚金。

当地主管经征机构依上列各项规定科罚时，应向受罚人送达处分书，对于缴纳的罚款应给予以收据，并于处分书及收据上应加盖处罚机构的公章及负责人的名章。

七、结 束 语

中国所得税诞生，甫满周岁，即于1937年7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接着抗日战争全面开展，时势动荡，历经艰辛，真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所得税开征时，1936年度所得税收入预算仅列为500万元，是年决算实收达6487000余元，占中央全部收入0.5%，1937年度决算实收20,238,000余元，占中央收入5%，至1938年虽会会计年度改采历年制，征收时期仅有六个月，且又逢淡季，而年度决算也达8,604,000元，1939年度决算实收已达30,002,900余元，1940年度决算实收且达49,645,400余元，此后所得税收入逐年增加，至1943年度所得税收入预算列为17亿元，从1936年至1943年短短7年之间，其收入预算增加了340倍，已成为国税收入的主干，由全国税收第七位而臻第一位，由此足见所得税创办初期进展之迅速。唯是创行伊始，问题必多，况我国幅员广阔，经济环境复杂，寥寥法令条文，自不能概括无遗，为了把工作做好，力求税制周密和公允起见，根据事实需要，对税制法令又陆续制订了一些修正章程和补充办法。当然所有这些法令、章程、办法尚不够完善，还存在不少缺点，而且实践的时间也比较短，

但其中凝聚着创办人及其共事者为推行所得税、期望其顺利成长的许多设想和所费心血。回忆当年创办所得税的经过，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当时所制定和实施的所得税税收制度，或许尚有可供当前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国家税收制度的参考之处。爰就所知，作此简述。

·订正 质疑 补充·

对《我在西南的挣扎和 被歼灭经过》的一点订正

李钦哲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刊载宋希濂《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一文，此文说，1949年11月20日正午在中官渡发现情况，实应该是19日，他和二十兵团直属队离开江口不是21日，应该是20日。根据如下：

第一，从地图上找不到中官渡，但按他所讲的方位、距离、又在乌江北岸看，应该是中嘴，这里正是该六十四师渡乌江处。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胜利的战斗》一书。其中登有四二二团六连附政指导员成恩的《进川日记》，讲到该团于18日到火炉铺，19日下午2时二营攻占离中嘴五华里的土门垭，三营前出包围了中嘴，20日中午二、三营攻占了中嘴街，江上还有三只木船满载国民党军在南渡，打沉了两只。该团没有渡江追击。由此可见宋在江口听见枪炮声的时间不是20正午，应是19日下午。宋既然是19日在江口发现这情况，他又是“立即”命部队向白马山转移，就应当是20日，而不可能是21日。从他离江口时还不知六十四师已全渡乌江看，他是20日早上离开江口的。

第二、我当时在四二三团任政委，团的作战日志和战斗总结都记载团于20日上午到土坎场北山，发现乌江南岸白马山公路上有国民党军的车、炮及人员向西转移，故立即渡江去拦截。只因渡河工具困难，至黄昏才渡过两个营；又因公路上的敌军没发现我

军，在安置宿营。所以团没有立即发起攻击，将部队运动至公路附近，于21日拂晓向茶园村（离白马镇30华里）一带展开袭击，俘获二十兵团直属队1000余人，使宋及二十兵团机关和他们的战斗部队完全隔绝。由此可见宋和二十兵团直属队通过白马山是20日而不是21日，这才和我团20日在土坎场的观察相符合。宋文说他21日下午二时还在白马山，在我军已于21日拂晓就切断了公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他应是20日通过白马山到白马镇的。

对《游台日记》中 一些字句的订正

张 素 戎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18辑刊载了我1947年10月20日至11月1日的游台日记，经翻阅后，发现有几个错别字，有些字句也有欠当之处，趁此机会一并订正如次。

文中编者按语第一行“作者系张治中将军之女”可改写为“作者系张治中将军之长女”。

书中第42页第五行、第43页第五行的“斌妹”应改为“妩妹”，文中其他处凡是“斌妹”的一律改为“妩妹”。

第46页倒数第四行“先上一个冰盘”应改为“先上一个拼盘”。第47页第14行“用刀剜成三只脚”应改为“用刀刻成三只脚”。第48页第18行“一间梳洗室”应改为“一间盥洗室”。

关于《冯玉祥将军谈韩复榘》 的一点质疑

余湛邦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09辑刊载李平一《冯玉祥将军谈韩复榘》一文，文中说：“1938年1月20日蒋介石派张治中到冯玉祥的住处，征求冯对韩复榘的处理意见。”这可能是记错了。张治中在1937年9月下旬从淞沪前线下来，11月中旬被任为湖南省主席，同月25日到长沙莅任。当时湖南正乱得一塌糊涂，伤兵问题、兵役问题等使张治中忙得不可开交，12月和1938年1至3月都寸步未离长沙，1月18日还召集一个重要会议，不可能又奉蒋介石之命去看冯玉祥的。